

目 录

第一章

- “恐龙克格勃”的来历 (1)
- 政权内的政权 (5)
- 克格勃主席策划“8.19 事件” (11)
- “紧急状态委员会”和“阿尔法”突击队 (14)

第二章

- “肢解”“恐龙”报家仇 (18)
- 一条恐龙化作多条大蛇 (22)
- 给每条蛇订立“家规” (24)
- 对外情报的新法令 (25)
- 有助联邦安全的新计策 (27)

第三章

- 群“蛇”之头 (31)
- “明星”秘书 昙花一现。 (33)
- 雷布金的锦囊妙计 (36)

第四章

“变色龙”稳坐钓鱼台	(39)
惟利是图 顺应潮流	(42)
职业情报官升任一把手	(45)

第五章

反复嬗变的联邦安全局	(49)
被“炒鱿鱼”的克格勃将军	(51)
酒友反目成仇	(52)
“出气筒”与“替罪羊”	(54)
大水冲了龙王庙	(57)
公然允诺双重间谍	(59)
控制军队 易如反掌	(61)

第六章

叶利钦和保镖	(65)
贴身保镖的远见	(67)
总统卫队长成了“特工王”	(69)
欲壑难填 壮士断臂	(72)

第七章

守护世界最长的边界线	(77)
边防特工“不倒翁”	(79)
边界三千烦恼丝	(82)
边界问题 热点叠现	(83)

第八章

千里眼与顺风耳	(87)
无孔不入 耳目遍天下	(90)
窥视侦听对手秘密	(92)
车臣总统 命赴黄泉	(94)
为信息战做准备	(97)

第九章

“小恐龙”格鲁乌	(100)
业绩斐然 显赫一时	(103)
平安过渡 一脉相承	(108)

第十章

东西方特工初度“蜜月”	(111)
互派机构 联手出击	(114)
“山姆大叔”的如意算盘	(118)
苏联变节者 转危为安	(120)
美国叛逃者 生死茫茫	(123)

第十一章

美国力追穷寇	(127)
冷战后最大的双重间谍	(129)
俄罗斯“鼯鼠”又遭捕获	(134)
“看家犬”变成“入室狼”	(136)
老间谍闯美撩风波	(138)

第十二章

调整政策 奋力反击	(141)
大事化小的“坦克间谍案”	(144)
针锋相对 短兵相接	(146)
令人头痛的记者事件	(149)

第十三章

“北极熊”和“约翰牛”的较量	(151)
获得宽宥的叛逃者	(153)
总统大选前的间谍风波	(158)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161)
“变节熊”状告“约翰牛”	(163)

第十四章

角逐欧洲情报重地	(167)
对德间谍工作垮台	(169)
另起炉灶 重振旗鼓	(172)
俄法谍海 波诡云谲	(174)
巨人和侏儒之战	(178)

第十五章

建立稳定和睦邻友好地带	(182)
搜集情报的最佳跳板	(184)
俄日较量 由来以久	(187)
以色列特赦克格勃特工	(190)

小草绊倒大象	(193)
--------------	-------

第十六章

风起云涌 狼烟四起	(195)
恐怖活动 层出不穷	(197)
反恐怖之战 愈演愈烈	(200)
黑手党肆意横行	(205)

第十七章

政要们的护墙	(209)
惹人注目的总统卫队	(212)
保卫局的特种车队	(214)
一个安全保卫特工的自述	(215)

第十八章

昔日特工今何在	(218)
政坛刮起“间谍风”	(220)
商海弄潮儿	(226)
俄罗斯买办的崛起	(228)

第十九章

前克格勃高官著书立传忙	(231)
情报分析和通报内幕	(234)
回忆录中的忧思	(236)
一只离巢“乌鸦”的回忆	(239)

第二十章

怀念逝去的好时光	(243)
为克格勃树碑立传的博物馆	(246)
特工装备商业化	(248)
峰回路不转 前景难乐观	(250)

结 束 语

对华情报 引而不发	(254)
国内局势 乱麻一团	(256)
重振雄风 尚待时机	(258)

第一章

“恐龙克格勃”的来历

俄罗斯是前苏联的主要组成部分，而苏联是在沙皇俄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朝代政权虽然更迭，但它们的情报特工活动及其经验却一脉相承，并不断地得到发展。

沙俄的间谍活动可以追溯到公元1380年。当时还是莫斯科大公国的统治者顿斯基大公，在其宗主国蒙古人的金帐汗国建立了大使馆，大使丘特乔夫的任务被规定为与汗国的核心领导人物建立密切联系，搜集政治军事情报。到1480年时，伊凡三世统治下的莫斯科大公国终于摆脱了蒙古人长达240年的或紧或松的统治，赢得了独立。1533年，只有三岁的伊凡四世登基继位，这位后来被世人称为“伊凡雷帝”的人物，在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设立了一个正规的情报特工机构——秘密卫兵团。伊凡四世用它对内镇压各地贵族头领的反抗，维护中央集权的统治，对外则加速扩张步伐。伊凡雷帝使一个局促于内陆的小小俄罗斯公国变成了一个拥有波罗的海、黑海和东亚太平洋出海口的大帝国。

1682~1722年，彼得大帝在位时，沙皇俄国的情报特工又有了一个大的飞跃。这位彼得大帝除了让外交官大量利用传统的外

交途径搜集情报外，还亲自化名参加俄国出访团组的出访，他作为随员暗中仔细考察了荷兰、英国、奥地利等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科学技术，并利用这些搜集来的情报作为对他所统治的落后俄国进行改革的蓝图。彼得大帝在镇压了阿历克谢王子的叛乱后，下令成立了“秘密侦察办公室”，并发布建立告密制度的命令，强化了俄国反颠覆、反间谍工作。

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时又出台了新举措，他于 1776 年下令，在沙皇办公厅下面设立“第三局”。这个秘密警察机构在法国大革命时，曾想方设法地试图遏杀这场革命在欧洲特别是在俄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从而在当时被人们称为“世界宪兵”。到 1866 年，沙皇俄国又在军队的总参谋部内设立了第七局，从而有了从事军事谍报活动的专门化机构。

1891 年，沙皇办公厅第三局这个历史超过百年的机构又被扩建成为国家保安部。该部是沙皇俄国历史上的一个全能的情报特工机构，到 1916 年时，其特工人员有 1.5 万人。国家保安部在沙俄境内把秘密警察的网络和触角伸向各个角落，渗透进并瓦解掉了许多革命组织和民族运动，逮捕、流放和杀害进步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国家保安部还向外国派遣了大量间谍人员进行策反工作和窃密活动。在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部窃取了日本和德国的许多重要机密情报；北洋军阀张作霖早年就给沙俄当过密探；一战前夕奥匈帝国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列德尔上校也被其策反。

但是，沙皇对俄国的反动腐朽的统治，仅仅靠残暴而又精明的秘密警察来维持是不行的。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沙皇在国外的战争接连惨败，国内百姓饥寒交迫，终于激起了 1917 年的“二月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沙皇统治被推翻了，国家保安部也被瓦解了。

俄国的工人和士兵因不满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换汤不换药的饥

饿政策和国内接连不断的战争，很快在1917年又发动了举世闻名的十月革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这场革命中，带领群众建立了工人阶级统治的苏维埃政权（后来的正式名称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简称苏联，1922年12月30日成立）。但是，沙俄旧军官们和资产阶级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不断地进行暴动、捣乱破坏和暗杀活动，加上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以保护侨民为借口，进行武装干涉，支持反苏维埃的白匪军。为了保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列宁的指示下，由波兰贵族出身的革命家捷尔任斯基负责在1917年12月20日（这天成为现在俄罗斯也还在庆祝的“契卡人员纪念日”）创建了一个“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契卡”。就像当时的红军接受了许多旧军官一样，契卡也从沙皇特工机构中吸收了人才和汲取了经验，只不过现在的矛头是指向国内外的一切反动势力罢了。契卡成立之后25天，即1918年1月14日，列宁的汽车遭到一群恐怖分子开枪射击，幸好未有人受伤。但七个半月后，列宁又被女刺客卡普兰击中两枪而伤势严重，克里姆林宫司令员却未经审讯即把卡普兰杀死灭口。契卡紧追下去，终于将一个暗杀团伙挖了出来。就这样契卡很快发展成了一个万能的特工组织，它集情报、反间谍、保卫、逮捕、审讯、判决、关押和处决于一身，能够非常高效率地对敌人进行全面地镇压，实行“红色恐怖”（当然差错也不少）。契卡领导人捷尔任斯基因而也在世界特工史上被称为“恐怖之父”。1926年捷尔任斯基逝世后，他的名字曾被用来命名苏联特工机构总部卢比扬卡大楼前面的广场，他的塑像也长期耸立在该广场上，直到1991年“8.19事件”以后被推倒。

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斗争的需要，契卡这个机构的名称和职责有过多次改变：1922年2月它被改为内务部政治保卫局，同年11月脱离内务部，并改为政治保卫总局；1934年7月又改为国内安全总局，再次并入内务部；1942年又独立出来，扩建为国家

安全部；同年6月，国家安全部合并到内务部，同时另建进行反间谍、镇压反革命和投靠德国的俄奸的锄奸部（又名消灭间谍局）；1943年4月，随着卫国战争形势的变化，国家安全部从内务部又独立出来进行工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机构名称虽然有如此多的变化，但苏联这一段时期的特工活动，还是被统称为“契卡时期”，这些机构的成员也都自称为“光荣的契卡战士”。在捷尔任斯基之后的契卡领导人有号称“契卡诗人”的明仁斯基；有精通毒药使用的医生雅哥达；有进行肃反扩大化的叶若夫；有斯大林的老乡贝利亚等人。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军队不怕牺牲，英勇善战，也由于情报特工人员机智勇敢，既能深入虎穴了解敌情，又能守住门户保守机密，所以彻底打败了德国希特勒法西斯的进攻，也对日本法西斯的失败给予了最后一击。但是二战后，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又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盟主美国发生了对抗。虽然双方没有直接地明火执杖地打起来，可也展开了你死我活的长达40多年的冷战。

所谓冷战，也就是用除了直接军事冲突以外的一切手段来颠覆和打倒对方。冷战的最好工具莫过于特工机构了。早在1947年美国酝酿建立中央情报局等机构之前，苏联的莫洛托夫也向斯大林建议，应该把当时苏联国家安全部、外交部等机构的对外情报特工部门，还有军队的总参情报总局（格鲁乌）全都合并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有力的情报委员会，斯大林同意了这个建议。1946年10月，苏联正式成立了苏共中央情报委员会。但是这种七巧板式的拼凑，并不能使中央情报委员会的人齐心协力地开展好工作，因为来自各部门的人员门户之见极深，大家总是不能劲儿往一处使。中央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先后由莫洛托夫、维辛斯基、马立克、佐林、阿巴库莫夫担任，结果哪个人都不能使其有效地运作。到1952年，随着阿巴库莫夫本人被逮捕，中央情报委员会也被撤销，

所属成员仍回原来部门去各司其职。1953年3月，国家安全部也被撤销，其成员并入内务部。

但是美苏冷战的严峻形势，在客观上还是需要苏联有一个强大而又统一的情报特工机构来发挥作用。所以，斯大林逝世后出来掌权的赫鲁晓夫，于1954年3月命令他的亲信、内务部第一副部长谢洛夫另起炉灶，从党、政、军各部门抽调精干人马，组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英文缩写KGB），简称克格勃，谢洛夫任第一任主席。

克格勃的建立，从此结束了苏联情报特工机构长期变化不定的局面。克格勃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所建立的规模最大的特工机构，其总部有1万多人，分布在国内外的情报、反间谍和技术侦察等部门的人员有20多万人，还有陆海空等军种俱全的边防部队30万人。这个机构的总人数超过了50万人，每年的经费总额高达100亿美元左右，所以世人把克格勃称为世界特工机构中的“恐龙”。

政权内的政权

克格勃从谢洛夫（1954～1958）开始，历经谢列平（1958～1961）、谢斯恰米内依（1961～1967）、安德罗波夫（1967～1982，其人后来升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费多尔丘克（1982～1984）、切布里可夫（1984～1988，其人后任苏共政法委书记）、克留奇科夫（1988～1991）这些主席的苦心经营，终于成为一个功能齐全、权

力庞大的国中之国，或者用日本新闻界的说法，克格勃成了“政权内的政权”。

根据《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条例》，克格勃的任务有：一是对外进行间谍情报工作（包含进行暗杀、颠覆、破坏和欺骗宣传等特别行动）；二是负责国内反间谍工作（包含跟踪、讹诈来苏联的外国人、控制政府要害部门和军队等）；三是同持不同政见者、民族分裂主义者和地下宗教人士作斗争（包含对他们进行监控、败坏名誉、送精神病院、判刑劳改等行动）；四是负责保卫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安全（包含给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人配专职保镖、保卫来访的外国政要等）；五是监督控制通讯联系（包含保证本国密码通讯的安全和监听、破译外国的通讯密码）；六是保卫苏联漫长的国界（所以以前人们说，到苏联第一个见到和最后一个告别的总是克格勃的人）；七是执行苏联中央和政府交给的其他特殊任务（如对外从事秘密外交活动，对内整顿有关行业和地区的秩序等）。

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克格勃不惜叠床架屋，设立了名目繁多的机构部门，它们有四个总局（相当于部级）、七个管理局和五个独立处。下面对其逐一作简单的介绍，因为现在的俄罗斯各情报特工机构基本上来自克格勃的各有关部门。

第一总局，主管对外间谍情报工作。下设S局（非法活动管理局），负责选拔、训练、派遣和管理通过非法和秘密途径去国外活动的间谍情报人员。S局内设八个处，其中第八处为行动执行处（V处），专门负责政治性的暗杀、绑架和破坏活动，该处还曾在古巴设有游击战联络处，协助古巴情报总局进行特种行动；T局（科技情报管理局），负责搜集外国的核武器、导弹、宇航和其他高科技情报以及先进的军工技术情报；K局（国外反间谍局），负责对外国情报和保安机构的渗透，负责苏联驻外机构的安全保卫工作并监视苏联驻外工作人员。第一总局有十几个直属处，它们是：I处（情报处），主管分析、发送从国外搜集来的情报，每天

出版一期简报供苏联中央政治局成员参考；A处（特别宣传处），主管欺骗宣传即心战工作，目的在于混淆国际视听，给敌对国家脸上抹黑；R处（计划分析处），负责对外派出去的特工和情报站的工作作出分析，并向总局提出他们的工作质量及改进建议的报告。还有八个直属处是针对世界各地的地区处，负责对特定地区和国家派遣有合法和公开身份（如外交官等）作掩护的情报官员，开展日常的情报工作。另外六个处是专职业务处，如用来指导控制东欧卫星国的情报机构、用来与间谍情报人员进行秘密联络、用来管理档案等。

第二总局，主管国内反间谍反颠覆工作，下设三个业务局、八个业务处和八个地区处。第一个业务局是政治安全局，下面按照方向和业务设立了19个有关的业务处，负责对来苏联的外国人和本国中一些人的间谍活动进行调查处理；第二个是工业安全局，通过下设的六个处来对重工业、兵工厂、经济中心和科研单位进行安全保卫，对来访的工商人士进行监视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加以策反；第三个是技术支援局，负责设计制作特工器材，如研制色情间谍用的在黑暗中拍摄的红外摄像机、贴在乳房上的可用于发报的假乳头等。八个属于总局领导的业务处负责内部调查、纪律处分和电脑业务等工作，八个地区处主要在列宁格勒、基辅、中亚、西伯利亚等地从事工作。

第四总局，主管边防军的总局，下面设有司令部、后勤部、海军局、空军局、边防技术研究室等部门。该总局拥有30支陆军总队、7支个海军巡逻队和5支空军大队，共计30万人。其任务除了守卫苏联边境外（1989年边防军抓获了3400名非法越境者），还派军事顾问和技术专家帮助外国训练边防军，或派情报特工人员越境去刺探消息、进行破坏和煽动叛乱等活动。

第五总局，即秘密警察总局，秘密警察机构最早源于德国普鲁士，是一种绝不公开警察身份而又能行使警察功能的机构。克

格勃第五总局的任务是，“镇压一切来自国内外的反动分子和反动活动”。它是克格勃的意识形态的心脏，专门暗中反对各类政治上的敌对者。第五总局下设按数字排列的1~9局，另外还有一个直属处，它们分别暗中从事控制苏联国内的宗教信仰、压制民族主义分裂分子、侦察和监视持不同政见者活动（如苏联氢弹之父、诺贝尔奖获得者萨哈诺夫曾被长期监控），并审查进口书刊，查封地下刊物，同时负责管理在克格勃总部内的卢比扬卡监狱。叶利钦在1987年被赶出政治局并丢掉了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后，曾有二至三年受到第五总局的全面监视，住宅被窃听，通信被截收。所以，早在整个克格勃被瓦解之前的1990年初，该总局就被撤销，并在它的基础上成立了宪法保卫局。

克格勃除了以上四个总局外，还设有七个管理局。它们是：

1. 军队管理局（第三局），向上至国防部、总参谋部下至一些重要的基层部队派驻或明或暗的代表，行使对整个苏联军队的监督职能；

2. 技术管理局（第六局），生产特务器材，从各式照相机到各种暗杀武器等，操纵卫星、雷达等技侦装备，驾驶间谍飞机和间谍船只；

3. 监视监察局（第七局），对常驻外国人和国内敌对分子进行长期的监控，拥有“阿尔法”突击队；

4. 通讯管理局（第八局），编制本国通讯密码，从事外国通讯的监听和密码破译；

5. 警备管理局（第九局），国外称其为“斯大林卫队”，负责党政要员和国外重要来宾的安全保卫工作；

6. 行政管理局，负责后勤和福利工作，如特供商店、休假胜地；

7. 人事管理局，负责机构成员的考评和升迁等工作。

后来，由于工作发展的需要，克格勃还不时新建和调整了一

些局，如第十二局，负责在世界各地的电子窃听等工作；第十五局，负责核武器指挥系统的安全工作；第十六局负责在国外侦听和研究密码破译的技术工作。

除了上述这些总局、管理局外，克格勃还有五个独立处。它们是：

1. 特别案件调查处，负责大案要案的调查；
2. 活动经验分析处，收留叛逃过来的外国间谍，如金·菲尔比等人，让他们发挥一点“余热”；
3. 国家通讯处，监督管理全国的通讯系统；
4. 保卫处，守卫克格勃总部各办公大楼；
5. 档案登记处，对克格勃的重要档案进行登记整理。

克格勃除了自己权力广泛的众多机构外，还通过外派干部，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苏联外交、外贸、新闻、民航、科学院、研究所等许多部门的工作，使它们为完成克格勃的任务而效力。如苏联的拥有1万余人的外交使节服务团，便是受克格勃严格控制的，外国驻苏联的机构必须通过该服务团来雇用厨师、司机、秘书、译员和服务员，他们这些人的职责是既为外国人服务，同时也必须为克格勃工作。该服务团还设立了技艺高超的建筑安装公司，能够在为外国人建造高质量的办公楼住宿楼的同时，也神不知鬼不觉地安装上灵敏的窃听装置。

克格勃网罗了苏联社会上的、党政军各部门里的最优秀的人才，他们拿着高薪（比军队还高），享受着良好的福利条件（去国内外度假，上特供商店买紧俏商品、舶来品），拥有着被授予的广泛权力，因而形成了一个精明、强干和高效的工作网络。克格勃名义上属于苏联部长会议领导，实际上受苏共中央政治局控制，真正意义上被苏共总书记一人所指挥。所以，克格勃凌驾于苏联政府之上、军队之上甚至党组织之上，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政权内的政权。

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创建和成长时的内外环境都极其复杂，民族各异，宗教不同，地域辽阔差异大，周围的国家也常常虎视眈眈。早年的德国、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都敌视它，甚至想颠覆它。因此，苏联能够存在和发展，不能不承认，早期的契卡和后来的克格勃是发挥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特别是作为国中之国的克格勃，自成立以后，一直以保卫苏联国家安全为己任，外国评论家也一直把它看作是苏联的最主要的基石。到后来克格勃还是苏联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主要工具，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势均力敌的对手。

不幸的是，苏联一直未能摆脱斯大林建立的那套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粗放型的数量上的经济增长达到极限后，苏联的经济发展失去了活力，人民的生活也长期得不到根本的改善，综合国力的提高也受到了限制。1985年上台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作为清醒地看到了苏联弊病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却在试图对苏联进行改革时，把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了。他对苏联过去的历史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一下子引发了苏联社会的全面混乱。对此情景，戈尔巴乔夫又幻想依靠克格勃的力量，能够帮他度过社会转折时期的难关。

于是，进一步扩大克格勃权限的《苏联国家安全机关法》在1991年5月16日正式颁布。在这项法律的基础上，戈尔巴乔夫要求克格勃同经济怠工斗争，对产品分配作监督，反对“黑市”和“影子经济”。为了进一步加强克格勃在制止社会动乱和民族分裂活动方面的能力，使它除了拥有原来的边防军和反恐怖突击队外，还授予了它若干空降师的指挥权。

然而，这时的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却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已经走进了一条死胡同，所以克格勃不仅要凌驾于党政军之上，而且要凌驾于苏共总书记和苏联总统之上，彻底扭转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向，从而稳定苏联的局势。

克格勃主席策划“8.19事件”

生于1924年的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早年当过工人，靠刻苦自学而成才。1956年，他被派往苏联驻匈牙利大使馆任三等秘书，认识了当时任苏联驻匈大使、后来任第四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同年匈牙利发生要求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动乱时，克留奇科夫积极协助安德罗波夫，采用欺骗和镇压的手段平息了骚乱。安德罗波夫在1969年出任克格勃主席时，克留奇科夫也被调进克格勃工作，并在初期被派往纽约任情报站站长。1973年，克留奇科夫升任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到1978年又升任克格勃主席兼第一总局局长，并晋升为上将。1988年，当拥有元帅军衔的克格勃主席切布里可夫明目张胆地批评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时，戈尔巴乔夫就对切布里可夫来去留问题进行了考虑。当戈尔巴乔夫就对切布里可夫来去留问题进行了考虑，表面上让他任主管整个苏联政法工作的中央书记，实际上把掌握实权的克格勃主席位置交给了出过洋、思想开放的克留奇科夫。

克留奇科夫在国外工作多年，办事非常圆滑，人称“微笑将军”。戈尔巴乔夫让他来接管克格勃的初衷，是希望他既能让克格勃适应改革的变化，又能让克格勃保护改革的顺利发展。一个政治家成败的关键往往在于能否用好人，而戈尔巴乔夫无疑被克留奇科夫的表面现象迷惑了。克留奇科夫上任后，对克格勃作了一些改革，声称要推行“公开化”，要使情报能够客观、公正并有预

见性，把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的第四总局改为宪法保卫局。他还表示要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等西方情报机构进行合作，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反对核扩散等。正因为此，1990年2月，克留奇科夫又被任命为总统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是苏联当时新设立的最高决策核心。

克留奇科夫在接管克格勃工作的同时，也为自己的亲属安排了一些好“位子”。他的儿子谢尔盖曾当过以驻法国大使馆一等秘书为掩护身份的克格勃国外情报官；他的妹夫多罗维克是苏联和平委员会的主席，这一职务是由克格勃任命的；他的外甥女嫁给了克格勃雅克斯将军的儿子，雅克斯将军作为第一总局一处的处长，负责克格勃在北美的秘密情报活动。克留奇科夫的家族无疑是过着好日子的。

1990年3月，苏联实行了建国71年以来的首次大选。原来苏共所选派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等城市的市长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在人民代表的竞选中落选，莫斯科军区司令、北方舰队司令和爱沙尼亚克格勃头目也都在竞选中败北。但是，受到克格勃监视的叶利钦等人却以高票当选。叶利钦随后被选为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第二年又通过竞选当上了俄联邦总统，重新在苏联政治舞台上崛起。苏联的主要城市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市长职位，也都落到了民主派波波夫和索布恰克的手中。

此情此景，让克留奇科夫等人看到，这样的改革肯定要使苏联也要使克格勃遭到灭顶之灾，当然也会使他小家庭的好日子难以为继。一向圆滑的克留奇科夫要硬干了，他和戈尔巴乔夫本来同是安德罗波夫的门徒，现在决心拼个你死我活了。1991年7月21日，他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放出风声，说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执行一项计划，目标是在苏联境内鼓动敌对活动，促使社会分裂和经济崩溃。这里克留奇科夫扯上美国中央情报局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一个月前，美国国务卿贝克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

情报，向苏联外长别斯梅尔特内赫透露：克留奇科夫等人在策划罢免戈尔巴乔夫的阴谋。但戈氏还是信任这位他亲手提拔的克格勃主席。7月23日，克格勃、内务部和国防部党委发表联合声明，指责俄联邦总统叶利钦在本月23日发布的关于非党化的命令，是旨在分裂和排挤苏联共产党，违背苏联宪法和结社法，加剧政治冲突，建立独裁制度的命令。到1991年8月，克留奇科夫和国防部长亚佐夫开始密谋，怎样才能罢黜戈尔巴乔夫，就像当年勃列日涅夫他们罢黜赫鲁晓夫一样，以便停止改革，保存原有体制。

1991年8月17日下午4时，克留奇科夫在莫斯科郊外克格勃的一个代号为“ABC”的秘密据点请客，参加者有政府总理帕夫洛夫、苏共中央书记舍宁、国防部长亚佐夫及其麾下的几位将军。在这顿“工作餐”上，克留奇科夫直言不讳地攻击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果，他说：“我不断向戈尔巴乔夫通报困难的局面，但是他没有作出足够的反应。他总是打断我的话，改变话题。他不相信我说的情况……”最后，他胸有成竹地建议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派一个代表团去见正在克里米亚福罗斯度假的戈尔巴乔夫，让他向委员会交权。他要是不交权，就让他呆在克里米亚，然后宣布他病了，让副总统亚纳耶夫任总统。他还补充说，他可以得到最高苏维埃的批准。俨然一副太上皇的样子。随后其他人补充了一下意见，事情就这么决定了。

克留奇科夫这样有信心，是因为当日他已经下令让克格勃对戈尔巴乔夫加以严密监视了。谁同总统有来往，打了哪些电话，他都了如指掌。克格勃还给戈尔巴乔夫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起了代号，戈本人是110，夫人赖莎是111，他的女儿、女婿和外孙都有代号，8月17日的克格勃监视日志写道：“上午12时40分，111号离家；下午5时45分111号在海滩；下午6时20分，112号（戈氏女婿）离开游泳池；下午111号离开海滩。”8月18日，克留奇科夫听到戈尔巴乔夫打电话说定于次日要飞回莫斯科，结束

休假时，立即实施了政变计划。

“紧急状态委员会” 和“阿尔法”突击队

1991年8月18日下午，克留奇科夫指示克格勃警备局局长普列汉诺夫、总统办公室主任博尔金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巴克拉诺夫等五人带着装甲车和特工军人，一起来到黑海度假胜地福罗斯，要求正在度假的戈尔巴乔夫把总统职权移交给副总统亚纳耶夫。当这个要求被戈尔巴乔夫坚决地拒绝后，这五人便下令把总统别墅包围得水泄不通，并带走了总统副官麦德维杰夫，留下了克格勃警备局副局长格列拉诺夫。克留奇科夫进一步命令，对戈尔巴乔夫实行全面隔离，把边防部队和边防海上巡逻艇也交给普列汉诺夫及其副手格列汉诺夫指挥，封锁停放着两架总统专机的别利别克机场，在海边的了望塔上派人用双筒望远镜监视总统别墅里的人的一举一动。克格勃通讯局特工控制了戈尔巴乔夫的所有通讯设施，不准其对外联络。这一切，使得堂堂的苏联总统只能靠一只短波收音机来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了解随后三天苏联所发生的事变。

当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克留奇科夫打电话把正在总理帕夫洛夫家喝酒的副总统亚纳耶夫等人请来，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克留奇科夫一开始就故作神秘地说：“发生了重大灾难。”接着他讲，克格勃得到消息，有人要武装起义，占领首都的战略要

地，其中包括电视台、火车站和议员们住的饭店。他还说发现了一张黑名单，在座的各位及其家属都将被处决。普列汉诺夫从旁作证说，他也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了同样的情况。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则言之凿凿地说，戈尔巴乔夫“可能是心脏病发作或中风”，医生不让别人打扰，我们刚从总统别墅回来，亲眼见到的。就这样，在现代的苏联，一场中世纪式的政变行动开始了。

8月19日凌晨6时5分，俄罗斯塔斯社播发了一条重大新闻，宣布由于戈尔巴乔夫健康问题不能履行总统职责，根据苏联宪法第127条第7款，亚纳耶夫自1991年8月19日起履行总统职责。接着宣布在苏联某些地方实行为期六个月的紧急状态，并组成八人的“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有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长普戈、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苏联农民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和苏联国营企业联合会会长季贾科夫。“8.19事件”爆发了。

随后，“紧急状态委员会”派出克格勃特工和军队接管了苏联电视台、电台、报社等新闻舆论机构。亚佐夫又派出坦克部队进攻俄联邦议会大厦——白宫，那里是叶利钦组织人力抵抗“紧急状态委员会”接管政权的指挥中心。但是，派去进攻的坦克在压死一些围堵的人后，由于围堵者的坚持和宣传，忽然掉转炮口，宣布起义，站到了叶利钦的一边。亚佐夫又命令伞兵司令格拉乔夫出动伞兵，格拉乔夫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伞兵师长列别德更是公开拒绝服从命令。这时就只能靠克格勃了，克留奇科夫下令，让克格勃精锐的反恐怖活动、反有组织犯罪的特种部队“阿尔法”突击队去进攻白宫。

“阿尔法”突击队成立于1974年，是安德罗波夫亲自提议建立的，受克格勃主席指挥和第九管理局管理。它开始时只有30名成员，任务只是反恐怖，布列宁是“阿尔法”小组的最早领导。该

小组后来成了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专门执行特殊环境下的特殊任务，更擅长于打城市攻坚战。其官兵不仅骁勇异常，而且十八般武艺无不精通。他们每个人都配备对讲机、马卡罗夫式手枪、冲锋枪……还有榴弹发射器、便携式反战车飞弹等高级武器，而且专业分工精细：狙击手、蛙人、爆破手、无线电报务员……各种专业有机组合，形成格外强大的战斗力。1981年12月，“阿尔法”小组在一次行动中成功地救出了被两名恐怖分子扣为人质的25名学生。1989年又两次成功地解救了被困在萨拉托夫和苏呼米的人质。攻占白宫的任务，自然又非“阿尔法”突击队莫属。

在政变前的一天，即8月18日，“阿尔法”突击队就被发动起来，准备战斗勤务。第二天，突击队长卡尔普欣传达了于8月20日凌晨3时攻占白宫的命令。但两位副手戈洛瓦托夫和贡恰罗夫这时已站在反对政变的立场上，他们问：“这是谁下的命令？”卡尔普欣宣布说：“这是政府的命令。”他们继续追问：“什么样的政府？”卡尔普欣只是重复：“政府的命令，3时发动进攻，我们潜入白宫控制大厦。”最后，“阿尔法”突击队的领导人们坐在一起讨论，经过研究他们决定不执行命令。然后，他们把各分队长召集起来，请他们对这道命令发表意见。各分队长也表示，将不执行命令。“阿尔法”突击队领导人随即指示各分队长召集自己带领的全体官兵，问一问每个人对命令的意见和他们要为自己作出什么样的决定。20分种后，所有的人都召集起来了，并且一致表示，整个“阿尔法”突击队不执行这项命令。拒绝执行命令，对于这支部队，对于这支部队的军人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就这样，“紧急状态委员会”很快便王牌使尽。与此同时，美国情报机构却在帮叶利钦的忙，布什总统甘心冒暴露美国窃听能力的后果，把国家安全局侦听破译到的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通过加密的地面通信线路进行的指挥命令内容告诉了叶利钦，从而使

叶氏知道了军官中谁也在抵抗“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迅速把他们拉到自己一边来。政变即以失败告终。内务部长普戈自杀身亡。克留奇科夫再现圆滑本色，亲自到黑海把戈尔巴乔夫迎回莫斯科。

但经过政变洗礼的叶利钦，这时拥有了真正实权，他派人迅速逮捕了参与“8.19事件”的有关负责人。克格勃领导人中被抓起来的，除了主席克留奇科夫外，还有第一副主席格鲁什科和阿格耶夫、警备局局长普列汉诺夫等人。被解除职务的克格勃其他领导人有副主席杰米索夫、第一总局局长舍巴尔申、第二总局局长季托夫，还有负责监听等工作的第十二局局长等人。

克留奇科夫等“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人，在“水兵寂静”等监狱被关了几年后，虽然都被释放出来，但已成了整天只会发发牢骚的无足轻重之辈。为了改善晚年的生活，克留奇科夫写了一本名为《私人案卷》的回忆录。据说这类书在俄国内外的销路还不错。

第二章

“肢解”“恐龙”报家仇

1991年“8.19事件”以后，戈尔巴乔夫虽然得以复出，但已成了空架子（到1991年12月21日，苏联被11个加盟共和国签署的《阿拉木图宣言》宣布停止存在，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氏即宣布辞职），叶利钦获得了比他更为实际的权力和更大的影响力。重要的决策没有二人一致的意见就不好办。但在如何整制克格勃的问题上，二人就有高度的一致性，他们都认为，要趁热打铁，打碎克格勃这个敢于监视叶利钦、囚禁戈尔巴乔夫的犯上作乱的国中之国，消灭政权内的政权。于是两人一致推荐巴卡金出任最后一任克格勃主席，由他从内部“肢解”这条“大恐龙”。

维·瓦·巴卡金是位有影响的民主派人士。他1933年出生在西伯利亚基谢廖夫市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60年毕业于新西伯利亚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后任建筑局工长、工程主任、总工程师、局长等职。1964年他加入苏联共产党，1973年起任克罗沃市党委第二书记，1983年任苏共中央督导员，1985年至1987年任基洛夫州党委第一书记。他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进入苏联领导阶层，1988年10月至1990年12月任苏联内务部部长，深受戈

氏的赏识和倚重。1990年底，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议员团的一些成员指责巴卡金“支持各共和国的分裂主义势力”，并要求戈尔巴乔夫罢他的官。戈氏不得已解除了他的内务部长的职务，但又以巴卡金“熟悉政治工作，若不使用将会造成很大损失”为由，任命他为苏联国家安全会议成员，负责国内政策。1991年6月，巴卡金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出马和叶利钦等人一起参加竞选俄罗斯联邦总统的职位，竞选失败后，便赋闲在家养老。但“8.19事件”一发生，他便积极活动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设法东山再起。8月21日，巴卡金同俄联邦总理西拉耶夫一起前往克里米亚接戈尔巴乔夫回莫斯科，随后即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

克格勃在巴卡金的心里，公仇私恨都不少。他当内务部部长当不下去，就是因为苏共党内保守派指责他的内务部在制止分裂活动上不如克格勃得力。作为民主派，他又很反感克格勃的滥用权力。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祖父是被克格勃的前身契卡处决的，克格勃的档案处一直保存着有关他祖父的档案材料。他祖父原是无党派人士，任西伯利亚粮食采购办事处的会计，1937年未经法院审讯就被特工部门处决掉了。由于这些因素，巴卡金在摆弄克格勃时，就感到特别来劲。

巴卡金行动果断迅速，基本上按照美国的模式来“肢解”克格勃。在1991年9月初召开的苏联调查国家安全机构活动的委员会上，他宣布了第一步的“肢解”方案：让第三总局及其边防部队独立出去，退出克格勃编制；让第九局及其警卫力量（素称“斯大林卫队”）也脱离克格勃系统，由总统直接掌管；国家通讯处也独立出去。到10月底，苏联又宣布中止《苏联国家安全机关法》，撤销克格勃，成立新的安全部门来代替它。巴卡金对此解释说，新的安全部门要从原来的克格勃50万人的规模上精减到3~5万人。到12月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正式宣告，克格勃在法律上已被撤销，过渡时期在它的基础上成立跨共和国安全局、中央

情报局和设有边防军司令部的保卫国界委员会。巴卡金自己摇身一变，成了苏联短命的跨共和国安全局的唯一一任局长。

巴卡金作为最后一任克格勃主席和临时性的跨共和国安全局局长，除了对机构和工作大砍特砍外，也对特工人员进行了“清洗”和整肃。他在就任局长后不久，在卢比扬卡特工总部大楼（外面广场上的特工创始人捷尔任斯基的塑像已被推倒）的办公室里，得意地对来访的西方记者说：他的跨共和国安全局只留了3.9万人，许多人因参与“8.19事件”而被解除职务扫地出门，其他一部分人也请提前退休，大多数人因机构变动而被调到其他政府部门工作，总共裁减了90%的人员。巴卡金还说，他按照美国新闻媒介的要求，亲自查阅了过去25年的克格勃的档案，但没有找到可以证明克格勃参与了谋杀美国总统肯尼迪和1981年刺伤教皇活动的证据。

最使克格勃旧成员和苏联保守派愤怒的是，1991年12月15日，作为即将下台的跨共和国安全局局长巴卡金，把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斯特劳斯请到自己办公室，亲手将原克格勃隐蔽安装在美国驻苏大使馆内的窃听器分布图和技术说明交给了他。过了四天，俄罗斯联邦就宣布由它来接管苏联的情报安全各机构，巴卡金因事情做得太绝而再次离职赋闲。到12月23日，莫斯科市苏维埃反犯罪行为委员会主席佐波夫指责巴卡金出卖国家核心机密，犯了叛国罪。俄罗斯苏维埃“八月事件”调查委员会说，巴卡金将苏联科学工作者的成果拱手相让，这在西方国家之间也是绝无仅有的。于是，俄罗斯总检察长受理了国家机密维护者提出的对巴卡金进行立案调查的报告。

但是巴卡金有恃无恐，并在1992年1月29日对记者亮出了王牌。他说，他把窃听器分布图交给美国人，事先曾得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俄联邦总统叶利钦两人的同意。接着巴卡金解释说，这也是正确的做法，只有这样，才能妥善地解决九年前的那

场政治丑闻。他指的是当时美国在莫斯科由苏联人施工的新的使馆大楼落成后，美方以大楼藏有窃听器而拒绝使用，但苏联克格勃矢口否认，说美国没有事实根据瞎指责。美国技术专家反复探测，得到的结论也是事出有因但查无实据。后来，美国政府只好把该大楼上面要用作保密办公的几层拆掉，全部从美国运进建筑材料，重新由美国人自己施工重建。为此又花费了3亿美元，但心里还是不踏实。巴卡金交出了窃听器分布图和技术说明，确实了结了美国人长达九年的一块心病，但也深深地刺痛了在窃听器上花了无数心血的老克格勃特工的心。尽管如此，因有两位总统的同意，对巴卡金的法律追究最终只能不了了之。

说巴卡金对克格勃有公仇私恨要报是可以的，但要说他自己有三头六臂的能力来把克格勃摆脱掉（巴卡金后来写的回忆录名叫《摆脱克格勃》），显然不是唯物主义的。

“大恐龙”克格勃之所以不能像“小恐龙”格鲁乌（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简称）那样被俄罗斯完全继承，而且在苏联瓦解之前就被扼杀，主要原因不在于巴卡金的好恶，而在于它本身不像一般的特工机构，不甘心局限于正常的情报反间谍工作范围内，卷入国内政治太多太深，滥用权力，树敌过多。另外，还在于克格勃在业务工作中不择手段，主要表现在：如大搞色情间谍，让“燕子”（女色情间谍）戴上能发信号的假乳头或避孕帽，一旦外国男士坠入色情陷阱时就能及时发出信号，以便当场捉奸进行讹诈；让“乌鸦”（男色情间谍）到国外到处勾引女性，用感情欺骗来获取机密，甚至进行换妻晚会来交朋友套取情报；设计烟盒手枪、毒刺伞等暗杀工具，把一些流亡在外的苏联、东欧的知名人士干掉；随便把持异议的知识分子定为精神病人强行关押，加以“治疗”。诸如此类，使得克格勃名声太臭，导致千夫所指，不疾自僵。巴卡金不过是顺势加了一把力而已。

一条恐龙化作多条大蛇

苏联瓦解后，美国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伍尔西说，美国的对手苏联像一条巨龙一样是死了，但在人类社会的丛林里又出现了许多条毒蛇。巨龙会一口把人吞掉，毒蛇也会一口把人咬死。伍尔西本意是说国际形势依然有危险，美国还是需要有中央情报局这样的匕首加斗篷的勇士。但用他的话来比喻苏联克格勃撤销后出现的俄罗斯联邦各情报特工机构，肯定也是很形象的。

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克格勃虽然被“肢解”被裁员，但它的各个“肢体”被俄联邦接收改造成自己的情报反间谍机构后，就像一条恐龙变成了多条大蛇，依然有很强的活动能力。下面就是这条恐龙所化出的蛇：

1. 俄罗斯联邦对外情报局。它来源于克格勃第一总局，1991年12月3日，该总局被改名为苏联中央情报局，到12月19日被俄联邦接管，改名为对外情报局。一直到今天，对外情报局没有大的变动，成员约有2万人，其中有1000多人被派往国外工作。对外情报局设有政治局、经济局、科技局、反情报局、特别局（负责对独联体等国家的情报合作）、计划分析局、新闻和社会联络中心等部门。

2.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它来源于克格勃第二总局（反间谍）和第三管理局（军事反间谍）等部门，它们在1991年12月3日曾改名为跨共和国安全局，12月21日又改俄罗斯联邦安全和内务

部，1992年初独立成为俄联邦国家全部，1993年12月被压缩为俄联邦反间谍局，1995年4月3日再改名为俄联邦安全局。该局下面设有行动局、军事反间谍局（控制军队）、战略保卫局、经济局、情报分析局、侦察技术局、反恐布局、侦察局、社会联络中心等21个局级单位。经过多次变化，其成员也从巴卡金时期跨共和国安全局的近4万人发展到现在的10万余人。

3. 俄罗斯联邦保卫总局和总统安全局。它们来源于克格勃的第九局（警备）、第四总局（秘密警察）中的若干政治侦查单位、第八局（通讯联络）中的若干通讯部队，以及原克格勃的“阿尔法”和“信号旗”两个突击队（这两个突击队有时根据总统命令常会变化隶属关系），并且还指挥着原克格勃的第118伞兵旅和第27摩托化步兵旅。这两个局在人员组成和工作任务上有相当大的一致性，区别主要在于前者负责整个国家的领导人和国外来宾的安全，后者则主要负责叶利钦总统的安全，带有私人卫队的性质，这也是当时叶利钦为了酬谢自己的私人保镖科尔扎科夫，因人设庙才成立的。由这两个局组成的保安队伍共计有4万多人。

4. 俄罗斯联邦边防局。它来源于克格勃的第三总局（边防军）。1991年“8.19事件”后，该总局被改为独立的边防军司令部，1992年6月17日又并入国家全部，1993年12月再次独立成为一个部级联邦机构——边防局。联邦边防局的组成成分边防军和边防机关两个系统，前者包括陆、海、空三军；后者由对外情报机关、作战机关、边检机关、边界警卫、国际条法司、后勤与技术保障机关、边防高等院校及中央直属部队构成。现在的边防局有20多万人马。

5. 俄罗斯联邦通讯和信息局。它来源于克格勃的第八管理局（通讯）、第十二管理局（电子窃听）和国家通讯处，类似美国负责全球无线电监听工作的国家安全局。

由此可见，现在俄罗斯联邦的所有情报反间谍特工机构，除

了军队的格鲁乌之外，无一不是发源于克格勃本身的。而且在总人数上不亚于克格勃时期，各机构的将军人数更是大大超过克格勃时期，最典型的如联邦通讯和信息局过去只有18位将军，现在则有70位将军。所不同的是，现在的俄罗斯情报反间谍特工机构不再是大一统了，而是按照美国的模式，各自独立，各司其职。然而，还是有人常常发出疑问，克格勃真死乎假死乎？

给每条蛇订立“家规”

不管克格勃算是真死还是假死，反正从这条恐龙身上变出了几条大蛇。但现在的俄罗斯已不同于前苏联的人治社会了，是一个讲法制的国家，他们给这些情报反间谍特工等强力部门都制定了明确的法律，并随着形势的变化还不断地加以修正。

制定法律的目的主要有二个：一个是鉴于苏联时期的特工机关动辄把人送入劳改营或精神病院，造成“扩大化”的冤假错案的教训，现在给每条蛇订些规矩，让它们带着镣铐跳舞，就不会由蛇“变”螃蟹到处横行，就不致于尾大不掉重蹈覆辙；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大一统的机构不存在了，以往就容易发生有功大家抢，有过大家推的现象，有了各自的法律后，就可以避免重叠冲突，也减少了空白疏漏。

对外情报的新法令

俄罗斯最早在1992年7月8日就颁布了一部《俄罗斯联邦对外情报机关法》，共有四章二十五条，开头就阐述：“本法规定俄罗斯联邦对外情报机关的地位、组织和活动原则以及规定对其活动进行检察和监督的制度。”第一章是总则，讲明了俄罗斯的对外情报机关、对外情报活动、对外情报活动的法律基础、活动原则、活动目标、活动权限、经费、情报保护和舆论界的关系等问题。其中规定：“大众传播工具发表有关对外情报机关的有机密内容的资料并且已经扩散，给对外情报机关及工作人员造成物质和精神损失的，要依法承担刑事和民事责任。”

第二章是对外情报机关活动的组织，包括对外情报机关的组建、工作范围、领导；情报活动的方法和手段；情报提供给谁以及情报机构在同国内外有关部门的合作关系；“禁止在俄罗斯领土上对俄罗斯联邦公民使用情报活动的方法和手段。……有关情报活动中使用特殊方法和侦察手段的法规属国家机密”。

第三章是对外情报机关的工作人员、基干人员、秘密帮助人、家属等的相应法律地位和社会保障。其中规定：情报机关的干部“可以到各部委、国家机关、企业和组织中担任职务”，以便掩护工作。对外情报机关干部执行侦察任务死亡时，“给死者家属相当于15年生活费用的一次性补助金”。“国家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帮助对外情报机关的基干人员及其家属在俄罗斯领土以外执行侦察

任务被拘留或逮捕时无条件释放”。

第四章是对外情报机关工作的检察和监督，主要规定由最高苏维埃监督其工作情况，总检察长监督其执法情况。

1995年12月8日，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又通过了新的《对外情报法》，该项法律经叶利钦总统在1996年1月10日签署后生效。下面对其略作介绍。

这部新的《对外情报法》，是一部针对所有涉及对外情报工作的机构的总的法律，共有五章。第一章总则规定了俄联邦对外情报机关的地位、活动原则、目标、权限、经费和物质技术保障等问题。其中：“俄联邦对外情报机关是联邦安全保卫力量的组成部分。其使命是在个人、社会和国家遇到外来威胁时，使用本法规定的方法和手段保障他们的安全。”其目标是向联邦总统、议会和政府提供为政治、经济、国防、科技和生态领域决策所必需的情报，为联邦安全提供军事技术保障。各对外情报机关要遵循下列原则：（1）包括俄联邦维护安全的力量在内的联邦权力执行机关的权限分立；（2）尊重法制，尊重个人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3）接受联邦总统和议会的监督；（4）公开和秘密的方法与手段相结合。第一章总则还规定，各对外情报机关的经费由联邦预算开支，物质技术保障由联邦政府统一提供，或向企业、机关和组织获取。

第二章规定了各对外情报机关的活动，即“情报活动由俄联邦独立的以及属于其他联邦权力机关的对外情报部门进行”，具体分工为：（1）俄联邦对外情报局负责政治、经济、军事战略、科学技术和生态领域，以及保障俄联邦驻外机构的安全；（2）俄联邦国防部对外情报机构负责军事、军事政治、军事技术、军事经济和生态领域的情报工作；（3）俄联邦总统属下的通讯和信息局负责依靠电子设备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和科学技术领域的情报工作；（4）俄联邦边防局对外情报机构负责边境、经济特区和大

陆架方面的情报工作。并规定，俄联邦总统是对外情报机关的总领导，由他确定情报活动的任务、控制和协调对外情报机关的活动，任命对外情报机关的领导人等。

第三章规定了对外情报机关工作人员及其合作者的法律地位和社会保障等事项。其中可授权对外情报机关同自愿参加情报工作的人建立秘密合作关系，实行情报人代号制度和为了安排情报人员而利用其他部门的设施。

第四章规定了检查和监督对外情报机关的工作方式和方法。议会将依法对对外情报机关的工作进行监督，总检察长及其任命的专职检察官负责监督对外情报机关执行联邦法律的情况。

第五章是附则，规定本法自正式公布之日起生效。

有助联邦安全的新计策

由于俄罗斯联邦国内政治局势的多次动荡，以及反间谍安全机构的多次改变，所以有关联邦安全方面的立法出台了好几个。

1992年3月5日，颁布了《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法》，开头写道：“为了巩固保障个人、社会和国家安全的法律基础，规定安全系统及其职能、规定安全机关的组织和财政拨款程序，以及规定对安全机关的活动进行监督，特制定本法。”共有五章二十二条，其中对俄联邦安全系统和俄联邦国家安全会议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有关前者是这么说的：“安全系统由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国家、社会组织 and 团体以及参与维护国家安全的公民和调整安全

领域关系的法律组成。不得建立没有法律根据的安全机关。”有关后者，该法称：“国家安全会议是为总统准备有关保障安全方面的决定的宪法性机构。……国家安全会议由主席、秘书、常务成员和成员组成；国家安全会议主席由俄联邦总统兼任；国家安全会议常务成员包括总统、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部长会议主席；国家安全会议秘书是常务成员，由总统任命并经最高苏维埃审批；国家安全会议成员必须是各部和主管部门的领导，包括经济、财政、外交、司法、国防、安全、内务、生态、自然资源、保健、对外情报及其他部门的领导人，由总统任命并经最高苏维埃同意。”

1992年7月8日，又颁布了《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机关法》。该法开头便说：“本法规定联邦安全机关的使命、任务、组织体制和活动的法律基础、职责和权力、人员和手段以及对国家安全机关的活动进行检察和监督的制度。”共有五章二十四条。第一章总则规定联邦国家安全机关的任务有八项：“（1）揭露、防止和制止外国情报机关针对俄罗斯联邦的情报和破坏活动；（2）搜集有关威胁俄罗斯联邦安全的情报；（3）揭露、防止和制止法律规定属联邦安全机关侦查的犯罪活动；（4）进行反恐怖主义斗争；（5）协同检察、内务和其他国家机关揭露、防止和制止有组织犯罪、营私舞弊和贩毒活动；（6）在职责范围内保护国家机密；（7）使用侦缉手段保障俄罗斯边境安全；（8）向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提供有关威胁国家安全的情报。联邦国家安全机关的其他任务必须有法律作出规定。”

第二章联邦国家安全系统说明了其组成机关，主要有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部及其地方机关、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及其他军队的反间谍机关、边防机关。

第三章规定联邦国家安全机关的职责和权力。

第四章讲述联邦国家安全机关的人员和手段。

第五章讲明了对联邦国家安全机关活动的监督和检查，包括

议会监督、总统监督、法院监督和检察院监督四条。

1993年7月1日，叶利钦又签署了一项《关于修改和补充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机关法的法令》，对一些具体的问题加以完善。

另外，俄罗斯还在1992年3月13日制定了《俄罗斯联邦侦缉行动法》，共有六章二十条。其中，第一条：“侦缉行动是国家侦查机关为保障个人生命、健康、权利和自由以及国家、社会的财产和安全，依照现行法律在其职权范围内采取公开和秘密的侦缉措施的一种行动。”第二条：“侦缉行动的任务是，查明、预防、制止和破获犯罪，包括预备、实施或者已经实施犯罪的人犯；通缉在逃犯和查找失踪者。”第六条：“只有在使用其他方式不能完成本法第二条规定的任务时，可以采取侦缉措施。侦查机关在遵守保密原则的前提下，可采取以下侦缉措施：（1）讯问公民；（2）调查；（3）搜集典型案例，以便对照分析；（4）购买物品进行检查；（5）检查物品和文件；（6）监视；（7）掉包；（8）勘查房屋、大厦、设施和交通工具；（9）检查邮件；（10）检查被判刑者的信件；（11）监听电话和其他交谈；（12）从特殊通讯渠道截获信息。这些措施只有法律才能加以改变或增补。”第十一条：“下列机关有权实施侦缉行动：（1）内务部；（2）国家安全部；（3）边境保卫机关；（4）对外情报局；（5）俄联邦保卫总局。这一机关名单的变动和增补须经立法程序。”

俄国家安全部在1993年底被改组为俄罗斯联邦反间谍局后，叶利钦总统于1994年1月5日签署第15号命令，批准了一项《俄罗斯联邦反间谍局条例》。这项条例的一个特点是鉴于前国家安全部长巴兰尼科夫闹独立性，甚至直接反对叶利钦总统，所以专门设立了一条来限制局长的权力。其第八条要求：“成立俄联邦反间谍局局务委员会，其成员有局长（兼委员会主席）、第一副局长、副局长和反间谍系统领导人。……局务委员会对有关反间谍机构的重要活动进行讨论和作出决议。局务委员会的决议由多数

成员表决通过，并由局长签署命令予以公布。当局长和局务委员会之间发生分歧时，局长在执行决议的同时，将发生的分歧向俄罗斯联邦总统报告。局务委员会成员同样可将自己的意见向总统报告。”

到1995年，叶利钦感到自己对特工机构的控制能力已经增强了，需要特工机构发挥自己的活力了，所以在同年4月3日又签署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机构法》，将联邦反间谍局改组为联邦安全局。根据该法，改组的联邦安全局的活动范围明显扩大，它不仅要从事反间谍活动，而且还有对外情报搜集职能以及同犯罪活动作斗争等职能。

第三章

群“蛇”之头

俗话说，蛇无头而不行。那么群蛇无头更像群龙无首，非造成一片混乱不可。俄罗斯的一群情报反间谍安全特工机构，自然要有一个头，俄联邦总统是法定的头。但俄联邦总统日理万机，事情往往照看不过来，于是仿照美国，设立国家安全会议来讨论重大国家安全工作问题；设立国家安全会议秘书，协助总统处理国家安全事务，照看特工机构等政府强力部门。所以，国家安全会议及国家安全会议秘书在相当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群“蛇”之头。

按照《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法》中的规定：“国家安全会议是为总统准备有关保障安全方面的决定的宪法性机构……国家安全会议秘书是常务成员，由总统任命并经最高苏维埃审批。”因此这个“蛇”头的作用大小，一看总统的放权程度，另外就看担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的人的声望和能力了。俄罗斯政局的稳定性现在还与美国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叶利钦总统也不像美国总统能把相当大的权力授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如尼克松对基辛格）一样，来授予俄联邦的国家安全会议秘书。这里还有点像传统所谓的国之利器，不可授人的味道。不仅不愿授权过多，连国家安全

会议秘书们的任期一般也不让太长，以免其势力坐大。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的办事机构由几个局、一个秘书处和其他一些处组成。安全会议的日常事务由安全秘书处理，秘书直接由总统领导。

对于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的地位和职责，俄安全会议的副秘书马尼洛夫在1995年1月23日曾发表一篇文章，进行了形象的解释。他说：“为了设想俄罗斯安全会议在我国生活中、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弄清楚这个最重要的宪法机构在什么样的坐标系统内发挥作用是重要的。假如说，这样的系统是由三个坐标组成。其中，第一个是基础坐标，它是基本的也可以说是整个系统的主要坐标——即俄罗斯的国家利益；第二个是对这些利益的挑战、威胁以及这些利益的风险、危险；第三个是保障实现和捍卫国家利益的力量、手段和资金。作为坐标系统起点的三个坐标的交叉点就是俄罗斯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这大体上是俄罗斯安全会议发挥作用的~~政治空间~~和生存领域。”该文还介绍，国家安全会议由总统任主席，总理和~~安全会议秘书~~任常委，上下两院议长、副总理、外长、国防部长、内务部长、联邦安全局长、对外情报局长、边防局长等为成员。

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建立以来的历任秘书，有影响的寥寥无几。1992年6月，在比邻罗马尼亚的摩尔多瓦和其境内的俄罗斯人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后，当时的国家安全会议秘书斯科科夫算是发挥了作用，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斯科科夫以俄罗斯总统和最高统帅的名义，对前去了解那儿局势和驻在当地的俄第十四集团军战备的列别德少将下达了五项命令：（1）用任何可行的方法阻止流血；（2）在必要的情况下保证军人家属的安全撤离；（3）将所有军事基地、武器弹药仓库置于自己的严格控制之下；（4）为装有武器弹药的列车顺利通过创造条件，必要时可经过乌克兰领土；（5）尽力使摩尔多瓦方面不采取抵抗政策。国家安全会议秘书斯科科夫的五条锦囊妙计，不仅为稳定

当地摩尔多瓦人和俄罗斯人之间的爆发性局势起了决定性作用，还为列别德接任俄第十四集团军司令，并以此为跳板坐上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秘书的宝座打下了基础。

“明星”秘书 昙花一现

列别德当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秘书虽然只有 121 天，但却是最耀眼的“明星”秘书，真正的群“蛇”之首，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更当不长。

军人出身的列别德却特别缺少“服从是军人的天职”的观念。在 1991 年的“8.19 事件”中，他作为陆军空降师的少将师长反对国防部长亚佐夫参加“紧急状态委员会”而初为人知；1992 年他作为在摩尔多瓦的俄第十四集团军司令而名声远扬后，就连续发表声明反对盖达尔政府一边倒的亲西方政策；1993 年列别德又开始直接批评叶利钦的内外政策，说叶利钦应该“到菜园子里去种草莓”；1994 年，他公开反对叶利钦和强力部门出兵车臣的举措；1995 年他公然抗命，拒不执行国防部长格拉乔夫下达的改编第十四集团军的命令。

列别德从口头发表意见，到行动上不服从命令，那就只好让其解甲归田了。但在今天已经民主化的俄罗斯，是非自有公认。这位对一切都敢于直言不讳的将军受到了俄罗斯公众的广泛欢迎，所以退役后他没有当老农而是正式从政了。他在 1995 年底轻松地当选上国家杜马议员，1996 年 6 月又单枪匹马竞选俄罗斯联邦总

统，结果爆出大冷门，名列第三，获得了 15% 的选票，得到了 1100 多万人的支持。当时，叶利钦和俄共的久加诺夫虽然名列第一和第二位，但都没有到达当选所必须过半数的选票，而且两人选票数十分接近。所以，列别德虽然没有可能在这次竞选中当上总统，却完全有能力在第二轮投票中决定谁来当总统。叶利钦在顾问们的建议下，尽释前嫌，利用现任总统的有利条件，对自己很反感的列别德封官许愿，任命他为国家安全会议秘书，使列别德的支持者投了自己一票，从而蝉联俄罗斯联邦总统。

列别德这个国家安全会议秘书是作为和叶利钦结盟让其再次当选总统换来的，所以影响力就非同一般。列别德上台前后，他就要求叶利钦免去了安全会议秘书洛博夫、总统安全助理巴图林、国防部长格拉乔夫、第一副总理索斯科韦茨、联邦安全局长巴尔苏科夫和总统安全局长科尔扎科夫等人的职务，为他工作扫清障碍。列别德在 1996 年 6 月 18 日走马上任，很快显示了自己的才干，特别是在俄罗斯对车臣的越南式战争上。列别德通过他亲自和车臣领导人马斯哈多夫的直接谈判，终于达成了双方都能接受的《哈萨尤尔特协议》，使俄罗斯摆脱了这个战争泥潭，也为他自己赢得了声望。而原来的国防部、内务部和联邦安全局用尽了各种公开及秘密的手段，都没有找到出路。接下来正当他还想处理北约东扩这个“烫手山芋”时，他和同僚及老板的矛盾突然激化。

原因是列别德太看高自己看低别人，认为什么事只有他才能处理好，权力欲也太强。他在处理国家方面事务的同时，还要求扩大安全会议的职能，提出要拥有就国家大政方针和任命国家高级官员等重大问题直接向总统提出建议的实权。他以国家安全为由，不仅把国防、内务、安全情报等强力部门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直接干预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的事务。列别德还提出增设副总统职位，毫不掩饰欲当俄第二号人物的企图。他甚至公开向叶利钦发起挑战，表示要提前接班。列别德在向德国《明

镜》周刊发表谈话时称，他“不一定要等到2000年才成为叶利钦的接班人”。在叶利钦心脏病重不得不准备手术时，他再次公开表示“总统有病就应交出权力”，毫不讳言他准备重新竞选总统，并同原来有矛盾的也被叶利钦抛弃的前总统安全局长科尔扎科夫结盟，组成竞选班子，擅自拉开了新一轮竞选帷幕。

这样的所作所为，使安全会议秘书列别德几乎得罪俄罗斯领导集团中的所有人物。首先不买列别德账的是内务部长库利科夫。这位内务部长年方50，是在当今俄罗斯政坛上亦非等闲之辈的少壮派，他不仅得到叶利钦总统的支持，而且是切尔诺梅尔金总理的亲密盟友。库利科夫自1995年7月任内务部长以来，一直负责解决车臣冲突，主张坚决用军事手段来解决车臣问题。列别德另起炉灶的解决方法本来就让库利科夫窝着一肚子火，但踌躇满志的列别德不谙其中的微妙，反而多次声称车臣战争的责任应归咎于库利科夫，认为库利科夫根本不配当内务部长，应该辞职。列别德还要求叶利钦作出选择：“列别德和库利科夫两个人中必须有一个下台。”被逼到绝境的库利科夫精心组织了反击，他于1996年10月16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公开指责列别德同车臣武装分子和刑事犯罪组织相勾结，“明确选择了暴力夺取政权的方式”；同时还罗列了证据：列别德指示其副手“建立一个类似并行总参谋部的新机构”，并组建名为“俄罗斯军团”的特种部队，为“发动政变做准备”，有1500名车臣反政府武装战斗队员将给予支持，等等。

库利科夫的发难，尽管含有“莫须有”的成分，但受到了各路权势人物的欢迎。因为列别德攻击过切尔诺梅尔金总理，声称他的经济政策没有维护国家利益，而有利于某些“势力集团”；指责过总统办公厅主任丘拜斯，说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充当俄罗斯的“摄政王”；甚至同自己的好友、国防部长罗季奥诺夫也吵翻了脸，攻击他在军队的改组是在“犯罪”。所以，西方记者评论

列别德时说：“这是一头闯进瓷器店的公牛。”在库利科夫记者招待会的第二天，切尔诺梅尔金总理在召集俄强力部门领导人开会时，大家表示认为库利科夫讲话中引用的一些材料属实。这样，列别德就百口莫辩了。

1996年10月17日下午6时，因病久未露面的叶利钦总统突然出现在公共电视台新闻节目的荧屏上，他神情严肃地宣布：撤销列别德的国家安全会议秘书职务。叶利钦在说明原因时还文绉绉地引用了俄国作家克雷洛夫的寓言作比喻，他说，国家的领导集体应该团结一致，拧成一股绳来工作，可是现在却成了“天鹅、虾和梭鱼”各行其是（寓言讲上述三者共拉一辆大车，天鹅向上飞，梭鱼往水中游，虾又朝岸上爬，结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大车仍原地不动），而使他们分开的正是天鹅（列别德在俄语中恰好是“天鹅”之意）。

安全会议的明星秘书就像彗星一样，在俄罗斯政坛上空亮了一下就消失了。至于列别德是像叶利钦当年一样跌倒再起，还是像克留奇科夫他们一样永远跌到了政治边缘，只有让时间老人来说明了。

雷布金的锦囊妙计

叶利钦罢了列别德的官后，任命上届国家杜马主席雷布金为安全会议秘书。雷布金担任杜马主席期间，处事稳健，既同叶利钦配合默契，又善于同各方打交道，是为俄罗斯上层各派所接受

的人物。雷布金上任后首先声明，“坚决拥护关于解决车臣危机的各项和平协议，将尽一切努力使车臣走出危机”。随后，等叶利钦的心脏搭桥手术完成并康复后，他又帮着处理了有关北约东扩的问题。经过半年的磨练和思考，雷布金在1997年4月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关于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想》，为今后国家安全会议的具体工作指出了方向。

雷布金说：“国家迫切需要一个全国性的纲领性的文件，即国家安全构想。”这有下列几方面的原因和内容：（1）应该把俄罗斯民主的国家制度稳定下来，使之根深蒂固；（2）尽管俄罗斯一些地区的情况仍很复杂，但俄罗斯的完整性和不可分割性仍不容置疑；（3）新俄罗斯意识到自己置身于国际社会；（4）目前，在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内外政策、军队建设、经济 and 情报方面的一些观点、立场、纲领和战略比较分散；（5）俄罗斯保障安全的整个制度都应该符合目前国际形势的复杂现实，符合本国的经济条件以及社会对变革的准备程度；（6）国家最高领导人同意和批准的国家安全总构想应该做调整工作，协调各级国家机关的工作，也就是说从内部和外部使国家得到加强；（7）必须深思熟虑地和合理地分配本国目前远非无限的资源。

在同一篇文章内，雷布金还表明了国家安全会议的工作应该以下列一些主要原则为基础：（1）各种安全的一致、相互联系和平衡，其优先性的变化取决于不断变化的局势；（2）保障国家的政治、经济 and 情报手段占优先地位；（3）国家安全系统的工作服从于俄联邦宪法和各种法律；（4）根据时间、条件、力量和资金，提出现实的任务；（5）只按国际法原则并严格按照本国法律采取武力措施（其中也包括军事措施）；（6）根据俄罗斯联邦的制度支配人力和资金，在俄联邦国家权力机关、联邦主体和地方自治机关之间分配权限；（7）俄罗斯将积极地和有平等权利地参加世界一体化进程，以及保障国际安全的对话。

总之，雷布金认为，“保障俄联邦安全的体系应该有远见，能及时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防止出现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这样，就“有可能在实施建成民主和繁荣的俄罗斯这一战略方针的过程中达到民族和睦。在即将进入 21 世纪的时候，俄罗斯最终具有自身稳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

第四章

“变色龙”稳坐钓鱼台

俄罗斯联邦对外情报局虽然是一块新招牌，但担任其第一任局长的叶甫根尼·普里马科夫却是苏联时代的老牌特工和老牌政治家。他在苏联瓦解到俄罗斯联邦独立的政治剧变中，就像有一种叫变色龙的四脚蛇一样，能随着周围环境色彩的变化来变化自己的皮色，从而避免各种敌视者进攻的危险，为自己找到生存和发展之路。

普里马科夫于1929年出生在乌克兰的基辅，随后移居格鲁吉亚首府。因他母亲当时要做两份工作，他也就只好在缺少家长管教的街头长大，以致有人后来说他早年当过土匪。其实，他天资聪明，自幼到大就爱买书看书。1953年，普里马科夫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专长是阿拉伯语。毕业后，他公开从事的职业是《真理报》驻外记者，苏联科学院专门研究中东问题的院士。

就在普里马科夫当记者和学者的同时，他用化名“马立克”积极为克格勃效劳，从事对西方的冷战。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俄国情报官员讲，每当普里马科夫院士到

某个中东国家访问时，那里的克格勃代表总能接到一封电报，指示其做好接待工作，要确保他的安全，并让他感到愉快。到达目的地后，普里马科夫常让克格勃官员用秘密经费为其购买昂贵的礼品送人。回国时，他也总是大包小裹的不少。这在克格勃的秘密活动开支帐目中，可以见到有关此类支出的记载。至于他出访期间的任务和目的，当地的克格勃官员无权过问。

普里马科夫才华出众，学识过人。他作为国际知名的中东问题专家，凭着与克格勃的密切关系，更靠着他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和灵活的政治手腕，不断地向权力核心迈进。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统治时期，他以自己的反西方观点和在中东黎巴嫩等国的广泛活动，逐渐成为苏联在中东地区同美国对抗、进行冷战的一员大将。

进入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年代后，普里马科夫及时调整了自己的观点，积极追随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终于在1988年成为戈尔巴乔夫的中东问题顾问，从而得以进入克里姆林宫决策层，并大出风头。

那是在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美国国务卿贝克风尘仆仆地进行穿梭外交，组成了一支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准备讨伐伊拉克的萨达姆。与此同时，会讲阿拉伯语、又是萨达姆的老朋友的普里马科夫作为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特使，与贝克针锋相对地在中东搞起了穿梭外交，目的是要让伊拉克自动撤出科威特，同时劝阻中东各国不要参加美国为首的战争行动。普里马科夫的外交活动，使美国布什政府极为恼怒，因为美国先礼后兵花了不少精力和金钱，萨达姆一概不理，现在调兵遣将就绪，箭在弦上，一举可以射倒萨达姆了，半路上却来了个普里马科夫要阻止美国动武，岂不是大煞风景吗？但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普里马科夫这位老对手的底细早有了解，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们把普里马科夫身上有部分犹太人血统的情况，大肆在中东阿拉

伯人中渲染，使其人格和建议都不受信任。加上萨达姆又固执己见，毫不退让。这一切导致了普里马科夫的海湾“和平使命”以失败而告终。

可是，这一活动使得普里马科夫乘飞机飞来飞去的景头和美国贝克的一样，频频出现在全世界的电视机屏幕上，他虽败犹荣，名声大振。当时就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1991年4月又被任命为苏联国家安全会议成员，进入了国家制定重大决策的核心圈子。

1991年发生“8.19事件”时，普里马科夫立即发表声明，谴责“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违反宪法”，要求从城市撤走装甲车，以免发生流血事件，保证戈尔巴乔夫的人身安全。“紧急状态委员会”失败后，普里马科夫在9月30日就出任克格勃第一副主席兼第一总局局长，配合巴卡金对克格勃进行整顿。同年12月3日改任苏联中央情报局局长，12月26日又改任俄联邦对外情报局局长。直到1995年，普里马科夫才离开对外情报局，出任俄联邦外交部长。这里可以看出，他显然要比昙花一现的巴卡金高明得多。

普里马科夫在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统治的各个时期，一直都是步步高升。特别是在叶利钦统治时期，西方传媒评论说，其核心圈内的成员的更迭像天气一样变化无常，而普里马科夫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舅）稳坐钓鱼台，并且权势还越来越大。普里马科夫的诀窍和本事全在于能变化调子赶时髦，所以舆论界给他送了一个“变色龙”的绰号，这是普里马科夫变的一面。他也有不变的一面，那就是他始终办事乖巧，保持远见卓识。他担任俄联邦对外情报局长后，手下都是将军，有关部门建议给他授予上将军衔，他一口拒绝，却要了许多将军的名额授给下属。你说乖巧不乖巧？当了将军，后来就不宜出任外交部部长了，你说他有没有远见？

惟利是图 顺应潮流

克格勃被撤销，苏联遭瓦解，俄罗斯虽然接收了原苏联国家机器的各个部门，但经济恶化，经费减少，政局动荡方向不明，如何让原苏联的国家机器能新的环境下生存并运转起来，确实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在和普里马科夫一样的强力部门和护法机关的同僚中，不少人都干不下去了。如国防部长格拉乔夫，除了对叶利钦愚忠之外，束手无策，使世界上一支最强大的军队不断地腐败瓦解，连小小的车臣反政府武装都解决不了，自己也以被撤职告终；国家安全部长巴兰尼科夫，野心勃勃，另找靠山对抗叶利钦，也被撤职逮捕；内务部长叶林，面对社会上日益高涨的恐怖浪潮，无力打击，只好下调到对外情报局当个副局长；和叶利钦曾共患难的总统安全局长科尔扎科夫，头脑简单，不识大局，好心帮倒忙，结果也被赶出核心圈子。但是，“变色龙”普里马科夫领导下的对外情报局奉行了英国政治家的名言：“没有永恒的敌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他在对外情报局内外广结善结，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不仅稳定了队伍（虽然牢骚不少），而且做出了成绩。

对外情报局的总部设在莫斯科西南部的环城高速公路附近的一幢 21 层高的建筑物里。它的工作性质和任务在《俄联邦对外情报机关法》等法规里都有规定，当然，有些任务经常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普里马科夫担任对外情报局长时，几乎每年要公开谈论该局的任务。例如，1994 年 10 月 15 日俄《劳动报》刊登了

他的《冷战结束后情报机关干什么》的文章；1995年12月21日俄塔斯社又播发了他在庆祝俄对外情报局成立75周年（从契卡成立之时算起）大会上的讲话，其中都大量谈到了该局的任务。归纳起来，有下列几个方面：一是跟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局势变化；二是注意外国的科学技术的变化，包括军用和民用两方面的；三是与国际恐怖主义和核扩散作斗争；四是搜集外国经济情报，防止他们对俄罗斯掠夺；五是注意独联体国家动向和北约东扩的动向；六是警惕好斗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七是积极帮助执行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八是不允许俄罗斯领土分裂，等等。

为了完成这些有助俄罗斯安全和发展的任务，普里马科夫在局内、国内和国际上都采取不讲敌友只讲利益的态度。在对外情报局内，他真正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开展工作，他充分肯定克留奇科夫领导下的情报部门的成绩和干部的奉献精神，赞扬他们忠于祖国，热爱本职工作，善于思考，工作效率高，个人素质好，还每年搞一次“契卡人员纪念日”活动，以示不忘传统，等等。其中最关键的一着是，普里马科夫大量提升部属为将军，尽管现在工作人员比过去减少了许多，但将军人数却大大超过了克格勃时期。

普里马科夫还积极安抚原克格勃的离经叛道者，这部分人往往能力极高，个性极强，意见不合或得不到重用，就对自己的组织反咬一口，如果不加安抚，就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曾被克留奇科夫剥夺了军衔和荣誉奖章的原第一总局国外反间谍局局长卡鲁金少将，普里马科夫重新给他恢复名誉，并聘他为对外情报局的顾问，视作好朋友。卡鲁金也投挑报李，不再随意攻击情报机关了，并且在1994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第一总局：我对西方情报与间谍活动32年》一书中，张冠李戴，说正是1985年叛逃的原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霍华德，应该为数十名为美国效劳的在苏联和东欧的间谍的暴露负责。卡鲁金以当年当事人的身份来胡

说一通，就是意在帮助普里马科夫掩盖他们安插在美国中央情报局里的真正“鼯鼠”埃姆斯。

普里马科夫甚至对叛国投敌的前克格勃特工也放一码。叛逃英国的原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站长戈尔季耶夫斯基，一直呼吁让其还在俄罗斯的妻子女儿出国和他团聚，到了普里马科夫时他同意了，并且还同意俄对外情报局的官员和戈尔季耶夫斯基一起在国际情报会议上讨论东西方之间的情报合作问题。能说善写的戈尔季耶夫斯基，现在对普里马科夫和对外情报局的口碑不错。

在国内，普里马科夫也让对外情报局新设立的新闻和社会联络中心积极向各界宣传他的机构及其作用，以求得大家的了解和支持。他身先士卒做公关，有份报纸上曾刊登了一幅有关他个人的讽刺画，一个大胖子，头戴院士帽，身披黑斗蓬，神秘又可笑，斗蓬上写着“间谍 007 普里马科夫”。普里马科夫见了不以为忤，反而给这位漫画艺术家寄去一瓶伏特加和一张自己的名片，以示欣赏。这样的公关也可看作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吧。普里马科夫还让情报专家和研究分析人员到莫斯科的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去开设一门新的主课，名叫《当代对外情报工作的地位和作用》，他还亲自去上了第一课，主讲新形势下对外情报局的任务，显示了他的情报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的态度。同时，普里马科夫也强硬地顶住了当时俄罗斯外交部和新闻机构要求他撤走情报人员的压力。他通过叶利钦总统向大家宣布，凡是谁需要用国家的外汇到国外工作，谁就有义务协助对外情报局开展工作。

在对外国的情报工作上，普里马科夫也作了重大调整。他的对外情报局放弃了以前一直把美国作为假想敌的做法，关闭了 30 多个与俄国没有多大关系纯粹是为了拆美国墙脚的驻外情报站和间谍据点，如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地区的，还有像新西兰这样的国家的。俄罗斯加强了和美国、德国等国家之间的情报交流，互派了身份公开的情报联络官。同时，俄对外情报局在重点国家和地

区展开了前所未有的重点攻势。如对美国本土，过去只有少数外交官和记者出入，现在则有大量商人、学者、旅游者、移民甚至卖淫的妓女进出，简直多如过江之鲫，其中混杂了不少俄罗斯特工，美国更是防不胜防。在德国，由于老大哥的小兄弟东德及其国家安全部的不复存在，俄对外情报局便迅速建立起了自己的谍报队伍。

对外情报局工作的如此调整，得到了叶利钦总统的肯定，也受到了国家杜马的好评。叶利钦为了使自己再次竞选上总统，就在1996年1月9日把一味亲西方不注意俄国自身利益的外交部长科济列夫撤下，换上了不空谈敌友只谋取利益的实用主义者普里马科夫，由他来主管俄罗斯的外交工作。这一人事变动，在国内受到了欢迎，也引起了西方警惕，因为普里马科夫长期在和西方暗斗，这下子变成明争了。不过当时大多数的舆论认为，他不是天生的反西方派或亲西方派，而是天生的务实派，不会与西方蛮干，只是讨价还价会更激烈些而已。事实也是如此，1997年，经过激烈的外交磋商，俄罗斯被迫同意北约东扩，接纳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后，普里马科夫外长还喋喋不休地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个最大的错误。

职业情报官升任一把手

如果说俄对外情报局长普里马科夫身上的政治家性格多一些的话，那么接替他的特鲁布尼可夫则是纯粹的职业情报官了。在

过去克格勃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从事情报职业的人当上一把手。所以，在1996年1月10日，当叶利钦总统宣布由对外情报局第一副局长特鲁布尼科夫上将升任局长时，便开始了俄罗斯情报工作真正内行领导内行的历史。

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维奇·特鲁布尼科夫生于1940年4月25日，伊尔库茨克人，中学毕业时获金质奖章，并考入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主攻印地语，专门研究东方国家。大学毕业后，特鲁布尼科夫与当时许多优秀的大学生一样，被克格勃录用。进101侦察学院培训深造后，他开始到当时还称作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情报中心工作。不久，他的工作就是以记者身份作掩护，不断到南亚一些国家执行任务。

60年代末，特鲁布尼科夫被正式以“新闻社”记者名义派往印度，“埋头工作”了多年，随后又去了孟加拉国，所以有人说他的情报工作是真正从第一线做起的。80年代初，他被克格勃主管情报的舍巴尔申将军看中，被调往克格勃工作的重点对象国——美国工作。此后，特鲁布尼科夫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还习惯于梳着整齐的头，戴着宽边眼镜，显得很有教养。由于他工作勤奋出色，曾荣获两枚红星奖章、一枚“苏联国家安全荣誉工作者”奖章和数枚其他奖章。

到1990年，特鲁布尼科夫就是克格勃主管情报的第一总局的负责人之一。1992年1月，特鲁布尼科夫出任了新成立不久的俄联邦对外情报局第一副局长。他的妻子也是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他们抚有一个女儿。

特鲁布尼科夫上下左右的关系都搞得不错，叶利钦自称：“很了解特鲁布尼科夫，我们经常见面。我常去对外情报局，因为他们只归我管。”对于曾是顶头上司的普里马科夫，特鲁布尼科夫则赞不绝口，说他“曾为建立新的俄罗斯对外情报局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据莫斯科的传闻，对外情报局的同事们对特鲁布尼科夫升

任局长更是持肯定态度，因为他的履历很好，是正宗的情报官。而原局长普里马科夫整天泡在政治里，不太受欢迎；再前面的巴卡金和克留奇科夫都是外来户，从左右两方给对外情报局带来了麻烦。

作为职业情报官，特鲁布尼科夫喜欢“实话直说”。他认为，情报机关的特工就是特工，可以不用某种方式或方法（如色情间谍），但不能放弃获得情报信息源这个主要目的，否则情报机构就变成了普通的新闻社。不仅要有闻必录，而且要有事必录。在他正式接任局长的前几天，正好是俄罗斯情报机构成立 75 年周年，特鲁布尼科夫接受了《莫斯科共青团》报的采访，直言不讳地就记者们感兴趣的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当今主要问题是要搜集政治、经济、生态和国防情报，首要任务是保卫俄罗斯领土的完整，因为“国外出现了许多想从我们国土上割走一块的人”。他提到了爱沙尼亚、日本和车臣。另外，一些国家向俄罗斯传播好战的伊斯兰教也引起社会的不安。当记者问及美国在俄对外情报局所要反对的国家名单中排在第几位时，他没有回答。特鲁布尼科夫转而说，俄不对独联体国家搞情报活动。他称，一些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首先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以及中亚的一些共和国，都建立了自己牢固的情报机构。

特鲁布尼科夫承认，与苏联时代不同，现在俄罗斯招募外国间谍靠的是金钱，也就是收买。当问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埃姆斯是否为俄提供了美国收买的情报人员的名单时，他不置可否。他只是证实了现在仍有人在投靠西方，1992 年俄罗斯情报员、当时任俄驻巴黎科技情报处副处长的维克多·奥辛科上校投奔了大不列颠，1994 年俄罗斯情报员德米特里·马可耶夫在泰国神秘地“失踪”。

到 1996 年 12 月 16 日，干了一年对外情报局局长的特鲁布尼

科夫接受了俄塔斯社记者的采访，谈到了该局的工作情况。他首先表达了自己一贯的观点，即没有情报机关，任何一个自尊的国家都不能存在，根据这个明显的道理，就不需要做戏表示假正经。他揭露和反驳了国外各种势力的阴谋，说他们利用对外情报局的活动来煽动反俄情绪。但是，特鲁布尼科夫对在美国被逮捕的埃姆斯、尼科尔森、皮茨，以及在欧洲其他国家被逮捕和驱逐的俄罗斯特工一律三缄其口，但话锋一转，说：“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处理的是许许多多外国特工在我国境内的切实的而不是虚构的案件，但是我们没有利用这些案件来煽动对有关国家的对敌情绪。”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特鲁布可夫实话直说的“水平”和不做戏的“戏”的绝妙程度。

总的来说，特鲁布尼科夫对自己领导对外情报局一年来的工作成果基本上是满意的，但具体有哪些成果，他又语焉不详。当记者问他主持的对外情报局有何变化时，他原则性地回答道：“情报机关不宜频繁地进行内部改革和变动，但又将不断地完善自己。”

针对俄罗斯内部有些人对联邦对外情报局的指责，如有人说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对外情报局向西方“出卖了”本国的间谍活动和昔日的伙伴，包括前东德情报局局长，特鲁布尼科夫说：“这种指责纯属虚构，认真加以讨论是没有意义的。”不过他又表示：“我们对前东德情报局长和他的同行受迫害表示关注，我们决不打算干涉德国的内政，但是我们认为还是有必要表示自己的意见：迫害他们是不对的。”

对于俄罗斯情报机关的开放性问题，特鲁布尼科夫认为，这对我们、对整个社会都有好处，但对真正需保密的问题，不希望有过多的公开性。

第五章

反复嬗变的联邦安全局

现在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与对外情报局的经历很不一样，后者从克格勃第一总局演变过来时比较顺利，仅经过短暂的 20 多天，苏联中央情报局就转到对外情报局，几乎是一步到位，局长也长期没变。而联邦安全局是从克格勃第二总局开始，经过反复的机构演变，更换了许多的领导人，花了好几年时间，才得以成形并初步稳定下来。有人总结为“六换领导、六改建制”。

1991 年 12 月 3 日，维·瓦·巴卡金按照美国情报安全机构分权分立的原则，“肢解”了大一统的克格勃，把其第二总局改为苏联跨共和国安全局，并自任局长。在此之前，俄罗斯在 1991 年 5 月 6 日也建立了自己的联邦安全局，局长为伊万年科。到 1991 年 12 月 19 日，已经接管苏联在俄罗斯一切权力的叶利钦签署总统命令，决定撤销苏联和俄罗斯原来的安全和内务机构，把他们改组为统一的“俄联邦安全和内务部”，任命曾先后担任俄联邦和苏联内务部长的巴兰尼科夫担任这一“超级部”的部长，巴卡金和伊万年科同时下台。

但叶利钦这项成立特工“超级部”的命令，引起了刚走出克

格勃阴影的俄罗斯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人们批评说，这是要进一步进行“清洗”和加强控制的信号。1991年12月24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四个委员会联合就这一问题举行听证会，绝大多数与会代表认为，建立这样一个权力过于集中的机构是不适宜的，并提出此事须经最高苏维埃的审议。1992年1月14日，俄联邦宪法法院又开庭作出决定，宣布叶利钦关于建立一个拥有克格勃和内务部权力的“超级部”的命令违背俄联邦的宪法，应予撤销，对此决定，不得上诉，立即生效。到1992年1月17日，叶利钦取消了《关于成立俄联邦安全和内务部》的命令，而分别成立了两个互相独立的部，其中俄联邦国家安全部部长由巴兰尼科夫担任，总部设在原为克格勃总部的卢比扬卡大楼内。

过了不到二年时间，1993年12月3日，叶利钦又下令成立俄联邦反间谍局，替代原国家安全部，以建立“可靠的安全系统”。因为在这年的7月至10月，国家安全部长巴兰尼科夫等人站到了反叶利钦的俄议会议长和副总统的一边。要不是当时许多人反对叶利钦建立“超级部”，也许叶利钦也会被巴兰尼科夫扣留起来，成为戈尔巴乔夫第二了。新成立的、权力更小的反间谍局局长由戈鲁什科担任，后由斯捷帕申担任。

又过了一年多，1995年4月3日，叶利钦签署命令，将俄联邦反间谍局改组为联邦安全局。根据《俄联邦安全局机关法》等法令的规定，该局局长的军衔和地位与国防部长相同，该局的具体任务是：获取有关俄罗斯安全的情报；同恐怖行为作斗争；同非法武装和团体作斗争；防止外国情报机关的颠覆活动；从事军队中反间谍工作；保卫国家机密；打击有组织犯罪；组建特种部队等。二个多月后，联邦安全局局长斯捷帕申被撤职，由克里姆林宫卫队长出身的时任联邦保卫总局局长的巴尔苏科夫接任。

到1996年6月19日，巴尔苏科夫因为和叶利钦的卫队长科尔扎科夫一起，擅自鼓吹暂停总统选举，并扣留叶利钦总统竞选

班子中的工作人员，激起了叶利钦的怒火，两人一起被撤职。科瓦廖夫由副局长升任局长。这样的机构嬗变和领导人像走马灯似的变化，其原因既有国内局势的波诡云谲，更有当事人的性格和适应能力问题。下面对这些俄国内安全特工领导人作些介绍后，大家便可明白了。

被“炒鱿鱼”的克格勃将军

还在苏联解体以前的1990年底，叶利钦为了加强俄罗斯联邦的实力，要求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他签订了《关于协调苏联克格勃和俄联邦安全机关关系的协议》，将俄联邦共和国境内的各级国家安全机关交给未来的俄联邦克格勃管辖。1991年初，叶利钦同克留奇科夫签订协议，成立“筹建俄联邦克格勃联合筹备组”，确定俄联邦克格勃总部设在苏联克格勃大楼内，其领导干部中50%来自苏联克格勃。1991年5月6日，叶利钦签署命令，宣告成立俄罗斯克格勃（俄联邦安全局），同时任命了一老资格的克格勃将军伊万年科出任主席。叶利钦想的是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让克格勃反对克格勃，狗咬狗，是最好不过的事了。

维·伊万年科1947年出生在俄罗斯联邦秋明州的一个农民家庭，大学毕业后就从事克格勃工作，时间长达20余年。最早是在秋明州的克格勃工作，慢慢升到该州安全局的副局长。1991年初，伊万年科被调到莫斯科，任苏联克格勃监察局副局长，少将军衔。同年5月，叶利钦请他组建俄罗斯的克格勃，先任代局长，

后任局长。

伊万年科是个正统的克格勃官僚，上台后便声称，俄罗斯克格勃的基本职能是“保证全面控制俄罗斯联邦的形势，制止共和国的反宪法活动”；对整个共产党的体制不作挑战，与苏联克格勃也不闹独立性。只强调他领导的安全局的主要任务是：“与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贩卖毒品、走私和贪赃受贿行为作斗争。”当然，他不是没有开拓精神，如他的安全局与西方国家的同类组织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为了打击正在德国活动的俄罗斯黑手党，还准备与德国方面进行合作。

但是这一切与叶利钦的初衷相去甚远，尽管伊万年科在“8.19事件”中没有和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站在一起，但也没有积极去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所以，叶利钦在成立俄联邦国家安全部时，启用了自己的亲信巴兰尼科夫，而将伊万年科“炒”了鱿鱼。

酒友反目成仇

维克多·巴兰尼科夫曾是叶利钦麾下的得力干将，又是亲密的酒友。他生于1940年，早年当过车工，学过法律。1961年进入内务部学校学习，毕业后一直在各地内务部门工作。1983年他进入苏联内务部总部工作，1988年起任阿塞拜疆共和国内务部副部长，1990年起任俄罗斯联邦内务部部长。这时的巴兰尼科夫积极追随叶利钦，他认为苏联护法机关缺乏灵活的机构，工作方式陈

腐僵化，主张对国家内务部进行根本的改革，并竭力主张俄罗斯联邦内务部脱离苏联内务部。他在叶利钦的支持下，首先在俄罗斯联邦内务部实行非政治化，撤销了苏联共产党在内务部的政治部门。

1991年的“8.19事件”后，巴兰尼科夫的内务部成为叶利钦捉拿“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得力工具，他自己也接替自杀身亡的普戈，出任苏联内务部长。巴兰尼科夫表示，他执掌的苏联内务部要“独立于政治之外”，内务部要改变过去的形象，重新赢得人们的信任，要“使人们相信不可能恢复极权政治、专横、精神和肉体上的恐怖”。真是说得比唱得还好听。

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巴兰尼科夫就任俄联邦安全部长，他强调该部的责任是：确保个人的权利、自由和合法利益，保卫社会和国家的安全；从事普通的和军事的反间谍活动；确保经济安全，严厉打击经济领域内的犯罪活动；坚决铲除走私、贩毒及恐怖活动。他声称，国家安全部内没有原克格勃的第五总局（秘密警察）的设制，但仍有预测国内政治局势和确保实行紧急状态的特权。

大概就是“仍有……”这一条害了巴兰尼科夫，使他不能独立于政治之外，而是深深地卷入了权力斗争。他和叶利钦本来都是民主派加酒友，但民主派们掌握了大权之后，难免因政治分赃不均而起内讧。到1993年时，已明显地形成了以俄总统叶利钦为一方，和以俄议会议长哈斯布拉托夫和副总统鲁茨科伊为一方的权力斗争。巴兰尼科夫的“预测国内政治局势的特权”使他觉得叶利钦可能不行了，而又不愿为叶利钦行使“确保紧急状态的特权”，所以他先是在两派之间游移。叶利钦是何等样人物，他可不会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受制于人。所以在1993年7月27日，叶利钦宣布解除巴兰尼科夫的国家安全部长职务，理由是巴氏“从事违反道德标准的商业活动”和在领导工作中、包括领导安全部边

防军的工作中犯有“严重错误”。这里未免有点王顾左右而言他了，这真像一位犹太外交家说的，考古学家总是发掘真相，政治家总是掩盖真相。但不管怎么说，这一对酒友从此成了仇敌。

巴兰尼科夫也不是善罢甘休之辈。到1993年10月，叶利钦与哈斯布拉托夫的权力冲突发展到武装对抗，即所谓“十月事件”，当时巴兰尼科夫投靠到议长那里，被议会重新任命为国家安全部长。他马上率领部分国家安全部的特工聚集到议会所在地——白宫，开始了武装行动。巴兰尼科夫先是组织人马进攻电视台等新闻机构，结果被忠于叶利钦的部队击退，随后他组织了保卫白宫的战斗。但叶利钦的卫队长科尔扎科夫调来了军队和坦克以及反恐突击队，一举冲垮了巴兰尼科夫的防线，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巴兰尼科夫等人都被逮捕入狱。这些人虽然后来都被释放，但也从此被逐出政治舞台。

“出气筒”与“替罪羊”

接替巴兰尼科夫的是俄联邦国家安全部的第一副部长尼古拉·戈鲁什科。他于1958年毕业于苏联托木斯克大学法律系，之后曾在检察机关任侦查员；1983年起到克格勃工作，1987年领导着乌克兰的克格勃；1992年俄联邦成立国家安全部时，他出任副部长，1993年9月又升任国家安全部部长。

戈鲁什科当部长时，国家安全部的许多人老是跟叶利钦作对，他就像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因为巴兰尼科夫一帮人对总

统不忠，所以叶利钦要他对其严加整顿和控制，但发生“十月事件”时，国家安全部不仅无力制止议会反总统的武装对峙，反而有不少人也跑到了议会一边反对总统。戈鲁什科自然要受到总统的训斥。到了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举行新的议会选举，在国家安全部的安全特工中，还是有一半以上的人的选票不投亲叶利钦的党派，而是投向了有“小希特勒”之称的日里诺夫斯基的自民党。这又引起叶利钦的大怒，自古曰：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既不能用，又吃里扒外，还要它干吗？戈鲁什科只好向叶利钦提交了撤销国家安全部建立新机构的计划。

1993年12月20日，叶利钦发布命令，成立俄罗斯联邦反间谍局。原国家安全部领导的边防军完全独立出去，侦缉局则归检察院领导，“阿尔法”突击队也完全归总统安全局指挥。其他安全特工减少一半左右，大部分特工转到无关紧要的行政部门工作。这样，戈鲁什科自己虽然没有丢官，转任了反间谍局局长，但已成了没脚的螃蟹，没有行动能力，干不了什么大事了。

使戈鲁什科雪上加霜的是，1994年初，由于俄方在保护情报来源上出了纰漏，美国逮捕了长期为俄国人服务的其中央情报局中层官员埃姆斯。这不仅使俄国反间谍部门丧失了一个最重要的反间谍情报来源，而且引起了美国和俄国关系的恶化，并导致了互相驱逐外交官的事件。叶利钦再也忍不住了，只好把戈鲁什科当“出气筒”，将一口恶气全出在他身上，在1994年3月罢了他的官。

在戈鲁什科之后的俄联邦反间谍局局长的谢尔盖·斯捷帕申，是位秀才局长，有学问，是这类机构领导人中学历最高的一位。他生于1940年，先后毕业于苏联内务部高等政治学院、苏联军事学院，并获得了历史学副博士学位。他的文化修养，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派上了用处，他被选上了俄联邦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并先后出任最高苏维埃的国防和安全委员会主席、国家安

全机构委员会主席。所以在1991年发生罢黜戈尔巴乔夫的“8.19事件”当天，斯捷帕申便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以表示强烈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他于1992年任俄联邦国家安全部副部长，1993年12月任俄联邦反间谍局第一副局长，1994年3月升任局长。

但斯捷帕申的实际工作能力比较弱。所以在1994年11月21日参加俄国家杜马的一次讨论会时，持强烈民族主义观点的日里诺夫斯基突然从座位上跳起来，大骂斯捷帕申就是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关的特务，俄联邦反间谍局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以色列摩萨德的分支机构。斯捷帕申当时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只好简单地回答：“咱们法庭上见。”事后也不了了之。

1995年4月，叶利钦鉴于国内的民族分裂活动和恐怖活动、有组织犯罪活动日益猖獗，就把反间谍局改组为俄联邦安全局，使这个机构的权限和实力又大大得到了加强，被正式规定为“部”级机构，还确定可在国外进行谍报活动。当时日本《产经新闻》报道说，这是对内“要加强治安体制”，对外“要恢复大国俄罗斯的影响”。无奈秀才纸上谈兵可以，实际统兵无力，斯捷帕申错失了重振安全机构雄风的机会。一段时间来，车臣反政府武装要求车臣独立的活动越来越强烈，俄罗斯政府终于在1994年12月11日开始对车臣采取军事行动。国防部、内务部、联邦安全局三个强力部门都想在车臣露一手，由正规军、内务部队、边防军和联邦安全特工组成的4万大军齐头并进，三个部的领导人格拉乔夫、叶林和斯捷帕申都来到了小小的车臣进行督战。结果，在这场杀鸡用牛刀的战争中，各强力部门全都刹羽而归。三位领导人中，只有格拉乔夫靠着对叶利钦的愚忠暂时没有被免职，而叶林只好到对外情报局去当个副局长，斯捷帕申则被撵下台。主要是因为1995年6月，车臣武装反叛分子在布琼诺夫斯克市居然一次扣留了2000名俄罗斯人质，并有120多人遭到屠杀，各方都严厉地怪

罪联邦安全局无能和失职。到6月29日，叶利钦就以“特工部门完成新承担的任务的能力低下”和“处理车臣问题失误”为由，将斯捷帕申当作“替罪羊”抛出。

大水冲了龙王庙

1995年7月19日，叶利钦任命原俄联邦保卫总局局长巴尔苏科夫为俄联邦安全局局长。巴氏生于1938年，1960年毕业于莫斯科高等军事指挥学校，后到苏联军队服役。由于他与生俱来的强壮体魄、匀称身材、漂亮容貌和聪颖睿智，很快就受到上司的青睐，被调到克林姆林宫当警卫员，随后任排长、连长、政府大楼警卫队副队长、队长。在保卫党政领导的过程中，巴尔苏科夫心细如丝，从未出现过任何差错，多次受到褒奖。在70年代末，他还被送进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修过。

1991年底，经叶利钦总统卫队长科尔扎科夫的推荐，米哈伊尔·巴尔苏科夫被任命为克里姆林宫卫队长。1992年初，他又被任命为俄联邦保卫总局代局长、局长，成为由1.5万人组成的“禁卫军统领”。巴尔苏科夫这位统领一向对叶利钦的命令坚决执行，对总统的“敌人”心狠手辣。1993年10月，总统和议会发生严重对抗，总统的许多支持者变成了反对者，但巴尔苏科夫坚定地按照叶利钦决策班子的指示，和科尔扎科夫一起指挥手下人马对俄议会所在地——白宫进行包围（按说这两人均无权前去做此事）。总统下达进攻命令后，他又首先带人冲进议会大厦，逮捕了

反抗总统的议长和副总统，使叶利钦坐稳了总统宝座。从此，巴尔苏科夫和科尔扎科夫两人与叶利钦总统形影相随，他们同住一幢楼，一起外出钓鱼，一起参加伏特加酒会。有人指控说，巴尔苏科夫为了扩大权势，秘密搞窃听活动，被窃听者甚至包括叶利钦自己的助手；攻击总统的主要政敌，多方筹措用于收买支持者的资金；他甚至为政府一些高级官员寻找占星术士，以使他们能获得预测捉摸不定的未来局势走向的建议。

巴尔苏科夫当上联邦安全局长后，要比前任拥有更大的权力，包括精锐的“阿尔法”反恐怖突击队也由他负责指挥。他也有针对性地强调要做好前任没有做好的工作，他说：“恐怖活动是迄今为止威胁我们社会安全的最大危险因素。”所以，他发誓要将恐怖分子赶尽杀绝。他的机构很快行动起来，有一次居然在莫斯科的一个地铁出入口，联邦安全局的特工和一帮人发生了美国电影里才有的激烈异常的枪战，直到双方都有死伤后才发现，对方是内务部的特工，反而让正在追捕的恐怖分子失去了踪影。这还算是个小小的误会。

那么在1996年6月19日深夜发生的事，就决不是任何误会的问题了。当时巴尔苏科夫跟着科尔扎科夫一起反对按时举行第二轮把握不大的总统选举（因为一旦失败，他俩也将丢官），而叶利钦赞同其竞选总管丘拜斯的主张即按时选举，以确保叶利钦以后执政的合法性。结果，巴尔苏科夫他们为了达到停止选举的目的，居然在俄政府大楼门口扣留丘拜斯手下的两名主要工作人员，说他们身上携带的50万美元来路不明。这不是在关键时刻往叶利钦头上拉屎吗？没过几个小时，愤怒的叶利钦立即毫不客气地把巴尔苏科夫和科尔扎科夫撤职。到了1997年2月，叶利钦知道联邦安全局副局长特罗莫夫中将也参与了此事，又余怒未消地罢了他的官。总统要让大家再次知道，大水冲了龙王庙是怎么一个后果。

公然允诺双重间谍

1996年6月20日，接替巴尔苏科夫上台的是俄联邦安全局第一副局长尼古拉·科瓦廖夫。他上台后，一是看到由于列别德基本上和平解决了车臣问题，恐怖事件大为减少了；二是看到他的前任卷入国内纷争没有什么好下场，所以他把联邦安全局的利剑朝向了国外。科瓦廖夫在1996年12月1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镇压外国情报机关在我国领土上的活动是我局的主要任务。不幸的是，我们不能期望他们的活动在今后几年里有任何收敛。”他特别提到，俄罗斯最近向土耳其提出了抗议，因为它涉嫌在包括企图分裂出去的车臣在内的北高加索地区搞间谍活动。科瓦廖夫在另一个场合还说，随着经济危机而来的生活恶化，“一些俄罗斯人准备为一二千美元出卖可能引起数十亿美元损失的机密”。所以，外国情报机构加强了对俄罗斯的活动，俄联邦安全局已对301名外国特工进行了揭露或严加监视，但在1996年只有“13个为外国情报机关工作的俄罗斯公民不再起作用了”。如何对付里通外国的人呢？

科瓦廖夫使出了打击间谍活动的绝招。1997年6月，这位俄联邦安全局长亲自到电视上现身说法（有些国家的特工头目的照片是不外传的）。他说，充当外国间谍的俄罗斯公民可以“坦白交待，为祖国尽职，这样你就能得到双份工资，一份是我们给的，一份是你的外国雇主给的”。他还许诺，充当双重间谍的人不必为自

己的安全担忧，因为联邦安全局将严格保密。为此，联邦安全局设立了一条 24 小时服务的电话热线，通过它就可以成为双重间谍了。该局的一名发言人对此进一步解释道，所有为外国间谍机构效劳的俄罗斯公民，只要转而为克里姆林宫工作，都将免于起诉。当双重间谍的好处是够多的，但在俄国为外国当间谍的人本来就是双重间谍的多，只不过是外国掌握的俄间谍机关的人。曾经流传着这么一个笑话：有一位想投靠美国人的克格勃特工为了表示忠心，说他可以在克格勃总部进行一次爆炸，美国人一听慌了，说千万别干傻事，那儿可有不少是我们的人啊。

科瓦廖夫作为用主要精力专抓间谍的联邦安全局长，头脑自然也不会简单，所以在引诱别人当双重间谍时，也没有忘记恐吓。他警告说，所有在俄国的间谍必须投诚，“因为我们迟早会抓住每一个人的”。他称，联邦安全局已经抓住了 39 名来自外国的特工和 400 名为外国间谍机构效劳的俄罗斯人。

但科瓦廖夫呼吁人们充当双重间谍的效果如何呢？没过多久，有记者采访了负责联邦安全局新开设的双重间谍电话热线的亚历山大中校，他不愿外向界透露是否有“幽灵”通过电话热线自愿要求成为双重间谍。但是他说，在能直接与克格勃式的机构接触一下的新鲜感的驱使下，已有数百人打来了电话，他们中有“精神不健康者”，有好奇的记者，还有贫困的养老金领取者——这些老人希望有人听他们诉说对苏联瓦解的抱怨。亚历山大中校解嘲地说，这条热线“能帮助人们摆脱一些困境，这不是坏事”。但对科瓦廖夫局长的打击外国间谍活动的目标来说，无疑也有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那种感觉。

控制军队 易如反掌

在苏联向俄罗斯的转变过程中，社会天翻地覆，军队也从世界上最庞大、也是最强大之一的武装队伍，衰落成新武器能卖给外国而自己却装备不起的“叫化子”队伍，几乎连生存都有了困难。如在1996年，拥有大量战略核潜艇的北方舰队居然因为长期拖欠电费而被俄罗斯电力公司切断了电源；太平洋舰队把包括二艘航空母舰在内的64艘军舰当作废铜烂铁卖给了韩国和印度；从外国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撤回的官兵无家可归，有9.5万名官兵至今仍住在帐篷和车库里。绝大部分军人不能按时领到军饷。这与当年（70年代）真不能相比。当时的苏联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元帅曾自豪地宣布：“苏联舰队满怀豪情地带着祖国海军军旗航行在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上，航行在北极和南极的海洋和地中海，航行在我国安全利益需要我们去的一切地方。”

到了1997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又签署了一项激进的军队改革计划，准备把已经一减再减的武装部队人数从170万削减到120万（苏联在卫国战争时期的兵力有900万人，1955年还有576.3万人，现在降到了北朝鲜和伊拉克军队规模的水平上）。英国《外事报道》评论说：“这是一度傲慢的俄武装部队受到的一系列羞辱中的最新一次。他们仅得到今年许诺给他们的预算经费的四分之一，拖欠军饷和普遍的绝望情绪，引起军队中很多人自杀和发生大量的枪击事件。在拉丁美洲或土耳其，如果一个文官领

导集团作出这种决定，那将迅速导致坦克开进总统府大门。但在俄罗斯，没有人认真考虑过是否可能发生兵变。”该刊分析了俄罗斯军人不会发生兵变的三个原因：一是在过去八年的大多数时间里，不少将军们忙于掠夺他们能从苏联帝国毁灭中得到的一切；二是军人因苏联帝国崩溃和在阿富汗、车臣战争中的失败而士气低落；三是叶利钦知道军人看不起他，就建立了不属于国防部的内务部队、边防部队和联邦安全部队。所以，即使俄军将领中的皮诺切特（用军事政变推翻智利总统的职业军官）式的人物很多，但叶利钦政权应该是安全的。

上述的分析也不算错，但缺少了一个关键的原因，即俄联邦安全局中的军事反间谍局的作用。尽管联邦安全局自己的机构和领导人常被变动，但它控制军队的能力，从克格勃那里继承来后，一直没有被削弱。1997年7月19日，俄罗斯《独立报》就刊登了一篇文章，内容是对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军事反间谍局局长阿历克谢·莫利亚科夫的采访录，其中就非常明确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下面摘录几段：

问：您的军事反间谍局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着军队的局势？

答：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局势始终处于我们的严密控制之下。最近各种社会和政治组织正在加紧努力打入军队内部，妄图在今后能利用军队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在军队中的军事反间谍机构接到明确的指示，要求他们及时揭露和预先防止极端主义行为和其他危险意图。这是十分必要的，如果国家出现政治局势尖锐化的可能，最高统帅——国家总统绝不能失去对俄联邦武装力量的控制，并且要制止一切妄图使军队卷入政治冲突的行为。我认为，军事反间谍机

关总体上来说控制住了军队，以及我们的战略保障部门——联邦边防局、内务部内卫部队、俄联邦总统下设的政府通信和信息局及其他部队机构的局势。

问：你把这些材料具体汇报给谁了？

答：先是把所有材料都呈交给联邦安全局的负责人，他们看了之后又送交给俄联邦总统叶利钦、政府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安全会议、国防会议以及联邦两院主席。

问：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军事反间谍局优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答：就是揭露和制止外国特工机关的侦察和破坏活动、武装力量不要受到破坏活动和恐怖主义行为的冲击，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防止出现携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事未经许可的行为。

问：你们有多少属下？

答：大约 6000 名工作人员。

问：你们在俄罗斯军队中是否也搞间谍活动？

答：联邦侦察活动法赋予了我们从事间谍工作的权力，我们也在积极运用这一权力。不这样做，就不可能完成我们所肩负的保障国家安全的任务。

问：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军事反间谍局在国外是否也设有间谍机关？

答：是的。军事反间谍条例允许人们从事一些间谍活动，从中获取一些威胁俄罗斯及其武装力量安全的情报。

.....

问：您认为军官是否会支持俄罗斯武装力量的改革计划？

军队是否可能出现武装反对最高统帅的情况？

答：我认为进行武装力量的改革是极其必要的。显然，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是一个痛苦的进程，它会触及成千上万名军人的利益。但是如果不进行军队改革，在目前严峻的经济条件下我们就不能走上确保国家防御能力的新阶段，大多数军人都明白这样的现实。俄联邦武装力量不会出现任何过火行为。

如此机密的特工部门的头头，对如此敏感的问题，作如此直率的回答，这是很难见到的。这也反映出俄联邦安全局军事反间谍局控制军队信心十足。

第六章

叶利钦和保镖

从苏联瓦解到俄罗斯联邦独立这一过程中，两个人物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就是同年（1931年）出生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相对讲，叶利钦作用更大些，因为他还影响了后来俄罗斯的发展和俄罗斯特工的改建。

鲍里斯·叶利钦的一生充满着戏剧性的冲突，就像他的名字一样（鲍里斯与俄文“斗士”一词相近）。他刚出生进行洗礼时，神父把他放进装有圣洁液体的木桶后，忽然同别人争论起来而忘记把他捞出来，等他父母明白过来时，他差一点就要断气了。在小学毕业典礼上，他作为班长与班主任老师算总帐，直闹到区委、市委，把班主任开除出学校，他才补发到毕业证。大学毕业一段时间后，他被调到乌拉尔重型管道建设托拉斯第13工程局当总工程师，与局长一直闹矛盾，甚至闹到相互上了法庭。到1961年初，叶利钦好不容易入了党，但第二天就受到市委的一次处分，他化了一年时间奔波才使处分撤销。从1968年起，叶利钦交上了好运，先当斯维尔德洛夫州的州委建设部长，到45岁时又升为州委第一书记，同时与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建立了良

好关系。1985年戈氏当上苏共总书记后，叶氏也跟着高升了，但人生的波折也更大了。

叶利钦在1985年当上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时，克格勃按政治局的人都要有专职保镖的规定，也给叶利钦配来了一位保镖——科尔扎科夫上尉。这位保镖于1950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1970年从军，长期在克格勃第九管理局（警备局）工作，默默无闻。

科尔扎科夫一到叶利钦那儿，不仅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也为叶利钦的政治崛起起了重大的有时是关键性的作用，两人一起参与了历史的创造。科尔扎科夫和叶利钦除了外貌相似外（这也是前者给后者当保镖的条件之一），还有许多其他的共同点，两人都是农民出身，都有俄罗斯男人粗壮的身体，都喜欢参加酒会，都有干事业的雄心壮志。尽管两人当时地位相差悬殊，但还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成就了大业。如果不是后来互相翻脸，也许会成为人类友情的一段佳话，但好在没有演变成传统政治中的互相残杀。

他们的友谊经过的第一次考验是在1987年。当时叶利钦成了苏共党内最大的“刺头儿”，他当时不仅和政治局的保守派意识形态权威利加乔夫、克格勃主席切布里可夫等人全闹翻了，而且在围绕讨论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报告草案时，叶利钦对戈尔巴乔夫的报告提出了20条意见。戈氏勃然大怒，对叶利钦训斥道：“难道整个莫斯科都围着你转还不够吗？难道现在你还要中央委员会为你消耗时间吗？”在随后的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要大家对叶利钦的意见发言，大家都猛烈地批评叶氏破坏统一、自负、傲慢、搞政治阴谋等，这些人中有的原来就对他反感，有的还是关系很好的人，如戈氏“新思维”的幕后捉刀人、民主派雅科夫列夫等。接着，他被赶出了政治局并丢掉了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戈尔巴乔夫看在老朋友份上，总算没有一棍子打死，让叶利钦到苏

联合国建设委员会任了个副主席的闲职。

这样的遭遇，使叶利钦的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精神也到了崩溃的边缘。外界也断定叶利钦的政治前途完了，他的追随者中的大部分人树倒猢猻散，另找靠山另谋前途去也。克格勃也公事公办，不仅撤回了保镖科尔扎科夫，甚至还让第五总局派人全面监视他。但科尔扎科夫本人并没有抛弃叶利钦，还义务为他服务。

贴身保镖的远见

当时，作为保镖的科尔扎科夫不知是凭着一种政治上的直觉本能，还是本着一种天性执拗的忠诚，他感到叶利钦的前途无量，应该继续追随叶利钦。克格勃让他回警备局，他却打电话给叶利钦，主动提出在业余时间免费地为他服务。当时已经是孤家寡人的叶利钦窘迫地解释说，政府已不再向他提供汽车了，科尔扎科夫就开着自己的“大地”牌汽车拉着叶利钦外出活动。

经过这次考验，他们的友谊得到了加强，关系更加密切了。他俩经常在一起议论如何东山再起，还一同去度周末。科尔扎科夫常邀请叶利钦到他的家乡，莫斯科远郊的一个小村庄去钓鱼和游泳。到晚上，这位业余保镖的乡村小屋实在太小，无法容纳两位彪形大汉躺下，因此两人只好经常露宿在外面的帐篷里。

1988年2月1日，叶利钦邀请科尔扎科夫到自己家里来庆祝自己的生日。此事被克格勃领导知悉后，就作为严重的违纪行为

来查处。两天后，科尔扎科夫就被撤销了职务，不久又被开除出克格勃第九管理局，一时失业。但对科尔扎科夫来讲，这样也好，无官无职一身轻，干脆像已经输光的赌徒一样把唯一的宝全部压在叶利钦身上，全力为他重返政坛而奔波。

科尔扎科夫的眼光没有错，精力没有白费，叶利钦不久果然东山再起。首先是因为掌大权的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把叶利钦看作是政治上的敌人而要消灭掉，戈氏曾说过：“我的敌人是右派（指传统保守派），但为他们提供弹药的却是左派（指激进民主派）。”意思是因为叶利钦口无遮拦，老给保守派抓住辫子，所以只好先撤他的职。1988年6月，叶利钦通过多方面的活动，当上了参加6月28日召开的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的代表，会上叶利钦毛遂自荐要求发言，他猛烈地批评了利加乔夫，并要求为他平反，他的发言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随后，叶利钦在1989年3月以高票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人民代表。到1990年5月29日，叶利钦又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成为苏联幅员最大的加盟共和国的主管。

叶利钦的当选不仅使他在政治舞台上站得比以前更高了，而且使整个苏联的政治力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标志着激进民主派在俄罗斯的重新崛起。此时，科尔扎科夫也有了正式的工作，担任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卫队长。

1991年6月21日举行的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又是关系到苏联命运的政治大事。当时有六位候选人，他们是：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前苏联内务部部长巴卡金、苏联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乌拉尔军区司令马卡绍夫上将和克麦罗沃州苏维埃主席图列耶夫。在这六位候选人中，主要的竞争者是叶利钦、雷日科夫和巴卡金。后二人当时都是属于俄共推出的候选人，巴卡金原来对是否出马竞选棋不定，但戈尔巴乔夫支持他参加，这样可以分散雷日科夫

的选票，从而保证了叶利钦有绝对把握当选。最后，叶利钦以57.3%的得票率当上了俄联邦总统，他立即任命科尔扎科夫为总统卫队长，军衔也一下子升为少将。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过了两个月，“8.19事件”结束后，科尔扎科夫这位被克格勃警备局开除的保镖，居然以总管的身份，前去接管该警备局，还有克格勃精锐的“阿尔法”突击队等，把它们收编到自己的麾下，成立俄联邦保卫总局和总统安全局，自己当起了八面威风的总统安全局局长。

总统卫队长成了“特工王”

在叶利钦落难时，科尔扎科夫固然能够鞍前马后，忠心耿耿；在叶利钦登上总统宝座后，科尔扎科夫也是两次冒险犯难，保驾护航。这一切既使他在总统眼中身价大增，也使他自己心中飘飘然，以俄罗斯“特工王”自居。

前面已经提到，在1991年8月19日，当时的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等人软禁了戈尔巴乔夫，并要捉拿叶利钦，而当时叶利钦和科尔扎科夫正在莫斯科郊外的阿尔汉格尔斯科耶别墅里度假，手中既无军队，也无舆论工具，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但科尔扎科夫毫不心慌，他让叶利钦化了妆伪装成渔夫，然后乘车潜回莫斯科，进入俄罗斯议会大厦——白宫。这是一座十多层高的白色大型建筑物，科尔扎科夫让叶利钦在这里确定自己的领导地位，组成对“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政治抵抗中心，他自己则组织

人马在大楼周围的进行武装抵抗。在白宫附近，科尔扎科夫冲上大街说服了前来进攻的著名的塔曼师的 110 号坦克，使其掉转炮口，并让叶利钦站到坦克炮台上，把身子挺得直直的，在俄罗斯和外国电视摄像机镜头前，大声宣读以俄罗斯总统名义发布的号召罢工、反对政变的呼吁书。

这是粉碎“紧急状态委员会”最关键的一招，全俄罗斯和全世界都看了，即使在实行新闻控制的地区，俄国人也通过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和美国之音进行了收看和收听。很快全苏联各界人士包括许多军事将领随之表示支持叶利钦，许多地区罢工开始。这也是叶利钦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他那振臂一呼的大无畏形象放出了最耀眼的光彩。他成了一面旗帜，一位英雄，一位苏联和俄罗斯的最大实权人物。

到了 1993 年 10 月，又是在白宫，以俄罗斯议会议长哈斯拉托夫为首的议会，和以叶利钦总统为首的政府之间的权力之争愈演愈烈，直至武装对峙。在双方僵持中，俄联邦议会宣布罢免叶利钦的总统职务。如此一来，叶利钦本人，还有国家安全部长、内务部长和国防部长衮衮诸公一时竟然不知所措。这时，又是科尔扎科夫跳出来，他全力说服国防部长格拉乔夫派坦克进入莫斯科，以控制局势。这位格拉乔夫在 1991 年发生“8.19 事件”时是苏联陆军精锐的空降兵司令，就是因为胆小不肯出兵莫斯科，才在后来升任国防部长，这次要他出兵，他就干脆让科尔扎科夫负责指挥。有了冲锋陷阵的坦克布满莫斯科街头，科尔扎科夫更是无所畏惧了。

10 月 3 日，当支持议会的群众在前国家安全部长指挥下，开始冲击白宫周围的防暴警察防线时，警察犹豫退却。副总统鲁茨科伊趁机号召议会武装人员及群众冲击奥斯坦基诺国家电视台。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科尔扎科夫调来内卫部队捷尔任斯基摩托化师，击退了进攻国家电视台的“暴徒”。接下来，他又叫上

老朋友联邦保卫总局局长巴尔苏科夫（按说巴氏还是上级，但科氏与总统关系密切，所以巴氏还得听科氏的）和他一起，带上警卫特工们直冲议会所在地白宫，白宫由于有前国家安全部长巴兰尼科夫带领部分军人和特工在把守，一时很难得手。科尔扎科夫就命令坦克开炮，把个白宫炸得千疮百孔，大火冲天，以分散大楼守卫者的注意力。接着再下令让“温姆佩尔·斯培茨纳兹”和“阿尔法”两个突击队的80名官兵，通过迷宫般的地下通道乘势而入，打垮所有抵抗的人，占领了议会大厦底楼。这时经过短暂“谈判”，已经绝望的哈斯拉托夫议长等首领同意束手就擒，并命令其余人员无条件缴械投降。这就是所谓的“十月事件”。从此，在俄罗斯谁也不敢和叶利钦用武力对抗了。

凭着上述这些资本，科尔扎科夫想当个“特工王”的雄心越来越强烈了。他虽然只是官拜总统安全局局长，本来的职责仅是负责总统的安全事项，但他觉得如果满足于此，岂非大才小用。而且天生我材必有用，总统安全局局长本来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他想一统俄罗斯情报特工机构，成为没有克格勃的克格勃主席。

科尔扎科夫除了自己的总统安全局外，联邦保卫总局也听他的“使唤”。巴尔苏科夫正是靠了他，才当上克里姆林宫卫队长和保卫总局局长的。1995年7月，当斯捷帕申由于在车臣行动上的一系列漏洞而受到各界指责时，科尔扎科夫又不失时机地推荐巴尔苏科夫去接管联邦安全局。同时，科尔扎科夫利用自己接近总统，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不断扩大自己的机构人数和权限。1991年苏联瓦解时，他就把一些快速反应部队和突击队的指挥权抢了过来，1993年他又得到了对政府所有通讯设施的监视权。“十月事件”后他还有了监督军队的权力，据说在紧急情况下他甚至有权亲自指挥某些军队，而无须向国防部长报告。1995年，他又建立了总统安全局下的情报和分析处，普里马科夫的对外情报局

和军队情报部门的情报经常要经过他这个处的过滤后，才能到达总统的手里。结果，像军方有关不宜出兵车臣的情报报告，就根本没有到达总统手中。

科尔扎科夫在1995年底的一次谈话中，不无得意地表示，他觉得他早就不只是单单主管总统的安全事项了，而是在主管整个俄罗斯的安全了。所以，俄罗斯各自治共和国各个地区也要受到他的监督，楚瓦什自治共和国总统费奥多罗夫就受到过来自科尔扎科夫机构的压力，因为这位总统批评叶利钦对车臣采取的军事行动，而科尔扎科夫是鼓动叶利钦对车臣动武的。

欲壑难填 壮士断臂

当了“特工王”，有时还不能让科尔扎科夫感到心满意足。从1994年12月起，科尔扎科夫还不时出来干涉一下政府的工作，以表明他的高见和权威。当时，他曾写信给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要他重新研究政府放宽出口石油的决定。1995年，科尔扎科夫自己成立了一个不受政府控制的国家军事技术政策委员会，指挥部下做军火生意，并参与银行业务，过问核动力工业、冶金工业的工作和国有财产私有化的问题。政府内阁官员的人选，也常常要根据他的意见来定。所以，俄国《消息报》曾在头版发表文章，其标题就一针见血地问道：《谁统治国家：是叶利钦、切尔诺梅尔金，还是科尔扎科夫》，英国《泰晤士报》也发表文章，认为科尔扎科夫控制着一个影子内阁，他已成为俄罗斯第二号最有权

势的人物。

确实，这位形象有点让人发笑，几缕长长的头发精心地覆盖在秃了的头顶上，经常穿着陈旧衣服的将军，好长时间迷住了叶利钦。叶利钦自己也多次承认自己少不了他，有时他在谈到科尔扎科夫时，所用的语气甚至比讲到自己的妻子还要亲热。科尔扎科夫随时能帮助叶利钦办各种事情，从不离开他的左右。像1995年底，北约突然对在波黑冲突中的塞族进行轰炸，实施空中打击，正陪同叶利钦在黑海胜地索契度假的科尔扎科夫立即主动地把联邦安全局长巴尔苏科夫、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外交部长科济列夫召来，举行特别会议，为叶利钦研究出了俄罗斯应该采取的对策。

1996年俄罗斯再次举行总统选举，这对叶利钦和科尔扎科夫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的政治前途由此决定。事先，科尔扎科夫替叶利钦摆平了一些可能出马与叶利钦竞争的有实力的人物，如威望很高的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和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对于卢日科夫，这位总统安全局长向给卢氏提供政治捐款的俄罗斯大桥银行开刀，不断地找碴儿，最后迫使“大桥”的首脑携带家眷逃往了国外。对于切尔诺梅尔金，科尔扎科夫在加强窃听活动的同时，攻击总理的改革政策特别是私有化政策一团糟，并放出传言，总理干不下去了，要辞职。当然，叶利钦像任何高明的统治者一样，看到部下勾心斗角非常高兴，这样可以分而统之。

正当科尔扎科夫在防备当权派中有可能出现的总统竞争者时，1996年的大选拉开了帷幕，在6月16日的第一轮的总统选举投票前，民意测验显示在野的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的支持率不断地提高，叶利钦可能会落选。这时，科尔扎科夫又跳了起来，在1996年5月5日公然对国际文传电讯社记者说，总统选举要推迟举行，理由是选举结果会对俄罗斯的稳定造成危险，而且可能导致内战。这番反民主和反宪法的言论，在俄国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给叶利钦的竞选造成了很大的被动。所以，叶利钦不愉快地

公开警告他：“这样的政治声明，以后再也不要有了。”

在总统选举的第一轮投票揭晓后，科尔扎科夫果然看到，叶利钦不仅未获得当选总统所必须的半数以上选票，而且得票率与竞争对手久加诺夫相比仅仅多出一个百分点。已经精疲力尽而又患有心脏病的叶利钦再进行第二轮角逐，就更加凶多吉少了。但是，叶利钦的竞选负责人丘拜斯建议照常进行第二轮投票，以取得继续执政的合法性，而科尔扎科夫却不那么想。他认为，万一落选，大家都得从克里姆林宫滚蛋，如果推迟选举，别人虽然有非议，毕竟权力还在手中，哪个人敢于造反，他就可以毫不客气地镇压谁。

为了向坚持要举行第二轮选举的自由派开刀，科尔扎科夫和联邦安全局长巴尔苏科夫在1996年6月19日深夜，派人把丘拜斯的两名亲信、叶利钦竞选班子中的主要工作人员利索夫斯基和叶夫斯诺夫斯基抓了起来。当时他们正带着50万美元走出政府办公大楼，科尔扎科夫以他们的大量资金来路不明，想来个人赃俱获，一举搞垮自由派，使叶利钦无法参加第二轮总统竞选，从而取消本届总统选举。

常言道，打狗要看主人脸。说叶利钦竞选班子的美元来路不明，不就等于说叶利钦用赃款参加竞选吗？这一举动太让叶利钦难堪了，简直是太岁头上动土。几个小时后，即6月20日清晨，叶利钦就宣布把反对总统第二轮选举的强硬派人物科尔扎科夫、巴尔苏科夫、还有第一副总理索斯科韦茨（该人在1995年8月一次与强力部门领导讨论在俄远东居住的中国人问题时，坚决主张制定驱逐计划）等人全部撤职，以免继续捣乱。同时任命拉克皮温为总统安全局局长，释放被抓的竞选工作人员。事后，切尔诺梅尔金总理也指责说，联邦安全局的部分人“倾向于用简单有效的、但就其实质是武力的、违宪的手段来解决社会积累的问题，事实上破坏了国家安全”。

幸而没有被科尔扎科夫他们言中，叶利钦通过与列别德的结盟，赢得了1997年7月初的第二轮投票，再次担任俄罗斯总统，任期四年。但科尔扎科夫这位被撤了职的特工强人不甘心从此又默默无闻，他到处活动，先到美国亚特兰大观看了奥运会比赛，不时还接受记者采访，透露些内幕消息，甚至扬言要写一部“反映某些看法的书”，来揭克里姆林宫领导集团的老底。这又惹怒了叶利钦，他不顾两人多年的“友情”，在1996年10月27日宣布把科尔扎科夫开除出武装部队编制，剥夺军衔，停发工资。

这是科尔扎科夫第二次被开除军籍，但他毕竟也不是酒囊饭袋，他立即另起炉灶，自己从政，参加了图拉州1997年5月的国家杜马议员补选，居然也一炮打响，当上了议员。他和同样被叶利钦解职的列别德消除前嫌，力图在政坛上对叶利钦构成犄角之势。到了1997年8月12日，科尔扎科夫的书终于写出来了，那天他请了莫斯科新闻界参加他的回忆录情况介绍会。科尔扎科夫说，读者要看到书还须等几天，因为那家印刷机构受到了情报机构的压力，突然拒绝印刷他的回忆录。他还说，他从俄罗斯情报界的朋友处获悉，该情报机构的局长不久前被叶利钦从休假地召了回来，叶对他说“要解决科尔扎科夫问题”。叶利钦用来对付一度是自己贴身保镖的工具居然也是情报特工机构，这真有点像是请君入瓮的故事。

不过从俄国《共青团真理报》和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发表的科尔扎科夫回忆录的摘要上看，这部叫《叶利钦：从崛起到没落》的书对叶利钦没有多大实质性的伤害，其中的许多说法早已在社会上流传了。如说叶利钦患有慢性抑郁症，有过多次自杀企图；说他摆脱对酒的依赖性是何等的困难；说这位总统被“纯粹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的种种现象所腐蚀，例如喜欢阿谀奉承、贪图物质享受、对自己毫无约束”；等等。科尔扎科夫对于自己的这些说法向记者说，他并不担心会引起法律方面的冲突，因

为他作为国家杜马议员还享有豁免权。显然，这位前特工强人在心里还是怕着特工机构的。

其实，他走了之后的特工机构，比他在时要安分多了。就以他的总统安全局为例，由拉克皮温接替他担任局长后，真正成了联邦保卫局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倒过来指挥它。联邦保卫局也去掉了“总局”的称呼，并且都安分守己地干着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科尔扎科夫控制的总统安全局人数最多时有 4 万人，现在只有 1500 人了，一心专搞总统安全保卫工作。

第七章

守护世界最长的边界线

俄罗斯的边防局来自于克格勃的第四总局。1991年9月，第四总局被划出克格勃，成为苏联保卫国界委员会下设的边防军联合司令部，卡利尼琴科任总司令。1992年6月3日，叶利钦发布了关于接管前苏联和独联体边防军，成立俄联邦边防军，并将边防军并入俄国家安全部的总统令，任命什利亚赫京为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兼边防军总司令。到1993年12月20日，俄联邦安全部被撤销，边防军又从国家安全机关独立出来，成为俄罗斯联邦边防局，它是一个部级联邦机构。这次改组也涉及到了领导人变动，由尼古拉耶夫接替什利亚赫京担任边防局局长，尼氏为上将军衔。

俄边防局守护着世界上最长也是最复杂的边界线。俄罗斯虽然不像前苏联有许多加盟共和国，但它还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面积有1700万平方公里。俄罗斯的边界线总长有60933公里，其中陆界14509公里，江河界7141公里，湖泊界475公里，海界38808公里，同中国的共同边界4209.3公里。此外根据协定，有四个独联体国家的外部边界由俄联邦边防局的边防军集团守卫，它们是格鲁吉亚574公里、亚美尼亚354公里、吉尔吉斯斯坦1089

公里（全为吉和中国边界）、塔吉克斯坦 1909 公里（其中塔和中国边界 522 公里）。

守卫如此漫长复杂的边界线，自然不容易。所以俄罗斯边防部队有 20 余万人，虽然比不上克格勃时期第四总局的 30 万人，但比起俄其他部队裁掉了一大半要好得多。边防局现在分成边防军和边防机关两大系统。前者有陆、海、空三种兵团和部队，后者由对外情报机关、作战机关、边检机关、边界警卫、国际条法司、后勤与技术保障机关、边防高等院校和中央直属部队构成。

按照俄罗斯 1995 年 12 月 8 日颁布的《对外情报法》，俄边防局的对外情报机关负责边境、经济特区和大陆架方面的情报工作。按照 1992 年 7 月 8 日颁布的《俄联邦国家安全机关法》的规定，以及 1993 年 7 月 1 日颁布的对该法的修改和补充法令的规定，俄国家安全系统的组成之一是“边防机关边防军侦察机构”；“边防机关边防军侦察机构负责实施侦察活动，并依照本法、《俄罗斯联邦侦缉行动法》和其他国家安全法，实施保障俄罗斯联邦国家边界安全的措施。”由此可见，边防总局也是一个特工机构，具有对外情报对内侦察的双重功能。当然，其活动内容主要在与边界有关的事项上。

边防局认为，边境地区对俄安全和利益的主要威胁有来自外部的也有来自内部的。外部威胁有：俄同一系列交界国边界划分问题的激化可能威胁俄领土完整；俄边界附近军事集团的扩展，北约东扩到俄边界；一系列邻国力图在俄边境地区扩大影响；西方国家在中亚和外高加索想把俄挤出其地缘政治利益区；一系列外国扩大利用俄自然资源的活动规模，削弱俄的领海地位；外国经济扩张的威胁增大。内部威胁有：第三国公民通过俄境的非法移民增多，其中一部分滞留在俄边境地区，人口扩张的威胁增大；俄边界附近和边境地区存在武装冲突和其他冲突，并有新爆发这类冲突的可能；边界地区的分裂主义活动；通过国际走私毒品、武

器弹药、原材料的有组织犯罪加剧。该局认为，非法移民和毒品走私的来源为南亚与中亚、外高加索和乌克兰等国家和地区。

1997年6月，俄边防局公布了它自1992年以来的工作成果，边防局的机关和军队共拘留了24660名越境者（包括车臣反叛总统杜达耶夫的遗孀杜达耶娃）。通过边防口岸的人数达2.7亿人次，其中俄国公民8900万人次；交通工具3600万件次。由于边境守护的重要，以及边防局工作的卖力，所以在俄罗斯各强力部门中，它的经费属于优先保障的单位，其工作人员和军人均能够及时领到薪金。

边防特工“不倒翁”

俄罗斯能产生独立的边防军，是当时巴卡金为了“肢解”克格勃，而模仿了美国建立独立的海岸警卫队的做法，但这不符合苏联和俄国的传统，所以很快被国家安全部吞并。国家安全部被撤销后，尼古拉耶夫当上了再次独立的边防局局长兼边防军总司令，发誓要独立生存下去。他果然有一套，尽管边防问题成堆，但他还是使边防局成为一个联邦部级机构，他自己也成为重要的俄联邦国家安全会议的成员。他的机构不仅没有再被别人吃掉，他自己也成了俄各强力部门中任职时间最长的领导。

事实上，除了原来国家安全系统想吃掉他外，国防部在格拉乔夫领导时期也一直想拿下边防局。格拉乔夫认为，俄罗斯正规武装力量不管边防事务，那么除非爆发大规模战争，否则英雄无

用武之地，军队就会萎缩，他这个国防部长也就乏善可陈了。所以，他一有机会就申明，边防局应该接受国防部的管辖，边防工作应该由俄罗斯军队参与，而尼古拉耶夫则表示坚决反对。

官司最后打到叶利钦总统那里，叶利钦就在1994年10月3日签署了一项不改变边防局隶属关系的命令，以表明自己的态度。总统的命令要求格拉乔夫和尼古拉耶夫结束有害的争论，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命令说，关于谁负责保卫俄罗斯边界的问题应该是已经解决了，俄联邦边防局应担负起这一任务，武装力量和边防军各有其不同的任务。针对当时他们争论的一个具体问题，叶利钦裁决：塔吉克和阿富汗之间的边界保卫同样不能由武装力量承担，因为那里的冲突具有游击战的特点，而边防军更适合实施这样的行动。最后，叶利钦要求国防部长和边防军司令在维护俄罗斯民族利益方面协调自己的行动和加强合作。显然，尼古拉耶夫在和格拉乔夫的斗争中没有倒下，倒是后者碰了一鼻子灰。

尼古拉耶夫得到叶利钦器重的一个原因，是他积极地处理了有关俄中边界的问题。1995年在率领俄联邦边防局正式代表团访问北京前，他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为了解决（俄中边界）争端，双方正在进行谈判，不久将达成协议。”这次访问，据他说，将签署一些对俄中两国都具有空前意义的文件，为起草这些文章花费了一年半的时间，克服了大量分歧。结果，尼古拉耶夫在北京和中国有关部门签署了《中俄合作警护边界协定》。他在北京还谈到了俄中边界的划界问题，他表示不打算在1991年签订的俄中条约上后退。他认为：“最漫长和政治上最重要的俄中边界应当成为阻挡犯罪分子的‘铁的屏障’，成为正常交往的开放边界。”

对于尼古拉耶夫在俄中边界上的态度，俄远东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纳兹德拉坚科经常持批评态度，联邦边防局也有一位参与划界工作的少将因不赞同尼古拉耶夫的观点而辞职。他们这些人

主要是反对在图们江接近入海口处的一些边界更动，认为这样中国就可以在那里建立直通日本海的港口了。当然，其他方面也还有争议，但俄总统和政府还是支持尼古拉耶夫的。俄边防军的海军副司令、海军上将斯卡利诺夫也在1996年8月23日说，尼古拉耶夫在北京签署的边界警护协定，有助于改善地区安全总的状况。他还说，边界要保持正常状态（就是禁止违法者进出），取决于两国边防军人的合作。尽管这些说得不错，但边防局实际上和暗中对中国的行动也是很复杂的。

尼古拉耶夫除积极处理与中国的边界问题外，还设法着手在独联体国家和土耳其、伊朗的边界地区建立一个高加索特别边防军区。1995年6月7日，他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对俄塔斯社记者说，该特别边防军区可以在俄罗斯、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边防合作的基础上开展工作。这位边防领导说：“如果阿塞拜疆也同意这个决定，我们就会实现我们早就考虑的加强共同守护边界问题的办法。”

针对北约东扩，这位边防局局长向叶利钦总统献上了一条进行反制的计策，让叶利钦在1997年7月12日向芬兰总统阿赫蒂萨里建议，为了省钱，由俄罗斯和芬兰双方联合在两国边界巡逻。叶利钦还说：“让我们联合看管边界——这将事半功倍。”如果这成功了，俄联邦边防军的势力将越出独联体的范围，进入斯堪的那维亚半岛，扩大俄罗斯的军事防卫纵深，这在苏联时期也是没有的。自然，满腹狐疑的芬兰人一口拒绝了。他们没有忘记斯大林以为了列宁格勒的边防安全为借口，出动了几十万大军强占了芬兰的卡累利阿地区。与北极熊沾在一起很危险，一旦其发怒就难办了，还是自己多化点钱好。

不管怎么说，尼古拉耶夫既能到处奔波办实事，又能绞尽脑汁出主意，总统感到非常满意。常常要批评强力部门工作的叶利钦很少批评边防局，这使尼古拉耶夫成了边防特工的“不倒翁”。

边界三千烦恼丝

尽管尼古拉耶夫成为边防特工“不倒翁”，但俄罗斯的边界问题就像懒婆娘头上的三千烦恼丝，实在太多太长，如一团乱麻。它有俄罗斯自己边境地区的分裂主义的民族矛盾；有独联体国家之间的边境纠纷；有独联体和其他接壤国家的边界争议；有世界大国向原苏联边缘地区的政治经济渗透，等等。

1997年7月2日，尼古拉耶夫在俄联邦边防局成立五周年（从俄罗斯接管苏联独联体边防军算起）的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了在公元2000年前边境线上存在的11个不良因素及其对策，虽然都很抽象、很简单化，但也反映出了问题的复杂和处理的麻烦。具体如下：

（1）通过国界的有组织犯罪规模扩大。对策：加强边界保卫工作，各部门协同打击边境非法活动。

（2）边界附近现有的和可能产生的紧张局势策源地。对策：制定并实施平衡妥善的民族和地区政策。

（3）某些边境地区分裂活动和情绪滋长，同划定俄与某些国家边界有关的问题激化。对策：实施俄边防基本政策。

（4）巴伦支海、波罗的海、黑海、里海及白令海峡领海和大陆架划分问题未解决。对策：继续从国际法上划分，分割领海和大陆架。

（5）外国情报机关加紧通过边界从事侦察与颠覆活动。对策：

协调联邦边防局、安全局和其他部委对付敌特活动的工作。

(6) 中国和朝鲜公民“开发”俄远东地区的危险。对策：联邦边防局、安全局、内务部、外交部、经济部共同努力制止中朝公民在俄境内的非法活动。

(7) 缺乏实施国家边防政策的机制。对策：通过联邦边防纲要。

(8) 独联体国家在实施共同保卫外部边界措施方面一体化进程不力。对策：不懈地实施俄加深独联体一体化的国策。

(9) 联邦边防局资金不足。对策：从国家安全受到的威胁出发，制定联邦预算。

(10) 联邦边防局技术装备数量和质量严重下降。对策：对国家军工转产计划实行修订。

(11) 俄人口形势恶化，影响边防局兵员配备。对策：由国家决定建立边防警卫队，作为联邦边防局的非军事机构之一。

尼古拉耶夫的“隆中对”能否实现，或有几分可行性，只有让历史老人去评说了，反正现在俄罗斯具体的边防状况还在继续恶化。

边界问题 热点叠现

俄罗斯边境形势的动荡和恶化，产了许多热点问题。对此俄罗斯的传播媒介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充满着危机意识和忧虑感。

它们报道说，根据俄边防局和其他情报机关搜集的情报资料并对其进行分析后表明，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势力的鼓动下，有一项行动计划要使俄国南部边境地区形势普遍不稳。在高加索方向，主要依靠车臣和印古什武装分子的队伍，由他们骚扰俄罗斯的达吉斯坦、北奥塞梯、斯塔夫罗波尔和莫兹多克市郊。领导这项行动的将是通过选举已当上车臣总统的马斯哈多夫，而不是已被击毙的车臣总统杜达耶夫的女婿拉杜耶夫。马斯哈多夫在1993~1996年期间不止一次地访问了土耳其、英国和美国，被这些国家的情报机构看作是他们在北高加索地区的“主要联系人”。在外高加索，西方在那里的主要伙伴是格鲁吉亚的总统谢瓦尔德纳泽和阿塞拜疆的总统阿利耶夫。谢瓦尔德纳泽的计划是进攻其境内闹独立的阿布哈兹，目的是把那里的土著居民赶到俄罗斯联邦的索契地区，这除了制造不人道的悲剧以外，还会给俄北高加索西部造成混乱。阿利耶夫承担的义务是，不仅利用俄罗斯向亚美尼亚秘密提供核武器这种虚假消息的烟幕再次进攻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而且要对居住在与达吉斯坦边界不远处的列兹根少数民族发动镇压运动。这必然使难民涌入俄罗斯，搞乱俄罗斯的局势。

可是，上述这些地区的核心问题还是车臣。这个几世纪以来一直以不顺从俄罗斯统治而闻名的100多万人的小自治共和国，现在处于事实上的独立状态或者是无政府状态。俄罗斯要再镇压它，事实证明很难；要让它独立，就会在整个北高加索地区引起连锁反应，而且失去对丰富的里海石油输出管道的控制权。但维持现状，等于让一颗毒瘤继续长在身上，在家里继续放着一颗定时炸弹。今日车臣人，不是靠打仗就是靠贩卖军火生存。1992年，杜达耶夫掌权后，车臣就接管了25亿美元的俄罗斯武器，其中有连俄军也还没有装备上的装甲运输车，俄联邦安全局推断，其中一些已被卖给西方。此外还有最新的反坦克导弹、地对空导弹、机枪和卫星通讯设备。其中许多武器车臣人用不了，就转手卖掉。除

了卖还有买，他们从波罗的海国家（主要是爱沙尼亚）经芬兰购买从俄罗斯军火库和军工厂偷运出来的武器，另外还从伊斯兰国家进口武器，其中有最先进的毒刺式导弹，一个士兵背着它就能击毁任何一架客机，对恐怖主义分子来说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工具。这些武器的走私线路，有经过车臣和格鲁吉亚之间的，有经过车臣和阿塞拜疆之间的，而俄罗斯边防局都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监控。这样的军火走私不仅使车臣成了一个巨大的火药桶，也使独联体范围内的地区战争因能够继续得到军事装备供应而无法平息。

在中亚边境地带，俄罗斯报界也评论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巴基斯坦特工机关扶植了阿富汗的原教旨主义的“塔利班”运动，他们全力进攻阿富汗北部地区。那里的居民大多数是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这将引起大量带有武器的难民进入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这些独联体国家既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又缺乏稳定的政治局势。一旦这些地区崩溃，必然导致哈萨克斯坦也陷于混乱。哈萨克斯坦境内又有大量俄罗斯人，冲突自然又要波及俄罗斯联邦。所以每当“塔利班”取得一次大的攻势的胜利，俄联邦和这几个中亚国家就要发表一次声明表示要共同保卫边界。叶利钦也明确地要尼古拉耶夫的联邦边防局负责此事。虽然“塔利班”迟迟没有取得席卷阿富汗北部的胜利，但是像塔吉克斯坦政府内部各派武装力量却已经杀得昏天黑地了。1997年8月9日，就同时有内务特种部队支队指挥官卡西莫夫和国家海关委员会主席萨利莫夫之间的战斗；有总统卫队指挥官米尔佐耶夫和快速反应旅的领导胡多伊别尔德耶夫上校之间的战斗。

另外，像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关于克里米亚的地位和归属上不时暴发争吵；俄联邦的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州也要求与蒙古统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苏联占领的现在属于俄罗斯的日本北方四岛，也给俄日两国之间的关系造成了最大的障碍。这北方四岛名叫齿舞、色丹、国后、择捉，不仅森林茂密，矿藏丰富，海产多

样，更重要的是地战略地位重要，俄罗斯的大型战略军舰能不受其他国家和严寒季节控制而自由出入海洋，就只有通过北方四岛周围的海道。所以，尽管1956年苏联与日本恢复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就同意缔结和约后归还齿舞和色丹两岛；1973年日本田中首相访问苏联时，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同意在联合声明中写上要解决包含有领土问题在内、悬而未决的问题来缔结和约；1993年在俄罗斯和日本的“东京宣言”中，重申了前苏联和日本签署的文件有效。但实际上为了“长远的地缘战略利益”，无论苏联还是俄罗斯，都不会把北方四岛交出来。可是不交，日本不罢休。日本作为现在世界上第二位经济大国和同样是第二位的军费开支大国，正在给俄罗斯不断加大经济和军事上的压力。

70年代，苏联跨海过洋到处扩张，美国人当时就说，北极熊“长出了有蹼的脚”，也能下水了；90年代，俄罗斯边境狼烟从四面八方冒起，难道要让疲惫的北极熊退回北极圈不成？可是人们感慨系之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北极熊”的潜力大得很，现在它自己时时充满着危机意识和忧虑感，将来有一天会让别人再次面临危机的。

第八章

千里眼与顺风耳

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又不受空间距离的限制，一直是人类所追求的一个梦想，像在《封神传》小说中也有描写。有个叫杨任的人，他两手中各有一只眼睛，它们能上看天庭，下观地底，中看人间千里。小说第九十四回还叙述了这么一场战斗。高明、高觉两人和姜子牙打仗时，靠着棋盘山上轩辕庙内的两尊“泥塑鬼使”来掌握敌情，知彼知己，屡战屡胜。这两尊泥塑，一叫千里眼，能目观千里；一叫顺风耳，能耳听千里。姜子牙吃了败仗之后，请杨戩去求教玉鼎真人，才知道是有这两尊泥像在起作用，就派人去打碎它们。没有了泥塑，高明、高觉就如同盲人聋子一般，很快就被打败了。现代社会有了真正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各式各样的雷达、声纳和照相设备比千里眼观察得还远；灵敏的电子窃听和监听设备不用顺风就能听到世界各个角落的谈话。俄罗斯的联邦通讯和信息局，就像美国国家安全局一样，充当了各自政府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俄联邦通讯和信息局源于克格勃第八局（密码通讯）、第十二局（电子窃听）、第十六局（对外侦听破译外国密码）。按 1992 年

7月8日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情报机关法》第十一条规定：“直属俄罗斯联邦总统的联邦政府通讯和信息局对外情报机构的工作范围是密码通讯和其他形式的专门通讯联络。”具体来说，它负责编制密码，保障机要部门的保密通讯，监听和破译外国密码通讯，利用间谍卫星、地面雷达站以及在驻外使领馆里、活动飞机和船舶上的电子设备搜寻地面及空中信息。此外，联邦通讯和信息局还负责有关的通讯和电子侦察器材；除了拥有大量的密码专家和技术人才外，它还拥有一支通讯部队，工作人员数以万计；它的密码研究院拥有几十名俄罗斯科学院的院士和通讯院士。可见其学术水准之高。

俄国的密码通信和破译始于彼得大帝时代，当时主要针对信件公文。彼得大帝这位力图改革国家落后面貌的沙皇，总是想法设法获取情报但又怕别人得到情报，所以他在皇宫里就设置了一间独特的“黑屋子”，自己亲自在那里研究密码和破译他得到的密码信件，他很少把这项工作交给别人。正因为控制得紧，一直到沙俄末期，密码部门的水平仍然不高，这也是德国人能轻易地破译俄国人的密码通讯，使沙俄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屡战屡败的主要原因。

前苏联契卡成立后不久，于1921年5月（一说是1918年11月13日）在其下面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负责编制密码和破译外国密码通讯和函件。到卫国战争初期，苏联已拥有一套能防止被人破译的可靠的密码系统。而且，密码情报人员还能获取远东方面的有关密码通讯，为苏联最终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胜利作出了贡献。

战后，这个监听破译机构成了克格勃第八局。1962年10月，全世界都惶恐不安，一场核战争一触即发。美国总统肯尼迪要求苏联从古巴撤走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苏联导弹，但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开始对此的反应充满了挑衅性。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对赫

鲁晓夫毫无顾忌的态度困惑不解。每次会见完这位感情容易冲动的国家元首之后，美国大使都会给肯尼迪发一份密电：“要么赫鲁晓夫是位天才，要么就是他了解您的想法……”其实，赫氏不是天才，只是他看到了被苏联情报部门破译的美国密电，因此他能经常获知肯尼迪同五角大楼和国会商谈的内容。这表明苏联情报部门密码破译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功。

1991年“8.19事件”时，克格勃第八局事先监听了戈尔巴乔夫总统的电话，事变中又控制了全国的通讯联系，使戈尔巴乔夫成了“瞎子、聋子和哑巴”。所以，事变一结束，该局立即受到整顿，并和克格勃第十二局、第十六局等一起被划出来，成为直接由苏联总统领导的机构，后来又被俄罗斯联邦接管。

现在的俄联邦通讯和信息局由叶利钦直接指挥，显示了俄罗斯对密码情报部门的重视。俄国的《俄罗斯报》上曾有人撰文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富足安康都要有三大支柱：核工业、导弹制造业和密码情报部门。当今时代的口号是，‘谁掌握了信息，谁就掌握了世界’。……谁拥有最好的武器，谁就会在战争中取胜，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甚至核武器也已不是取胜和保卫国家的唯一保证，必须对信息电信系统严加保护。不然的话，导弹可能根本无法发射，或者可能会帮助敌人毁掉自己的城市，或者会在发射井中爆炸。”

俄联邦通讯和信息局在规模和能力方面，在当今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俄罗斯同美国和其他最发达国家之间保持着稳定的平衡。

无孔不入 耳目遍天下

俄罗斯联邦通讯和信息局的总部设在莫斯科南郊昆采沃的森林之中，这里也是监听整个欧洲动静的基地。在阴凉的森林里布满了天线，各种设备都加以伪装。办公室内很拥挤，也很温暖。有的人戴着耳机，有的人不停地查阅着密码本，有的调整着接受器，昼夜 24 小时忙个不停。

整个俄罗斯的技术侦察网络由以下四大部分构成：

(1) 地面雷达和天线站，它们分超视距雷达、远距离警戒雷达、数以千计的跟踪雷达和无数的信号接收天线，它们既保证了自己辽阔大地上的通讯畅通，也监视和监听外国的交通和通讯。其中克鲁格环形分布乌伦韦伯天线阵用于高频侦收和测向，有效距离可达 1 万公里。有的设在驻外使领馆，以侦听微波通讯等信号。

(2) 海上间谍船，它们是些装有雷达设备和天线的商船、拖网渔船和科学考察船，有时也直接用军舰和潜艇来进行电子和照相侦察。1989 年，经北约国家确认的当时苏联的技术侦察船，有 14 个级别、67 艘，总共 16 万吨，其中还有排水量达 4 万吨的核动力船舶，这些船上工作人员达万人，比其他国家的总和还多。现在俄罗斯可能要少一些，但规模不会小。

(3) 空中间谍飞机，俄罗斯的间谍飞机虽然没有美国的出名，但品种和功能还是比较接近的。主要有图-95D 熊式、图-22C 式、雅克-28R 和米格-21R 等型号的飞机，有的是能飞到 2.5 至

3 万米高度的高空侦察机，用于照相侦察；能长时间在空中飞行的螺旋桨飞机，用于空中电子侦听；还有就是预警飞机，升空后，能把方圆几百公里至上千公里地区的地面和空中目标看得一清二楚，包括导弹发射、飞机起降和坦克出动。

(4) 间谍卫星，这是俄罗斯和美国技术侦察能力远远高出他国的主要体现。因为现在除了他们外，世界上只有法国和以色列发射过一二个间谍卫星，日本等国家都还在试验阶段。

俄罗斯和美国都发射了数以百计的间谍卫星，这些间谍卫星就像上帝的眼睛一样，关注着地球上的人类的一举一动。

早在苏联时代的 1958 年，俄国人就在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让卫星服务于国家安全、让它从太空进行侦察的想法，最早是由苏联火箭和宇航总设计师科罗廖夫在给科尔德什院士的信中提出来的。他写道，要“制造一种仪器能够从卫星上对地球表面进行摄影，得到的照片可以满足各种需要”。经过两年的研制，到 1962 年 6 月 24 日，第一颗间谍卫星就隐藏在“宇宙—4 号”火箭内发射升空了。这个代号为“天顶”的间谍卫星环绕地球飞行了三昼夜，发回了许多有价值的照片。它当时装有三架照相机、一个地形测绘仪和一些无线电侦察仪器。三架照相机在 200 公里高的太空轨道上，拍摄了宽度为 180 公里范围的照片，分辨率为 10~12 米。每架相机的胶片储备足够拍摄 1500 张照片，可进行连拍。最后，拍完的胶片连同相机一起由回收设备送回地面。

从此俄国人明白，借助航天技术可以用卫星进行图像侦察和无线电信号侦听，可以从太空轨道上发现位于卫星控制区域内的导弹及雷达所在地，以及测定导弹的发射坐标等。随后，苏联一直在数量上保持第一卫星大国的地位，仅到 1981 年底，它就发射了 538 颗照相侦察卫星，127 颗电子侦察卫星，32 颗海洋监视卫星（监视全球海军），25 颗预警卫星（监视导弹发射），共计 722

颗。不过按照英国《简氏防务周刊》在 1997 年的分析，前苏联的军事太空计划虽然曾一直被认为比美国的规模大得多，但这是因为苏制卫星的使用寿命只有美国的 25%~50%。美国的摄影侦察卫星能在轨道上运行长达一年，而苏联的这类卫星只能运行一至两个星期。较新的美国这类卫星运行寿命为四到六年，而第五代俄罗斯这类卫星则一般运行一年。

俄罗斯联邦接管了苏联的卫星系统和发射场，主要的发射场是在哈萨克的拜努科尔，现在由俄罗斯出钱租用。并且俄罗斯在经济严重困难、经费严重短缺的情况下，还在自己境内修建新的发射场，以便继续保持太空侦察的领先能力。说掌管着从间谍卫星到其他技术侦察手段的俄联邦通讯和信息局的耳目遍天下，一点也不夸张。

窥视侦听对手秘密

窥视主要靠间谍卫星，在前苏联和美国之间曾用它来相互监视对方的核武器和导弹的数量及分布状况。有了这种窥视，双方就可清楚地知道对方的厉害，才有条件谈判核均势、核裁军和销毁中程导弹之类的协议。现在俄罗斯和美国虽然同意双方可以到各自的现场进行一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核查工作，但主要还是靠技侦手段来摸清对方的军事实力，也包括飞机、坦克、军舰的数量和部署。除了用卫星、飞机的照片来断定对方的军事动向外，无线电信号的侦听也能知道可能和正在发生的变化。

俄罗斯通讯和信息局经常把窥视和侦听到的国际军事协定的执行情况（即是否在裁减军备和撤销军事基地）、外国武装力量的调动、民族和国家的冲突等情报资料，迅速地送到总统的办公桌上。同时也根据积累的资料，向国家领导人预测外国对俄罗斯可能发生的侵犯。

1997年5月，德国《焦点》周刊报道，美国有14万名工作人员的国家安全局最近得到情报，它的对手俄罗斯通讯和信息局的高级间谍们自1989年起破译了美国的模拟语言加密系统，即保密电话系统STU。这是北约成员国最高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之间高度敏感的、花大力气保护的通讯联络系统。一位德国反间谍专家提到了这样的后果：“当美国总统从白宫向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打电话时，俄罗斯人可以同时听到；当德国国防部长吕厄同他的五角大楼同行在电话里讨论敏感的联盟问题时，莫斯科可以立即拿到破译出来的谈话内容；当克林顿和科尔在电话里聊天时，叶利钦很快可以知道，是不是拿他开玩笑。”德国联邦信息技术安全局发言人迪科普夫证实：“我们同美国国家安全局讨论敏感问题时所使用的是同样的STU线路。”后来，美国人暗地里有点尴尬地告诉德国情报机构，通讯渠道出现了漏洞。

当有人向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女发言人塔季扬娜·萨莫利斯问及此事时，她守口如瓶，滴水不漏。前克格勃无线电侦察处副处长维·卡普拉诺夫少将也拒绝谈论STU问题。他曾指挥过破译北约密码的工作，但现在在电话里闭口不谈此事。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密探们认为，不可能有可以破译他们密码的超级电脑，只能是有人出卖了机密。美国联邦调查局便开始对六名嫌疑对象严密监视了几个月。

有时，俄罗斯通讯和信息局还能得到不少个人隐私性质的东西，这些东西就只能作为私下侃大山的笑料了。例如，俄联邦通讯和信息局的军官们曾透露说，他们常听到最爱信口开河的美国

飞行员在飞行时讲的笑话，他们谈论和女友的性关系细节，有时甚至还通过电话直接和女朋友交谈，说些下流的粗话。德国人也在空中飞行时骂娘，基本上都使用英语，因为北约国家都将英语作为公共用语，而且联邦德国军队司令部向各部队发号施令也用英语。国外的粗鲁话比较贫乏，也较易学会。俄电子情报人员也常监听到俄罗斯军人的粗话，他们认为，俄语粗话五花八门，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粗话有利于保密。如俄罗斯坦克兵在训练中用无线电说的一些粗话，俄联邦通讯和信息局的情报人员只能勉强听懂，外国监听人员则肯定不知所云了。

在俄罗斯对车臣反政府武装分子的战争中，俄联邦通讯和信息局曾立了一大功。他们通过监听信号，确定车臣闹独立的总统杜达耶夫的位置，再让飞机前去把他炸死。就像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通过监听信号把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在空中拦截击毙一样。

车臣总统 命赴黄泉

俄罗斯联邦高加索地区有个信仰伊斯兰教的车臣自治共和国（车臣族仅 90 万人），其总统杜达耶夫原是苏联军人，矮小精悍，1991 年掌权后就不断要求脱离俄罗斯而独立。对此，俄罗斯在 1995 年 1 月出动大批军队进攻车臣，占领其首府格罗兹尼后，扶植了一个亲俄政府。但杜达耶夫继续领导他的部下和强大的俄军开展游击战，双方打了 16 个月，既不分胜负又难解难分。

为了掌握杜达耶夫的行踪从而消灭他，达到擒贼先擒王的目的，俄国防部和情报部门决定联合行动。自1996年1月开始，国防部长格拉乔夫通过中间人与杜达耶夫多次通电话，表示叶利钦愿在俄总统选举之前与车臣达成永久的和平。实际上这是在一次次的试验，通过与杜达耶夫大哥大的电话联系，让电子监听部门测定其方位，同时确定用跟踪卫星电话信号为军方飞机发射导弹提供目标所需要的数据。

到1996年4月21日，条件成熟了。当天深夜，杜达耶夫乘坐一辆“尼瓦”牌吉普车，驶出了由车臣游击队控制的格希丘村，他凭以前的经验，发现一通大哥大，不一会儿就有导弹飞来，所以要离开村庄去拨打电话。车开了1.5公里，来到了一片空旷的田野里。然后，杜达耶夫走下汽车，拿起大哥大开始与一位为结束车臣战争充当调解人的莫斯科政界人士通话。此时的田野里，除了偶尔传来几声杜达耶夫的争议外，一切显得那么的平静。谁知，几分钟后，两架米格飞机突然从天而降，刺耳的噪声划破长空，接着又是“轰轰”两声巨响，52岁的杜达耶夫和他的两名助手随着两枚激光制导弹的爆炸而死去。这是一幕可与任何间谍电影相媲美的精彩场面，虽然如此说法，对于死者有些失敬。

事后，杜达耶夫反叛政府里的一位人士说：“这次攻击行动是由俄罗斯特工人员实施的，西方某些国家通过间谍卫星参与了这次行动。”特工人员是指俄联邦通讯和信息局，西方国家则可能是指美国。法国一位反恐怖专家说，只有美国才有能力凭借其间谍卫星把使用卫星电话的人的所在位置精确地确定在数米范围之内。在海湾战争中，美国一度也想用卫星信号锁定目标的技术来杀死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如此说来，这就可能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同俄联邦通讯和信息局的一次情报合作了。但是，在俄罗斯的西方军事专家又说，俄罗斯不需要外国的帮助就能执行这样的任务。而俄军方又说，杜达耶夫之死与俄军队无关，是车臣各派内讧而

杀死了他。这又可能是俄军进行的一箭双雕的心理战：既可避免对方的报复袭击，又可让对方内部猜疑不和。要使陆空斗争的真相大白是谈何容易！

杜达耶夫死后，他的妻子杜达耶娃又讲出了一些死因背景。杜达耶娃是在她丈夫被炸死一个月后，持着假护照企图越过俄罗斯边界到土耳其避难时，被俄边防军截获的。俄边防军核实了她的身份之后，立即电告莫斯科。俄最高领导层研究之后，决定不搞株连，由叶利钦总统签署命令，将其释放。杜达耶娃获释之后，在其住所接受了新闻记者的采访。她说，杜达耶夫和他的随从早就知道了俄罗斯可以通过捕捉移动电话发射的无线电信号来让军用飞机确定袭击的目标。杜达耶夫还曾和他的部下做过一个试验，他们把他的大哥放在旷野地里，并让它发出信号，过一段时间后就有俄军飞机出现在天空，并准确地向大哥大发射了导弹。因此，杜达耶夫每次打电话时，都远离他的妻子等人，坐车到荒野之处，通话时间也尽可能地短，通话结束后立即撤离。

4月21日晚的“不幸”事件的发生，主要是杜达耶夫先后通了两个电话，一个是给莫斯科的巴洛维，一个给“自由广播电台”的记者，加起来时间较长；另外，他感到为每天要打电话而东躲西藏厌烦极了，没有像往常一样打完一个电话便马上换一个地方。这样，俄国人不仅捕捉到了信号地点，俄军飞机也及时赶到附近发射了导弹。这也是俄国人在过去的三个月里，为打死杜达耶夫所作的第三次努力。在前二次行动中，由于杜达耶夫打电话的时间很短，导弹失去了目标。

为信息战做准备

人类在经历了冷兵器战争、热兵器战争和机器化战争之后，现在已经进入了一种全新的战争形态——信息战。许多高级战略家认为，士兵在激战中大批阵亡的概念将很快与长矛和弓箭一样成为历史的废弃物。俄罗斯虽然还没有全面尝试过信息战，但仔细观察了美国在海湾战争中和波黑冲突中采用的信息战特点，并积极为信息战做好准备。

所谓信息战，就是用摧毁敌方信息系统硬件或软件的办法，使对方的信息不灵，成为聋子和瞎子，失去战斗力，从而被挨打。如在海湾战争中，美国首先用隐形飞机轰炸伊拉克的雷达和通讯系统。另外，早在战争爆发前夕，美国获悉伊拉克从法国买了一种用于防空系统的新型电脑，就在伊拉克通过约旦偷运回国时，美国在安曼的特工就把带有病毒的同类芯片换到了这种电脑里，战争一爆发，美国人便激活病毒，伊拉克的电脑防空系统的软件即陷于瘫痪状态。这样，伊拉克信息系统的硬件和软件全部失灵，萨达姆拥有的同样先进的各种苏制飞机、导弹毫无用处，只能被动挨打。

对此，俄罗斯非常关注。俄联邦通讯和信息局的副局长马尔科缅科在1997年8月14日亲自在俄《独立报》上发表文章，讨论信息战问题。他说：“目前，在国家安全保障的战略方面，信息这个因素已跃居到了第一位。……现代化的信息技术积极地用于

个人、社会和国家活动的各个方面，可创造有助于俄罗斯使用‘信息武器’的某种条件。俄罗斯政府通讯和信息局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已开始为国家权力机关建立专用的信息和远距离通信系统。叶利钦总统于1995年4月3日签署的334号命令，规定信息和远距离通信系统具有总统机构的地位，这说明该系统从事的工作具有特殊的国家意义……”

什么是信息武器呢？俄罗斯自然科学院的齐吉奇科、斯莫良和切列什金三名院士在一篇合写的文章中作过如下概括：第一种是能够渗透到电话局、公共电视网及其管理系统并致使它们瘫痪的计算机病毒；第二种是计算机逻辑炸弹，即预先装入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信息管理中心破坏性程序，在指定的时间里，炸弹自行爆炸，致使国家重要设施陷入瘫痪；第三种是抑制公共电视网交换信息的手段，制造假信息的方法，利用国家和军队控制的频道传播敌对立场的信息。

马尔科缅科在他的文章中还介绍了为对付和进行信息战，而由俄通讯和信息局建立了信息和远距离通信系统，其中的信息部有各种级别的信息分析中心，最高的是总统信息分析中心，其次是部门和地区信息分析中心、某些单位和机关的信息分析科，还有战时和紧急情况下的多功能机动信息分析站。另一个叫远距离通信部，是国家一体化密码通信系统。

马尔科缅科设想的“信息战”要求做到：（1）抑制敌国的指挥和军事指挥基础设施的要素（摧毁指挥和管理中心），对信息和远距离通信系统的要素进行电磁干扰（无线电电子抗争）；（2）获取技术侦察信息，办法是截获和解读通信线路信息传输的信息，或者通过安置在室内和技术设备上的专门电子设备获取信息（无线电电子侦察）；（3）非经批准地接触敌人的信息，然后将其篡改、销毁或窃走，或者破坏敌人信息系统的正常功能；（4）通过敌人的信息渠道或全球性信息协作网，制造和大量扩散假情报或有倾

向性的信息，以此来影响敌方居民和参与决策者的看法、意图和倾向（心理战）。另外，还要求做到通过截取和加工不设防的通信线路传播的信息、和信息系统传递的以及舆论工具登载和播放的信息等几个渠道来获取情报。他认为，信息战的这些设想，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应积极地加以实施（第一部分除外），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用“信息对抗”这个术语更为恰当。俄联邦通讯和信息局以及其他一些类似机构都在密切注视着信息对抗局势的发展。

其实，俄联邦通讯和信息局不仅仅是在注视，也有行动。有一次，俄电子情报人员破译了一份某个西方国家密码电报后，就用同样的密码向对方发出命令，要该国的某个电子情报站全部撤离。如果这个“命令”起了作用的话，可使这个联络枢纽停止运行。遗憾的是，命令无效，小试锋芒就受挫了。

第九章

“小恐龙”格鲁乌

原苏联的军队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简称格鲁乌（英文缩写TPY）。格鲁乌曾有10万名工作人员，另外还有一支3万人左右的特种部队，规模也相当可观，所以人们称其为“小恐龙”。

苏联时期一直有一个传统，即党的情报特工机构以对内为主，军队的情报机构以对外为主，或用一名前格鲁乌少校的话来讲，克格勃的职能是不让苏联从内部被搞垮，而格鲁乌的职能是防止来自外部的打击搞垮苏联。因为基本的职能不同，所以两者的组织机构也有很大的差异，在适应从苏联到俄罗斯联邦的剧变过程中，更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克格勃被五马分尸，格鲁乌却没有受到大的冲击，它除了有部分成员和基地被留在独联体其他国家外，总体上都完整地俄罗斯所继承。当然，不能说以前格鲁乌是与克格勃平分秋色的，现在它就成了老大了，其实格鲁乌作为军事情报部门被政府特工机关所监控的传统一直没有改变。当年，契卡发现红军总司令托洛茨基让其英国军事顾问希尔另搞一套不受控制的情报队伍时，捷尔任斯基就派人在1918年7月10日去“清洗”掉了这支队伍。从此以后，格鲁乌同整个军队的其他部门一

样，都先后被置于契卡组织、克格勃和现在的俄罗斯联邦反间谍安全部门中的军事反间谍局的控制之下。格鲁乌就只能在被限定的对外军事情报方面的领域内大施拳脚。

格鲁乌现任局长为费奥多尔·拉德金中将，他是一位职业情报官和军备控制专家，其格鲁乌生涯长达 20 多年。

格鲁乌总共有十六个局，有的用数字编号，有的则没有，如人事局之类。第一局负责对欧洲开展特工情报活动，下辖五个处，每一个处负责在几个国家的领土上进行情报活动，处下面分科，每个科负责领导派驻在某一个国家的秘密特派站；第二局具有类似的组织机构，负责对北美洲和南美洲进行特工情报活动；第三局负责对亚洲进行特工情报活动；第四局则负责对非洲和中东进行特工情报活动。以上每个局大约有 300 名高级军官在莫斯科本部，另有大约 300 名在国外。第五局是指导军区、集群、舰队（舰队的又称海军情报部）开展情报活动，包括指挥特种部队；第六局负责电子情报搜集。再下来是宇航情报局，它有自己的航天发射场、一批研究所，苏联时期发射的 2000 多个供不同目的的宇宙物体中，有三分之一是属于它的。另外，情报总局还有四个直属处，第一处负责在莫斯科的官方机构，如外交部、外贸部、科学院等安插人员，以掩护职业开展情报活动；第二处在东柏林和西柏林地区从事情报活动；第三处在民族解放组织和恐怖组织中进行活动；第四处以古巴为基地进行活动。这些直属处在苏联瓦解后估计撤并掉了。上述都是情报搜集机构。

格鲁乌还有六个情报整理局，一个情报资料研究所。第七局是对北约集团的；第八局对世界范围内的单个国家；第九局研究军事技术；第十局研究世界范围的军事经济学（提出过对西方石油禁运的对策）；第十一局研究核国家的战略思想和核力量；第十二局的活动不明。情报资料研究所是以公开渠道的图书报刊、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络等资料作为研究情报的基础，与前面各局那种以

特务、电子和宇航技术获取的秘密资料作为情报研究的基础有根本上的不同，所以它也不在情报总局的高墙之内办公。

格鲁乌的第三部分是支援机构，有负责军官升迁和调动的人事局，负责谍报装备的行动技术局，负责外汇和物资的行政技术局，负责通信联络的通信局，另外还有直属情报总局的政治处、财务处、护照处、档案处等部门。

格鲁乌有不少培训间谍特工的学校和基地，如总参学院情报系、军事外交学院、军事外语学院、非法越境者训练中心、克里米亚桑普罗巴军事学院、切列波维茨高等军事通讯工程学院、敖德萨高等步校、北极地区的弗兰格尔训练营、位于莫斯科西北 25 英里处的干部学校等，还有一些军事院校的特别系。但是，像克里米亚和敖德萨现在都是属于乌克兰了。

这些都是粗线条的，如果细讲的话，每个局都有好多部门。这里以主管电子情报的第六局为例作一简单的介绍。

该局有四个分局，第一分局负责无线电通信情报，即有关无线电通信信号的侦察。它直接控制全国的侦收、测向网络，协调下属各军区和驻外军群的无线电侦察活动。它直接控制的侦测网络有：以在莫斯科南约 32 公里的克利莫夫斯克站为中心，包括全国各地的 11 个侦收站，约有 1800 名军事和文职人员，主要目标是美、英的战略空军和北约西欧国家的核武器和导弹部队。

第二分局负责无线电技术情报，即对非通信信号的侦察，如飞机飞行、导弹发射、军舰出动等。

第三分局为技术勤务分局，管理派往国外的有线、无线电信的侦听小组，这些小组分二种，一种叫驻外技术勤务组，在使领馆中为情报总局监听军事信号，属于密码的送回总部处理；一种叫无线电监听站，监听当地反间谍警察的动向，以配合自己间谍的活动。

第四分局为值班分局，负责根据无线电侦察所得的情报，整

天不间断地分析和监视全球军事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美军的动态。

根据值班分局整理出来的一、二、三分局搜集内容的报告，第六局编出每日信号情报简报，格鲁乌再依此并综合其他情报，写出给上级领导看的《每日情况简报》。

格鲁乌总部设在莫斯科市里的哥廷卡中央机场边上，整个机场的四周都有戒备森严的建筑物，其中有三个主要的航空公司的办事处、一个火箭建造公司的办事处、一所军事航空学院和一家航空研究所。机场就躺在这些秘密机构的中央，机场的活动不太多，有时候有一架战斗机在半夜被拉出来去试飞，有时候一架运输机降落下来，驶向格鲁乌大楼，卸下一辆外国坦克或一枚外国火箭。进入格鲁乌总部的道路还要经过一个同样戒备森严的宇宙生态研究所。所有这些机构都有带电的铁丝网围着并由凶猛的警犬看护着。

格鲁乌占据着一幢九层高的长方形大楼，所有朝外的墙都没有开窗。与该地相邻的围墙外的一幢十五层的大楼是格鲁乌的家属楼。整个地区甚至每平方厘米大小的地方都有电视摄像机监视着，并且有肥头大耳的先生们在不停地巡逻，陌生人一出现在那里便会被立即逮捕。

业绩斐然 显赫一时

格鲁乌最早是在红军总司令托洛茨基建议下，列宁在1918年10月21日签署法令后才成立的“红军登记部”，到1920年成为

“红军参谋部第四处”，随即改为“第五局”，1922年成为总参谋部情报部，1941年苏联成立国防委员会后，改为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简称格鲁乌，从此基本定型（为了叙述方便，下面不分时期一律称格鲁乌）。

从苏联内战期间到结束以后，契卡机构一直忙于国内的肃反斗争，并造成扩大化的错误。这一错误不仅扩大到契卡本身的领导和干部身上——相当多的人被处决，更使格鲁乌遭了大殃。从创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格鲁乌共有11位领导人，其中有8位被“清洗”掉，其他人也多少受到牵连。但是格鲁乌对外情报工作依然极其出色。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它招募了大量外国共产党人，在莫斯科加以训练后，以经商办厂或记者等名义派往他们自己所在国或熟悉地方从事情报工作，并进一步发展间谍网。这些人在后来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为苏联战胜德国和日本、并在战后崛起成为超级大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最有名的当然是由德国人理查德·佐尔格领导的、在日本的“拉赛姆小组”。佐尔格在1929年曾到中国，在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中搜集国民党军事围剿动向，提供给中国苏区的红军。1933年，他在获得德国法兰克福报记者及纳粹党党员的身份后，被格鲁乌派到日本东京活动。他组成的情报小组获取和发回了大量战略性情报，如希特勒准备进攻苏联、日本决定进行太平洋战争而不是进攻西伯利亚等重要情报。前一个情报因为派他去的格鲁乌领导别尔津已被处决，斯大林怀疑其可靠性而不予理采，后一个情报使苏联及时把西伯利亚集团军调往莫斯科前线作战，并最终通过斯大林格勒决战扭转了整个战局。后来由于佐尔格他们发报过多，在1941年被日本宪兵队破获，1944年他被处以绞刑。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只有这么一个外国情报组织成功地活动过。

在欧洲，波兰犹太人特伯雷在1938年受格鲁乌派遣，以经商为名，在比利时、法国和德国建立了有数以百计成员的“红色乐队”情报网。从1940年至1943年，“红色乐队”共向苏联提供了1500份左右的情报，内容有德国的武器装备、军队调动和军事计划等，1942年下半年开始，其成员逐渐被盖世太保抓获。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中立国瑞士，当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间谍中心，德国的军事谍报局、美国的战略情报局、英国的军情六局都有大批人马在此活动。苏联格鲁乌也不例外，它在瑞士建立了两个情报网：一个是匈牙利人雷多为领导的情报网，一个是德国人卢西领导的情报网。在这之前，英国人索妮娅也在瑞士打下了基础，他们之间都有联系。雷多情报网提供了有关意大利陆军和空军的调动情况、海军建设和军火工业等情报；卢西情报网则提供了美英情报机构和德国情报机构暗中勾结，企图让西线单独结束战争，使德国全力对付苏联的情报。斯大林利用这些情报及时向罗斯福、丘吉尔交涉，从而保证德国无条件投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格鲁乌和苏联其他情报机关还直接对英美加拿大盟国联合进行了一项原子弹间谍活动。1940年，格鲁乌出现了一位最奇特的局长戈利科夫，因为希特勒的入侵使他同自己的一些最重要的间谍网失去了联系，所以在1941年7月，他干脆以苏联军事代表团的名义，把格鲁乌的指挥中心搬到了伦敦。戈利科夫在英国不仅指挥了对德间谍网的工作，而且布建了“原子弹间谍网”。有关苏联进行原子弹间谍活动的公开暴露，是由于1945年9月6日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馆的密码译电员古曾科的叛逃而引起的。古曾科的实际身份是格鲁乌中尉，他带走了109份重要文件，证明了苏联在美、加地区的间谍人员。后来，通过这些人员又牵出了更多的间谍分子，光在加拿大就有13人作为间谍被逮捕。从事原子弹间谍活动的著名人士有：在加拿大原子实验

室工作的纳恩·梅，他承认向苏联人提供了一些铀的样品和有关原子弹研究的资料，后被判十年徒刑；在英国原子弹研究机构理论部工作的克劳斯·富克斯，他曾参加在美国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向苏联人提供了原子弹实际制造过程的详细资料，他被判 14 年徒刑；还有在英、加、美等地原子研究机构工作的科学家蓬泰科尔沃，他因为富克斯被捕而于 1950 年 9 月逃往苏联，后干脆到新创建的苏联科学院核物理研究所直接为苏联工作；另外在英国驻美大使馆任一秘的麦克莱恩，是负责与美国原子能委员会联络的外交官，暗中也给苏联人递送有关情报，他在 1951 年也逃往苏联。

在战后的东西方冷战时期，格鲁乌在监视西方国家军事动态的同时，还从事了两项重要活动，一项是偷窃西方的军工技术和产品，促进自己的军事工业的发展；一项是在国外从事特种战争，直接为苏联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出力。

格鲁乌的军官大都是受过高等军事技术教育的专家，他们中有 1500 人在国外从事着与军事有关的科技情报，相对而言，克格勃只有 300~400 人在干着同样的工作。原苏联的军工委员会是这项工作的后台老板，克格勃架子大，拿了钱不出活，所以后来该委员会基本上把钱都给了格鲁乌，格鲁乌也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来干这活。

西方的军工技术和产品，虽对苏联实行禁运，但在西方国家大都是可以贸易的，所以格鲁乌最关键的是要搞一套非法暗中进行或合法公开进行的转运网络。

1981 年，日本东芝公司为获暴利，向苏联出口先进的 MPB—110 数控机床。从此，苏联生产的潜艇再也不容易被美国的声纳系统发现了。原来美国的声波定位仪可在距离苏联潜艇 200 海里处进行有效侦察、跟踪，到了 1986 年 7 月，苏联潜艇出现在美国东

海岸 10 海里处，竟然未被发现。到 1987 年，美国才查明了原因，迫使日本逮捕了四名东芝公司职员，勒令两名领导辞职。美国还对此总结出了格鲁乌转运西方高技术产品的种种手段：一是买卖双方起草两种合同，一种是遵守国际条约的正式合同，另一种则是提供真货的合同；二是在运输中，苏联所需的禁运机械和其他产品经过严密包装后，被一堆普通货物所伪装；三是那些袖珍电子系统则被装在手提行李箱内带走；四是那些需要直接运送苏联的物品通过外交邮袋运出所在国；五是选择警惕性较差的海关出口；六是把禁运品从所在国向与其关系融洽的第三国出口；七是从国际博览会上租借展出的敏感物资。

格鲁乌有一支 3 万人左右的特种部队，这是当年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向苏共政治局提出建议后组建的。朱可夫认为，一旦发生战争或战前危机，就需要特种情报颠覆部队潜入敌人后方进行破坏活动。格鲁乌特种部队参加的特种战争是很多的。50 年代入侵匈牙利、60 年代入侵捷克斯洛伐克、80 年代参与波兰的军管，另外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民族独立和民族冲突战争中，它都派出了特种战争教官和专家。最突出的是，格鲁乌特种部队在得到勃列日涅夫要求进攻阿富汗的命令后，迅速出动。1979 年 12 月 27 日，一架安-22 大型运输机出现在喀布尔机场上空，机长告诉地面塔台：“飞机机械故障，请求紧急着陆。”阿富汗人按照国际惯例，同意这架飞机在机场降落。哪知道，该飞机在跑道还没有停稳，一群群全副武装的空降突击队就从巨大的机腹中冲了出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占了塔台，控制了机场。随之，天空中飞来了成群结队的苏联军用飞机，后续部队源源而来。喀布尔阿军束手就擒，只有阿明总统的卫队在空降突击队进攻阿达拉农宫时进行了四个小时的激战，但被训练有素的格鲁乌特种部队打死了 200 多人，阿明总统也被打死。当晚 11 时，苏军完全控制

了阿富汗首都。后来苏军陷入了“泥潭”，只好于1989年2月15日，在徒劳地加强纳结布拉傀儡政府的实力后，全部撤出了阿富汗，殿后的又是格鲁乌特种部队。

部署在原东德的格鲁乌特种部队还曾有这样的任务，在出现战争形势时，迅速捣毁美国在欧洲的导弹基地。为了能随时完成这类特别任务，特种部队一般都部署在接近前线的地区。所以，在1991年苏联解体时，格鲁乌装备最精良、战斗力最强的特种部队大都留在了俄罗斯境外，如在乌克兰境内就有三支它的特种部队。特种部队的制服最初有摩托化步兵服、飞行员服和通讯兵服，现在他们就穿自己的特种兵服。

平安过渡 一脉相承

世界上的恐龙灭亡，主要是由于气候突变。克格勃被“肢解”，也是不能适应苏联到俄罗斯的剧变。但“小恐龙”格鲁乌却适应得很好。1992年2月，德国的《南德意志报》上有篇文章说：“与不再存在的克格勃相反，前苏联军事情报机构格鲁乌在武装力量总司令部的庇护下，至今仍完整无损地保留下来了。”不过，该报说，格鲁乌现在不只是对德国的军事机密感兴趣了，还把重点放在德国的经济和工业上，“感兴趣的目标是：电子、传感器、激光和通讯”。

格鲁乌能平安过渡，是由于它一贯不参与国内纷争的传统，但也不尽然，也有运气的成分在内。在1991年的“8.19事件”中，

因为有克格勃的力量存在，“紧急状态委员会”没有调动格鲁乌的特种部队去莫斯科，所以政变失败后，它毫无牵连。但在1993年10月3至5日的“十月事件”中，因为国家安全部内部分成了两派，派不上用处，叶利钦就让他的卫队长科尔扎科夫指挥部队去进攻反对自己的议会大厦，进攻的部队中就有调动来的来自梁赞州丘奇科沃市的格鲁乌特种部队。但这次成功了，格鲁乌从此更被重用。

根据1995年12月8日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情报法》，其中规定：“俄罗斯联邦国防部的对外情报机构，负责军事、军事政治、军事技术、军事经济和生态领域的情报工作。”作为负责以军事情报为主的格鲁乌，在现在俄罗斯和美国等西方国家成为伙伴关系的今天，肩上的担子无疑要轻松多了。双方的核弹头已经放弃了把对方作为瞄准的目标，也不再处处互挖墙脚了，也没有进行幕后遥控的代理人战争了，军事交流日益增多，这些使得格鲁乌不必像以前那么神经紧张了。特别是1994年12月初在欧洲安全会议召开前夕，俄罗斯、美国和欧洲共有50多个国家达成了一项每年彼此交换军事情报的协议。协议要求这些国家必须提供极为详细的全部军事情报，并且每年还要补充最新资料。所提供的情报资料不仅必须包括各国境内的驻防部队情况，也要包括驻在其他国家的军力态势，特别是如美、俄、英、法等国在世界各基地的部队。交换情报的具体内容包括：部队兵力、驻防位置及指挥体系；主要武器及装备系统的数量；武器照片和技术资料；新式武器系统及国防工业。协议还规定，以后这些被交换的高度机密的军事情报，将存放在维也纳的欧洲安全合作会议办事处，供核对查询。这要给格鲁乌节省不少的人力和物力。

但俄罗斯是不甘心沦为二流国家的，也不甘心仅仅作为美国的附庸而出现在世界的舞台上。在1997年叶利钦宣布的军事改革中，采取了“宁紧人头费，不紧科研费”的做法，加大了对高技

术装备的投入，其中重点加强了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电子对抗和人工智能等关键性高新技术的研究。所以，格鲁乌的军事情报能力和军事情报活动不会减少，更不会停止，只不过是调整一些重点和方向而已。如更加关注俄国周边的军事动向，利用比以前更方便的条件，更多地搜集军工技术情报。俄罗斯的《论据与事实》周刊在1992年5月也提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声称格鲁乌在积极搜集美国的军事技术情报，并说现在这些俄罗斯间谍更多地以旅游者和商人的身份作掩护，比过去以外交官和记者身份进行活动更难进行监控。

第十章

东西方特工初度“蜜月”

1991年，美国人向俄国人提出了一个漂亮的建议：“冷战结束——终止情报机构之间的对立。”俄国人响应了，主动交出了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内的窃听器分布图。以此为契机，俄、美之间情报安全机构建立了直接的正式的关系。双方情报反间谍机构开始了一个短暂的“蜜月”时期，官员经常互访，并在与非法武器贸易、毒品和放射性物质走私、国际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等斗争中结成了伙伴关系。

在前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的第二年，即1992年4月11日，东西方23个国家，包括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美国、德国等国的情报官员和情报机构头面人物，一起参加了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鲍雅纳”国宾馆召开的首次东欧和西方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这个为期两天的会议，是由保加利亚总统热列夫倡议并由保加利亚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美国“民主中心”联合召开的。会议的题目是“民主社会中情报机构的作用”。会上，各方达到了“交流情况、通力合作和协调一致”的三个目的。

但该会议基本倾向是带有西方情报机构收编东方情报机构的

性质，主要由西方情报官员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全面介绍了民主社会条件下情报机构的职能”。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科尔比强调，“情报机构是民主社会的主要工具”。过去的情报机构必须严密注视前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的行动，因长期以来担心苏联红军可能在早上四点越过德国的福尔达山口发动进攻。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可以把情报手段包括军事情报手段用于其他目的，用于发展经济、地质勘探和解决生态等问题。不仅如此，情报手段的职能转移后，将比原来用于间谍活动的开支大大减少。总之，今后的情报活动不应当是一种间谍活动，而应当是一种有利于科学的活动。科尔比描绘的前景太美妙了，只是几年后的实际完全不是这样，连他本人忽然死去也成了一个有疑问的谜。

西方的情报官说，对东欧而言，“不得不改变一项传统的职业模式，应当彻底清除共产党极权主义在情报部门的残余”。另外，该会议强调了议会对情报机构的监督作用和情报机构对前共产党的监督作用，保加利亚内务部长声称，“要把所有前共产党人置于特工机构的监督之下”。最后，会议确定，西方向东欧提供情报技术手段和提供经费培训人员，东欧在情报资料方面向西方开放，如德国情报机构获准查阅保加利亚前政权时期的档案，并协助处理这些文件。

该会议结束时还发表了一项声明。声明说，23 国情报机构一致表示，它们将加强合作，采取果断行动，以便为世界和平与文明，为公正的国际关系和民主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在具体活动中，各国情报机构将通力合作，严厉打击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走私毒品和武器、非法输出资本、生产和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等活动。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俄罗斯情报机构首先在工作中对敌人加以重新定义。原克格勃主管对外情报工作的副主席、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咨询小组负责人基尔皮琴科中将在 1993 年 1 月访问美国

时说，俄罗斯情报机构有别于克格勃，它改变了“敌人”的含义，敌人不是指某一个国家，而是指威胁全人类的某种现象，如核扩散、有组织的犯罪和毒品走私等。所以俄罗斯情报机构愿与所有国家的情报机构进行合作，并与北约建立了业务关系。确实，冷战时期的苏联驻外间谍机构都奉行“主要敌人”路线，身在罗马尼亚的情报人员，实际上做的是反对美国的工作。不过，俄罗斯情报机构发现没有明确目标也不行，后来就用了“优先国家”的术语来取而代之，即根据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程度来确定对外情报工作的重点。

基尔皮琴科访问美国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民主社会中情报机构的作用和任务。他还高度评价了俄《对外情报机关法》的意义，说在制订该法的过程中，他研究了国外的情报立法情况，认为只有美国的情报立法比较完善，欧洲国家差些，第三世界国家则根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基尔皮琴科和局长普里马科夫一样是中东问题专家，懂阿拉伯文，曾在谢列平、安德罗波夫、切布里可夫、克留奇科夫等这些主席手下从事情报工作40年，但现在观念完全变了。陪同他访问美国的还有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新闻和社会联络中心主任科巴拉德泽上校。

对西方人士从来不开放的俄罗斯情报反间谍机构本部，为了促使东西方相互了解和交流，在1992年1月也接待了第一位西方记者——美国《纽约时报》的资深记者怀斯。首先让他参观了对外情报局，他看到了隐藏在茂密森林中的一幢21层高楼，该大楼是1972年夏天建成使用的，属克格勃第一总局。它的外形极像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兰利总部，看得出苏联设计师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建筑物设计的影响，也许是克格勃领导故意要求相似，以便一比高低。该大楼附近有莫斯科环城高速公路，但人们在公路上只能看到白桦树和松树上面的一个屋顶而已。接待怀斯的代局长亚季莫夫也对克格勃的过去进行了谴责，说其权力太大，不仅

未能达到保卫国家的宗旨，而且危害国家安全。接着怀斯又去参观了卢比扬卡大街3号的原克格勃总部、现在的俄联邦安全局。他说总部大楼布满电子设备。在这之前，美国国务卿贝克也曾慕名前去参观，当时他的安全人员的对讲机就因受到这些电子设备的干扰而无法通话。在原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的办公室里，桌上放着六部专线电话，分别通向克里姆林宫、政治局、国防部、格鲁乌、克格勃机关和东欧的情报机关。

1992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盖茨和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普里马科夫也实现了互访。1993年5月16日，普里马科夫在对捷克进行的四天访问中，还公开建议各国情报和安全机关领导人定期举行会晤，以加强对有组织犯罪的监控。通过这些交流，为东西方签订合作协议创造了条件。另外，按照独联体国家之间的有关规定，相互间也不搞情报活动，而是进行情报交流。当然，事实上不一定这样。

互派机构 联手出击

临时性的相互访问或者参观，对当时处在“蜜月”时期的俄罗斯情报反间谍机构和西方国家的同类机构来说还不解渴。他们很快还向对方派驻了常设机构，以便在工作业务上可以联手出击。

这方面俄罗斯和德国之间做得最早也最全面。1992年10月的德国《世界报》报道，在10月1日，德国政府人士证实，德国联邦情报局在德驻莫斯科大使馆内设立了一个与俄罗斯对外情报

局联络合作的办公室。同时，俄罗斯对外情报局也在其驻波恩的大使馆里开设了一个分支机构。这是在8月份谈判的结果，当时德国情报机构协调人、总理府国务部部长施密特鲍尔、联邦情报局局长波茨纳和联邦宪法保卫局局长韦特巴赫在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等人会谈后，双方达成协议：大家要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贩毒、黑手党组织、非法技术转让和洗黑钱的斗争中合作。俄罗斯还承诺，到年底之前停止所有针对德国的侦察工作。

德国情报机构期望，不久能看到这一合作关系带来的明显成果。一位专家说，俄罗斯拥有关于德国恐怖主义组织——“红军派”的详细资料，这些资料是过去东德国家安全部向他们提供的。东德国家安全部支持“红军派”，并且向许多恐怖分子提供庇护。德国将从俄罗斯方面获得“红军派”核心成员的情报，这些人目前仍在德国进行地下活动。德国和俄罗斯情报人员之间交换的情报能涉及世界上的很多危机。在莫斯科的德国联邦情报局人员（具有外交官的合法身份）与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人员正在进行定期接触。俄罗斯情报人员有时也被邀请到德国联邦情报局总部晤谈。联邦情报局高级官员说：“我们相互之间保持信任并迅速地相互理解是十分重要的。”德国与俄罗斯情报机构的所有人事问题已经解决，在莫斯科已经没有曾一度为德国工作的间谍在押。

1993年的8月8日，俄罗斯国家全部办公厅主任邦达连科在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时透露，俄罗斯国家全部代表团最近访问了德国，并签订了多项合作协定。邦达连科说，俄德安全机关签订的协定规定，双方交换有关犯罪组织活动的情报，在可能的情况下采取联合行动。他还说，在俄罗斯国家安全机关的帮助下，德国当局制止了“柳别列斯基”犯罪组织在德国的活动。这一犯罪组织以莫斯科为基地，同外国犯罪组织保持密切联系。邦达连科表示，双方可以通过通讯联络传递信息，并对两国迄今尚未签订关于引渡犯罪分子的协定表示遗憾，因为俄、德两国安全机关

加强合作已使犯罪分子惶恐不安，但犯罪分子最怕的是两国签订引渡罪犯的协定。

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家全部副部长契尔年科指出，俄罗斯安全机关同外国安全机关的合作是卓有成效的。例如，俄罗斯安全机关同外国安全机关实施联合行动，在圣彼得堡破获了多起贩毒案，查获可卡因达一吨之多，还破获了多起伪造外币案，查获50万假美元。此外，在意大利查封了四座伪造美元的地下印刷厂。

1994年8月20日，德国总理科尔又派总理府国务部长、德国情报机构协调人施密特鲍尔作为特使赴俄罗斯，与俄联邦反间谍局、俄外交部、俄内务部和俄原子能机构的一些代表在莫斯科会晤，讨论慕尼黑机场上的钚走私事件。最后施密特鲍尔和俄反间谍局局长斯捷帕申一起商定了对付核走私的措施，其中包括立即加强情报机构的接触，以确定被查获的核材料的原产地、走私办法、路线、和最终使用者，同时加强边境控制等。

当然，作为冷战后的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自然不会错过扩大特工活动天地的机会。1994年初，美国联邦调查局到莫斯科设立了执法专员办事处。联邦调查局局长弗里在1995年3月30日的一个美国贸易委员会的会议上说：“联邦调查局和俄罗斯内务部已经开始合作，共同打击诈骗、绑架、洗钱和其他通过不合法手段把资本从俄罗斯转移到美国的罪恶活动。在所破获的案件中，其中一个涉及到美国某公司。美国的那家公司在即将把700万美元的资金提供给所谓的俄罗斯合伙人时，俄罗斯内务部向美国联邦调查局提供了有关情报，说这些合伙人均为骗子。美国联邦调查局及时将情报通报给该公司，使这家公司免受了巨大损失。”弗里还说明了联邦调查局和俄罗斯内务部之间的合作内容，“包括俄罗斯内务部和联邦调查局的官员的直接接触，联邦调查局、俄罗斯内务部和德国警察机关总部之间直接可靠地进行电话联系。美国联邦调查局目前正在提供一些帮助，主要是在俄罗斯和美国培

训俄国警官，并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设立一个办事处，以便更多地培训俄罗斯、东欧和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警官”。

美国联邦调查局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俄罗斯的核材料被非法出售的问题。弗里说：“俄罗斯执法部门认为非法出售核材料是一个大问题，核弹头虽然受到了相当好的保护，人们可以放心。但人们越来越担心的是一些实验室和研究室，因为那里有高度放射性的核材料。大家知道，在去年圣诞节前，捷克警方缴获了 235 高度浓缩铀 6 磅，这种铀是制造核武器的，虽说 6 磅还不足以制造一枚核装置，如果再有 5 公斤就可以了。由于德国和波罗的海国家缴获核材料的事情越来越多，我们对此十分担心。”美国总是像救世主一样悲天悯人。

这种联手活动的浪潮居然也波及到了已经退休的一些前间谍高手之间。1993 年 11 月，四名前克格勃上校级官员应邀访问美国，他们在参观了华盛顿的名胜古迹后，来到一位前美国中央情报局高官的私宅内举杯畅饮，回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瞻望未来，发财机会多。来客中，80 岁的巴尔可夫斯基面貌酷似晚年的毕加索，双眼炯炯有神，他当年曾从原子物理学权威富克斯的手中，获得了英美制造原子弹的机密，震惊世界；71 岁的莫汀被一位间谍小说家形容为“外貌酷似圣诞老人”，他曾在 60 年代策反了英国高级情报官菲尔比投向苏联怀抱；63 岁的加明从前是乌克兰、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专职对美谍报工作；60 岁的托托洛夫精通中、英、日三国语言，他曾在东京、大阪居住 20 年，专职策反亚洲地区的美国情报人员。

主人中，前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分析官马凯帝打算成立一家咨询保险公司，专为打入俄国市场的美国企业服务，他的合伙人就包括了托托洛夫以及已经退休的前以色列情报人员。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反恐怖活动中心主任泰拉洛则另辟蹊径，他与其他前克格勃高官合作，准备出版和报道从前的间谍内幕来赚钱。但愿这

些间谍老手真能老有所为。

“山姆大叔”的如意算盘

绰号叫“山姆大叔”的美国，总喜欢以老大帮人一把。它最大的执法机构和国内反间谍的中坚力量——联邦调查局，在冷战结束后，就开始把东欧和俄罗斯警察特工的培训也纳入了自己的计划。1994年初，该局局长路易斯·弗里对欧洲进行了为期十天的九国之行，并出席了该局新设的莫斯科办事处的开幕仪式，这个办事处将成为联邦调查局庞大的全球侦破机构中的24个战地指挥部之一。弗里对莫斯科的访问，是该局70多年来完成此举的第一位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这次访问为该局扩大在上述地区开展培训和进行活动奠定了基础。美国《华盛顿邮报》在1994年12月14日对此事背景及后来的发展作了介绍，另外《纽约时报》于1995年7月也有专门报道，其情况综合如下：

美国联邦调查局官员在公开场合总是反复强调，其增加派驻海外的特工人数完全是为了打击罪犯，绝不会介入情报活动；派驻海外的特工，如莫斯科的两名，唯一的任务就是与当地警方建立并保持有效的联系；外派特工只能在有限的几个国家中被允许调查毒品、洗钱和藏匿资产等犯罪行为，允许以掩护身份开展工作的国家的数量则更少。

按照弗里局长的新计划，除在海外开设新的办事处外，美国联邦调查局还将直接派人和出钱在美国境外训练别国警察特工。

表面上的主要目的是打击罪犯，但据联邦调查局私下称，出钱训练外国警察特工是为了寻找和培养更多的“交谈伙伴”，即那些回到自己国家后仍愿意向美国联邦调查局提供诸如银行记录、有价值情报和证据的足以信赖的外国执法官员。

目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国际执法官员培训和联络计划的中心任务是，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创办一所警察训练学院。根据克林顿总统 1994 年 12 月 5 日在布达佩斯短暂停留时与匈牙利领导人达成的协议，该学院将由美国出钱，由美国联邦调查局实施领导和指挥；教员由斯堪的那维亚、奥地利、英国和德国的老牌警官组成；受训学员来自俄罗斯、乌克兰和巴尔干地区以及东欧一些国家。

在匈牙利的这所联邦调查局国际警察训练学院，是美国参与国际合作、打击日益猖獗的跨国犯罪集团的最雄心勃勃的计划之一，也是“山姆大叔”显示影响力的一个机会。美国参与此举的除了联邦调查局外，还有缉毒总署、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这所学院的大楼是由一位匈牙利人捐赠的，经费已经美国国会批准、由国务院和联邦调查局基金拨给。训练模式完全按照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联邦调查学院的模式进行。

美国联邦调查局此举与六七十年代该局的国际警察训练计划大不相同。那个时候，联邦调查局总是经外国中介人之手、或借情报计划向目标国提供训练经费和将待训人员接到美国来，主要目的是发现和打击那些国家内的颠覆分子和共产党组织。多年来联邦调查局已经训练了包括警察局长在内的 2.7 万名外国执法者，其中许多人成了该局遍布世界各地的“交谈伙伴”网中的佼佼者。他们中的许多人直到现在仍和联邦调查局保持着密切联系，联邦调查局也不时将其中的“出类拔萃者”再次请到美国来接受更高层次课程的训练。

现在，许多东欧和俄罗斯的警察也来到了位于美国弗吉尼亚

匡蒂科的联邦调查学院，接受美国式的特工训练。1994年，有几十名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警察在那里受训，1995年则有数百名俄罗斯、乌克兰、捷克、波兰和匈牙利的警察到美国受训。联邦调查局在1994年底调查的大案中，大约有50起涉及到俄罗斯犯罪分子，因此急需在那里发展“交谈伙伴”并得到他们的帮助。根据联邦调查局的建议，1994年12月戈尔副总统访问莫斯科时，与俄罗斯政府签订了一项执法合作协议，两国将在未来交换一些罪犯证据和执法情报。

苏联变节者 转危为安

1994年的初春，一个晴朗的早晨，苏联情报机构的中校特工、现在已是美国公民的鲍里斯·尤琴驾驶着刚刚得到的“美洲豹”牌高级轿车，来到旧金山市的克里斯托福公园。当漫步在公园里杉树和松柏树夹道的幽静小路上时，尤琴似乎又回到了过去的岁月。

具有历史学硕士学位的尤琴第一次进入美国是在1976年6月。当时，根据克格勃的安排，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与一群苏联专家一起到美国加州大学做学术研究。实际上他的主要任务是熟悉美国，为日后打基础，同时监视一起来的同事并为克格勃物色可供利用的“未来之星”。尤琴在加州大学进行学习研究的十个月中，利用多种渠道搜集到了为数不少的敏感情报，并成功地将它们交给了克格勃。

另一方面，美国反间谍机构联邦调查局在尤琴进入加州大学

后不久，对其真实身份就有了怀疑，并开始全面监视其行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联邦调查局认为尤琴是克格勃特工无疑，而且是个“可以被策反而为我所用”的理想人物。1976年底，联邦调查局专门设置陷阱，诱使尤琴陷入了与一名美国女子的法律纠纷之中。正当尤琴不知所措时，以律师身份为掩护的美国特工不失时机地出现了，主动提出愿意为其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受过特工训练的尤琴，此时看出了这是早就安排好的圈套，但他却认为这是自己与美国秘密机构建立联系的最好途径。因此，他顺水推舟，表面糊涂心中明白地跳进了陷阱，与联邦调查局建立起了“当事人和律师的关系”。

事后，尤琴说：“联邦调查局‘律师’的表现并不高明，其实他们完全没有必要那么劳神费事，在我到达美国一周后，就感到在这里的呼吸是那么的顺畅，因此产生了为美国出点儿力的想法。”1977年春，那场法律纠纷圆满结束，尤琴也成了一只愿意为联邦调查局效力、继续隐藏在克格勃内的美国“鼯鼠”了。

从1978年到1982年间，尤琴第二次被派到美国，公开身份是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驻旧金山地区的记者。实际上是克格勃负责当地间谍活动的中校军官。这期间，他提供给“美国主人”的最重要的情报内容有：机密级的克格勃通讯手段；苏联人对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等美国情报与安全部门的监听方法；他同事的姓名、职务、任务和个人优缺点及嗜好等。在尤琴的帮助下，联邦调查局基本查清了克格勃在旧金山地区的秘密接头点和部分接头人的情况，并逮捕了几名为苏联效力的美国公民，同时至少抓获了一名非常重要的克格勃间谍。

1982年，尤琴工作期满，离开美国返回克格勃总部工作。在他临走之前，联邦调查局曾计划通过中央情报局莫斯科情报站与他继续在苏联境内进行联系，但遭到尤琴的拒绝，他的理由是，“那样做危险性太大”。

回到国内后，尤琴多次要求能有机会再度到国外“为国家做贡献”，但他的上司都没有同意。到1986年12月23日，尤琴突然被秘密逮捕，几天后以间谍罪被判处15年徒刑，开始了“难以忍受的囚徒生涯”。

然而，尤琴是幸运者，因为他是苏联被判定犯有这种罪行而未被处死的极少数人之一，而且他在监狱中只呆了5年。1992年2月，根据叶利钦总统的大赦令，尤琴和其他数十名犯人一道重新获得了自由。尤琴获释后，旧情不忘的美国情报部门帮助他和他的家人在1994年初顺利地进入了美国，并成了它的永久公民，联邦调查局还奖给他新车和新房子。目前，尤琴和他的妻子及20岁的女儿定居在加州马林县的诺托瓦城。

对其丈夫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的纳德娅在尤琴遭逮捕后，曾四处求人，打探消息。当时克格勃给她的答复是：“我们怀疑、监视他很久了，有十分可靠的消息来源证明他已经成了敌人。”这个“可靠的消息来源”，就是前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特工埃姆斯（他和他所出卖的人在后面还会提到）。

先是克格勃特工，再为联邦调查局效力，再被中央情报局出卖，接着是逮捕、判刑、入狱，最后被大赦并到美国定居，这是尤琴人生的一条轨迹。现在，他想循着这条线索写一本自传体的小说。谈及写书时，他说主要的目的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但“不会拒绝任何肯出高价购买自己经历的买主”。尽管不必为自己的生活担心，尤琴还是想以作家或档案管理员的身份开创自己在美国的事业。

美国叛逃者 生死茫茫

只有美国的叛逃者没有得到“蜜月”的好处。

美国人霍华德在1980年经商失败后，报名参加了中央情报局。1981年1月他正式到中央情报局的训练中心——“农场”受训，并取得了优异成绩。按计划，他将同妻子玛莉一起被派往莫斯科工作。然而，临行前总部进行的再次考察表明，霍华德有吸毒、盗窃和贪色的顽疾。这样，不仅去莫斯科的事告吹了，而且连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也丢了。霍华德决心报复中央情报局。

1985年春，霍华德夫妇以度假为由到了维也纳，霍本人走进了苏联驻维也纳大使馆，向里面的克格勃人员讲了自己曾在培训前往莫斯科工作时所掌握的全部东西，其中有美国在莫斯科发展的间谍人数、姓名、职业和联络路线等情报。克格勃对此非常重视，让他化名罗德热尔，由尤尔琴科与他联系。苏联根据他提供的情报，抓住了美国驻苏使馆二秘史托包和苏联隐写密码专家托卡切夫。对此，美国中央情报局断定内部有人背叛，但查了一个多月竟毫无头绪。

1985年7月，尤尔琴科叛逃到美国，讲到了罗德热尔的泄密事件。中央情报局很快查明是霍华德所为，并让联邦调查局对他采取监视、窃听、跟踪和心理压力等手段，试图查到证据，让他服罪。霍华德就用他在“农场”学到的反跟踪技术逃到了莫斯科。9月21日，他和妻子一起坐车外出，他手中提了一个包，里面装

着一个可充气的玩具人。到了车上，妻子玛莉开车，他在座位下把玩具人的气充足，穿上和自己一样的衣服，戴上一样的帽子。经过一个拐弯处，他迅速跳下，走入一家商店，玛莉则把充气人放在霍华德原来的座位上，继续开车。后面跟踪的联邦调查局特工转过弯来看见一切正常，仍继续跟踪。玛莉绕了一大圈开回家中车库，独自一人进屋后，又用事先准备的有霍华德声音的录音带打了问问天气之类的电话，让联邦调查局特工监听到后继续监视其住宅。

就这样，霍华德来到了莫斯科，成为克格勃“最受欢迎的人”，并一直在莫斯科生活。苏联主子让他在莫斯科以西的克格勃度假村内占有一座五间套房的公寓，提供 24 小时的安全保护，还指派一对中年夫妇照顾他的起居。但是，在装有报警装置、监视设备和八英尺高的防护围栅内，霍华德犹如囚徒一般，若没有保卫人员打开大门，他甚至不能随便进出公寓院落。后来由于苏联解体和俄罗斯极力想寻求美国的援助，霍华德就越来越担心他的“收养人”兼保护者随时会出卖他。1991 年 5 月，美国的几名参议员就提出要将霍华德交还美国，作为提供经援的条件之一。

同年 12 月，霍华德手持为期六个月的居住和工作许可证，移居瑞典。七年前就是在这里他投奔了克格勃，此次旧地重游，却不断地否认他此行是在替莫斯科从事间谍活动。他对把他的经历写成《逃脱的间谍》一书的作者怀斯说：“我现在是世界上最不愿意搞那种活动的人了，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是谁。”似乎向美国表明他洗心革面了。霍华德住在斯德哥尔摩郊区的一套公寓里，并开了一家叫做“西方之星”的商号，他宣称商号业务是从前苏联地区购进木材，同时向那里推销瑞典商品，也销售巴基斯坦的服装、香水等。1991 年圣诞节前夕，他和妻子玛莉及一个儿子终于在美丽的瑞典首都团聚了。

然而好梦难圆。就在新生活开始不久，霍华德就察觉到他梦

寐以求的那种田园诗般的生活永远不属于他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四名“捕谍者”已经悄悄地跟踪而至。他们可能是在得到瑞典当局提供的线索或监听到了他打回家中的国际电话后，追踪而来的。一天，瑞典情报机构萨波的反间谍特工通过电话告诉霍华德说：“联邦调查局人员要见你，他们就等在五分钟路程外的汽车里。”霍氏表示同意见面，但坚持只能在自己律师的办公室内见面。1991年12月30日，在其律师办公室内，这位投向克格勃的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和联邦调查局的代表会面了约一小时。霍华德事后说：“他们的基本态度是：回国去，否则我们会使你这里的生活如同地狱一般。我拒绝了那个‘友好’的邀请。”

从法律的角度来考虑，霍华德是相当安全的。因为在绝大多数的国家中，间谍罪只被看作是一种政治罪。据美国司法部称，不能以间谍罪名将嫌疑犯从瑞典及其他103个与美国签有引渡条约的国家引渡回国。尽管美国最高法院已裁定，可授权联邦调查局去世界各地将任何“违反美国法律的罪犯绑架回国受审”。但霍华德一点也不害怕，他说：“在瑞典这样稳定、民主的国度里，不可能被绑架。绑架只会发生在盛产香蕉的国家，如巴拿马。”但是，经过严格特务训练的霍华德还是注意到自己正被全面监视着，如在非垃圾清除日，他的垃圾袋会不知不觉地被什么人拿走了。

到1992年8月17日，霍华德要求长期定居瑞典的申请被驳回，理由是“由于他过去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活动”。到20日，霍氏夫妇和儿子正缓步朝动物园走去时，约50名警察悄悄地围拢过来，形成一个小小的包围圈。两名彪形大汉突然靠近“这名罪犯”，强行将他架起，硬塞进路旁一辆灰色轿车。随后，汽车飞速驶向孔格肖尔曼岛上的一所监狱。

狱中，虽然经过多次提审，瑞典特工没有发现霍华德在瑞典从事间谍活动的任何证据。然而瑞典政府仍表示，他是不受欢迎的人，若继续留在瑞典，将得不到任何保护。迫不得已，霍华德

只好决定重返莫斯科。在其律师陪同下，四名瑞典特工立刻将霍华德送往机场，专门负责此案的瑞典反间谍负责人奥马布莱德亲临机场监督，直到霍华德确实登上了飞机。

美国联邦调查局眼看煮熟的鸭子又飞走，对瑞典朋友恼怒不已。消息传到华盛顿，司法部发言人警告说，霍华德不许再东躲西藏，背叛国家的间谍永远不会找到“安全的避风港”，“即使在地球的天涯海角”，他也会被抓捕归案。

对此，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发言人科巴拉德泽表示，欢迎霍华德回来，俄罗斯将继续向他提供住房和工作机会，因为他“曾和苏联情报部门合作过”。以此向全世界表示，俄罗斯不会因为和西方情报机构关系亲密而抛弃自己的间谍。

第十一章

美国力追穷寇

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关系，只有永恒的利益冲突。只不过有时大些，有时小些，有时要用暴力解决，有时可用谈判解决。有时找盟友、或把敌人的敌人当作暂时朋友，以对付共同的敌人，共同的敌人消失后盟友之间又会有新的敌人。正因为这样，所以西方国家把间谍活动看作是人类社会持续不断的第二古老的职业，仅次于卖淫行当。所以，在苏联瓦解后，东西方情报机构的“蜜月”是短暂的甚至是表面上的，在桌面上握手言和的同时桌底下就互相踢着脚。特别是美国表现出了“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劲头。

1994年12月20日，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发言人科巴拉德泽在“契卡人员纪念日”大会上说，冷战时期，苏联情报机构的人员编制大大超过了美国中央情报局，1991年以来俄罗斯情报机构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员减少了40%，驻外情报站减少了30%，在亚、非、拉地区不以国家设点而以地区设立情报站。另外有报道说，过去拥有八至十名情报人员的海外情报机构，现在只有二至三名。由于变节、泄密和中途放弃情报职业等因素，俄方失去了

在美国和所有西方国家中的 90% 的活动间谍。在职的也不安心，特鲁布尼科夫任对外情报局副局长时就称，他的一位 30 岁的助手请求转业，到一家合资企业后，工资就比他这位副局长高出 50%。情报人员更是后继乏人，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情报学校，过去有 300 名学生，如今只有 50 人。

但美国政府还是不满意，它要求俄罗斯公布在美国布建的间谍网。美国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主任福克斯在 1992 年 2 月同记者的一次谈话中，几乎用最后通牒式的口气说：“去年‘八月事件’后，尽管俄罗斯政府的对外政策有所变化，但在美国的克格勃人员却没有什么动静。外交人员及克格勃人员都原地不动，离开美国的人极少。如果由于手续问题，动作迟缓一些可以理解，联邦调查局正密切监视他们的行动。如果在今年后半年中还不离开美国，联邦调查局将同国务院磋商处理这一问题的办法。”对此，俄罗斯的《论据与事实》周刊评论道：“试问，美国为什么不公布自己在前苏联布建的间谍网？美国特工为什么不离开俄罗斯？”

俄罗斯当时的国家全部编制为 13.5 万人，其中不包括 18 万人的边防部队，但包括司机和打字员。实际缺编军官 16%，有的地区机构缺编人数达 40%，9000 人无房住。60% 的国家安全人员对自己的处境表示不满，同时，工作却忙不过来。当时的国家安全部部长巴兰尼科夫说：“尽管俄罗斯改善了与邻国的关系，但各国情报机构仍把俄罗斯作为主要目标。美国仍把俄罗斯当作‘头号敌人’。”而在国内，他说，旧的官僚集团和新的企业主阶层相互勾结出卖俄罗斯，例如对外经济联络部将军事设备非法出卖给西方国家；机要人员则将国家机密出卖给别国，仅 1992 年 10～11 月，国家安全部门制止非法出售的机密材料就达 100 公斤之多；在追查窃密事件过程中逮捕了许多犯罪分子，但缺乏法律依据，因《国家保密法》还未公布，已颁布的《出境法》却又允许接触机密者出境。

1995年6月12日，俄联邦安全局官员、曾经主管对美国反间谍工作的沃尔科夫上校对在美国出版的《新俄罗斯言论报》记者说，近几年来美国情报机关在国外从事人力情报活动的经费逐年增加，与此同时，美国却致力于扼杀俄安全机构，谋求俄议会撤销特工机构，至少将其经费削减90%。他还指出，美国特别用力破坏俄罗斯安全机构的声誉。例如，美国竭力夸大1994年被揭露的、曾为苏联和俄罗斯服务的特工埃姆斯的作用，似乎破获的美国间谍都归功于埃姆斯一人。美国的这种“十足的添油加醋的”做法，目的在于贬低俄罗斯反间谍机构。

冷战后最大的双重间谍

美国联邦调查局经过三年时间的调查，包括监听电话、监测电脑和监视行踪，终于确定奥尔德里奇·埃姆斯，这位中央情报局中层官员，是一个投靠苏联、俄罗斯的变节者。1994年2月21日，当埃姆斯要飞赴莫斯科办理公务时，美国联邦调查局怕他乘机逃走，当即逮捕了他。

子承父业的埃姆斯，大学只读了两年就投身情报工作，曾经先后被派往土耳其、墨西哥、意大利、苏联等国执行特殊使命；1983年至1991年，官拜美国中央情报局行动计划司苏联东欧反情报处的主任；1991年至被捕时为止，任美国中央情报局缉毒中心主任，负责黑海地区反毒品走私工作。但他不满足于年薪7万美元的收入，为了攫取更多的金钱，自1985年起，就暗中开始向苏联（后

俄罗斯)出卖情报。他的叛卖活动,对他来说,先是获得了250万美元,后是将在铁窗下度过余生;对美国中央情报局来说,则有近30项对苏活动被破坏,十几名间谍被对方处决。

下面就是埃姆斯危害到的一些人的情况,同时从中也可看出美国的对苏联的情报活动能力,名字后面括号中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给他们起的代号:

德米特里·保利亚柯夫(戴帽漫游者) 他是苏联军事情报机构格鲁乌的将军,早年参加二战功勋卓著,战后在青年军事学院毕业,被格鲁乌多次被往国外从事情报工作,并先后担任在美国、缅甸等情报站的领导工作。自1961年起,他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合作,向美国提供了100多期绝密的苏联军事刊物和数不清的绝密文件,据说装满了中央情报局总部的25个文件柜。其中有苏联高层军政官员的各种想法,有苏联掌握的70年代初中国准备和苏联决裂的计划(这帮助了尼克松要打开中国大门的想法),有苏联的反坦克导弹资料(这对后来美国在海湾战争中对付伊拉克帮助极大)。保利亚柯夫在1986年7月被逮捕,1988年3月15日被处决。

瓦莱里·马提诺夫(异教徒) 他是苏联克格勃派驻在美国华盛顿的一位官员。但他却不断地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内的权力斗争的政治情况,还有苏联外交政策的决策内幕。他还向美国指明了克格勃试图从美国偷取的科技情报的范围。马提诺夫在被召回苏联后,即遭到处决。

阿道尔夫·图卡契夫(征服者) 他是一位科学家,长期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有关米格战斗机的详细资料,其中包括这些飞机的电子导航系统和用来迷惑美国

飞机的电子对抗设备。他还提供了苏联想要窃取的美国技术的计划。克格勃原来也在怀疑图卡契夫是否是一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埃姆斯提供的材料就完全证实了克格勃早先的怀疑，结果他被逮捕，随后被处决。

弗拉基米尔·普塔舍夫（神灵媒人） 他是一位和苏联的外交政策制定者有着密切联系的军事专家和国际问题分析专家，在苏联的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工作。他向美国传递了大量有关苏联在武器控制谈判中的立场。他在1986年被捕入狱，但是，后来他居然又逃了出来，现在居住在美国的南卡罗莱纳州。

鲍里斯·尤琴（绳子） 他是一位克格勃的中校官员。他给美国中央情报局拍摄了克格勃的许多详细的内部报告，它们有克格勃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招募新手的报告，有克格勃努力偷取的技术的报告。他在1986年12月被捕入狱，后被特赦，现生活在美国。

塞尔盖·摩托林（金属网） 他是克格勃派驻在华盛顿的少校官员。他向美国中央情报局透露了有关克格勃在美国首都活动的各种信息。摩托林在1985年被逮捕，然后遭到处决。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夫（调谐器） 他是苏联派驻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官员。他帮助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东欧把克莱德·李·康拉德抓了回来，后者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防务计划和北约国家使用的通讯密码出售给了克格勃。瓦西里耶夫在1986年被处决。

塞尔盖·佛隆茨沃夫（修道士） 他向中央情报局披露了克格勃针对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所开展的行动。特别是他提供了一种称之为“间谍粉末”的资料，克格勃用这种粉末令人不知不觉地喷洒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

馆的小汽车上，这样就不用后面派车跟踪，也可随时知道它的动向，看出它到哪里去和给美国当间谍的俄国人接头。佛隆茨沃夫后来也被处决了。

杰纳德·瓦伦尼克（健康人） 他是一位克格勃的官员。他告诉中央情报局说，苏联制定了一个计划，准备在德国暗杀美国军人和他们的家属，然后嫁祸到德国恐怖主义者头上，以破坏美德两国关系。瓦伦尼克 1985 年在东柏林被逮捕，然后被处决。

塞尔盖·菲杜伦柯（战争舞蹈） 他是苏联派驻联合国的外交官。他向美国透露了苏联对战略武器谈判和裁军的态度，指出了在纽约活动的克格勃的特工人员。他后来躲避了被逮捕的命运，现生活在美国的罗德岛。

除损失了上述人员外，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苏近 30 项行动惨遭失败，其中最使他们痛心的有下列两项绝秘行动，即在苏联通讯中心的窃听器行动和探测苏联多弹头导弹轨道的行动。另外，1985 年 8 月美国策划了克格勃负责对美国和加拿大活动的高级情报官员尤尔琴科从罗马叛逃美国，埃姆斯就通过某种手段对他施加压力，使尤尔琴科供出一个霍华德后不再吐露情报，并最终又溜回苏联。而埃姆斯又告诉了霍华德，使他得以逃亡苏联。

香港的《南华早报》还披露，1986 年 10 月埃姆斯在罗马与克格勃反间谍人员会面时，对方明确指示他尽一切办法误导、影响中央情报局。从 1986 年到 1994 年 9 月，由莫斯科控制的间谍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了大量精心编造的有关克里姆林宫情况的假情报。这使美国削弱了对前苏联、俄罗斯局势的判断力，最大的一个方面是看不到对方军事力量的迅速衰落，把夸大的假情报作为决策依据，仍然加速发展军备，耗资巨大。

埃姆斯的暴露，有的说是俄罗斯变节特工的告密，有的说是

在1991年的例行测谎检查中波纹反常，有的说是他的上司发现他去拉美旅行不报告。反正在1991年受到怀疑后，他先是从敏感的苏联东欧反情报处处长位置上被调走，接着由美国联邦调查局暗中调查取证。在侦查破案过程中，美国反间谍机构使用了高科技手段，如偷读他家中电脑上的信息，在其住所附近安装监视摄像机、进行电话窃听等。反间谍特工还在埃姆斯家扔掉的垃圾中找到了许多有力证据，如有一张便条上谈及了往南美与俄罗斯情报人员接头的事，在一卷用过的打字色带上发现他与俄罗斯接头人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会晤的情况。

在“埃姆斯案件”真相大白后，美国上下哗然。克林顿总统接到有关此案的报告后说：“这是一起十分严重的案件，我们马上向俄罗斯政府提出抗议。”叶利钦总统的新闻秘书则说，有人试图将这起间谍案政治化。1994年2月25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宣布，美国政府决定把与此案有关的俄罗斯外交官李森科驱逐出境。2月28日，俄罗斯外交部宣布：“抗议美国对经两国同意而派到华盛顿工作的俄罗斯对外情报局代表采取无根据的措施，因此俄方被迫宣布美国驻俄大使馆参赞莫里斯为不受欢迎的人。”

在美国内部，许多人指责中央情报局的问题严重。参议员帕特里克甚至公开提问，现在是不是到了取消中央情报局的时候？中央情报局长伍尔西因对涉及埃姆斯的有关人员处分不严厉，在攻击声中被迫辞职下台。在俄罗斯，叶利钦怪罪联邦反间谍局局长戈鲁什科保护情报来源不力，也让他下台。

埃姆斯一案的震动力如此之大，所以人们称他为冷战后最大的双重间谍。

俄罗斯“鼯鼠”又遭捕获

在埃姆斯的冲击波还未消失，美国于1996年11月16日又挖出了一只藏在中央情报局内的俄罗斯“鼯鼠”——哈罗德·詹姆斯·尼科尔森。这次轰动虽然没有埃姆斯的大，两天后仅由美国副国务卿塔尔博特召见俄驻美大使沃龙佐夫，对他提出强烈抗议，同时扬言美要进行报复，后也未见具体行动。但美国联邦法官琼斯宣布，尼科尔森给国家安全造成的损失巨大，不得保释。

尼科尔森被捕时46岁，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供职了16年，开始可说是仕途顺利。他博学多才，精明强干，是个模范特工。1982年被派往马尼拉，负责招收双重间谍的工作；1985年他在曼谷工作；1987年他被调往东京工作；在东欧剧变期间的1990年至1992年，尼科尔森在布加勒斯特情报站任站长。1992年下半年至1994年，他又被调往亚洲的吉隆坡情报站任副站长，这时，他一边大量花钱闹离婚，一边想娶位泰国女人，还一边对现任职务有不满，所以就开始向俄罗斯特工出卖情报以换取金钱。当时他向上司汇报说，他招募了一名俄国人，需要经费，其实他在向这名俄国人出卖情报，从两头捞钱。1994年底他奉调回国，出任中央情报局弗吉尼亚特别训练中心高级教官。1996年7月起，尼科尔森又到局总部兰利反恐怖主义中心任近东处处长。

1995年10月，美国中央情报局照例对其特工人员进行测谎

检查。当测谎机问“你是否隐瞒了你与外国情报机构的联系？”和“你是否擅自与外国情报机构接触过？”尼科尔森作贼心虚，支吾其词，回答没有过关。当局就下令由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联合对他监视调查。

结果他在两件事上露了马脚。1996年3月17日，俄罗斯对外情报局联络处打电话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华盛顿办事处，要求提供有关车臣恐怖分子的情报。4月23日，尼科尔森也向中央情报局要求提供车臣的背景资料，调查人员发现他的训练间谍计划不涉及车臣问题，感到奇怪。8月11日，联邦调查局密探搜寻他的电脑资料，竟发现他已盗取了中央情报局有关车臣问题和车臣游击队活动的机密报告，相信是提供给了俄国人作参考。在9月，当尼科尔森坐在他在中央情报局的办公室桌旁用照相机翻拍放在他膝盖上的文件时，他被录了像。另一件是1996年6月27日，尼科尔森因私离开美国时，却住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每日租金300美元的客房里，白天他到处转悠，看有无别人跟踪。晚上，他忽然溜出去，来到了一个地铁站，一位陌生人便带尼科尔森上了一辆挂有外交牌照的高级轿车，车主居然是“俄罗斯驻新加坡大使馆”，尼科尔森还把他的相机包放进了那辆车的后备箱里。第二天，他把8300美元存入了自己私人银行帐户上，接着直飞曼谷去和情人幽会度假了。但这一切都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监视到了，接着就是等待逮捕了。

尼科尔森出卖的情报，光是联邦调查局专家从他手提式电脑中发现的就有：中央情报局对莫斯科的派遣计划、兰利总部任用的间谍履历、间谍编制、中央情报局现在派驻在莫斯科的特工情况。特别让联邦调查局特工惊讶的是，在尼科尔森的电脑中，居然有历次审讯前一只“鼯鼠”埃姆斯的速记稿提要，以及一份中央情报局讲述俄情报机关招募美国间谍图谋的绝密文件。是尼科

尔森还是俄罗斯情报机构想看看前车之鉴？反正尼科尔森像埃姆斯一样，被判处了终身监禁。但尼科尔森从俄国人那里仅得到约18万美元的酬劳。

“看家犬”变成“入室狼”

就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内接连被挖出俄罗斯“鼯鼠”，而联邦调查局作为美国的“看家犬”不断有贡献而自以为了不起时，它自己的一名特工也在向俄罗斯出卖情报，变成了一条“入室狼”。他就是1996年12月18日被捕的43岁的厄尔·埃德温·皮茨。

皮茨于1983年到联邦调查局工作。1987年到1989年，他在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工作，负责追捕和招募克格勃情报人员；1989年到1992年，他在华盛顿的联邦调查局总部从事绝密的档案和人事工作。被捕前他在弗吉尼亚州匡蒂科的联邦调查学院担任督察。

调查皮茨的工作是在得到俄罗斯一位驻联合国的官员的帮助下开始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在这位官员帮助下装成俄罗斯间谍，于1995年8月开始了旨在控告皮茨行动和了解他在1992年“潜伏不干”之前可能已经犯下的叛国罪的程度。在假冒的俄罗斯特工同皮茨取得联系的几天之后，皮茨的妻子玛丽便向联邦调查局告发了他，说他可能正在从事间谍活动。她不知道这是联邦调查局在暗中调查皮茨，这事差点儿被这位无知的妻子搞糟。玛丽当时也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名职员。

为了牢牢地控制住皮茨，美国联邦调查局动用了最先进的装有红外监视仪的“夜间跟踪者”飞机。到1995年8月13日，皮茨对他以为是来自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秘密特工说：“在1987年至1992年，我向你们提供了我所知道的一切。”联邦调查局特工就顺藤摸瓜调查下去，结果真相大白，皮茨也锒铛入狱，终身监禁。联邦调查局负责此事的特工兰伯特在书面说明中写道，联邦调查局认为，皮茨向苏联人出卖了“苏联行政人员名单”。这是一份在美国的所有在苏联间谍机构担任过或被怀疑担任过职务的苏联官员的机密的计算机汇编材料。兰伯特还写道，皮茨还把“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秘密汇报俄罗斯情报问题的重要人员”告诉了俄罗斯。皮茨出卖情报得到的酬金有22.4万美元。

对于皮茨一案，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特鲁布尼科夫在1996年12月19日发表谈话时说，美国司法部长和联邦调查局长指责皮茨为苏联和俄罗斯情报部门效力，实际上是间接地指责了自己国家加紧进行针对俄罗斯的间谍活动，因为他们指责皮茨向莫斯科提供了有关美国对苏联和俄罗斯驻美代表机构采取行动的大量情报。看来这位俄罗斯对外情报局长很懂得“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道理。

另外，1996年2月23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宣布拘捕了一名前美国电子情报机关的雇员利普卡。年已50岁的利普卡被控自1964年起为苏联克格勃充当间谍十年。利普卡1964年至1967年在美国马里兰州米德堡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工作，他离开时总带走了一些该局的机密文件，并将这些机密文件卖给苏联人，直到1974年为止。看来美国各情报机构都有苏联（俄罗斯）“鼯鼠”在活动。

老间谍闯美撩风波

1996年10月29日，美国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一名50多岁的白人男子步下一架从莫斯科飞抵纽约的班机后，镇定自若地走向机场出口处的美国海关通道。一名美国海关人员例行公事地要求这位男子出示护照。当海关人员看到护照上写着弗拉基米尔·加尔金的名字时，立即拿起手边一张俄罗斯人签证申请表的复印件，申请表的主人就是加尔金。这张申请表的“曾任何职”一栏中居然填写着“间谍”！于是这个自豪而公开地将“间谍”两字填在俄赴美签证申请表中的加尔金，马上就被海关人员召来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请上了“专车”。

加尔金在1992年以前曾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欧洲处的工作人员。1991年，他在塞浦路斯会见了一位名叫科塔的美国电脑专家，科塔当时是通用数据公司职员。据美国联邦调查局说，加尔金从科塔那儿得到了美国“星球大战”计划和他从其他军事计划讨论会上搞到的三份报告，为此加尔金付给科塔3万美元。此后，加尔金还被怀疑曾试图让一名叫普拉萨德的美国工程师设法窃取美国隐形飞机涂料的秘密配方。但那位工程师非常无能，费了不少劲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1992年后，加尔金退出了俄罗斯对外情报局，成为一家俄罗斯安全公司的“企业家”。此次他“作为俄罗斯护法机关代表团成员前往美国，购买两国合作打击国际团伙犯罪所需要的警察装

备”。1996年9月30日，他在递交给美国驻俄大使馆的俄赴美国签证申请表上漫不经心地填上“间谍”时，就已经极大地震动了美方人员。他根本不知道，在他得到美国大使馆签证的前二天，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已经得到在肯尼迪国际机场逮捕他的命令。

据加尔金后来透露，他被美国人“请”去之后，他们曾希望他“合作”，并威胁说如果不合作，就让他“在监狱里呆几年”。加尔金毕竟是间谍出身，他对美国情报人员的引诱和威胁无动于衷，反而“建议”美国特工人员“不要给在俄罗斯的美国商人帮倒忙……因为他们中许多人曾是美国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

此事发生后，俄罗斯反间谍和情报部门都表态了，一起指责美国同行违反了“惯例”和“进行挑衅”。什么是惯例呢？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长尼古位·科瓦廖夫解释说，世界各国特工机构有一条不成文的惯例：一个情报特工人员在退出特工机构的几年内，会被其他国家认为是“不受欢迎的人”，一般来说是不可能得到那些国家的入境签证的；而别国一旦将签证发给这名退役特工，就意味着“以前的罪过已被忘记，此人在该国的法律面前是清白的了”。而加尔金就是得到了签证才去美国的。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女发言人塔季扬娜在加尔金被美国特工机构被捕后多次提出强烈抗议，指责这是美国情报机构的“一个卑鄙的阴谋”。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在1996年11月4日还发表正式声明，愤怒地谴责美国进行这个“肮脏的挑衅性行动”，说“采取这个挑衅行动的美国当局并没有停止它的间谍活动，访问俄罗斯的前美国情报人员为此是不为感谢联邦调查局的”，并威胁要加以报复。塔季扬娜暗示，如果美国情报机构不对加尔金“放一码的话”，那么已被俄罗斯情报机关掌握的在俄前美国情报人员就“没有好日子过”。最后，连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也出来表态，“不愿看到事态扩大”。

在此情况下，美国情报机关不得不为那些远在异国他乡曾为

他们卖过命的同行们考虑考虑了。11月14日，美国司法部撤销了对加尔金的指控，司法部在—项声明中说：“在政府内部进一步磋商之后，中央情报局最后裁定，国务院也表示同意，撤销指控将最符合国家的利益。”于是加尔金与曾经逮捕他的美国同行们“绅士般地体面地分手了”。加尔金回到俄罗斯后，表示他不打算再到美国去了，“除非工作需要”。他说：“我从未想过呆在美国，我对欧洲和亚洲更感兴趣。此次在美国的经历证实了我以前的看法——这个国家的整体素质令人不敢恭维。”

事后，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特鲁布尼科夫还是心有不平地说：“西方老是说俄罗斯不遗余力地加紧对外情报工作，其实绝大多数这类说法都有某种政治目的。”他举例说，不久前发生的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原工作人员加尔金案，有人指责他好像接受了一位印度公民提供的间谍情报。其实这个案子完全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一手制造的，这件事严重败坏了联邦调查局名声云云。

第十二章

调整政策 奋力反击

在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掌权的初期，以外交部长科济列夫为首的欧洲主义派在制定俄罗斯对外政策方面起着主要作用。科济列夫等人拟定的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基本构想，是向西方倾斜的、与西方亲热为基本特征的。欧洲主义派认为，俄罗斯外交的近期目标是争取美国、西欧、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争取西方在政治外交上对俄罗斯改革加以支持；长远目标则是使俄罗斯加入西方社会，成为西方文明发达社会的一员。

科济列夫在1992年4月1日的《独立报》上撰文说：“俄罗斯联邦必须加入最蓬勃发展的民主国家的俱乐部，俄国与美国、日本和西欧没有任何无法克服的分歧和利益冲突，因此，完全可能同它们建立友好关系，将来还会建立盟友关系。”

西方在苏联解体后，曾一度想帮助俄罗斯恢复经济，拟定了所谓“新马歇尔计划”，宣称每年将向俄罗斯提供200~300亿美元的援助，十年内准备提供给俄罗斯2000亿美元，以促使俄罗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加速转变。所以，叶利钦、盖达尔（俄当时的总理）拟定的向市场过渡的“休克疗法”，也是建立在西方的

大量贷款因素上的。

但是在1992年的一年中，由于种种原因，西方七大国许诺给俄罗斯的240亿美元贷款，实际上只给了10亿多美元。这使俄罗斯经济雪上加霜。在政治外交上，不仅美国想填补原苏联在东欧留下的真空，连以前对苏联毕恭毕敬的日本也气势汹汹地要求立即归还北方四岛。所以从1993年起，俄罗斯逐渐开始调整内外政策，先是盖达尔下台，接着是科济列夫下台，并由长期进行西方冷战的高手、对外情报局长普里马科夫接任外交部长。国际舆论评论说，这是将外交情报化，意思是间谍斗争将广泛激烈了，俄罗斯将反过来出击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早在1994年9月21日，俄罗斯对外情报局长普里马科夫叫他的情报分析人员炮制了一份公开散发报告，题目是：俄罗斯—独联体：西方的立场是否需要调整？报告指责西方不愿意俄罗斯加强独联体的向心倾向，不愿意俄罗斯强大起来。报告指出：“根据这一实际情况，得出了一个结论：独联体各国必须保持和发展自己的进攻性战略力量。”

英国路透社当时评论说：“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在俄美首脑会晤前一周做出了一个不寻常的举动，它今天告诫叶利钦总统，西方有些势力想阻止俄罗斯成为一个大国。”路透社还接着说：“普里马科夫拒绝详细说明他领导的情报机构计划采取什么步骤来抵制西方的不利影响。”这真是书生之见，情报机构计划采取的步骤如果可以说明，那还叫什么情报机构？而且实际上是做了也不说，这叫“好事不出门”，只有做坏了露了馅，才不得不辩解几句，争取不要“坏事传千里”。其实，暗中可以说俄罗斯情报机构此时已经干了一件大事，抵制了西方的影响。

1995年1月10日，俄联邦反间谍局在俄《独立报》上也刊登了一篇在国内外反响和争议很大的报告，题目是《联邦反间谍局对美国研究人员在俄罗斯的活动表示不安》。反间谍局在报告中公

开指责美国情报机关利用学术机构和研究人员，在俄罗斯开展情报颠覆活动，并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其中说道，到今天为止，世界上共有将近 500 个对外政治中心从事对俄罗斯的研究，美国有 200 多个。其中有各种协会，如美国斯拉夫研究促进会、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美国东西方一致委员会、兰德公司、耶鲁大学国际宗教研究中心等。

该报告说，俄联邦反间谍局掌握的材料证明，这些研究中心活动的真正目的是，协助美国遏制俄罗斯的对外政策的实施，因为俄罗斯是能与“唯一超级大国”对抗的潜在国家。联邦反间谍局分析的美国情报机关利用美国科研中心在俄联邦境内的活动有，合法地收集情报，建立常设的俄罗斯公民被调查者网，如与业已回国的西部军队集群的军官签订合作合同，在各地建立特约记者网；在俄政治、经济、科学和国防部门建立据点，企图确立俄罗斯总统的竞争者并设法与他联系；策划“人才外流”，每年可能使俄罗斯流失 200~300 名有重大发明的科学家。如果出走了 1000~2000 名，俄罗斯的科技和国防将受到严重的威胁。

俄联邦反间谍局认为，从美国情报机关这些间谍活动的材料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1) 利用科研中心在俄罗斯搞间谍活动具有总体性，它是经过精心策划的美国在前苏联境内建立牢固的政治、经济、科学和其他据点的计划的一部分。

(2) 美国借助自己的情报机关和科研中心，深入俄罗斯生活的各个领域，占领战略阵地，对俄联邦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

(3) 大量采用非传统的（即公开合法的）收集情报的方式和方法，使美国特工机关的活动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4) 到今天为止，俄罗斯没有一套对付外国情报机关，首先是对付美国情报机关利用科研中心收集情报的有效制度，外国特

工往往可以公开地进行活动。

(5) “保护国家机密的统一体制遭到破坏，爱国主义和警惕性的提法失宠，涉密人员与外国人接触不受监督，加上不择手段地弄大钱的想法，这一切都是造成重要信息外流的原因。

俄联邦反间谍局认为可以采取的措施有：一是要建立防止外国情报机关收集情报的有效的全国性体制；二是研究外国企图通过影响俄罗斯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经济、国防和科技领域来威胁俄罗斯安全的问题；三是制定并防止“人才流失”的全国性计划；四是研究通过新法和修改旧法的问题；五是加强对涉密人员出国及某些科学家和科研机构的成果外流的监督。

俄联邦反间谍局的报告出来后，最强烈的反对者居然来自俄罗斯本身。俄科学院院士波格丹洛夫、俄国家杜马科学委员会主席沃龙佐夫、俄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卢金联合写了篇题为《联邦反间谍局的报告效果适得其反》的文章，也刊登在《独立报》上。他们说，把克格勃的牌子换成联邦反间谍局后，实质上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这一组织的性质。这个组织希望回到迫害、禁止与外国专家的接触、使我国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老路上去。并说，报告的最后部分讲的措施“尤其令人气愤”。内部的不统一，使俄罗斯的行动常常左右摇摆。

大事化小的“坦克间谍案”

美国武器专家得知俄罗斯拥有最先进的 T—82 坦克的消息

后，一心想得到这种新型坦克的技术情报。1993年1月，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美驻俄大使馆二秘凯利·汉密尔顿参与了这起“坦克间谍案”，他发展23岁的俄罗斯商人马克西姆·阿廖申为情报搜集员，报酬是5万美元。

按照计划，汉密尔顿要求阿廖申先去搜集有关生产T-82坦克的工厂的情报，为联系方便，汉密尔顿还给阿廖申一封用英文写的亲笔信，信中要求大使馆有关人员在阿前往美国使馆时给予方便和帮助。

阿廖申为搜集情报，来到了生产T-82坦克的“乌拉尔车辆制造厂”所在的下达吉尔市，会见了这家军工厂的一名39岁的工人伊戈尔·莫托林。莫托林设法搞到了这家工厂总体规划的四份复印件。阿廖申回到莫斯科后，便把这些文件交给了汉密尔顿。这位美国特工又要求他再搜集有关T-82坦克的装甲钢板和电子设备的秘密情报。在阿廖申和莫托林还在设法窃取这些情报之时，他们的阴谋活动就被察觉，俄联邦反间谍机关就把他们两人拘捕起来了。

一年之后的1994年，俄罗斯联邦反间谍局的发言人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此案情况。他指出，这起美国外交官汉密尔顿参与了的“坦克间谍案”，由于及时制止了两名俄罗斯人的行动，没有给国家安全造成损害，所以就没有必要对汉密尔顿采取什么措施，但希望他们吸取教训。由于阿廖申和莫托林这两人肯自首坦白，而且与国家安全机关配合调查，所以也决定对他们免于起诉。

米尔伊洛夫还说，现在揭露这起“坦克间谍案”，同美国逮捕其中央情报局官员埃姆斯和他的妻子一案无关。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外人就不知道了。反正“坦克间谍案”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针锋相对 短兵相接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想把势力扩大到东欧，俄罗斯就难以忍受，想扩大到原苏联地区的独联体，那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而美国自以为是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了，就想无孔不入地扩大其影响。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高级特工弗瑞德·伍德拉夫来到格鲁吉亚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1993年6月，45岁的伍德拉夫奉命出任美国驻格鲁吉亚大使馆的代办，实际上是在其首都第比利斯负责为谢瓦尔德纳泽总统训练保安人员，还帮助格鲁吉亚政府整顿情报机构，培训反间谍特工人员。谢瓦尔德纳泽原是苏共政治局内的民主派，1991年“8.19事件”后出任戈尔巴乔夫政府的最后一任对外关系部部长，苏联一瓦解，他就回自己的故乡（也是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当总统去了。他现在请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老牌特工，就是想在格鲁吉亚自搞一套情报特工机构，同时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一块在高加索活动的跳板。俄罗斯自然不答应，但人家格鲁吉亚也是主权独立国家，明的也不好去干涉内政，于是就来暗的。

1993年8月8日，伍德拉夫和其同事、格鲁吉亚总统保卫局局长古格斯拉泽，以及伍氏所下榻的酒店酒吧间里从事业余工作的一位攻读英语的女大学生玛丽娜和另一位女士，一起开车去风景如画的第比利斯北部山区玩乐。在晚上的归途中，总统保卫局长开着汽车，透过车灯突然看见路边一名男子，手中挥舞着自动

步枪。玛丽娜听到了枪声，但她认为没有出事，因为她没有发现车上的玻璃被击碎。不一会儿，玛丽娜发现伍德拉夫从座位上往下滑，起初还当他在开玩笑，可是当看到他的帽子掉在地上时就惊叫了起来，他血流满面。

伍德拉夫受了重伤，汽车赶到一个叫姆茨海塔的小镇停了下来，以便抢救。但由于停电，医院无法工作，又急忙赶回第比利斯，不料伍德拉夫在路上就停止了呼吸。

事件发生后，当局逮捕了凶手，他就是 21 岁的格鲁吉亚人沙尔马伊德泽。根据他的供述，那天晚上他的汽车在途中汽油用完了，想在路过的司机那里买一些汽油。当伍德拉夫及其伙伴们不愿停车时，他就勃然大怒，举起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向后车厢开了一枪。正当他开枪之际，伍德拉夫转身朝后看了一下，子弹便击中其右上额。1994 年 1 月，法庭以杀人罪判处沙尔马伊德泽有期徒刑 15 年。判决书中没有涉及有关“伍德拉夫事件”的其他人和事。

美国和格鲁吉亚当局表面上都用低调方式处理此事，将其作为一般的刑事案件对待。因为伍德拉夫是以外交官之名在干训练特工之实，嚷出来对双方形象都不好。但在暗中，莫斯科、华盛顿和第比利斯的政界对此事都非常关注。因为事件发生后不久，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伍尔西便到格鲁吉亚了解案情经过，并护送伍德拉夫的遗体回国，还带回了死者的私人文件。

审理此案的格鲁吉亚列奥尼德泽法官对前去采访的《纽约时报》记者说：“这是一宗简单的案件，现已结案。”过一会儿，他又补充说：“但是我们不能过于自信。”这意味深长的话，似乎既说明了此案情况复杂，也说到了伍德拉夫在格鲁吉亚招摇过市，太自信。

关于杀害伍德拉夫的真正原因，人们只能作如下推测：一些人说，伍德拉夫是被格鲁吉亚前总统加姆萨胡尔季阿的支持者刺

杀的，因为伍德拉夫正在与政府情报机构策划刺杀加姆萨胡尔季阿的行动；一些人又说，伍德拉夫是被俄罗斯的情报特工刺杀的，以此警告美国不要插手格鲁吉亚和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内部事务。当时俄罗斯报纸上也谈到俄情报机构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前苏联各共和国积极开展活动十分关注。

但美、俄埃姆斯双重间谍案发生后，进一步加大了俄情报特工刺杀伍德拉夫的可能性。在第比利斯讲国际关系的美国教授朗德里说，伍德拉夫被刺杀前，埃姆斯作为负责黑海地区反毒品走私的中央情报局官员，曾到过第比利斯。埃姆斯按其职责，自然必须前去会见既是美国大使馆的代办、又是中央情报局站长的伍德拉夫，同时他也会在那里很方便地会见莫斯科来的情报联络员。而此时，正值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联合在对埃姆斯进行调查，伍德拉夫可能被授权对埃姆斯加以监视。结果是伍德拉夫有了怀疑埃姆斯的证据，埃姆斯和俄罗斯情报特工也知道伍德拉夫已掌握了秘密，这使莫斯科下决心采取行动除掉伍德拉夫，以保护埃姆斯的安全。

这一切都事出有因，但又查无实据。反正在第比利斯的短兵相接，使美国中央情报局再一次领教了继承了克格勃传统的俄罗斯情报特工的利害。80年代在中东黎巴嫩，当时宗教极端派分子老是绑架美国和西方人质，然后要这要那，美国中央情报局束手无策。后来苏联也有人被绑架了，美国中情局特工瞪大了眼睛看克格勃咋办。克格勃特工抓了几个将苏联人绑架的宗教极端组织里的头面人物，把其中的一人杀了，并将其睾丸割下塞入口中，然后派人将其送回，附上一张纸条：“如果不将绑架的人释放，其他人的命运也是这样。”吓得极端组织赶快把苏联人放了。当时，美国中情局局长凯西知道了也自愧不如克格勃有办法。所以，“伍德拉夫事件”一出，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俄活动的特工未免都吸了一口冷气。

令人头痛的记者事件

利用驻外记者或者驻外记者自己从事搜集机密性文件材料的现象，在国际交往中是屡见不鲜的。怎么处理？也是令各国政府头痛的一件事，不处理吧，国家政府的内幕被捅出去，有无穷害处。但对记者进行传讯、拘留、驱逐等处理，一是要引起国际间的纠纷，说不尊重对方公民权利，人家还可以报复；二是还容易得罪舆论界，说什么侵犯新闻自由，这又有损政府形象。所以，自1986年到1993年之间，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基本上对美国记者采取宽松政策。1986年，克格勃曾拘留了美国记者丹尼洛夫，指控他犯有间谍罪，然后把他驱逐出境。但这事搞得美苏关系一度很僵。

1993年4月8日，俄罗斯国家全部侦查局侦查员什卡林传讯了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驻莫斯科记者恩格伦，讯问进行了两天两夜，最后恩格伦拒绝在讯问记录上签字，而由翻译代签。当时恩格伦要求聘请律师参加讯问，但被俄安全机关拒绝。

侦查局是俄罗斯国家全部一个由精干特工组成的部门，当时有1300人。1993年底撤销安全部成立反间谍局时，侦查局被裁掉，人员划归总检察院，当时叶利钦指责这个机构没有提醒他注意在议会的政治反对派已经变得多么的危险。1994年11月24日叶利钦又签署总统令，决定在反间谍局内恢复这个机构，编制1000人。当时总统办公厅新闻局说，这将“迅速彻底地侦破危害

国家安全的罪犯”。而美联社当时评论道：“叶利钦的这项命令是他发布的一系列措词强硬命令中的最新的一项。”这是侦查局的一些后来的背景情况。

侦查局传讯恩格伦，主要是这位于1991年来到莫斯科的美国记者采访报道了俄罗斯化学家米尔扎扬诺夫的一些看法。米尔扎扬诺夫指责俄罗斯当局违反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研制和生产的国际条约，他先在《莫斯科新闻》发表了这些看法，随后恩格伦前去进一步采访后，又在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上发表了同样观点的文章。事后，米尔扎扬诺夫被逮捕，并被指控犯有泄露国家机密罪。

恩格伦被传讯两天两夜后，心里一直感到不是滋味，他认为俄罗斯国家安全机关不应该随便传讯一名外国记者。恩格伦事后说，侦查员什卡林在讯问过程中，千方百计要了解他是否从米尔扎扬诺夫那里获得俄罗斯的科学和军事机密，并且像凶神恶煞似地吼叫，连吃饭的时间也不给。而恩格伦守口如瓶，除文章中写过的东西外，其他几乎只字不谈，连安排他采访的联系人也没有说出来。

当时以格普哈德为首的美国民主党议会代表团正在访问俄罗斯，他们向俄方提出，对美国公民应予尊重，美国公民的神圣权利无论在国内或是国外都应得到保障。不过，据《纽约时报》报道，俄罗斯国家安全机关在传讯恩格伦前，曾向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作了通报，所以美国政府没有作出强烈反应。

第十三章

“北极熊”和“约翰牛”的较量

“北极熊”是俄国人的别称，“约翰牛”是英国人的别称。

俄国和英国从地理上看，本来是风马牛也好，风熊牛也好，都是不相及的。但由于两个国家各自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独特影响力，相互在隐蔽战线上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有的时候不亚于俄国和美国之间的斗争程度。

在创建苏联的十月革命时期，在俄罗斯进行间谍活动最厉害的就是英国间谍了。1917年9月，英国军情六局派出知名作家毛姆到俄国了解“二月革命”后的政治局势，推动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继续对德作战。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不仅使俄国退出了资产阶级的掠夺战争，而且号召工人阶级变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为国内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这对大英帝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都是个致命的威胁。

当时，以英国驻俄特使、老牌特工洛卡特尔为主谋，运筹帷幄，法国、美国大使等人也参加赞助，由英国间谍巨头西德尼·赖利上下内外串联，组成了一个所谓“三大使阴谋活动网”，他们把一些反对革命的俄国政治团体聚集起来，准备搞一次推翻列宁

和苏维埃政权的政变。1918年8月30日，赖利收买了女刺客卡普兰将列宁刺成重伤，另一位刺客将彼得格勒契卡主席乌里茨基刺死。第二天，赖利又去找由拉脱维亚射击手组成的克里姆林宫卫队队长别尔津，动员他们反戈一击，在即将进行的暴动中逮捕所有苏维埃政府领导人。为此赖利拿出了由英、法、美三国一起出资的1000万卢布的巨额资金，别尔津知道苏维埃政府正缺钱化，便假装同意把钱拿走。

这样，洛卡特尔以为政变的成功是万无一失的了，不仅把成立新政府的部长成员名单都拟定了，而且连为列宁丧葬的神父和教堂都确定了。哪知反革命乱党暴动前夕，契卡先发制人，将他们一网打尽。英国特使寄予厚望的别尔津也没有去占领克里姆林宫，而是指挥部下包围了三家大使馆，后来这些大使们都被驱逐出境。其中英国特使、间谍阴谋主犯洛卡特尔是与李维诺夫交换后才返回英国的。赖利则还不时进出俄罗斯进行间谍活动，直到1925年他再一次潜入苏联时，在芬兰与苏联边境被边防军打死。

就在“约翰牛”大闹俄国的同时，“北极熊”也来到了英伦三岛搞情报特工活动，他就是十月革命后被任命为苏维埃政府驻伦敦外交代表的李维诺夫。李氏是从事地下活动的老手，原是沙皇部队军人，1906年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后，开始从事地下工作，1901年被沙皇政府被捕，第二年即越狱逃往英国。从1903年起，李维诺夫就与布尔什维克密切合作，在欧洲秘密从事党的工作。作为外交代表来到伦敦后，李维诺夫主要目的是想摸清英国对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权后的各种反应，同时搜集英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情报。李维诺夫在英国做出的一个突出的贡献是，他向苏维埃政府报告了在英国著名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中存在着不少同情布尔什维克思想的人，这为苏联后来有目的地在英国名牌大学生中进行思想渗透、招募间谍打下了基础。1918年10月，李维诺夫被英国情报部门逮捕，并与英国特使洛卡特尔交换回国。这

是第一个在英国被捕的苏联间谍人员。

这是苏联初期的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首相丘吉尔首先指责苏联在东欧和西欧之间拉下铁幕，他要求英美两国共同对苏联进行冷战。在发现苏联大力对英美两国（主要是美国）搞原子弹情报后，英国情报机关立即行动，也搞苏联的原子弹情报。苏联在1949年9月23日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成功，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核国家。然而，早在试爆前一年多，英国一个有“秃鹫”之称的著名间谍罗斯包德，就通过跟踪和监视一批在西欧活动的苏联间谍，获得了苏联是怎么掌握制造原子弹秘密的情报。1952年10月3日，英国在澳大利亚蒙特贝洛岛一艘军舰上也成功地试爆了一颗原子弹后，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核国家。同样在一年多前，苏联得知英国准备试爆的消息后，就派女间谍尤里娜以马戏班演员去澳洲演出为掩护，色诱岛上参与核爆的工作人员，又套取了英国核武器发展的机密。

1971年，英国一次把105名苏联间谍驱逐出境，创了驱逐外交官的世界记录。1989年苏联驱逐了11名英国外交官和记者，英国也驱逐同等数量的苏联人以示报复。所以，“北极熊”和“约翰牛”在重大时期和重要问题上经常要进行间谍斗法，只不过激烈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获得宽宥的叛逃者

冷战的结束，带来了短暂的曾经是敌对的谍报机关之间的

“蜜月”。以前的那些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大家似乎一时说不清楚了。这使得一些以前的俄国和英国的叛逃特工浑水摸鱼，得到宽宥，捞到不少好处。

戈尔季耶夫斯基于1963年从克格勃训练学校毕业后，进入第一总局工作。1966年起，他先后以苏联驻丹麦使馆新闻官员、二秘、一秘和大使政治经济顾问的身份在哥本哈根从事间谍活动，后又担任克格勃驻哥本哈根站的第二负责人。1972年，他开始与丹麦情报机关合作而充当双重间谍，提供克格勃在丹麦的间谍活动情报，致使丹麦当局破获了窃取丹麦先进技术的企业家本特韦伯和受克格勃指使、在丹麦和平运动内搞颠覆活动的作家彼得森等间谍案。

1982年，戈尔季耶夫斯基被派驻英国，以驻英使馆新闻官员的身份担任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第二负责人，具体负责在英国物色和招募间谍，向英国政府内部以及其他团体渗透。暗中，他却向英国情报机关提供了100余名苏联间谍的情况，全力发挥了双重间谍的作用。1984年，英国情报机关的高级官员贝塔尼准备向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站长古克出卖情报，英国情报机关根据戈尔季耶夫斯基提供的情报，逮捕了贝塔尼，并将古克驱逐出境。同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和挪威情报机关破获了一起重大苏联间谍案，逮捕了为克格勃搜集北约情报的挪威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特雷霍尔，提供破案情报的又是这位戈氏。此案一发生，克格勃随即进行了广泛的调查，最终怀疑到伦敦情报站。1985年7月，克格勃总部命令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国休假和汇报工作。戈氏回去后察觉到他将要被审查，就在莫斯科向英国情报机关呼救，英国特工就把他从苏联国内偷运到了英国。并且又根据他提供的情报，驱逐了25名在英国的苏联间谍。

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叛逃是克格勃的奇耻大辱，所以苏联宣布了对他缺席判处死刑，他所工作的第一总局下的V处，把他列为

首先执行暗杀的目标。戈氏只好乔装打扮、隐名埋姓地在英国过着地下生活。

到了1991年“8.19事件”后，英国首相梅杰不失时机地和戈尔巴乔夫说，克格勃不是好东西，竟敢对你也下手。所以，应该对反克格勃的人给予宽宥。梅杰请求允许让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妻子列伊拉和两个女儿来英国，使他们可以全家团聚。这位苏联总统同意了，梅杰趁热打铁，立即请人把列伊拉她们请到莫斯科英国大使馆，和自己一起喝香槟酒以示庆祝。到1991年9月，母女仨就到伦敦和戈尔季耶夫斯基团聚了。

1993年，普里马科夫的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官员，居然还和戈尔季耶夫斯基一起在丹麦的一次东西方情报合作交流讨论会上，握手言欢，共商协作大计。俄对外情报局发言人、新闻和社会联络中心主任科巴拉德泽在评论别人称叛逃者都是些精神病患者时说，戈尔季耶夫斯基就不能这么说，他是个有才华有见地的人，只是处事往往心血来潮、别出心裁。到1994年11月18日，俄罗斯《消息报》（以前有“《消息报》上无消息”的谚语）记者专程赶赴英国采访了戈氏，他对来自祖国的记者说，早在1968年苏联率领华沙条约组织部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他就对苏共政权不抱幻想了。他说，他当两面间谍并没有挣到许多钱，现在主要是靠讲课、接受电视台采访和写文章来维持生计。戈尔季耶夫斯基不愿透露他是怎样从莫斯科逃出来的，但说他将在计划撰写的一部回忆录中把那段经历公诸于众。他还没有打算返回故乡，原因之一是俄罗斯还没有正式取消对他判处死刑的命令。

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回忆录隔了一年果然出版了，书名为《下一站是被枪毙》，书的开头一章《紧急出逃》就记述了他逃离苏联的经过。其中说是英国得知他的呼救后，首相撒切尔夫人亲自下令要英国情报机关协助他尽快逃离，结果有两对英国男女在俄国与芬兰边界开了两辆汽车，把他塞进一辆汽车的后备箱内，连续

过了五道边防关卡，来到了芬兰，再转赴英国。

反过来，英国叛逃到苏联的著名间谍菲尔比死得早了一点，但他的第四任妻子、俄国人罗芙娜享受到了东西方间谍机构“蜜月”带来的好处。1937年，菲尔比从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后，在一次骑摩托车去欧洲旅行时，娶了一位奥地利的犹太女共产党员做自己的妻子，同时加入了苏联情报机关。1940年他参加英国军情六局，开始向苏联提供英国情报机构的情报。1946年，菲尔比以一等秘书身份在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工作，在那儿他暗中让苏联抓回去了一名投奔英国的叛逃者。战后英国军情六局建立了反苏联间谍处，处长却是菲尔比，其工作就可想而知了。1949年，菲尔比又被派到华盛顿，担任英国军情六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联络官，他把英、美两国情报机构的机密大量送给了苏联人。1952年，他又以《经济学家》记者身份到中东贝鲁特工作。1962年，担任英国女王艺术顾问的布莱克因苏联间谍罪被捕，菲尔比怕暴露只好叛逃到苏联。

菲尔比到苏联之后，被授予最高荣誉勋章之一的“红旗勋章”，并留在克格勃的活动经验分析处发挥“余热”。作为一名苏联培养的双重间谍，他还是受到了信任，在60年代曾代表克格勃暗中到中东地区活动过。1990年，就在他去世前夕，他还和原克格勃主席、当时主管政法的苏共书记切布里可夫一起到波罗的海地区，向当地人士现身说法，讲西方间谍机构如何地搞颠覆活动，分裂苏联，要大家提高警惕云云。

然而也是青山挡不住，菲尔比去世了，苏联瓦解了，但他的未亡人罗芙娜却还要生活下去。所以，这位双重间谍的妻子想到为何不把菲尔比的遗物拿到英国去卖些好价钱，也好下半生有个金钱靠山。要是在以前，菲尔比既是一位叛国逃犯，又涉及到英国情报机关的机密，英国政府一定会阻止的。即使英国不管，苏联也不会让他的公民把克格勃间谍的遗物拿去外国卖钱。而现在

双方都是畅通无阻的。1994年7月底，罗芙娜把菲尔比的一些纪念品、遗物亲自拿到了伦敦著名的索斯比拍卖行进行拍卖。罗芙娜对记者自嘲道：“菲尔比地下有知，对此肯定会发笑，他是个很有幽默感的人。”

无疑地，菲尔比也会对他因叛变英国而使他那些苍白物品有吓人的高价感到欣慰。一件由金属和塑料制成的供放在桌面看的附着轨道间谍卫星的地球仪，是克格勃在菲尔比75岁生日时赠送的礼物，被人用5980英镑买走。似乎含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只英国发给菲尔比的外交官用手提箱，卖出了比原价高好多倍的价格，即2530英镑。一只皮夹，其中放着一张1963年报道他逃到莫斯科消息的《真理报》剪报，也卖到2760英镑。一枚镶在粗糙的青黑色塑料上的盾形纪念章，它是克格勃西伯利亚分部送给菲尔比的，以1265英镑成交。九封由小说家格林写给菲尔比的信（格林二战时在英国外交部工作，后以间谍影片《第三个人》出名，与菲尔比是朋友），以高达26450英镑的高价才敲定下来。到最后，这次拍卖会会让罗芙娜得到的净收入为15.2万英镑，超过了索斯比拍卖行估计的两倍。

最大的买主是一位神秘的美国人，他付出了5万多英镑，主要是因为他想开办一家东西方间谍战的博物馆。英国报界批评索斯比拍卖行从一个叛国者的琐碎饰物中谋利，但索斯比拍卖行负责此事的塞雷说：“当我们拍卖拿破仑的东西时，并没有站到他的一边；当我们拍卖H·D·劳伦斯的手稿时，我们没有拥护无约束的爱情；对菲尔比，我们也一样。”罗芙娜却在她提着装满英镑的钱包乘飞机回莫斯科时，说了一句大煞风景的话：“我丈夫的思想现在又被证明了，资本主义世界根本不会去关心什么是非和理想。”

总统大选前的间谍风波

1996年6月，俄罗斯将举行第二次总统大选。由于叶利钦当上总统后，像戈尔巴乔夫一样只是在政治上不断进行西方化的改革，经济上却束手无策，所以几年下来，他也像戈尔巴乔夫一样在西方有声誉，并得到支持，但在国内却不受欢迎。因此叶利钦想要蝉联第二任总统，还得动些脑筋。政治家国内有难题，往往就用挑起国际纠纷的办法来转移老百姓的视线，自己又装扮成大无畏的民族英雄，这样谁也不好以区区国内小事反对自己的民族英雄。

当今最好的国际纠纷就是间谍事件了，它既不死人，最多让人坐几年牢，又有神秘性，容易吊起人们的好奇心，转移人们对国内问题的主意力。当然，间谍事件也会有影响两国关系的后遗症，所以“北极熊”考虑到这个矛盾不能直接对着美国，因为反弹力太强，也不能对那些弹丸小国，那就像绣花针扎在棉花里，不会有影响。比较下来跟“约翰牛”斗斗最好，可以像西班牙斗牛士一样既风光，又安全。

目标定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马上卖力行动。在1996年4月的一天，当一名俄罗斯青年正在与英国以外交官身份为掩护的军情六局的特工进行联络时，俄联邦安全局特工迅速将他们当场抓获，并从这名青年身上搜出多种间谍设备。据悉，该年轻人是俄政府官员，名叫奥布霍夫，任职于俄罗斯外交部，可接触到机密

材料。他在1990年被招募为英国军情六局的间谍后，还网罗了其他一些人，一起为英国广泛搜集俄罗斯情报，他们的行动代号是“透视克里姆林宫”。

初步的审讯结果表明，这位年轻的奥布霍夫之所以愿意为英国人效力，完全是为了金钱，并无政治目的。奥布霍夫在向英国递送机密被当场抓获后，被指控犯有严重的叛国罪，送交给法庭审理。据透露，英方要奥布霍夫及他的同伙出卖的俄罗斯情报涉及下面一些内容：

俄对英、美和北约虽不构成威胁，但其常规武器、核武器和生化武器仍属欧洲最强；克宫野心甚大，如政局突变，可能带来威胁；

俄仍在秘密发展新一代核武器和导弹，西方不可不防；

俄军售大增，不断向亚洲、非洲和中东倾销军火，想借此增加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令英国军售利益受损；

俄核材料偷运猖獗，由俄运出的核原料，大多流到朝鲜、利比亚、巴基斯坦、印度、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等；

俄与伊朗签有10亿美元的建设核电厂交易，俄替伊朗建核电厂的首批反应堆原料已起运，将有500名俄专家到现场参与建设；

俄与白俄已签署一体化条约，克宫重建大俄罗斯之心未死，欲再称霸欧洲；不少前克格勃人员复出效力克里姆林宫，他们被派到独联体各成员国活动，其任务不寻常。

这个“透视克里姆林宫”行动六年来提供了如此广泛的情报内容，俄联邦安全局不会不知道，但引而不发，就是为了等待一个好时机。现在，为了总统大选，可以做文章了。1996年5月6日，俄罗斯外交部召见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安德罗·伍德，就英情报人员以使馆为掩护，在俄境内进行“间谍活动”一事，向英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将涉及间谍活动的英外交官名单公开交给伍德。名单上不仅有九名与间谍案有关的英国外交官的姓名，还详

细列出了他们参与的间谍活动。俄罗斯外交部宣布，这九人是“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离境。

这个间谍案曝光后，在俄罗斯进行的民间测验显示，叶利钦的支持率扶摇直上，一下超过了本来远远领先于他的俄共总统候选人久加诺夫。

“北极熊”的目的达到了，可出乎意料的是，“约翰牛”的牛脾气大发。英国政府作出了强硬反应，称莫斯科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正准备参加欧盟外长和国防部长会议的英外交大臣里夫金德说，如果英国外交官真的被驱逐，英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同样的报复措施”。与此同时，英国秘密保安局（即军情五局）根据政府命令，迅速拟定了十名对英危害最大的俄罗斯外交官间谍名单，以备报复时采用。

俄罗斯官员这下子被伦敦的强烈反应弄糊涂了。普里马科夫在5月7日夜间亲自召见伍德，表示可进行私下磋商，并敦促英国克制。经过幕后交易，双方同意将驱逐的人数减少到每方四人，5月18日，俄英双方就针锋相对地宣布了驱逐对方四名外交官。英国外交部对俄罗斯驻伦敦大使阿达米申说，英国认为被驱逐的四名俄罗斯外交官是俄联邦安全局的特工人员。

事后，莫斯科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政治分析员马尔科夫说，这件间谍案，除了是为叶利钦竞选需要外，还向俄国人表明俄罗斯的安全机构已经恢复了正常工作。马尔科夫还说，在1991年12月苏联瓦解后，西方冷战时期的劲敌——克格勃这个秘密警察机构一度“陷入了危机，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思想库性质的机构”。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马尔科夫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所以前几年的俄英间谍战经常是英国采取进攻性和主动性，同时对俄防备甚严。

1993年11月18日，英国伦敦法院经过两个月的审理，判处史密特犯有泄露国家机密罪和为俄罗斯充当间谍罪，等待着他的将是漫长的铁窗生活。

迈克尔·史密特，1948年出生，读大学时参加了英国共产党，他为前苏联服务是出于政治信仰，后来为俄罗斯服务则是为了金钱。

早在70年代，史密特被以外交官身份作掩护的克格勃特工维克托·奥辛科招募为间谍。以后，奥辛科又成为史密特的领导人。从1976年起，史密特在生产军事装备的公司工作，他将有关美国国防设施的电子设备等机密文件交给奥辛科。当史密特所在的公司得知他是共产党员后，便将他解雇了。为恢复工作，史密特作了很大的努力，甚至给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写了申诉书。1990年至1992年，是史密特与奥辛科合作的最有成效时期，当时他在杰涅拉尔电器公司工作。

1992年7月，俄对外情报局特工、史密特的领导人奥辛科决定与自己的国家决裂，并与英国情报机构合作，这使英国安全机构有了侦察史密特间谍案的可能。英国反间谍人员设下圈套，伪装成俄罗斯特工同他约定接头地点，于1992年8月将他逮捕归

案。当对史密特在伦敦的住所进行搜查时，发现了2万英镑、与俄罗斯特工接头的时间表以及有关导弹设计的大量机密文件。

英国总检察长斯彭塞尔在起诉书中说，史密特案件表明，即使在冷战结束后，也不能低估俄罗斯情报机构的作用。

俄罗斯为了报复，在1994年3月1日宣布俄联邦反间谍局逮捕了“一名英国间谍”辛佐夫。瓦季姆·辛佐夫是俄罗斯一家军工企业的负责人，1993年春季被英国驻俄大使馆外交官、英秘密情报局驻俄情报站站长约翰·斯卡特利招募为间谍。辛佐夫一年多来，利用职务之便向英国提供了大量机密情报，其中有俄罗斯向中东国家出售武器的情报，出售武器的过程和武器特点，以及新武器的研究和生产方面的情报，并获得了1.2万美元的酬金。

俄联邦反间谍局人员在辛佐夫的住所搜出了各种特务工具，包括密写本、指令、情报传递守则，还有传递情报用的铺路鹅卵石仿制品。按照俄联邦刑法典，辛佐夫可判处十年以上徒刑。俄罗斯当局在审讯辛佐夫后，于3月上旬驱逐了英国斯卡特利这位披着外交官外衣的情报官。4月1日，英国也宣布驱逐俄罗斯驻英大使馆的一名高级外交官，以示报复。

到1995年1月11日，英国当局以“影响英国安全”为由，将俄罗斯奥斯塔基诺电视台高级记者亚力山大·马利科夫驱逐出境。英国当局的做法使俄方措手不及。对外情报局的官员说，英方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马利科夫从未加入过情报机构。43岁的马利科夫也申辩说，他要为维护一个记者的名誉而斗争，他没有当过间谍，也许他缺乏当间谍的才能，但他是一个不错的记者。

对此，英国报纸评论说，“马利科夫事件”表明莫斯科没有放弃东西方对峙时期的思维方式，不过在具体做法上有所不同而已，以往情报人员更多地以外交官身份作掩护，现在则更多地以记者、商人和非外交机构工作人员身份进行间谍活动。英国的研究分析人员认为，一年多前，俄罗斯情报机构减少了驻英情报人员，但

最近又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英国的秘密保安局同以前一样，将经费开支的 20% 用于对付莫斯科的间谍。

英国情报机构表明看法是，1990 年派到英国工作的马利科夫，其任务是在英国招募间谍，并从事经济和军事情报活动。英国当局注意到，马利科夫在从事记者工作方面并不十分积极，奥斯塔基诺电视台驻英办事处的一把手是希什科夫斯基，俄罗斯电视台驻英办事处的得力干将是古尔诺夫。1994 年 9 月叶利钦访问英国时，是后两人在全力地进行报道。马利科夫在英国可能想招募了解英国武器出口的人。因为原来苏联出口武器占世界第二，现在俄罗斯却被英国超过去了，而武器外汇对俄罗斯来说又至关重要。因此，伦敦方面认为，有关英国武器出口和武器贸易合同签订的情报是俄罗斯情报机构严密注视的目标。

最后，在 1995 年 2 月，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副局长拉波塔中将又主动站出来承认了马利科夫是间谍。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针对“马利科夫事件”直言不讳地说：“只要合情合理，我们将利用一切人来作掩护。一般来讲在努力满足我们的需要时，我们是遵守法律和常识的。新闻工作是一项微妙工作，我们不想损害俄罗斯记者或从事其他职业的人的形象。但另一方面，我们没有掩护就无法行事，我们不得不这样做。”

“变节熊”状告“约翰牛”

维克多·麦克罗夫自 80 年代起，开始供职于克格勃第十六

局，该局的一项任务是拦截和分析外国使领馆的通讯密码。麦克罗夫主要负责破译希腊和保加利亚驻苏联大使馆的电讯密码，能够接触大量北约和欧盟的机要通讯。麦克罗夫“身在曹营心在汉”，虽然在为克格勃工作，但非常崇拜英国的秘密情报局（即军情六局），而且清楚军情六局的机要密码没有被克格勃破译，即使他要投靠他们，也不会在通讯信号中有暴露的危险。

1985年，麦克罗夫的女友在一次贸易洽谈会上，结识了一位英国电脑推销商。她告诉这位商人，自己的男友维克多能得到苏联破译西方密码的详细情况。这位商人回去便向英国情报部门汇报了此事。

起初，英国秘密情报局并不相信麦克罗夫，天上哪有自然掉下天鹅肉的。他们派间谍人员通过迂回的渠道对麦氏进行试探，一个为英国情报机构做事的澳大利亚商人同麦克罗夫及其女友多次接触后，发现“麦克罗夫是诚心诚意的”，从而打消了军情六局的疑虑。很快，麦克罗夫向英国提供了克格勃破译德国和加拿大电报密码的具体方法，以及他们所掌握的北约和欧盟的情报。麦克罗夫后来说：“不久，加拿大就加强了安全防护措施，显然，英国情报部门对加拿大发出了警报。至于德国有没有被提醒，我就不清楚了。”作为回报，军情六局表示将于1987年4月以前，把麦克罗夫从苏联“解救”出来。

然而，麦克罗夫想变节就像商人想投资一样搞多样化，商人投资多样化可以降低风险，麦克罗夫这样做就加大了风险出了事。几年前，他除了委托女友向英国人联系外，还向一位男性好友透露了想投奔英国情报机构的想法，并委托那位朋友将自己写的一个纸条设法秘密交给英国人。可是那位老兄琢磨了几年后，却在1987年把那张字条交给了克格勃。此举又恰恰发生在英国情报部门要“解救”他之前。结果，麦克罗夫不仅没有走成，反而以叛国罪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对此“不幸遭遇”，麦克罗夫说：“幸亏

是戈尔巴乔夫执政，要是在过去，我早就被枪毙了。”

1991年底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下台，叶利钦执政后又把全国最后的十余名政治犯特赦了，麦克罗夫就是其中之一。出狱后，他毫不迟疑地走进了英国驻俄大使馆，随后他被送到英国驻拉脱维亚大使馆。在那里，自称“肖恩”和“坎特韦尔”的两位军情六局的官员对麦克罗夫说：“到英国后，军情五局（管国内反间谍的保安局）的人会关心照顾你的。”当时，麦克罗夫就对军情六局的人用假名对他敷衍了事极为反感。1993年，他曾向英国首相写信投诉秘密情报局，信中写道：“军情六局奸诈骗人的行径，极大地伤害了我。”

果然，到了英国以后，麦克罗夫除了领到每年1.1万英镑的生活补贴外，其他什么都没有人管了。因此他的居住条件很差，没有钱治病，精神都要崩溃了。他是在苏联北极圈内乌拉尔山上的劳改营呆了五年的人。这地方就是曾经名噪一时的著名监狱——彼尔姆35号劳改营，一位参观过的美国议员说：“那里异常寒冷，完全与世隔绝。”所以，现在麦克罗夫整天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1992年，他们对我说，在英国我虽然不会有男爵一样的生活，但会同每个普通英国公民一样生活。我不相信你们普通英国公民的生活会像我今天这个样子。”

1997年，麦克罗夫这位前克格勃中尉正式上诉英国“独立法庭”，要求军情六局兑现承诺，保障他的正常生活水平，并对他为军情六局坐牢五年进行经济赔偿，每年按1.8万英镑计算。麦克罗夫认为自己越来越老，此事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麦克罗夫的律师格雷克解释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原告在独立法庭上诉获胜的先例，但是我们别无选择。”

英国独立法庭的审判从来不公开，即使不涉及任何机密，公众也不能旁听，关心人权自由的律师也不能插手调查。有人认为，独立法庭本来就不是为了特工人员的申诉而设立的，它设立的目

的是为了受理民众对军情五局和军情六局的抱怨案。前间谍在这里根本没有讲话的余地。秘密情报局的官员也放出风声说：“到独立法庭对俄国佬没有好处。”

看来这场官司的前景不妙。麦克罗夫还有一件遗憾的事是，自1987年他因入狱而与女友分别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被问到当英国间谍后悔不后悔时，麦克罗夫喃喃地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难以三言二语讲清的问题”。

第十四章

角逐欧洲情报重地

在过去的冷战中，苏联和美国在世界上争夺霸权，重点就是在欧洲，那里是人类现代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当今世界的一个主要的工业中心和科技文化中心，谁在欧洲占据了优势，谁也就取得了争霸世界的优势。欧洲既是两个超级大国部署重兵之地，也是他们隐蔽斗争的前哨阵地，犬牙交错，厮斗不已。

冷战结束后，美国和俄罗斯都不愿意退出欧洲这块重地，结果法国首先公开驱逐在法进行间谍活动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德国也一再表示要拉下面子，迫使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活动收敛一些。对于由苏联衰落变化而成的俄罗斯，欧洲各国更是毫不客气。

1993年5月16日，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普里马科夫前去捷克共和国进行访问时，曾在布拉格大谈各国情报和安全机关领导人的合作。他当时会见了捷克情报局局长契尔尼和内务部部长卢姆尔等部门的首脑，大家作为经过对共产党国家进行了“温和革命”后的情报和安全机关的领导人，相见甚欢。契尔尼当时对记者说：“两国的情报机关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如果现在不采取措

施，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面临庞大的国际犯罪组织的威胁。”

但到1996年2月，捷克的想法又变了。捷克反间谍机构当时呈交给政府的一份秘密报告中称，大约有400名从事秘密活动的俄罗斯特工人员及其他的合作者一直在捷克共和国积极活动。捷克的《青年阵线报》援引这份报告说，俄罗斯特工人员在冷战结束后仅限于从事工业间谍活动，但是在过去两年里，他们又恢复了政治方面的间谍活动。俄罗斯特工人员“一直力图在捷克加入欧盟和北约之前就在捷克牢牢站住脚跟。他们还想在1996年5月31日至6月1日的捷克总统选举中影响舆论”。据捷克的这份报告称，在这400名俄罗斯特工中，有56人是正式派驻捷克的俄罗斯外交官。这份报告还说，在捷克的俄罗斯外交官中有一半人，是由前身为克格勃的俄罗斯情报机构的特工人员或涉嫌给其合作的人充当的。

对此说法，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特鲁布尼可夫辩解道，有这么多特工，为什么未见抓住一个人呢？

在捷克没有被抓，但在其他欧洲国家却被抓得不少。1992年4月10日，在比利时，就有记者金德、化工联合企业职员科拉尔、高等教育督察员莫奥南、商人埃里亚德等近20人因为给俄罗斯搜集情报而被逮捕，他们为俄罗斯提供军事和科技情报；4月23日，法国反间谍机关逮捕了六名俄罗斯间谍网成员，他们搜集法国的工业情报。同日，荷兰驱逐了四名从事间谍活动的俄罗斯人，其中外交官一名、记者三名。这次对俄罗斯间谍大“扫荡”，起因是俄驻比利时大使馆的一等秘书科莫普列夫在1991年底叛逃到美国，把他所掌握的俄罗斯间谍组织全供了出来而造成的。

同样在1992年初，意大利逮捕了28名俄罗斯间谍。德国在柏林逮捕了为莫斯科提供情报的一名美国驻德使馆中的德国雇员和二名前东德间谍。德国统一后，已查清了为数众多的东德间谍。但据德联邦宪法保卫局领导人说，目前仍有1000名前东德情报人

员在继续活动，其中三分之一的人为俄罗斯对外情报局服务。

在欧洲，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关心”的范围很广，从银行电子系统到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计算机都感兴趣。据美国政府官员说，仅在伦敦就有 50 多名的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特工在活动。

在俄罗斯对欧洲进行特工活动的同时，欧洲的国家也在对俄罗斯进行同样的活动。所以在 1995 年 5 月 5 日，俄联邦安全局社会联络中心主任瓦西里耶夫说：“俄罗斯已成为美、德等西方国家进行颠覆活动的对象，1994 年仅在经济部门，就在外国专家中‘挖’出了十名间谍，另外还有 90 人的间谍身份已确信无疑。”1996 年，俄罗斯对欧洲邻国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2 月下旬，俄联邦安全局在圣彼得堡逮捕并驱逐了一名瑞典情报机关的间谍；5 月上旬，俄罗斯外交部宣布驱逐英国和爱沙尼亚的几名外交官间谍；9 月 25 日，俄《独立报》又披露了俄罗斯于 1995 年处理的另一名瑞典间谍；12 月 17 日，俄联邦安全局局长科瓦廖夫说，俄罗斯最近向土耳其提出抗议，因为它涉嫌在包括分裂出去的车臣在内的北高加索地区从事间谍活动。

对德间谍工作垮台

在克格勃时期，苏联对德情报特工的活动如鱼得水，原因就是它的卫星国中有一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它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本是同一民族同一国家，只因德国战败，遭到东西方盟军的占领而被一分为二。当然，联邦德国对苏联的活动

也是有特色的，如1968年8月21日苏联坦克开进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时，西方各国情报机构都懵然不知，只有德国联邦情报局的间谍在布拉格打来长途电话，把这一事件的详情告诉了德国情报官。

东德的国家安全部是克格勃控制的小兄弟特工机构中最有战斗力的，特别是它对西德的活动非常地深入并屡获成功。国家安全部不仅由当年反对希特勒而进行地下斗争的共产党人来领导和组织，而且还有一些前德意志帝国的高级特工人员被苏联军队俘虏改造后，也来为其出谋划策。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领导德国军事情报局、从事大规模宣传心理战的被称为世界“谎言之父”的瓦尔特·尼古拉，希特勒掌权时期就当他的特工问题总顾问，而在苏联和东德共产党掌权时，也献计献策。尼古拉的做法，和英国的瑟罗、法国的富歇这些间谍大师一样，都奉行“有奶便是娘”的原则。另外，希特勒帝国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盖世太保领导人米勒，后来也效忠苏军和东德。

正因为东德国家安全部既有克格勃传授的绝招，也有德国过去的秘传，好像生物界有“杂交优势”一样，这个特工机构也有极强的优势。它不仅一丝不乱地控制着东德国内的局势，也不仅一再打入西德各个部门，包括西德的联邦情报局和宪法保卫局，而且还经常代表克格勃老大哥出面到其他国家去指导培训特工人员。即使在东德被西德合并后，东德特工还是非常吃香，伊朗、利比亚和伊拉克都在尽力利用这些高水准的间谍。所以，伊朗情报部有能力于1992年在柏林暗杀库尔德民主党的三名领导人及其翻译，德国当局也在1996年3月15日发出要逮捕伊朗情报部部长法拉希安的命令，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在东德国家安全部担任了长达30年首脑的马尔库斯·沃尔夫被西方称为是世界上最能干的间谍头子之一。他在1945年随苏联红军进入德国时，是名红军中尉。1950年被召回苏联受训，不

久回国协助组建国家全部。沃尔夫随即向西德派遣了大量的战略间谍，其中最成绩的莫过于1972年爬上了西德总理勃兰特秘书高位的纪尧姆，直到1974年纪氏才被捕。西方称纪尧姆是“战后联邦德国破获的间谍案中最活跃而且效率最高的间谍”。沃尔夫的机构在1982年又成功地策反了西德宪法保卫局反间谍处（第四处）处长蒂德格，并于1985年8月即将暴露前，帮助他叛逃到东德。蒂德格的变节，使西德在东德的165名间谍相继被捕。德国总理科尔称，蒂德格的叛逃给联邦德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随着东欧的剧变，在1990年1月15日傍晚，近万名东德青年包围了位于东柏林里希滕贝格区的国家全部总部。这个特工机构整个人马有近10万名，在总部就有2.5万名。总部是一栋有着两扇令人望而生畏的钢结构大门挡着的“堡垒”建筑，被人们嘲弄地谑称为“窃听监视公司”或“全能的秘密警察中心”。但是这群不速之客嚷着“我们要进去”、“我要我的档案”、“国家全部要光明磊落”的口号，冲砸了15分钟后，大铁门被打开了，这群人在里面没有发现文件，但把里面的不少财物洗劫一空。文件有的早被克格勃取走，有的则不明下落。

从此这个强大的被称为“人民的剑与盾”的机构瓦解了。其实几周来这个机构已经元气大伤，82岁的现任国家全部部长米尔克因同意射击越境者已被投进监狱，另一名部领导维甘德同一个已婚的女秘书一起投奔了西德。国家全部名称也一改再改，先叫国家全部，后叫国家保卫局。当时，统领着8.5万名国家全部队的司令默勒中将看到了这些前车之辙，所以面对冲砸国家全部的人群，手中只是拿着一副望远镜观看而已。在总部迷宫般的大楼里，至少还有五位将军负责守卫，但唯一的武器也是自己的拳头了。原情报头子沃尔夫则是在别人要抓他时，留下一张休假去也的条子，用了三十六计的最后一条：走为上。但到1993年，他还是走投无路，投案自首，被判刑六年，缓期执行。

另起炉灶 重振旗鼓

联邦德国是欧洲最重要的国家之一，特别是在东西德统一之后，它的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水平在欧洲都是举足轻重的。虽然俄罗斯与德国在商量情报合作时，俄方答应要停止对德国的间谍活动，但实际上俄罗斯只不过让以前由它的小兄弟东德国家全部组建的一些已被暴露或无法活动的间谍网任其自灭而已。俄罗斯自己却又迫不及待地另起炉灶，组建起新的完全由自己指挥的间谍网了。

1992年初，在德国波恩的一位反间谍专家说，俄罗斯情报机构接替了被解散的克格勃的工作，接收了世界上最大间谍机构的80%的情报人员。对于德国来说，可以明显地看到，他们在德国东部新建的五个联邦州里正在努力建立一个范围广泛的间谍网。这位反间谍专家解释道，在民主德国时代，克格勃掌握的大多数有关德国的情报是从东德国家全部处得到的，而“现在俄罗斯情报机构不得不自己亲自去搞那些必要的情报”。

德国反间谍专家说，俄国人在整个德语地区（除了德国外，还有奥地利和瑞士部分地区）配备了间谍无线电台，间谍们的活动通过无线电台统一领导。至今联邦德国反间谍机构还没有能破译其联络密码。虽然大约30名前克格勃官员在联邦德国接受审讯，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人泄露密码的破译技术。一位联邦德国的情报专家说：“只有当他们中有一人招供了，我们才能破译密码。”

据德国宪法保卫局官员说，莫斯科间谍一如既往的任务是侦察联邦德国的政治家，向本国政府报告这些政治家的政见和活动。但他们对联邦德国的军事秘密兴趣减弱，而对德国的经济和工业技术的注意力加强了。

面对德国日益增多的俄罗斯间谍特工，德国先礼后兵，先君子后小人。1992年底，德国请了一些原苏联知名老特工到德国阿芬沙堡参加专门国际会议，公开商讨稳妥的处理对策。应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原克格勃将军孔德拉绍夫、原苏联情报首脑舍巴尔申、原苏联驻英国的间谍负责人戈尔季耶夫斯基等人。会议建议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共同努力，争取到1993年底，分别将自己在德国的特工缩减到700人和500人。而舍巴尔申马上纠正说，现在俄罗斯在德国的特工人员只有400人。但德国方面却认为，俄罗斯在德的特工人员决不只有这些。

到1995年，俄罗斯特工还是不见减少，德国想要来点硬的了。4月28日，德国《明镜》周刊报道，德国反间谍机构宪法保卫局已经向德国外交部递交了一份有165名俄罗斯人的名单，并建议将他们作为间谍驱逐出境。《明镜》周刊说，德国联邦政府正在决定如何对这份报告作出反应。该刊说，政府已经拒绝了给莫斯科任命的一位俄驻柏林武官发放签证，因为知道他是俄罗斯军事情报部门——格鲁乌的成员。

对此，俄罗斯外交部的评论是：“显然，有的人并不喜欢建设性地发展俄罗斯和德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尊重各国之间的合法性和互相信任的国际法基础上建立欧洲未来的这一共同愿望。这给人的印象是，某些人仍然希望保留着俄罗斯是敌人的印象，而且从这种成见出发，不制止导致破坏俄德关系的因素。”俄罗斯外交部还说，在欧洲“胜利日”庆祝活动以及德国总理科尔即将访问莫斯科的前一周，提出这样的报告是“特别不合适的”。经过这番评论，德国外交部也只好大事化小处理了。

但德方人士还是对俄罗斯的间谍活动深为担忧。他们说，在经济领域，俄罗斯间谍往往以商人的面目出现，在合资企业和德国公司都有俄罗斯的情报人员在活动。图书馆、档案馆、基金会、研究所和大学里工作的俄罗斯专家，有不少是间谍人员。此外，俄罗斯在德国设立的一些文化、艺术、新闻代表处中的不少作家、艺术家和新闻工作者也是为俄罗斯情报机构效劳的。

德国在对付俄国人的同时，也在1997年3月下旬下令，让一位美国驻波恩大使馆的外交官在被指责从事经济谍报活动后离开德国。虽然，这对在德国拥有1120多名美国特工来说，只是少了九牛一毛，但这毕竟是第一次公开揭露此类事件，其意义不可低估。

俄法谍海 波诡云谲

俄罗斯在历史上深受法国文化影响，贵族中曾经流行法语。法国作为一个想在西欧和西方独挡一面的大国，常常面临英国、德国和美国的挑战，所以采用远交近攻之术，经常和苏联、俄罗斯拉关系。这样，他们之间的间谍斗争相对来说，就经常带有温情脉脉和羞羞答答的色彩。

原克格勃最喜欢对法国人采用“美人计”。法国男子本来多情，对苏联敌意也少，一有温柔热情的俄罗斯姑娘，就最容易上钩。最有名的是克格勃从1956年到1963年，先后用两只“燕子”（女性色情间谍）和法国驻苏联大使德让发生性关系，然后准备向他索取情报。后来参与此事的克格勃官员克罗特科夫叛逃至英国，才

使法国得知这个难以相信的事实。由于及时召回了德让，没有对法国安全造成大的危害。所以，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见了德让只是耸了耸肩膀说：“你是到处睡觉啊，德让。”

格鲁乌也喜欢用“美人计”对付法国人。1986年法国披露了一件格鲁乌窃取“阿丽雅娜”火箭技术的间谍网，网中男主角是彼尔·维迪耶。他毕业于法国巴黎综合工科学校，不知怎么娶了一位苏联人作妻子后，格鲁乌就把他发展为间谍了。网中的女主角是格鲁乌派来了一位以难民出现的罗马尼亚女人，叫安多勒塔·马诺尔。他们两人在生产“阿丽雅娜”火箭发动机的法国诺曼底发起成立了一个协会，名叫法国—罗马尼亚文化协会，目的是为格鲁乌窃取火箭发动机、特别是HM—7第三级发动机的技术，因为当时苏联有九个研究单位在研究第三级火箭。

马诺尔这个色情间谍的情欲旺盛，她用网罗情夫来开展工作；维迪耶则精通技术，他们两人也是一对情人。这对少有的黄金搭档，专门结交接触“阿丽雅娜”火箭机密的人，并发展了一名火箭发动机试验台的绘图员直接为格鲁乌工作。这个间谍网的暴露，是由于马诺尔看到维迪耶另有“新欢”，醋劲大发，向法国反间谍机关领土监护局告发了维迪耶。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结果，马诺尔坦白无罪，维迪耶和那名绘图员等被逮捕入狱，另外两名格鲁乌在法国的得力干将也被赶回苏联老家：一个是格鲁乌在法国的头目金奇勒夫，在驻法使馆任参赞；一个是格鲁乌的航空航天专家科诺尔夫少校，任苏联驻巴黎空军副专员。

1992年秋天，法国反间谍部门领土监护局局长雅克·富尔内挟着一个装有令人震惊的共和国机密材料的公文包，紧急求见密特朗总统。这些材料是一个东欧国家的特工向富尔内提供的，讲的是有关密特朗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前法国国防部长夏尔·埃尔尼接受东欧和苏联特工操纵和资金的情况。埃尔尼是在1956年5月被克格勃发展的，当时他作为一名法国议员访问莫斯科，在红

场附近乘出租车时神秘地失踪了，直到第二天凌晨4点才返回代表团，唯一的说法是：“在莫斯科，妓女在出租车上拉客……”密特朗总统听了汇报后吓了一跳，随后果断地说：“我们不能改写历史，局长先生，请把此事列为国家机密。”直到1996年10月，此事才被法国《快报》周刊捅了出来。

由于克格勃老是通过脐下五寸处的部位对法国开展间谍活动，这也启示了法国特工部门。80年代初，全世界都看到勃列日涅夫身体有毛病了，但他患的是什么病？严重程度怎样？那可是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外人一无所知。西方国家情报机关都想劈开这只闷葫芦，但又无从着手。后来还是法国的国外安全和反间谍局找到了办法。一次勃列日涅夫要出访丹麦，法国情报机关首脑德马朗什想，苏联领导人的保卫虽然严密，但他总要拉屎拉尿，把他的大小便弄到手，他的病不也就可以知道了吗？于是法国特工打听到勃列日涅夫住的是哥本哈根的唐莱特尔饭店，就马上用一位法国大工业家的名字在勃氏所住的总统套房下面也租了一套房间。法国特工在房间里拆下了勃列日涅夫套房下面的下水管道，等这位年老多病的苏联领导人住进来后，把他排泄出来的屎和尿通通截住在塑料袋内，然后运往巴黎化验。结果法国人清楚地知道了勃列日涅夫由于长期过量地喝伏特加酒，肝受到了严重损坏，剩下的生命也有限了。果然，到1982年底，勃氏就一命呜呼了。

1968年7月，即“布拉格之春”的最后一些天，38岁的弗朗蒂瑟春风得意，当上了捷克斯洛伐克驻法国大使馆的副武官，但实际上他是捷军事情报局的一名少校，前年从莫斯科的克格勃学校培训出来，其任务是在巴黎推动间谍情报网的发展。8月21日苏联坦克开进了布拉格进行镇压，弗朗蒂瑟第二天就向法国对外情报和反间谍联系，表示愿意为法国效力。他后来不仅把捷克政府的秘密文件和军事情报局的工作简报送给法国人，有几次还把

苏联军事情报局格鲁乌在法国的工作简报弄来，也给了法国人。结果，谁知道在法国特工机构内的“雅克二号”（克格勃的一只“鼯鼠”）出卖了他。弗朗蒂瑟于1978年2月3日在捷克家中被捕，坐了12年牢房。1990年，他出狱后，法国特工机构答应要给他一笔赔偿金，但后来弗朗蒂瑟催了几次，送来的却是一本《花园栽培艺术》，大概是希望他在捷克山间乡村自己的那幢有花园的房子里好好养老罢了。

到了80年代末，苏联和俄罗斯对外情报部门的领导人一再声明，不再运用以前克格勃那套违反人性和个人自愿的手段来开展情报搜集活动了。但是，俄罗斯特工还是有办法获取法国的机密。

1992年，法国物理学家弗朗西斯·唐佩维尔因向俄罗斯出卖穆鲁罗瓦核试验情报而被逮捕。他是被以“学生”面目出现的特工拉下水的。唐佩维尔在攻读核物理学博士时，为了能交学费坚持学习下去，就通过授课来赚钱。1987年的一天，他刚进入法国核物理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不久，有个叫塞尔日的“商人”，要求他授课，一个晚上同意支付300~400法郎。其实塞尔日是苏联驻法使馆的二秘，叫斯米列夫，他一边花钱“学习”，一边请客吃饭，开展心理攻势，终于控制住了这位老师。

1989年10月1日，唐佩维尔进入法国原子能中心担任原子工程师。在学生的要求下，这位法国原子工程师在1989年9月至1991年4月给了塞尔日6000页的资料和图表。它们五分之四都盖有“防务机密”的图章，其中有法国1979年到1988年在穆鲁罗瓦进行的31次核试验的分析材料，1989年到1990年的各次核试验的文件材料，以及1991年的四次核试验的说明。

后来，唐佩维尔自己也越来越害怕了，干脆离开了原子能中心，想以此摆脱间谍生涯。但塞尔日这位“学生”仍不罢手，改让俄罗斯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处三秘、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特工马尔罗夫（化名勒内）继续同他联系。勒内同唐佩维尔一直联

系到1992年6月，当时俄罗斯想得到西方对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研究材料。到7月，一个逃到伦敦的俄罗斯间谍维克多·奥辛科供出了唐佩维尔。据法国情报部门说，唐佩维尔出卖情报总共得到了200万法郎。

巨人和侏儒之战

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从人口数量上看，俄罗斯和瑞典相比，完全像巨人和侏儒一样，不在一个档次上。但是其间谍战是在暗中进行的，不在于外在的大小，所以巨人和侏儒照样可以你来我往地较量。

1995年4月1日，瑞典司法部宣布逮捕并驱逐了俄罗斯驻瑞典贸易代表团官员斯米尔诺夫，指责他企图从瑞典人手中获取国防机密。接着，俄罗斯连续进行了二次反击。

1996年2月21日，瑞典情报机构的联络员、32岁的汉斯·诺尔兹特雷姆以瑞典某公司代表的身份，乘坐牌号为“KXL—975”的红色福特轿车进入俄国圣彼得堡。俄联邦安全局通过情报得知，这家瑞典公司是瑞典总参谋部为在俄进行间谍活动专门组建的。他到俄罗斯后，先住进了瑞典领事馆，在那里了解当地的反间谍形势和俄联邦安全局力量布置及设施配备等情况，并接受有关指示。瑞典之所以要派联络员来俄罗斯，是因为当地领事馆的外交人员都已处在俄联邦安全局的监视之下，活动不方便。而年轻的斯堪的纳维亚商人驾车来俄罗斯多如过江之鲫，仅在圣彼

得堡每天就有几十个人俄特工不可能对每位旅游者都进行监视。

2月23日，诺尔兹特雷姆与一名俄罗斯间谍选择在一个海军博物馆的一个展品旁会面。因为当天博物馆里异常拥挤，很难看清参观者及其行动。会面前为了掩人耳目，诺尔兹特雷姆换上了不显眼的深色大衣。他与俄间谍相见后，互通了暗号。随即，俄间谍交给他一只内藏胶卷的俄罗斯洋娃娃，这名被瑞典情报机构招募的俄间谍得到了2000美元。但是，上述过程却被俄联邦安全局的反间谍人员无一遗漏地拍了下来，两人立即被逮捕，并很快被押送到圣彼得堡市联邦安全局受审。

经审查，这名俄罗斯间谍能够接触机密情报。在他交给瑞典联络员的胶卷中有23份印有“绝密”和“机密”字样的公文。被捕前，这名俄国人与瑞典派出的联络员已进行过十多次的秘密会面。而诺尔兹特雷姆在向俄反间谍人员解释自己的行为时，称他是受一位熟人的委托才与俄国朋友会面的，完全不知道交给的是秘密文件。这是情报人员常用的装糊涂办法，前苏联克格勃叛逃者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当年英国特工在偷运他出苏联时，一旦被发现，也准备说是自己躲在英国人汽车里的，他们一无所知。

瑞典方面对此事不予评论。被请到俄联邦安全局圣彼得堡分局的瑞典总领事，在看了被捕联络员的供词和两人会面的录像后，承认证据确凿，却又表示：“很遗憾，瑞典人太天真了，力求完成朋友的委托，没有考虑到后果。”不愧为领事，有这么好的外交辞令。鉴于俄瑞之间传统的友邻关系，克里姆林宫决定不追究诺尔兹特雷姆的刑事责任，而将其驱逐出境，并要求瑞典召回与该联络员有牵连的高级外交官。

瑞典虽然是一个中立国，但其军事力量和情报工作一直是比较先进的。总参谋部的情报和反间谍局分二大块，一块就是军事情报局，它非常注意搜集俄罗斯各方面的情报。即使冷战结束后，瑞典仍把俄罗斯视为假想敌，倾全力获取俄罗斯军事、经济潜力、

国家权力机构的组成及武装力量等方面的情报。瑞典主要的反间谍机构——安全警察局，它同刑事警察局同属瑞典总警察局领导，也把俄罗斯作为重点监视对象。瑞典情报机构还积极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六局合作，共同对俄进行间谍活动。

过了七个月即1996年9月25日，俄罗斯的《独立报》又披露了另外一桩瑞典间谍案。

1993年11月，47岁的瑞典客商汉斯·艾克斯特雷梅尔代表西吉夫技术公司来到俄罗斯的普斯科夫。他一到那里就积极活动，与保密企业的领导见面，向他们提出一系列有诱惑力的合作建议。处于危机状态的军工企业经理们对这位艾克斯特雷梅尔先生印象最深的是他有瑞典一些大银行的担保，可以引进巨额投资。很快，艾氏就进入了普斯科夫几家大型军工企业，其中包括普斯科夫电子机械厂，他以评估实施合作的可能性为由，参观了生产军需品的保密车间。这位瑞典客商还前往圣彼得堡，以同样的借口进入了“新曙光”、“自然铁”等与军工生产相联系的科研生产联合体。但是，艾克斯特雷梅尔却回避了俄方提出的具体合作建议，没有签订一份合同或意向书。

艾克斯特雷梅尔的行动很快引起了俄罗斯反间谍机构的注意，查明了他用录像、照相等手段搜集了关于这些企业产品的性质、产量以及产品的使用者等方面的秘密情报。1994年，艾克斯特雷梅尔在维卡亚区拍摄铁路桥时，被巡逻警察作为“工程间谍”抓住并被扭送至护法强力部门。但他自称是被非法拘留，并趁机和普斯科夫内务局领导人及民警建立个人关系。此后不久，艾氏又多次出现在普斯科夫联邦安全局大楼前，观察下班回家的工作人员。某一天，他与联邦安全局的一名军官认识后，进行了有目的的情报打听。上述提到的这些，内务局和安全局的工作人员都向上级作了汇报。

到1995年，这位艾克斯特雷梅尔干脆直接来到普斯科夫联邦

安全局，表明自己愿意与安全局进行有偿合作，还给自己起了个间谍代号，名叫“红色斗牛士”。其实这是瑞典军事情报局的一个阴谋，他们想让俄罗斯设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使馆情报组与他联系，这样就能掌握使馆情报人员的活动。普斯科夫的反间谍机构拒绝了艾克斯特雷梅尔的建议。1995年5月，莫斯科考虑到这位瑞典“客商”与瑞典特工机关的密切关系，为了防止俄罗斯机密泄露，决定永远禁止艾克斯特雷梅尔进入俄罗斯境内。

图林

第十五章

建立稳定和睦邻友好地带

俄罗斯虽然不像前苏联那样，觉得自己是与美国并列的超级大国，在全世界都有自己的利益；觉得自己是社会主义老大哥，要在全世界帮助小兄弟们太平无事，但俄罗斯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在世界上有自己的利益和地位。俄罗斯对外情报机构虽然不像克格勃那样，全面渗透，无孔不入，但也总想有机可乘，捞到好处。所以，现在俄罗斯虽然不在每个国家都设立间谍站，但各大地区还是有自己的情报点在活动。下面介绍几个方面情况，可以见一隅而以三隅反。

俄罗斯很重视在情报反间谍工作中加强对独联体国家的控制，前面讲到的伍德拉夫之死是一种表现，另一种表现则是使独联体国家的特工机构和工作一体化。俄罗斯对外情报局负责与其他情报部门协调“内部行动”的副局长拉波塔中将在1995年初说：“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工作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可以预见的，即确定俄罗斯国家利益面临的外部威胁，但第二个重点是不可预见的，那就是前苏联共和国的一体化问题。”他认为，情报局的目的是在尊重各自的主权的同时，使俄罗斯与前苏联的几个共

和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和实现一体化，最终“以俄罗斯为中心建立一个稳定和睦邻友好的地带”。

俄罗斯控制独联体国家的特工工作具有很大的有利条件。美国《华盛顿邮报》评论说：“许多前克格勃职业特工继续在新独立的国家中掌握重要权力的同时，相互间还一直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对此，独联体各国人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这些以秘密活动为己任的老特工们曾在莫斯科克格勃学校中同窗数年，而且在同一个领导下长期工作，因此具有相同的兴趣、观点和信仰。”

前乌克兰克格勃主席尼古拉·戈鲁什科在苏联解体后，携带大批关于乌克兰的秘密档案跑到莫斯科，摇身一变，成为俄罗斯国家安全部部长和联邦反间谍局局长。1993年，戈鲁什科因在总统与议会冲突时，“未能给予总统足够的支持”而遭到叶利钦的撤职。但鉴于他对乌克兰事务的熟悉，后来又被任命为俄联邦安全局局长的高级顾问。

白俄罗斯重新独立后，它的情报安全机构的名称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依然是“克格勃”。白俄罗斯的总统、世人称他为“小希特勒”的亚力山大·卢卡申科，也曾任苏联克格勃的边防部队任过职。原俄罗斯对外情报局长普里马科夫就极力鼓吹加强独联体成员国的密切联系，出任外交部长后，在他的积极游说和压力下，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签署了实现“一体化”的协议。

曾任原克格勃阿塞拜疆负责人、现为阿塞拜疆总统的阿利耶夫，前段时期因为俄罗斯与亚美尼亚的关系而一度与莫斯科失和。但在最近，俄情报特工机构不断向他暗送秋波。最为明显的例子是，俄联邦安全局根据阿塞拜疆的要求，将数名藏匿在莫斯科的阿利耶夫的政敌一一逮捕，想借此改善两国的关系。

为了不影响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的关系，俄罗斯特工机构尽量不直接出面在这些国家进行间谍活动，以免小不忍则乱大谋。所以，有时俄罗斯需要有关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关系的情报，就

通过驻土耳其的间谍人员来搜集。

正因为这样，一些评论家说，深深扎根于许多非俄籍前克格勃官员脑海中的一种观念是，遵循莫斯科的指示、仿照莫斯科的做法，要大大强于他们对本国、本民族的忠诚。有了这个条件，在独联体实现“一体化”前，其成员国的情报机构可能会首先完成“一体化”。

比如，自1992年以来，独联体安全部门的头目们在俄反间谍机构的统筹下，经常聚会，商讨相互关心的特工活动战略和其他感兴趣的问题，并签署了在更广泛的领域开展情报合作的协议。到1995年春时，各方又达成了一项重要的协议：在莫斯科成立一个专门协调独联体各国情报搜集活动和情报分享的秘书处。

1996年4月，俄通社报道了一条重要却未引起外界注意的消息：独联体12国的情报局长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召开特别会议，商讨加强其情报部门更密切合作的良策。那次会议后不久，就在莫斯科设立了正式机构，由这个机构来负责协调独联体成员国间的情报活动，向它们提供所需情报，并帮助其训练欲安排在国内或派遣到国外活动的高水平特工。俄罗斯特工部门一位负责人说，有些新独立的国家缺少到国外进行情报活动的人力、财力和能力，因此“乐于接受俄罗斯的帮助”。

搜集情报的最佳跳板

加拿大在前克格勃眼中不仅其自身具有重要的价值，它是参

加西方七个首脑会议的发达国家之一，是北约的重要国家，与苏联隔北冰洋相望。这北冰洋水路虽然终年封冻，但空中飞机和导弹的飞行瞬间即能通过，所以加拿大在冷战时期是西方和东方之间最重要的一条防空线。而且加拿大和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有着漫长的边境线，这条边境线又几乎是不设防的，两国的人员完全可以自由来往，这样又是克格勃对美国开展非法途径搜集情报的最好跳板。

曾有一位叫卡洛·图米的苏联英语教师，1958年在莫斯科接受了全套特工训练后，克格勃便派他到美国去活动了。克格勃设计的方案是，让他装成是出生在美国的美国公民，后来移居加拿大，现在是重返故乡。图米从莫斯科机场起飞时，拿的是芬兰裔美国游客的护照，在巴黎和布鲁塞尔逗留了一周后，于1958年12月17日往加拿大蒙特利尔飞去。在通过蒙特利尔市海关后，图米马上销毁掉第一个护照，摇身一变，成了一位美国芝加哥实业家，开始在加拿大活动一段时间。

在加拿大，图米不仅消失了从俄国来的痕迹，而且还先在加拿大弗雷塞河畔木材场、温哥华的一个木材场、后到美国米尔沃基市的机械厂、当地的通用电气公司等寻找和熟悉“早年生活的经历”，最终就变成了美国离乡的游子。然而，正当他带着早就伪造好的机械厂和电气公司的离职证明等文件，想在美国开始间谍活动的时候，就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然后又成为美国对苏搞情报的双重间谍。直到1971年，美国《读者文摘》介绍了图米的故事，克格勃才发觉上当，并把图米列入自己追捕的罪犯名单中。这是一次失败的“跳板跳水”。

1996年6月上旬，加拿大自己也发现潜伏了六年之久的一男一女两名俄罗斯间谍，并把他们遣送出国。

加拿大多伦多市中心的一栋高楼里，住着一对年轻的夫妇，男的叫伊恩·兰伯特，33岁，自称在加拿大出生，曾移居欧洲和美

国的多座城市，1988年返回加拿大。女的叫劳里，34岁，据说在加拿大出生后去了瑞典，几年前才回来，其英语带有明显的瑞典口音。

这对“兰伯特夫妇”工作很出色。伊恩在多伦多布赖克斯摄影厂担任技术员，上司认为他是个理想的、天才的职员。劳里在进入国际保险公司后，就因聪明和机智获得了晋升的机会。周围的同事和邻居对“兰伯特夫妇”自述的“身世”深信不疑，直到1996年5月22日，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把这对夫妇双双拘捕，并没收其财富，人们才如梦方醒。原来“兰伯特夫妇”是冒名潜伏的俄罗斯间谍，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伊恩的真名叫德米特里·奥尔舍夫斯基，而他用的伊恩·兰伯特这个姓名，则是1965年5月出生后不到一年就夭折的加拿大北约克的一个男婴的名字。劳里的真名叫叶连娜·鲍利沙夫娜，而劳里这个名字则是1963年9月出生在加拿大魁北克、1965年8月在多伦多死去的一个女婴。冒用目标国早已死亡的婴儿之名，以便使莫斯科的“鼯鼠”变成“地道”的加拿大人，是前苏联和俄罗斯情报机构的惯用伎俩。由于加拿大公民很少保存婴儿死亡证明，以致假冒死者身份的间谍难以曝光。

伊恩和劳里虽然自称是夫妻，却无法详细地说明他们是在何时何地结婚的，而且双方也没有感情。两人在多伦多同居五年多后，一年多前突然分居。1994年12月，伊恩与厂内结识的女经理凯依丝到北约克同居，而劳里则于四个月前与55岁的多伦多医生密勒堕入爱河。

其实，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早在1992年就发现“兰伯特夫妇”伪造的护照上有疑点，便开始不动声色地对他们进行严密的监视，并在侦查中证实，这两名间谍曾返回莫斯科“接受命令”。

1996年5月，伊恩告诉凯依丝说父亲病逝，他计划在6月24日赴瑞典“料理后事”。加拿大情报机关获悉这一消息后，认为伊

恩想逃跑，便于5月22日采取了拘捕行动。根据多年搜集到的证据，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指控“兰伯特夫妇”长期非法地搜集加拿大军事和经济情报，认定他们为俄罗斯间谍。

据报道，劳里被捕后曾表示，她愿意向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提供有关俄罗斯的情报来换取在加的居留权。但是，在6月5日加拿大联邦法庭就执行驱逐令举行公开聆讯时，被告的律师却突然宣布：“两名当事人不再争取居留加拿大，将遣返回国。”舆论认为，这很可能是俄驻渥太华大使馆与“兰伯特夫妇”做了交易，莫斯科将保证他们的安全。

6月11日，“兰伯特夫妇”在两名俄罗斯官员的“陪同”下回到了莫斯科。他们一下飞机，便迅速钻入一辆遮盖严密的汽车，疾驰而去。从表面上看，此案似乎已划上了句号，但留下的许多疑问，仍令人费解。

俄日较量 由来已久

苏联时代和日本的间谍斗争一直是针尖对麦芒，互相不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时，苏联向日本派出了以佐尔格为首的间谍网，同时还派专家在中国同国共两党合作搞对日情报。日本则收买逃到中国东北的白俄和其他变节分子搜集苏联党政军机密，曾经还派出暗杀小组，向斯大林行刺。

那是在1938年，即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二年，为了牵制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支援，消

除日本军队的北顾之忧，日本东京参谋本部第二部和关东军司令部首脑批准了“熊工作计划”，“建立了庞大的掩护组织”，要像暗杀张作霖一样，实施对斯大林的暗杀行动。日本军部的特务机关，想通过勾结逃到中国东北的苏联叛徒，收买流窜在东北各地的白俄，加上和纳粹德国进行密切合作来完成暗杀任务。

第一次行动由日本人长谷部太郎带队，另外有1938年6月从苏联逃到伪满洲国的留西柯夫将军、伪满外交部“嘱托”别济曼斯基等八人。他们一行在1939年1月25日经土耳其潜入苏联境内，企图暗杀正在黑海胜地索契疗养的斯大林。因为留西柯夫曾是阿速夫黑海地方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长官，了解当地情况。但是，他们在边界地区即被苏联军队伏击并打死一些人。

这次行动失败后，日本驻纳粹德国的大岛大使在和希姆莱会谈时表示，要再搞一次暗杀，并暗示要求这位德国特工头目给予协助。结果是，由德国党卫队国外保安局的一个组长舒伯特和日本驻土耳其大使馆的陆军武官立川两人负责，制定了一个暗杀计划，预定在1939年5月1日派暗杀小组到莫斯科，通过在苏联内务部的关系把定时炸弹放进列宁墓内，并在上午10点斯大林登上列宁墓的时候引爆。这个暗杀组由四个恐怖分子组成，辗转到达了莫斯科的据点，但又被内务部队包围，有三人畏罪自杀。这些暗杀的失败，主要是在日本策划的活动中，被苏联一个代号叫“莱欧”的人打入了，以至暴露。

战后，苏联利用大量日本战俘和思想左倾的人士搞日本的情报，其中最大的要算1980年破获的“宫永间谍案”了。这个间谍网涉及到日本自卫队的军事情报领导人、陆军少将宫永幸久等日本三名高级军官和两名苏联外交官。但由于日本是战败国，在对苏联的反间谍工作上总体还是缺乏力度，而克格勃在日本一直极为活跃。

1991年苏联瓦解后，日本感到可以抬头了。因为日本不仅在

经济实力上远远超过了俄罗斯，即使在军费开支上也一跃而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国，军人的人均军费还居世界第一。所以，日本一直气势汹汹地要求俄罗斯归还被前苏联占领的北方四岛。1992年9月，原定叶利钦总统访问日本，日本准备在谈判中持强硬态度压压俄罗斯。结果，叶利钦推迟访问。

在这件事情背后，日本发现俄罗斯情报机构在做手脚，而且对日本态度非常强硬。为此，日本的反间谍机关法务省公安部起草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与俄罗斯政治、经济形势混乱大相径庭的是，该国情报机构正在不断地加强对日活动，这次叶利钦推迟访问日本是情报机构干预的结果。今后，在是否归还北方领土问题上，情报机构的影响力还会进一步增强。

日本法务省公安部的报告说，正当俄罗斯国内的保守势力反对归还北方领土的论调高涨之时，俄对外情报局内部也坚持应该重新研究叶利钦访日问题。该局头目普里马科夫还曾劝说叶利钦延迟访日。另外，在宣布叶利钦推迟访问日本前数日，总统安全局的第一副局长拉托尼科夫曾以日方不允许俄罗斯警卫人员携带武器为由，也劝说叶利钦暂时不要访日。

日本人还说，从目前的情况看，俄罗斯情报机构的在日人员丝毫没有减少的迹象，以使馆工作人员身份来日本的人员中就有许多人是原克格勃的特工。此外，驻日情报机构的规模有所扩大，活动越来越频繁；使馆工作人员对日本的尖端技术产业颇感兴趣，与右翼团体的接触也引人注目。这些，显示出俄罗斯对日情报工作采取了强硬的进攻性姿态。

以色列特赦克格勃特工

1993年3月11日，以色列总统赫尔佐克对前苏联克格勃间谍沙布塔依·卡尔马诺维奇发布特赦令，宣布提前释放他。接着总统办公室发表声明，称赫尔佐克总统是根据俄罗斯政府的要求对卡尔马诺维奇实施特赦的，目的是改善以色列和俄罗斯两国之间的关系，并有助于解决曾接触国家和军事机密的俄罗斯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的问题。但是，因这个间谍案而发生的以色列和美国的波拉德间谍纠纷却还看不到解决希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国际间谍斗争的舞台上，占据老大老二的自然是美国和苏联的情报特工机构，但老三老四应该属于谁，看法就有分歧了。相当多的人士认为，从间谍活动的业绩上看以色列可以充当老三了。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杜勒斯在60年代初就称，以色列特工机构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机构。但是在1963年任以色列中央情报和特殊使命局（摩萨德）局长的亚里夫却“谦虚”地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苏联克格勃才是第一流的，以色列特工机构和英国、法国的特工机构比较，也仅在作战情报上略胜一筹。尽管谦虚，也以老三自居。

以色列特工机构与美国中央情报局通常是密切合作的，与克格勃却经常要来比划几下。摩萨德第一任局长哈雷尔在1956年知道美国正全力获取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也下令要部下进行搜集。结果摩萨德首先从波兰人那里搞到了这份秘密报告，

哈雷尔作为见面礼，送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杜勒斯。

到1961年3月，以色列的国内安全总局（欣贝特）抓住了一位苏联在以色列的间谍伊斯雷尔·贝尔。他曾是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的军事顾问，并且是一位有国际声望、造诣很深的军事理论家和公认的以色列军事史学家。他自1953年以来，一直把以色列国防部的机密文件带回家，直到八年后，欣贝特的特工人员看见他在街上和苏联外交人员交换公文包时逮捕了他。贝尔承认拿过许多有关以色列的军事基地、核研究和外国武器供应方面的机密情报给克格勃。

在此以前，以色列还在外交部内逮捕了一名叫齐耶夫·阿夫尼的苏联间谍，他曾在以色列驻比利时、希腊、南斯拉夫等国的大使馆工作过，而实际上他是一名老资格的格鲁乌特工。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阿夫尼就是格鲁乌布建在瑞士的情报网成员之一。战后，他冒充欧洲难民来到了以色列，并把获取的大量军事和政治、经济情报提供给格鲁乌总部。1956年他被逮捕，并在狱中呆了14年。此案直到1991年4月10日才由以色列《新消息报》首次公布。

以色列通过战争和特工交还等各种手段经常得到苏联的各种飞机、导弹和坦克等军事装备，除自己进行研究外，还常常把这些装备送给美国人进行研究。这使苏联恨得咬牙切齿。克格勃后来想，美国人可以利用以色列来掌握苏联的军事机密，它也可以利用以色列来掌握美国的军事机密，还可以破坏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这是真一石三鸟的妙计了，也只有克格勃才有这么高水平的谋略。

1971年，就是开头提到被特赦的那位卡尔马诺维奇从苏联移居到以色列时，他才25岁。受过良好教育的卡尔马诺维奇到以色列后，在一家外国公司工作，交际甚广。交际活动中，他常把自己装扮成以色列摩萨德的间谍，并以此名义同美国海军情报局的

情报分析员乔纳森·波拉德建立了关系。波拉德也是犹太人，有着强烈的民族感情，非常同情以色列，他先后将 1000 多份秘密文件拿给他自以为是“摩萨德特工”的卡尔马诺维奇。当然，因为波拉德的冒险犯难，卡尔马诺维奇也给了波拉德 4.5 万美元的报酬。结果，到 1985 年 11 月 21 日，美国联邦调查局以间谍罪将波拉德逮捕。第二天，他的妻子安妮·波拉德也被收监，她的罪名是“间谍同谋”，是间谍活动的助手。当波拉德复制和传递情报时，安妮就为他放哨把风，及时发出“危险警报”，波拉德被捕的当天，安妮还企图销毁罪证。

波拉德被捕后，深信自己是在为以色列提供情报，完全没有料到这些情报都被送到了克格勃总部。以色列摩萨德和政府更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当时的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只好一面向“美国朋友”表示歉意，一面命令特工部门立即查清情况报告上来。最后终于发现，原来是克格勃搞了鬼，并在 1987 年 12 月把卡尔马诺维奇逮捕起来。

以色列对犹太人总是格外开恩，所以在 1988 年对卡尔马诺维奇只判了十年徒刑，并在 1993 年提前三年零九个月释放了他。但波拉德可惨啦，他妻子虽然只判了五年，可他在 1987 年自己 33 岁时被判处了“终身监禁”。美国的犹太人团体和以色列的领导多次请美国总统能特赦波拉德，但当时的里根总统和布什总统都一口拒绝了。

1993 年，以色列特赦了卡尔马诺维奇后，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拉宾就几次请求克林顿总统能考虑重新审理波拉德一案。克林顿在 1993 年 12 月指示美国司法部专门研究，并提出具体处理意见。该部副部长海曼在 1994 年 2 月自己离职前提出了一个在终身监禁和特赦之间的折中方案：改判有期徒刑 20 年。但司法部的女部长雷诺在调阅了波拉德一案的法律文件后，在 3 月份下结论：“维持原判，继续关押这名间谍。”克林顿也很快接受了雷诺的意见，

决定不对波拉德“施恩”。

克林顿的决定受到了美国包括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在内的联邦情报和执法部门的拥护，它们一直反对向波拉德表示一点点的“怜悯”，坚持决不宽容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

小草绊倒大象

非洲国家在美苏冷战时期常把这句非洲谚语说在口上：大象相争，小草遭殃。意思是美国和苏联在非洲争斗不休，当地人可就遭殃了。冷战结束苏联瓦解后，美国和俄罗斯都压缩了在黑非洲地区的情报站点和特工人数，大象不再在那里相斗了。可是，反过来，有时小草也会把大象绊一下。

1995年5月，美国《新俄罗斯言论报》报道，1994年俄联邦反间谍局破获了22起俄罗斯公民为外国情报机构充当间谍的案件，其中之一的“古尔吉扬茨间谍案”，其主角就是被非洲津巴布韦招募为间谍的俄罗斯人。真有点虎落平阳被犬欺的味道。

弗拉基米尔·古尔吉扬茨，1936年生，1991年任俄罗斯民航局驻津巴布韦办事处工作人员时，被俄罗斯的“友好国家”津巴布韦情报机构招募为间谍。1993年8月，他就多次与津巴布韦情报机构秘密接触，提供了不少情报，包括秘密情报，如以各种身份潜伏在津巴布韦的俄罗斯情报人员的名单。

与此同时，古尔吉扬茨对自己不高的职位和微薄的收入不满足，便违反规定，背着领导私下经商。这样的所作所为自然引起

上司对他的不满，他就反咬一口，来个恶人先告状。他和津巴布韦情报机构串通好后，向俄联邦反间谍局诬告他的上司为津巴布韦充当间谍。想以此陷害他的上司，继后由他来取而代之。

1994年初，俄罗斯联邦反间谍局对“古尔吉扬茨间谍案”进行侦查。4月，反间谍局将案卷提交军事检察院。同时，反间谍局将古尔吉扬茨在其莫斯科的住所逮捕归案。他没有提出任何问题，顺从地跟随执法人员进入卢比扬卡监狱。在第一次预审时，古尔吉扬茨就承认自己有罪，说他向津巴布韦情报机关提供情报，动机是为了摆脱上司而能求助于外国情报机关。当然，他也得到了津巴布韦情报机关给的不少酬金，在搜查其住所时发现了1万多美元。

1994年8月，军事检察院向莫斯科军区军事法庭提起公诉。1995年初，军事法庭以从事间谍活动的叛国罪罪名，判处古尔吉扬茨有期徒刑八年。

第十六章

风起云涌 狼烟四起

俄罗斯在过去是由独裁专制的沙皇统治的，在苏联时期又实行一党专政，一些民族问题、个人自由问题通常都由安全特工机构用高压手段压住了。苏联一瓦解，俄罗斯自认为要向西方文明看齐，努力建立政治民主化、经济私有化的制度。结果在这几年，整个社会陷入了相当严重的无序状态。

像政治上的动荡和经济上的混乱，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后，应该会走向稳定和繁荣。这在欧洲的近现代历史上是有大量的先例可以证明的。就从最近二三十年前西班牙、葡萄牙看，或从更近的这几年东德、捷克、匈牙利、波兰看，都是这样。

但俄罗斯还有不同于这上述这些国家的特点，即它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幅员辽阔，民族众多，这就会引发它特有的矛盾。

俄罗斯和前苏联一样，仍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有100多个民族。更重要的是，在这块广袤土地上的“民族博物馆”内，积聚着太多的矛盾，就像活火山一样，随时可能爆发一下，从而危及俄罗斯联邦的安全。

前面讲到过的车臣情况，还有和车臣邻近的印古什，情形也

差不多。他们一起早在 18 世纪 80 年代就在苏莱曼教长的领导下反对过沙皇俄国的统治。到 1834 年至 1864 年，又在什叶派穆斯林首领伊玛姆沙米尔领导下，建立过伊斯兰教长国。苏联成立后，因肃反问题、农业集体化问题在那里都发生过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四五十年代还一度成立了“起义者联军总司令部”。90 年代俄罗斯对车臣的战争，只不过是这种长期不稳定关系的继续。但“给”车臣独立，连俄罗斯自由派的报纸《独立报》也认为将后患无穷。首先是打开了北高加索一系列民族独立的“潘多拉匣子”，印古什、达吉斯坦、奥塞梯等地区都会脱离莫斯科。苏联瓦解，外高加索出去了，现在北高加索又出去的话，俄罗斯就完全离开了高加索地区。而那里有着世界上最大的有待开发的里海石油资源，和俄罗斯可以通过车臣控制的输油管道。丢失了这些，要损害到整个国家的综合国力。

所以，即使明的不行，暗的也要控制。1994 年 5 月，俄联邦反间谍局局长斯捷帕申在前往北高加索进行指挥布建情报网的工作后，对俄罗斯《消息报》说，如果没有情报网，就无法巩固地方上的安全机构，此外，即使从莫斯科再派 1000 名专家，没有情报网的支持，也无法开展工作。他特别提到了车臣的教训，他说 1992 年安全部没有做到这一点，使总统失去了在武装冲突发生前实行戒严的可能性。

此外，俄罗斯还有一个有 360 多万人的鞑靼共和国，在 1992 年 3 月 22 日经全民公决，有 61% 的人赞成独立，只是还没有宣布退出俄罗斯联邦。俄罗斯境内的近 200 万居住了 200 多年日耳曼人也嚷着要回德国，他们在卫国战争中被赶出了伏尔加日耳曼自治州，现在俄罗斯虽同意恢复该自治州，但自治的条件已不能满足日耳曼人的愿望了；这是人心的分裂。布里雅特自治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势力也在抬头，成立了布里雅特蒙古人民党，该党公开要求把俄罗斯的布里雅特、伊尔库茨克州和蒙古合并而脱离出去。

还有一些小小的但自然资源丰富的自治共和国，如巴什基尔、科米、雅库特也在争经济主权的同时朝着独立方向发展。俄罗斯的少数民族自治共和国加在一起，人口在1300万以上，占俄总人口的9%，但领土面积有496万多平方公里，占俄总面积的28%，如果真的脱离了俄罗斯，那俄罗斯的世界大国地位就难保了。

更为危险的是，在俄罗斯本民族中也有一些分裂主义的苗头。由于俄罗斯从东到西横跨欧亚大陆，长约1万多公里，跨越10个时区，自然环境千差万别，形成了多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和行政区域。在苏联解体和俄罗斯中央政权对地方领导能力削弱的情况下，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出现了一些脱离莫斯科、要求加强地方自治的痕迹。至于是否会像当年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一样脱离英国，这也很难说。

所以，1994年5月26日，叶利钦总统在俄罗斯联邦反间谍局会议上强调：“不可能有下诺夫哥罗德反间谍局或滨海边疆区反间谍局，我们只有一个反间谍局——俄罗斯反间谍局。它是在严格的等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与地方权力机关无关。根据宪法，它归俄罗斯总统管辖。”叶利钦可不想犯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允许各加盟共和国建立自己的克格勃。当然，戈氏可能也是迫不得已，就像叶利钦控制不住车臣一样。

恐怖活动 层出不穷

这里讲的恐怖活动就是恐怖主义活动，也就是带有政治目的

的暴力活动。这种暴力活动不是战争，也不是街头暴乱，而是一种包括劫持载有旅客的飞机车船、绑架、纵火、爆炸、暗杀、投毒等的暴力活动。这些活动从形式上看与普通刑事犯罪并无多大区别，但其背后都有着强烈的政治目的或与政治问题有牵连。

1992年7月24日，俄罗斯国家安全部社会联络中心主任契尔年科说，近年来俄罗斯共发生了100多起恐怖主义活动的事件，其中25起是针对公职人员和政府代表的。这100多起恐怖事件绝大多数迄今还没有侦破。为了与这类犯罪活动作斗争，俄罗斯国家安全部最近成立了“反恐怖主义局”，该局把在国家安全部工作的前克格勃反恐怖专家集中起来使用，这些人包括研究分析人员、反间谍人员和突击队员。反恐怖主义局在工作中将与外国专门机构保持联系和进行合作，并吸取外国同行的经验。

契尔年科还介绍了成立不久的反恐怖局工作人员与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密切配合，首次完成了一次解救被绑架的外国人的重大行动。他说，这一绑架若干名外国人的事件发生在俄罗斯的境内，绑架者要求支付100万美元的赎金以换取人质的获释。虽然俄罗斯政府没有对这次行动进行宣传和夸耀，但这确实是首次合作便获得了成功，而且通过这次合作，两国专门机构之间产生了好感。

但在俄罗斯，这种成功行动太少了。据新加坡《联合早报》1994年12月报道，被称为“第四权力”（相对于行政、立法和司法而言）的俄罗斯新闻界，在1994年2月至10月间共有12名新闻工作者被杀身亡，20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恫吓、威胁、武力攻击和非法逮捕。奇怪的是俄联邦特工当局对这些恐怖事件的犯案凶手竟诡称无从捉拿，或即使捉到也不审判定罪。这说明恐怖事件的政治背景太复杂了。

1994年10月17日，发生了一起《莫斯科共青团报》记者霍洛多夫被预谋放在一个包裹里的炸弹炸死的事件。种种迹象表明，

这显然是一起高层策划的残酷的政治谋杀事件。27 岁的霍洛多夫之死，是与他调查俄罗斯西部军团的贪赃、非法产业、军火交易以及专业化军事中心给黑手党训练杀手等涉及军队高层官员的事件有关。他发表的文章不仅没有一篇得到官方的反应，反而时常接到匿名电话和恐吓信，但他并未因此罢手。这次被炸死前，他已准备好了材料，要在国防委员会主席提议召开的会议上谈西部军团营私舞弊的问题。据霍洛多夫的同事回忆说，是俄罗斯联邦反间谍局的人打电话给他，称又有一份有关西部军团内部军火交易的文件。但霍氏取回编辑室的“文件”，却是里面放有相当于 200 克的三硝基甲苯爆炸力的炸弹，威力极强。当他拆开“文件”包裹时，炸弹爆炸，他在去医院抢救的途中死去。

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报》主编古瑟夫指出，这是对新闻工作者的政治性谋杀，他们要杀死敢说真话的人。那些染指贪赃受贿、非法军火交易的官员们，企图消灭真理和俄罗斯的言论自由。霍洛多夫准备公布于众的资料中，揭露了俄军财富的去向和因此而自肥的人，其提供的线索更涉及到俄联邦反间谍局和前西部军团司令、现国防部长格拉乔夫。霍洛多夫是在俄罗斯权势阶层掀起一股反对“第四权力”的恶浪中被杀的。这股恶浪非常嚣张，他们认为“第四权力”妨碍了他们依仗权势不择手段地聚敛国家财富。像霍洛多夫这样不肯驯服的新闻工作者，当然更是当权者的头号敌人，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

1996 年 11 月 10 日，莫斯科南部的科利亚公墓发生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爆炸，13 人被当场炸死，26 人受伤。爆炸发生在 11 时 35 分，当时有 150 人正在参加悼念原阿富汗战争伤残人基金会主席、1994 年 11 月 10 日在其住宅的电梯处被凶手安放的炸弹炸死的利霍杰伊的活动。正当悼念活动有条不紊地进行时，藏在一张摆放食品的桌子底下的炸弹突然发生了爆炸。被炸死的人中有现任阿富汗伤残人基金会主席特拉希罗夫、利霍杰伊的遗孀及他的

一些生前好友。根据对现场爆炸物残片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爆炸是由装有 2 至 5 公斤炸药的可控爆炸装置引起的，并在现场发现了通向爆炸装置的 60 米长的双芯电缆。

对于这次恐怖事件的侦破行动无论是在果敢程度和规模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谴责这种恐怖主义行径并认为是对警方的“挑衅”（11 月 10 日为俄“民警节”），因心脏手术而正在康复中的叶利钦总统也下令彻底查办此案，内务部部长库利科夫亲自负责追查凶手。俄联邦安全局的左林上校说，该基金会的两个敌对派系两年来冲突不断，因此本案可能是涉及两个敌对派系的仇杀事件。莫斯科回声电台说，另一个派系的首脑特拉契科夫最近遭对方派系的伏击，身受重任，这次爆炸案可能和此次伏击有关。

反恐怖之战 愈演愈烈

上述恐怖活动和因车臣战争而引发的恐怖活动相比，还算是小的。车臣要求独立，但被俄罗斯各强力部门的部队用优势火力打垮后，就改变策略，一是在车臣境内打游击战，一是到俄罗斯国内搞恐怖袭击活动。

其实，早在 1994 年初到同年 12 月 11 日俄罗斯对车臣用兵前，俄北高加索地区的矿水城附近就发生了类似的四次劫持人质事件，以转移俄对车臣问题的注意力。在 7 月 28 日发生的第四次事件就是这样的，四名车臣恐怖分子用手枪和手榴弹武装了自己，

不动声色地混在乘客中上了一辆长途公共汽车。当汽车开到矿水城机场附近时，他们突然戴上假面具，亮出手枪，命令司机不准打开车门。恐怖分子派出两名女乘客，去向当地政府提出要求：要求释放在5月底发生的同一类型的劫持案的罪犯，支付1500万美元的赎金，并提供两架配有驾驶员的直升飞机。

谈判一开始，俄罗斯就在矿水城机场成立了反劫持和营救人质指挥部，由内务部副部长兼内卫部队司令库利科夫中将（后任内务部长）负责，并向当地调动了内务部指挥的“信号旗”特种部队。矿水城的安全和内务机关动员了一切力量，将机场团团包围。7月29日凌晨3时，车臣恐怖分子与斯塔夫罗波夫边疆区政府代表的谈判结束，其要求表面上基本得到“满足”。俄罗斯中央银行行长格拉先科立即筹集了款项，当局派出了一架直升飞机，四名恐怖分子押了十名人质一起上了飞机。

凌晨3时6分，正当直升飞机要起飞时，“信号旗”特种部队发动了进攻。这时一名恐怖分子在机舱内拉响了一枚手榴弹，飞机顿时燃起大火。尽管及时采取了灭火措施，飞机还是被全部烧毁，五名女人质被炸死，五名特种部队成员被炸伤或受枪伤，一名恐怖分子也被炸死，其他均被制服。

车臣战争开始半年多后，即1996年6月14日，车臣战地指挥官、35岁的巴萨耶夫带领一批武装分子冲进了俄罗斯南部的布琼诺夫斯克市，一路上用自动武器和榴弹发射器进行扫射和轰击，至少有40名俄罗斯警察和军人被打死。他们占领了一所医院，扣押了2000名人质，并要求举行记者招待会。当俄安全官员企图阻止记者前往时，巴萨耶夫毫不犹豫地处死了五名人质。他对记者们说，他们不是匪徒，在这场争取独立的战争中，他有11位亲属被俄军打死了，他要在俄开辟一条新的战线。他还说，他本来想到莫斯科去打一下。

这是世界上首次罕见的大规模劫持人质事件，俄罗斯只好出动最精锐的“阿尔法”反恐怖突击队，向巴萨耶夫的队伍发起进攻。接受任务后，“阿尔法”突击队立即对医院作了全面侦察，发现主楼和车库、洗衣部、传染病部及外伤急救部等副楼之间是大片空旷地。这对于进攻方来说很不利，将完全暴露在敌人的交叉火力网之下，况且巴萨耶夫分子还在主楼周围埋下了不少地雷。主楼本身是一幢结构坚实的砖楼，里面有上百名恐怖分子和上千名人质，底楼窗户全部有铁栅栏，难以进入，只能从二楼进去。当时，“阿尔法”突击队负责人古谢夫表示，强攻很困难，会造成人质和突击队员的很大伤亡，因为无法同时消灭上百名在不同房间内的恐怖分子，剩下的恐怖分子必然会屠杀人质；而且突击队员考虑到楼内上千名的人质的安全，也无法充分发挥火力作用和作战技术。

然而，俄内务部副部长叶戈罗夫上将还是命令“阿尔法”突击队强攻主楼，其他各部队配合进攻副楼。6月17日凌晨5时，各路突击队同时发动攻击，当“阿尔法”突击队进入主楼周围的空旷地时，果然遭到了巴萨耶夫分子用轻重机枪、冲锋枪、火箭筒组成的交叉火力网的拦截。冲在最前面的弗·索罗沃夫被恐怖分子用火力把他同战友们隔开了，他就独自同恐怖分子进行激烈对射，战斗中两颗子弹击中了他的手，匍伏在地的他想侧身包扎时，又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背部，索罗沃夫成了第一个牺牲者。德里亚宾斯基是二年前从莫斯科高等军事指挥学院毕业的神枪手，他用一秒钟击毙一个车臣战斗队员的速度连续消灭了十多个窗口的敌人，掩护了战友们的疏散隐蔽，但他自己却遭到了恐怖分子密集火力的进攻而不幸中弹牺牲。

想通过进攻医院附属食堂来攻入大楼的“阿尔法”第五小分队，恐怖分子向他们投掷了大量的手榴弹，但他们凭借高超的军

事技能居然一一躲开，奇迹般没有遭到任何伤亡。此时如果有强大的火力支援，他们就能够冲入大楼。但原定的装有 30 毫米机关炮的步兵战车却不知为何姗姗来迟，突击队员无法展开攻击。为了掩护战友们的进攻，“阿尔法”的突击手们冲出了隐蔽部，也来到了空旷地，以便抵近大楼而向恐怖分子射击。他们中的德·布尔贾夫就这样立刻牺牲了。

盼望中的步兵战车和装甲车终于开到了，机关炮的猛烈扫射立即使恐怖分子的气焰受到了压制。突击队员们又从各个方向向主楼发起了猛攻。一度攻入了大楼底层，解救出 100 名人质。伤亡重大的恐怖分子眼看大楼即将被攻陷，一边开始屠杀部分人质，一边把许多人质推到窗口和门口作为肉盾。对此情形，“阿尔法”突击队员只能停止进攻。

从凌晨 5 时至上午 9 时，“阿尔法”突击队进行了四个小时的战斗，消灭了巴萨耶夫战斗队员数十人，自己牺牲三人，其余突击队员也大都负伤。后来，俄政府授权斯塔夫罗波尔内务局局长麦德韦季茨科夫中将负责进行谈判，在基本上同意了车臣人要求停止在车臣的战斗的条件后，巴萨耶夫武装分子押了 100 多名人质返回车臣，随后释放了他们。“布琼诺夫斯克人质危机”终于降下帷幕，共有 100 多名平民在此次事件中丧生。

事后，俄罗斯舆论界一些人指责说，“阿尔法”突击队明知不能以强攻结束危机，为什么还要强攻，造成那么多的伤亡？“阿尔法”突击队负责人表示，“阿尔法”在事前已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但最后决定是政府下的，“阿尔法”只能尽可能好地去完成任务。况且从军事上看强攻是成功的，自己阵亡三人，却击毙了数十名匪徒，说明了突击队员们有高超的军事技能，如果不是恐怖分子使出人质肉盾招数，他们就能攻克主楼。而且，世界上还没有一支突击队同时与上百名恐怖分子进行过战斗。但如果也像通常的

恐怖事件只有几名匪徒的话，“阿尔法”仅需几分钟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最后，这位“阿尔法”的指挥官对这次行动打了三分，以示及格。

到1996年1月8日深夜，车臣领导人杜达耶夫的女婿拉杜耶夫带领250名武装分子，潜入俄罗斯境内的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的基兹利尔市，又劫持了2000多名人质。1月10日，这股恐怖分子挟持百余人质回窜时，被俄罗斯内卫部队和正规军包围在临近车臣的五一镇。经过一周的战斗，俄军救出了80余人质，打死150余名恐怖分子，俘虏了20名。俄罗斯部队和人质也有不少伤亡。其余70名武装分子在拉杜耶夫带领下劫持少数人质仓皇逃遁了。愤怒的俄罗斯人最后设计炸死了杜达耶夫。

在俄罗斯反恐怖之战中，内务部内卫部队起了很大的作用。内卫部队的历史悠久，它是1811年俄罗斯帝国亚历山大一世皇帝颁布命令而成立的。内卫部队的主要职能是镇压国内暴乱，这项职能一直没有改变。1991年10月，叶利钦总统规定内卫部队的任务是：帮助护法机关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紧急状态的法律制度；保护特别重要的国家设施，包括核动力综合体和劳改机构；依据国家军事学说参加保卫国家领土。内卫部队有近28万人，五所干部学校。它在清剿车臣反叛分子的战斗中，曾先后击毁和缴获坦克116辆，装甲运输车160多辆，大炮336门，消灭战斗人员1.4万名。

但车臣始终没有停止大规模的再加上持续不断的小规模的恐怖袭击。最终俄罗斯只好让反叛分子、杜达耶夫原来的参谋长马斯哈多夫重新在车臣掌权了事。

黑手党肆意横行

亚洲从事有组织犯罪活动的团体，人们一般称其为黑社会；对欧洲进行有组织犯罪的团体，人们通常称其为黑手党。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自然是意大利西西里黑手党了。但现在俄罗斯黑手党则有后来居上之势。

俄罗斯《消息报》在1995年9月的一篇分析俄罗斯黑手党产生和发展的背景文章中说，苏联解体和随之而来的改革使国家作用削弱。管理权的分散和强力特工机构的改变，导致社会治安能力削弱和犯罪数量增加。法律不完备而为犯罪的发展提供条件：俄罗斯至今还没有处罚洗钱活动的法律条文；拒绝归还贷款者很少被认为是犯罪行为；至今没有任何法律对付进入国内的窃听设备的“专门技术”。对保存和买卖武器的监督很薄弱。登记在册的私有枪支有300万支，未登记的多出几倍。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暴力组织开始迅速发展，组织结构复杂化，武器商业化，作案国际化。俄罗斯黑手党就是这样的暴力组织。

军队、内务部和克格勃的干部大量流失，有的成为黑手党的主要成员，一些阿富汗回来的士兵和国家执法机关的退伍军官也壮大了黑手党的队伍。有些商业机构利用黑手党保护财产，也促进了黑手党的发展。争夺生存权，扩大影响，黑手党更加职业化。黑手党还对商业机构施压，定期向他们收取“贡赋”，同时“保护”该机构不受同行的侵犯。据俄罗斯内务部的统计，现在各种

犯罪组织对 50% 的经营管理部门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黑手党分子获得收入的传统领域是毒品、武器贸易、赌博和讹诈。近年来他们还从事放射性材料的交易，盗窃核工艺以及铀、钚等材料，这样的集团犯罪分子被称为“核黑手党”。

波尔·泰捷姆是一位出生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商人，1989 年他 35 岁时来到莫斯科经商，成立了一家“美国人”公司。他在考察了当地的环境后，决定与“莱吉松”公司合作，在莫斯科建立一座信誉良好的宾馆和一个现代化商业中心。泰捷姆作为营建宾馆的合作伙伴，当时持有 40% 的股份，另有 10% 属于那家俄方的公司，余下的 50% 属莫斯科市。到 1994 年，一个属于臣车黑手党的名叫贾勃拉伊洛夫的人控制了新建的宾馆，泰捷姆陷于艰难境地。他向莫斯科市长和美国联邦调查局驻莫斯科办事处求援，并说宾馆里有车臣黑手党在活动。但泰捷姆的行动是以鸡蛋碰石头。1996 年 11 月 3 日，他接到一个约会电话后，就带上两名保镖来到约定的莫斯科中心的“基辅”地铁站门口，这时一个身穿黑色开司米大衣、手持卡拉什尼科夫手枪的男子，对着泰捷姆连发两梭子弹。这时一位过路人高喊“黑手党”，只见凶手迅速钻进一辆停在附近的“日古力-9”汽车，逃之夭夭了。

泰捷姆被枪杀后，美国国务院呼吁俄方用最积极的措施查办凶手。俄罗斯内务部长库利科夫开始每天两次听取有关调查进程的汇报，并表示俄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缉拿罪犯。但这位部长承认，每十起雇佣杀人案中只有一起能破，而 1996 年俄有 450 人被雇佣杀手所杀。这也可以看出，尽管俄内务部设有专门反对黑手党活动的反有组织犯罪总局，但作用不大。

另外，在俄罗斯愿意充当黑手党等的杀手的人也不少。这些杀手还有三个等级。一是低级杀手，他们主要是由 20~35 岁的年轻人组成，一般经过特殊训练，在空降兵部队、内务部特种部队和边防部队服过役，用来谋杀二流企业家，佣金 2000~7000 美元

不等；二是中级杀手，他们通常是克格勃、内务部和国防部的退役军官，都是军事训练方面的专家，具有从事恐怖活动的心理和精神素质，是“奉公守法的公民”，找不出任何犯罪记录，一次行动的佣金在1~4万美元之间；三是俄联邦司法机关所谓的“超级单干户”，这些高级杀手都是来自前克格勃和国防部等特工部门的间谍分子，有着丰富的秘密工作经验，他们下手的对象是银行、大公司、合资企业和犯罪界的头面人物，一次行动的佣金高达10~20万美元。1995年8月，俄罗斯某银行行长在办公室被暗杀。临死前，呈现出异常痛苦状，剧烈头痛、泪流不止。调查后证实，此次暗杀工具系放射性武器。如此高明的暗杀，自然是由高级杀手所为了。

对此，俄罗斯在1997年初首次颁布了《枪械法》。该法允许公民使用瓦斯枪和燃烧弹来保卫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但严禁公民擅自收藏流传广泛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和马卡罗夫手枪等武器。对于《枪械法》的颁布，俄联邦安全局局长科瓦廖夫认为还不够，对黑手党的活动，还需另谋对策。据统计，俄罗斯的人均武器占有率，大大超过了欧洲其他国家，不久可能会赶上美国。

俄罗斯黑手党还企图大力打进国会等各级立法机构，议员豁免权是他们追逐的主要目标，另外也可营造起一个政治保护网，以便为黑手党利益服务。俄罗斯副总检察长盖达诺夫说，已有150多人因为是国家 and 地方议会的议员而被免于起诉，他们当中有好几个人被控犯有谋杀罪。1995年10月，国家杜马议员候选人盖达尔的竞选办公室负责人博克瑟预计说，新杜马中有10%的黑手党党徒。对黑社会深有体会的台湾的《中国时报》说，如果黑手党在俄大选中不断获胜，到时俄罗斯恐怕要举国以犯罪为业了。

俄罗斯黑手党在国内猖獗活动的同时，还向海外扩张势力。据香港《南北极》杂志1995年10月报道，目前一个以莫斯科为大

本营的俄罗斯新黑手党，已经在对前苏联时期移居海外并发迹多年的白领地下组织开展了“强夺地盘”行动，这些组织活动范围包括美国、比利时、以色列等。新一代的俄罗斯黑手党喜欢搞大买卖，如贩毒、贩卖核原料和洗黑钱等。他们行动快捷，潜力巨大，无孔不入，以俄罗斯官方力量为后盾，实施全球策略，其人力物力总有一天会使西西里黑手党同它比起来如同小巫见大巫。1995年6月，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自1991年就被任命为美国方面俄罗斯黑手党社会最高头头的伊万科夫，罪名是勒索等多种罪行。联邦调查局局长弗里说，俄罗斯黑手党是个“越洲敌人”，逮捕伊万科夫非常重要，一定要在其势力未强大起来前先把 he 抓起来。

俄罗斯黑手党能大量繁殖滋生，直接原因是执法机构自身腐败，打击不力。为此，俄罗斯内务部于1996年在其内部设立了一个自身安全局，用来查处黑手党向内务机关渗透的情况，以及揭发同黑手党有联系的工作人员。俄内务部自身安全局局长戈利岑少将在1997年5月说，该局成立一年来，在内务部揭发出来的利用职务之便犯罪的人数增加了四分之一。因背叛本部门利益、同犯罪集团有联系和其他违法问题，而在1996年被内务部开除的工作人员有21347名，另有404名因受贿而受到刑事和纪律处分。

第十七章

政要们的护墙

鉴于国内安全局势的恶化，俄罗斯对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等的保卫工作是非常周密的。总统的保卫由总统安全局负责，叶利钦总统出行，总统安全局的保卫工作是分级展开的：第一级，即最低一级叫“树后保镖”，这些人保障叶利钦在路上的安全；第二级叫“窗下保镖”，他们负责叶利钦住所和别墅的安全；第三级叫“楼梯保镖”，他们负责近处警卫；第四级叫“贴身保镖”，他们几乎寸步不离被保护人。

除了负责总统出行的保镖外，总统还有随从保镖。这是几个私人保镖，他们几乎时刻陪伴在总统身边。比如，在叶利钦总统会见来访的国家元首时，在出席宴会时，甚至在非官方的场合时，都是这样。但是当叶利钦和总统助手们，或者和总理单独会见时，任何保镖都不让在场了。

对总统及其家属以外的政要人物的保卫，就是俄联邦保卫局的职责了。俄联邦保卫局，现在人数在 5000 人左右。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从保卫列宁等领袖的拉脱维亚射手队开始，中间经过“斯大林卫队”、克格勃第九局、俄联邦保卫总局（1996 年以前

名称)。按照俄罗斯有关法律，政府总理、国家杜马（下院）和联邦委员会（上院）主席、最高法院、宪法法院和仲裁法院的院长，都要由联邦保卫局实施国家级的保卫。

除此以外，一些重要机构和场所也要联邦保卫局实施保卫工作，并要处理一些突然发生的影响领导人安全的事变。所以它必须是一个强有力的、高效能的特工机构。在它机构最庞大的时候，包括了总统卫队（前克里姆林宫团）、原克格勃警备局机关、“阿尔法”突击队、还有第 118 伞兵团和第 27 特种摩托化步兵旅。现在联邦保卫局的军官还和上述特种部队保持联系，一有情况便可以及时调动指挥它们。

由于总统安全局和联邦保卫局尽心尽力地工作，它们所承担的保卫对象至今没有出现大的事故，这是极其不容易的。曾任过克格勃警备局局长的韦利奇科在俄《劳动报》上撰文分析道，俄罗斯领导人的安全保卫工作的形势是很严峻的。在莫斯科周围的恐怖组织，有的有无后坐力炮，有的有火箭筒，有的还有无线电遥控的反坦克导弹，简直防不胜防。而且，现在俄罗斯的恐怖分子既有欧洲式的也有亚洲式的，前者在行动中运用高科技力求全身而退，后者持“与汝偕亡”的狂热姿态。最著名的暗杀拉·甘地的恐怖分子，就是亚洲式的，无论印度总理还是恐怖分子本人都被炸得血肉横飞。

苏联成立初期，领导人遇险的事也多次发生过。列宁二次遇刺，主要就是当年担任保卫克里姆林宫的拉脱维亚射手队经验不足。据说在 1919 年 1 月，列宁的汽车遭到匪徒的拦截时，他的贴身保镖兼司机斯捷潘·吉利居然还一手提着一桶牛奶，没有及时亮出武器，很不在行。

到斯大林时期，保镖再也不用拉脱维亚人了，而是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部内的专业特工担任，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负责保卫工作的局机构，有 26 人，局长是著名的西拉弗克少将。当然，

这26人不包括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孔策沃别墅以及其他住处的众多警卫。所有这些人统称为“斯大林卫队”。

而赫鲁晓夫时代，虽然成立了克格勃，但领导人的警卫开始有点松懈。克里姆林宫的大门开放了，安全机构人员大大减少。但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有一天就出事了。当时莫斯科欢迎英雄的宇航员归来，列宁格勒军区的一位叫伊英利的少尉换了一身民警制服，站在克里姆林宫的保罗维茨大门附近。克格勃第九局的特工和封锁交通的民警都没料到会发生任何糟糕的事，每个人都把伊英利当成同类机构的特工。政府的高级轿车刚要驶出克里姆林宫大门，伊英利就开枪射击。结果，他没有打中勃列日涅夫，却射中了宇航员。现在好多俄罗斯人却把伊英利当作反共产主义斗士和民族英雄来赞扬。

戈尔巴乔夫时期，也有一个叫什莫诺夫的人，在红场欲射杀戈氏而引起了轰动。后来，戈尔巴乔夫身边的人，就要求克格勃第九局加强保卫，不能让人随便靠近他。

在俄罗斯，有特工机构保卫的政要人物应该说是有关安全感的。但不够资格的人可就惨啦。1996年6月7日早晨，莫斯科市市长卢日科夫的竞选伙伴、49岁的莫斯科副市长绍齐夫离开公寓去上班。当他走向停在寓所门口的汽车时，汽车突然爆炸，绍齐夫及其夫人和一名随从被炸伤。这是一次破坏总统和市长选举的阴谋，因为6月16日是俄罗斯总统和莫斯科市长的选举日，被炸伤的绍齐夫是卢日科夫市长的竞选伙伴。俄联邦法律规定，市长必须有副市长作为竞选伙伴方能参选，如果绍齐夫死去，卢日科夫的参选就会被破坏，而卢日科夫又是叶利钦的人马。另外，爆炸同样会影响人们对总统选举的投票意愿。恐怖分子不能对总统下手，转而对没有特工保卫的绍齐夫下手了。

俄罗斯保卫特工机构在技术上与美国同行也还有一大段距离。还是在戈尔巴乔夫当总统时，一次他访问美国要参观华盛顿

的杰佛逊纪念碑，碑旁是湖，湖对岸停放着许多汽车。负责保卫工作的克格勃的韦利奇科上校认为得查查汽车里有没有恐怖分子。身边的美国同行马上通过电脑把每辆车的车主情况调了出来，并说如有必要，可以进一步监视车主。韦利奇科在1996年说，俄罗斯还没有这样整套的保卫办案系统。不过，美国保卫特工对苏联、俄罗斯特工人员的素质很是佩服。他们陪同领导人到莫斯科后，常说：“我们简直是来休息的，我们非常信任你们的特工机关，相信你们的办事能力。”

惹人注目的总统卫队

俄罗斯的保卫特工机构如上所述，根据不同的保卫对象，分成了两个部门，一个是总统安全局（1993年12月成为独立机构，1996年6月后又由保卫局主管），一个是联邦保卫局。从级别上看，前者仅是后者一个下属部分，但从重要性上看往往前者还指挥后者。

总统安全局（总人数约1500人）的核心是克里姆林宫的总统卫队，他们一共有10个连，其中第一连负责在克里姆林宫站岗，担任迎接外国领导人的仪仗队，其他九个连的任务都是保密的。第一连原来有项可以给公众观看的警卫任务，它就是从1927年起设立的在红场列宁墓前的1号岗，每天下午3点57分就有从克里姆林宫巴斯塔楼里走出来的换岗的士兵，到4点正，他们就在红场举行闻名于世的换岗仪式。但在1993年10月6日下午，总统卫

队接到了撤销此岗哨的命令，改由总统卫队成员在列宁墓里面进行保卫。

总统卫队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迎接和护送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根据外交礼节，一般的程序是这样的，比如说欢迎美国总统克林顿：叶利钦和克林顿分别沿着克里姆林宫中央楼梯的两边往上走，他们应该在格奥尔基宫的正中会面。总统总统卫队的第一连应站在两边楼梯的台阶上，待总统走近时高喊“敬礼”，同时对总统行注目礼。递交国书的仪式也是如此。

总统卫队的服装有特别的意义。克里姆林宫恢复了古老的传统，因此“被遗忘的遥远的过去”成了新的东西。1995年，总参谋部徽章制服处的专家们提出了一些关于总统卫队穿什么制服的方案，最后俄罗斯制服专家奥列格·帕尔哈耶夫的方案被采纳。他说：“没有对俄罗斯军事象征学的研究未必能提出好的建议。我设计军服的基础是彼得大帝时期的军服。它的每一个部分不仅让人赏心悦目，而且还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新军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高筒军帽。总统卫队的队员戴着这样的帽子显得神采奕奕，总统也非常满意。

1995年，车臣武装头目巴萨耶夫在被他占领的布琼诺夫斯克市扬言，他只需带上几百名手持冲锋枪的士兵就可以攻下克里姆林宫。总统卫队对此不屑一顾：“用坦克还差不多。”但不管怎么说，在这之后一些重型武器被运进了克宫，还加强了里面的岗哨。以前的克里姆林宫只有自动卡宾枪，其余什么也没有。

但后来攻进克里姆林宫的不是巴萨耶夫的战斗队员，而是一位体育爱好者苏尔金。他选择了克宫围墙中最高最陡的一段爬了上去，因为以前从没有人上去过，所以也没有安置信号设备。苏尔金没有借助任何工具就能爬进克里姆林宫，这使总统卫队对克宫进一步加强了防范。不久前，还引进了不寻常的“士兵”，那就是鹰，它们的职责是驱赶乌鸦。因为乌鸦不仅弄脏克宫建筑，发

出难听声音，有一次居然还弄脏了一位贵宾的西装，这使总统卫队不得不考虑招募鹰来“服役”。

总统卫队的队员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每半年由俄联邦安全局、兵役局、地区行政长官和总统卫队军官一起在全国范围内挑选一次，候选人的道德、身体都要求很高。每一个人都必须在原工作和学习单位得到很高的评价，不能有任何犯罪记录。候选人应该刻苦耐劳、身体强壮，身高不低于 1.80 米，脸型要像斯拉夫人。这并不是歧视少数民族，而是因为总统卫队无论在国内和国外都代表着俄罗斯。总统卫队的第一连在每半年一次的挑选中，从几万名志愿者中只录取 36 人，这岂止是百里挑一。可见其严格程度。

保卫局的特种车队

联邦保卫局除了拥有一流的保镖之外，还拥有一流的车队和车手。保卫局的特种车队也有 70 多年的历史，它是 1920 年 12 月 31 日从人民委员会车队分离出来而成为一支独立车队的。几十年来，特种车队虽然几经变易，但总有一点是不变的：为被保卫的人保证用车安全方便。

特种车队的主要任务是为政府要员提供特别规格和安全可靠的轿车。总统和总理要坐“吉尔”牌轿车，这种车在 1996 年的造价是 15 亿卢布一辆，具备防弹性能的车还要贵三倍。其他政要配备中级轿车，即“伏尔加”牌轿车。但是谁都不喜欢这种轿车，特

种车队现在只好购买奔驰—280型和奔驰—300型等轿车，以代替“伏尔加”牌轿车。

特种车队对汽车的要求特高，只要车跑满10万公里或用过十年，都要被淘汰改作他用。汽车一定要人工清洗，保持一尘不染，还要喷洒花露水。在技术上出过故障的车一般来说不能再继续留用，它们的保养标准如同飞机一样严格。

特种车队里的“魔术师般的车手”，确实是一些身手不凡的特殊的人。司机们不希望一般也不可能发生行车事故，然而正是行车事故才能表现出他们高超的驾车技能，他们在紧急情况中就像鱼在水中一样灵活。这一切都来自平时的苦练，每当初寒和降雪之时，他们就开始在光滑的路面上练习驾车的技术。另外，特种车队的司机们还同外国同行高手交流经验、切磋技艺。

特种车队的司机都是俄罗斯保卫局的骨干军官，挑选是非常严格的，能被挑选上那真是没有说的。成为一名超级司机，是必须的起码条件，另外还经常接受职业训练，成为能从事反恐怖行动的司机，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能采取妥善的行动。司机之间没有“等级”的差别，不管是为总统开车，还是为总理或别的什么人开车，工资待遇一律一样，晋升的机会均等。

一个安全保卫特工的自述

俄罗斯《消息报》在1997年2月6日刊登了一篇文章，作者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警卫，他在文章中讲述了作为安全保卫

特工的经历和体会：

1983年我进了克格勃警备局，参与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的保卫工作。这种工作有许许多多的规章制度，但我没有经培训就上岗了，因此只能边干边学，不断积累经验。最难办的是要了解领导人的性格和习惯，认识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与他们和睦相处。一些看起来是鸡毛蒜皮的事，却相当重要。例如，可以与谁说话和不能与谁说话，另外坚决禁止与领导人说话。由保卫小组长制定出访时的保卫计划，根据出访国的危险程度确定警卫人数。

对领导人的每一次出行都要预先作出周密的安排，领导人要到机场，我们就沿途加岗；领导人要看演出，我们就去剧场布置警卫。车队的安全也由我们负责。

最高首长一出轿车，我们就得全神贯注，做好一切准备。哪怕天上掉下石头，也要排除险情。我们最主要的做法是：眼睛不看首长，但要感觉到他的一举一动，监视和控制自己的管区，同时要注意搭档那边的情况。干我们这一行特别要有协作精神，要有集体观念。

安全保卫首先应当善于消除突发事件和种种困难，在特殊训练中学会处理几十种甚至上百种情况。否则，当领导人遭到袭击时，就无法有效地保护他。在出现情况的那一瞬间，就必须作出反应：第一是开枪，第二是使用特制防弹公文夹保护领导人免遭袭击，第三是将领导人带到安全地点。

尽管我们的工作严肃的，但有时也会出现滑稽可笑的事情。一次在华盛顿，两位政治局委员迟迟未从饭店出来。等了10分钟、15分钟，到底出了什么事呢？原来，他们把衬衫交给使馆洗衣房洗，取时拿错了，尺寸完全不同，根本无法穿上。虽然没有出什么大事，但时间安排也就打乱了。

有一天，戈尔巴乔夫的一个亲信对我们头儿说，他觉得总书

记的安全保卫工作比较薄弱，总有一大堆人能上去围着他。我们的负责人说：“这不过是你的感觉而已。”戈尔巴乔夫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一直处在最严密的保卫之中，他身边都是些最好的警卫特工，不曾有过一点闪失。而且他们个个都是神枪手，经常与“阿尔法”特种部队一起训练，甚至模拟在政治局会议上“排除险情”。戈尔巴乔夫大概是最难保护的人。他经常有出人意料的举动，随时随地都可能命令停车，在事先没有安排保护措施的地方下车与人们交谈。他根本不考虑我们的工作，好像与他无关似的。

在难忘的1991年“8.19事件”后，叶利钦开始起用新的保镖。可以看出他们工作很努力，但没有经验，经常出些小差错：不检查照相和摄影器材就放记者进去采访，或有时行动路线选择不当。但他们很快就变成了行家里手。

多年来的安全保卫经验使我认识到，无论保卫谁，准则永远只有一个：宁可保持百倍的警惕，不可有一分的疏忽。

第十八章

昔日特工今何在

由于苏联克格勃和东欧卫星国的特工机构都吸收了社会上最优秀最有才干的精英分子，从事的又是世界一流水平的情报、反间谍和安全保卫工作。所以，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许多人由于种种原因，不再当特工了，但他们要混碗饭吃是绝对不成问题的。条条道路通罗马。

在所有这些路中间，最好最风光的当然是从政。当总统、总理、部长，在这些特工间谍中也有不少。除开俄罗斯不说，像在独联体就有白俄罗斯总统、阿塞拜疆总统、乌克兰外长等好多人，他们还为自己曾是克格勃特工而备感自豪。

克格勃和东欧卫星国的特工间谍在东欧和西欧从政的也有一些，但这些人的原来身份就不能暴露了，一旦暴露往往就身败名裂。这种情况在德国最多，因为西德是把东德吃掉的，有许多东西都能在肚里慢慢消化出来。自从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以来，已经有100多人混迹在政坛高层的前东德国家安全和克格勃的间谍被揭露出来。1993年，一位名叫丽丽·P的39岁的德国女外交官正要出任大使时，被控为前民主德国从事间谍活动而断送了

前程，她是20多年前当学生时就被招募为间谍的。在同年稍早的10月初，另一位叫卡尔·海因茨·罗德的46岁的外交官，也因曾经与东德国家全部合作而被捕。其他国家的具体情况在下面再作介绍。

最坏最危险的就是同黑手党和恐怖组织同流合污，俄罗斯有不少这方面的情况。美国《洞察》周刊在1994年10月31日登过一篇文章，题目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出现了新的恐怖》，专门讲克格勃和它的小兄弟特工机构中的“下岗”特工们与犯罪组织合作给社会带来的危险。文章讲，欧洲国家政府，如波恩、布拉格、布达佩斯和华沙首先害怕对这些特工机构的特工作过分调查，他们的态度是让睡着的狗躺着吧，不要惹麻烦。但不幸的是狗并没有打盹，他们和各种游击组织、毒品恐怖分子、俄罗斯黑手党和一些无法无天的国家等形成了各种联盟关系，在欧洲上演着一场危险而又隐秘的戏，如果西方不小心，戏中的主角就可能对冷战后的格局产生极大的影响。

这篇文章还重点例举了前东德国家全部官员及其高效的中央侦探局国外间谍处的间谍的例子。一位前东德情报官说，1993年秋天，前国家全部的间谍帮助伊朗招募了至少12名、很可能是15名研究化学战的专家，此事受到德国联邦情报局的调查。几个前东德中央侦探局的间谍，包括80年代中期东德驻伦敦情报站站长施瓦格尔，现在成了一名伊朗军火商阿里莫拉迪安驻柏林办事处的办事员。阿里莫拉迪安在两伊战争中曾在东德和伊朗之间贩卖了几百万美元的军火。德国警方消息灵通人士说，有一组前东德中央侦探局的官员被认为正在同一部分乌克兰黑手党合作，专门走私偷运从俄罗斯军械库盗来的小型武器和半自动步枪。美国毒品管制署认为，一小撮前东德国家全部的官员帮助了哥伦比亚卡利毒品卡特尔进行了改组。

但是，应该说，绝大多数的前特工人员，难以走从政的路，但

也没有走犯罪的路，而是走了一些不错的其他道路。他们利用自己的特长，组建保安公司、信息咨询公司，以满足新兴的市场经济的需要，甚至自己经营各种商业生意。一些年老或特工生涯特别丰富的人就写写回忆录，把一些影响、轰动世界的事件的内幕背景交待了出来。还有一些老特工组织了俱乐部，自娱也娱人。

政坛刮起“间谍风”

在苏联、东欧局势大变，情报特工机构改组后，不少精明强干的间谍利用民主政治自由选举的机会开始从政。另外，竞选对手为了击败对方，也明查暗访，看看有谁当过间谍密探，从而一举击倒对方。就这样，在欧洲政坛不时刮起一股“间谍风”，真真假假，吵吵嚷嚷，好不热闹。

1990至1992年，德国几名主要的政治人物因被揭发与东德时期的秘密间谍有关系而被迫下台。在保加利亚，秘密档案曝光的时间通常不早不迟，总能令某些官员陷入困境。罗马尼亚前总统伊利埃斯库也受到过类似的困扰，一份报纸指责他50年代在莫斯科留学期间，被克格勃招募为间谍。实际上罗马尼亚并没有公开当年的国家安全机构的档案，但个别人士的档案却不可避免地被泄露了，从而被一些人利用，以中伤政敌。后来罗马尼亚情报机关主管默古雷亚努深知这类手段的厉害，干脆主动公开自己的档案，以表示与前克格勃等特工机构无丝毫瓜葛，免得别人再道听途说，造谣中伤。

现在，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共产党时期建立的国家安全机构和秘密间谍网，已成为一些“知情者”进行勒索或自我保护的本钱。昔日的东欧共产党间谍的秘密不断地被泄露，涉嫌者往往因此断送仕途，知情者则乘机得利。特别是德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波兰等国的前共产党人士当选上政府官员后，更会经常面对各种莫名其妙的间谍指控。

这方面最有影响的事件，就是所谓波兰“奥莱克西间谍案”。奥莱克西是由前波兰共产党人组成的社会民主党政治家，1995年3月1日出任波兰总理。他刚执政两周，就与团结工会出身的总统瓦文萨合不来，总统扬言将设法使这届政府在一二个月内垮台。但是到1995年11月，总理没有垮台，而瓦文萨却在总统大选中惨败。到12月19日深夜，还有三天就要下台的总统突然向波兰众参两院议长和最高法院院长等人披露，总理是克格勃和俄罗斯情报机构的间谍。瓦文萨还让内务部长米尔恰诺夫斯基把有关材料提交波兰最高军事检察长，要求审理此案。

这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奥莱克西总理在12月20日发表电视讲话，说：“这是一种肮脏的挑衅。一周以前，我被告知，如果我在12月19日辞职，那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而我回答说：‘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不会向这种政治讹诈屈服。’”12月21日，米尔恰诺夫斯基向波兰议会介绍了有关奥莱克西和克格勃及俄罗斯情报机关间谍的关系的情况。这位内务部长说，奥氏自1982年或1983年起，一直与外国间谍保持联系。“1990~1995年，奥莱克西与这位外国间谍多次见面，并在见面时转交了情报，其中有秘密情报和文件”。但波兰总理说，这些材料“大部分”是伪造的，他与外国外交官的接触属于正常的工作关系。据波兰报纸报道，奥莱克西与一个叫阿尔加诺夫的俄罗斯人经常保持联系。此人在1981年到1992年一直在莫斯科驻华沙的大使馆担任一秘，其实是克格勃的成员。波兰特工人员老早就盯上了奥莱克西和阿尔加

诺夫，1994年9月，波兰内务部曾对当时担任众议院议长的奥氏提出过警告，说阿尔加诺夫是俄情报机关的间谍。

波兰右派控制的报纸，还不断传出骇人听闻的消息。1996年1月17日，相当有影响力的《简言》周刊以《大赌博》为题推出特大新闻，透露涉嫌间谍案的不仅有奥莱克西，还有左派社民党的四名领导人，从而把这一政治“围剿”推向高潮。远在莫斯科的俄罗斯间谍阿尔加诺夫也云里雾里散发一些信息。他说，1995年7月，他在西班牙马略卡岛休假时，波兰特工就从他与波兰朋友们的电话中窃听他在休假地的情况。随即，波兰派出著名特工马·扎哈尔斯基到马略卡岛找他，向他搜集包括奥莱克西在内的波兰著名政治活动家的情况。这位波兰来的特工说，波兰特工机构已经掌握了足以使奥莱克西声名狼藉的材料。据说，奥氏向阿尔加诺夫提供的秘密文件里包括了一份波兰国家保卫局起草的报告，内容是有关外国驻波兰秘密情报人员的活动情况。

在“奥莱克西间谍案”审理期间，即1996年1月26日，新当选上的波兰总统接受了奥莱克西及其政府的辞呈，但总理坚持说“他是无辜的”。华沙军事检察院著名侦破间谍专家戈什凯维奇上校带领一批人马，经过三个多月的侦讯，查阅了大量有关证据材料并讯问了所有应该讯问的人，在4月22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奥莱克西是间谍”的最后裁决。戈什凯维奇解释说，波兰国家安全局高级特工扎哈尔斯基在西班牙马略卡岛从俄罗斯间谍阿尔加诺夫那里获取的有关奥莱克西的材料含有多处事实错误，有可能是张冠李戴，而且还给了巨额贿赂。

军事检察院的裁决一公布，随即在波兰政坛引起强烈反响。波兰社民党副主席谢拉科夫斯卡强调“有罪者必究”。她表示社民党将在近期内向议会递交把制造“奥莱克西间谍案”的人推上国务法庭审判台的提案。波兰新总理齐莫谢维奇表示，他将停止国家安全局中直接搞奥莱克西材料的人的工作，但暂不解除他们的职

务。奥莱克西本人向记者发表声明说，我在辞职的时候就说过，我从未背叛过波兰和我的祖国。但前总统瓦文萨认为，在今天搞特权交易的时候，不会有明智的判决。前内务部长米尔恰诺夫斯基说，军事检察院裁决中的许多提法我是不同意的，适当时候我将表态。我不怕坐牢，在共产党执政期间我多次坐牢，在后共产党执政时期我再去坐牢，也毫不奇怪。团结工会、中间派协议会、波兰复兴运动等右派组织和政党领导人也纷纷出来发表谈话，认为检察院的裁决“不公正”、“无根据”、“是共产党压出来的”，强调“奥莱克西间谍案”仍将是政治斗争的目标。

在“奥莱克西间谍案”发生期间，美国报纸说，克林顿政府怀疑俄罗斯新任外长普里马科夫在担任俄对外情报部门负责人期间，策划了一起破坏波兰民主选举，从而使共产党人重新上台的秘密活动。由普里马科夫领导的机构在这些活动中曾向波兰共产党人秘密提供经费，并周密地指导该党如何收买国有企业，并建立新的行业。其结果是，建立起了一个足以击败其他政党的经济王国。奥莱克西就是普里马科夫的重要间谍。美国情报部门还向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汇报了其他前苏联卫星国也有类似俄情报机构在波兰的那种秘密活动，这些国家包括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但是，也有另外的报道说，莫斯科并不喜欢波兰社会民主党，曾授权让其特工阿尔加诺夫以100万美元的价格向波兰情报部门提供有关奥莱克西的材料，达到既除掉人也得到钱的一箭双雕的目的。政坛和谍海的波诡云谲，局外人哪能明白个中奥妙。

到1997年8月，政坛“间谍风”又刮到了欧洲边陲的挪威。正当挪威各政党为即将到来的四年一次的大选进行最后冲刺的时候，挪威最大报纸《世界之路》报披露，现任首相并正在进行连任竞选的工党领导人亚格兰曾是克格勃间谍，是三个“可靠的联络人”中的一个，代号“尤里”。挪威电视台当晚还就此播放了专题节目，一时成为竞选中的爆炸性新闻。

关于“可靠的联络人”及其代号，最早是苏联叛逃者布特科夫在其所写的《克格勃在挪威》一书中公布的。他说，70年代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在挪威有三个“可靠的联络人”，他们的代号分别为“尤里”、“杜丁”和“鲁迪诺夫”。但当时他没有透露代号人的真实姓名。这次《世界之路》报明确指出“尤里”即是亚格兰还是第一次，但它没有说明消息来源。

亚格兰本人对这一消息处之泰然，认为这不会伤害他的竞选活动。他声称70年代和80年代他在工党办公室工作期间，同外国使馆联系很多，特别是同苏联和美国使馆联系更多。他说那些联系只是例行公事，主要是向外国人介绍挪威政治局势，这些事都向工党领导人报告过。此后，政府保安警察局长强调亚格兰与苏联外交官的接触不存在犯罪问题。各政党对此事的评论也很谨慎，只有竞选对手、进步党主席哈根认为，这一消息使亚格兰更不适于担任挪威首相。

克格勃间谍事件虽然没有引起更大的风波，但也被认为是亚格兰在竞选中的一个挫折，因为他在同哈根进行电视辩论之后曾一度占主动，这一事件又使他不得不处于守势。

挪威政坛工党著名人物被说成是克格勃间谍，这已是第二次了。1993年8月，挪威的多家报刊曾经同时连篇累牍地报道了一起“首相夫人间谍案”，这是根据前克格勃将军杜班斯基讲述的情况而来的。据这位克格勃官员讲，挪威那位曾前后执政了16年、把挪威建成全球“福利国家典范”的“现代最伟大的政治家”的夫人费尔娜，居然是被克格勃男性色情间谍“乌鸦”拉下水而成为苏联的一只“鼯鼠”。

费尔娜既是首相夫人，也是工党青年组织的负责人，当她在50年中代率领挪威青年友好代表团访问苏联时，克格勃找了一位长有典型“北极熊”身材的贝尔雅可夫作陪同导游。在一边培养感情的同时，克格勃自导自演了一出“英雄救美人”的戏。他们

假装让两名歹徒袭击正在独自散步的费尔娜，而贝尔雅可夫在关键时刻又突然出现，把歹徒打得抱头鼠窜，费尔娜自然倒在了“救命恩人”的怀里。

挪威青年友好代表团回到奥斯陆后，贝尔雅可夫也以外交官的身份来到挪威，找情人费尔娜约会。而当时坐镇挪威的克格勃将军杜班斯基声称“自己当时的角色和拉皮条的差不多”，不断巧妙地既让两人做爱，同时套取情报，还要不被发现。当时挪威是北约成员国，通过费尔娜，北约的大批战略情报源源不断地流入了苏联手手中。费尔娜为了不失去心上人，甚至让贝尔雅可夫在她丈夫、挪威首相的办公室和官邸内都安装了窃听器。

最后还是贝尔雅可夫的妻子妮娜发现了“事情”不对头，从而愤愤不满，克格勃怕暴露，就结束了这次色情间谍行动。在杜班斯基揭开这段不光彩的往事时，首相和首相夫人都已逝世，所以最尴尬的就是费尔娜的儿子鲁恩了。因为他当时已坐上奥斯陆市议会的首席位置，而且也是工党内活跃的重要角色。当被问及有关对他母亲的“背叛”行为的指控时，鲁恩三缄其口，不作任何评论。但挪威政府的一位发言人对外界表示，费尔娜这位前首相夫人长得漂亮，和丈夫的年龄相差一大截，又担任过挪威工党青年团领袖，各种谣言一直围着她身边打转，实在不足为奇。此公原意可能想以此澄清事实，结果越描越黑，信者更多。

商海弄潮儿

克格勃特工和特务从政的固然不少，但经商的则更多，这方面世界各地和俄罗斯的新闻媒介都有大量的报道，下面摘录几篇，就可以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了。

香港《明报》1994年4月报道说，俄罗斯总统一直对克格勃怀有戒心，在1991年及1993年两次政变后，都对它进行了大幅裁员。数以万计的“前朝功臣”不是提前退休，就是被解雇。这样，就在莫斯科十月广场转角处有了一家职业介绍所，里面有先进的电脑和可人的秘书，同市内其他简陋的职业介绍所截然不同。当然，来这里谋职的人也非同小可，他们全都是前克格勃官员。电影中将克格勃描绘成冷面杀手，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是国家的精英，通晓外语，拥有二三个学位并不稀奇。克格勃退休协会主席韦利奇科说，聪明的银行家都知道，只要聘用一名克格勃人员当雇员，就等于将整个情报机关都掌握在手中了。

俄罗斯颇有影响的《论据与事实》周刊在1992年8月报道了莫斯科一家“威信”私人侦探社，其中说，“威信”私人侦探社的工作人员都是行家里手，因为他们都来自民警局和克格勃，工作上习惯于高标准严要求。侦探社建立了一套组织机构，各司其职，互相配合。这些机构有：昼夜值班室、行动部、保镖部和安全机构。每周进行四次侦查业务培训。“威信”侦探社的顾客是一些可靠的有钱人，他们往往是对民警局失去信心或是在走投无路的情

况下求助于侦探社的。最常见的是一些经商者在同口是心非的对手打败官司后来请侦探社帮忙，处理这种纠纷往往要花大量时间去查阅文件和财会账目。“威信”侦探社不涉足他人的隐私，如果有一位爱吃醋的丈夫要求侦探社帮助他调查妻子是否对他忠诚，有无外遇的话，那么侦探社绝对不予受理。到目前为止，“威信”侦探社还没有抓到过任何匪徒，因为根据原法律，私人侦探无权携带武器，只能配备瓦斯枪。但现在已颁布新法，规定从1992年9月1日起，私人侦探有权携带和使用武器了。

上面这些还是属于无名之辈经商，那么一些克格勃将军的出手就不凡了。舍巴尔申将军原来是克格勃对外情报工作的负责人，现任俄罗斯对外情报局长特鲁布尼科夫就是当年由他派到美国去的。他现在正在从事私人保安业务，向需要者提供保镖、进行背景调查、进行反电子窃听或提供“工业咨询情报”。舍巴尔申的手下，主要是从法尔坎学校招收来的合同工。而这个学校又是由原克格勃警备局副局长鲍里斯森科建立的。舍巴尔申以及像他一样的人已显示出了他们对商业活动的令人惊讶的知晓能力，并因此而赚到了大把大把的钞票。原克格勃“阿尔法”突击队的军官达卡莫夫建立了一家阿尔法—德利瓦特公司，德利瓦特是俄语“第九”，即克格勃警备局，该公司的所有职员都来自克格勃“阿尔法”突击队和第九局这两个部门。所以，达卡莫夫对其他保安公司嗤之以鼻，说他们只能教人在外散步时不要外露装满美元的钱包之类的玩艺儿，而他们是些当年能冲到阿富汗把阿明总统干掉的人。

法新社也在1997年6月10日专门介绍了一家前克格勃成员组建的特别情报服务公司。该社不无讽刺地说，一些在苏维埃时代专事围捕“资本主义鲨鱼”的前克格勃特工，现在正设法为俄罗斯和外国资本家服务。特别情报服务公司的经理和其中的大部分负责人都是前克格勃特工，他们的生意非常兴隆。特别情报

服务公司经理米埃纳夫介绍说：“雀巢公司和几种名酒在俄罗斯经常被造假，但我们有办法向企业提供非法制造者和销售者的名字，并查明控制这些销售渠道的犯罪集团。”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一家企业派驻莫斯科的代表说：“当我要签一个大合同或寻找一个俄罗斯伙伴的时候，我往往会去找特别情报服务公司。我会向他们提两个问题：我所感兴趣的公司是否同黑手党有联系？它是否稳固？是否有偿还能力？在这样的国家，你必须知道你把脚放到了哪儿，这是最基本要做的。”驻莫斯科的一家德国大银行为了招聘俄罗斯职员，也经常要求特别情报服务公司提供另外一种服务，即让公司里的前克格勃心理学家对应聘者进行各种测试。一位外国实业家说：“这家公司甚至向我提议，要用一台测谎器来对一个应聘者进行测试。”简直是匪夷所思。还有一位这家特别情报服务公司的顾客说：“在我需要保镖的时候，特别情报服务公司会为我派来一些能干而又可靠的年轻人。”

俄罗斯买办的崛起

拉杰德·伯克在1974年至1978年是美国超级机密部门——国家安全局的局长助理，离职后他自己办了一家名为“帕尔沃斯”的保安咨询服务公司，总部设在马里兰州。1992年10月，已经62岁的伯克率领一支由企业安全指导官、前情报官和其他相关人员组成的代表团来到俄罗斯，旨在招募精于企业秘密安全保卫的前克格勃官员，从而扩大自己的业务范围和能力。帕尔沃斯公

司的业务是向美国海外企业提供安全咨询，使其免受工业间谍之害和其他窃密者（内部和外部的）、恐怖分子、电脑“黑客”和白领犯罪的威胁。这家公司正式雇员10名，还有约100名的业余顾问，业务量增加得异常迅速，年收益已达200万美元。

在莫斯科，前来应聘的人员中竟有前克格勃少将尤里·德罗兹道夫，他当时68岁，是位传奇式人物。当年他是负责鲁道夫·阿贝尔间谍活动的前苏联间谍头目之一。阿贝尔是50年代苏联在美国的非法地下间谍网的领导人，被抓后，苏联用打下的美国U-2飞机驾驶员把他“换回”。德罗兹道夫亦曾指挥过前苏联遍及全球各地的“非法人员”活动网，这些非法人员以平民身份长期暗藏在世界各地的企业之中。

伯克先生说：“德罗兹道夫现在想帮助外国的公司寻求在俄罗斯官僚制度内的发展之途。尽管这些克格勃分子可能不那么令人喜欢，但他们确实有能力混入工业界和政府的各个部门。我可能会与他达成一笔交易，但要十分小心。”促使伯克和德罗兹道夫走到一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赚钱”，但让克格勃人员充当自己的买办，伯克自己也觉得“有点儿超越时代”。原因之一是前克格勃官员仍在利用他们经商的条件为俄罗斯对外情报局服务。不过，伯克强调指出，绝大多数克格勃官员投身企业是为了赚钱。

伯克在莫斯科期间，前克格勃官员当买办的热情高昂。他们在伯克先生面前摆满了各类信息资料，业务拓展建议也堆积如山。如圣彼得堡巴尔干银行主席想在建立一套银行安全系统中得到伯克公司的帮助；一直被视为诈骗目标的一家莫斯科公司亦希望伯克他们能帮助建立并监管自己的保安系统。

所以伯克说，与前苏联间谍合作，不仅有利于俄罗斯经济的发展，而且对美国经济的复苏亦大有益处。据说，伯克后来还找到了自己更感兴趣的合作伙伴——前苏联反间谍部门的头目维克多·布塔诺夫。有了这些情报、反间谍高手充当自己的买办，伯

克公司的业务可望在俄罗斯得到蓬勃的发展。可伯克先生还来个欲抱琵琶半遮面，说：“但我对此仍感到不那么舒服。在我的大半生中，这些家伙一直被看作是敌人，现在要与之共事，这真是一场否定自己过去的战斗。”

前克格勃官员除了充当美国商人的买办外，也积极充当以色列保安公司的买办，这又是一种强强结合。以色列经历的恐怖袭击是世界上最多的国家之一，精明强干的以色列人经过反恐怖的实战洗礼，成了世界上最善于搞保安的国家，它的保安公司闻名世界。任过意大利总理的媒体大王鲁斯柯尼就聘雇以色列保安公司代训其安全人员。超级模特儿克劳蒂娅·辛弗也以高达9000美元的月薪，雇用以色列保镖。甚至在车臣分裂主义分子劫持俄国人质时，有些俄国报纸就建议当局邀请以色列突击队来营救被扣人质。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色列的“国际保安公司”来到了莫斯科，这是一家于1991年创立的新公司，但发展迅速。它除了在以色列赫泽里亚城有个大型训练中心外，在德国、奥地利、拉脱维亚及加拿大等地都设有地区总部或办事处。在俄罗斯，由于前克格勃官员的加盟，该公司发展得更快。据香港《信报财经月刊》报道，国际保安公司在莫斯科建立了训练中心，在俄国各地都有庞大的分支网络，在各个独联体国家也都有它的分公司。

以色列国际保安公司在前苏联地区的最重要市场当然是莫斯科，它在当地招募了50多名前克格勃官员，经过总部培训后来充当公司买办和保镖。谁也不会想到，这帮人的头目，竟是戈尔巴乔夫总统当年的近身护卫、总统警卫团的团长亚历山罗夫。昔日的近臣重将，竟会沦落到俯首听命于他人的买办地位，为到莫斯科访问的数以百计的欧美商人“提供个人安全服务”。

第十九章

前克格勃高官著书立传忙

苏联的瓦解，导致了一个没有先例的有关前苏联秘密机构的出版物如洪水般地涌来。虽然，克格勃的档案（还有格鲁乌的）继续与世隔绝地封存着；政治局的档案，在1992~1993年曾有限地让人接触过，但在随后的俄罗斯政治寒潮中又被关闭了。然而，著名政治人物和高级情报官员撰写的回忆录在继续出版着，书中包含了特别多的趣味和偶而出现的“迷人”信息。在苏联时期，只有叛逃出去的人才会写有关克格勃内幕的书。

人们知道舍巴尔申曾当过几年的克格勃第一总局（负责对外情报）的局长，在1991年8月他还当过24小时的整个克格勃的头儿，他在1994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在情报首脑机关的生涯》的回忆录。

巴卡金，曾作为由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共同推出的人选，在1991年8月被任命为克格勃的主席。巴卡金在这个位置上呆到1992年1月初，然后被叶利钦的亲信所代替。他在1992年出版了一本《出自克格勃的判决》的回忆录。该书趣味十足，因为他在不很成功地试图改革克格勃时，遇到了许多困难和严重的问题。

基尔皮琴科从 7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的许多年里，一直是克格勃对外情报总局的两位第一副局长中的一位，一度也当过克格勃的副主席。他在 1993 年出版了《来自一位情报官的档案》，1995 年又出版了一本《俄罗斯对外情报机构的老战士们》（克格勃或现在所称的对外情报局的人员一起参加了该书的编写）。

莱比莫夫是克格勃里的一位亲英派，曾在伦敦、赫尔辛基和哥本哈根度过了许多岁月。现在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运用自己的才干和掌握的苏联间谍机构中的内幕来写作，1995 年出版的《一个一无所是的情报站长的笔记》就是他这类书中的一本。

卡鲁金，70 年代是克格勃对外情报总局内的反间谍局局长，因为和他的上司克留奇科夫争吵而被降级。在“新思维”的年代里，他开始猛烈地批评克格勃，当时这样干已经变得相对安全了。卡鲁金在 1994 年出版的《间谍大师》（又名《第一总局——我对西方情报与间谍活动 32 年》）一书，与上述书的出版地不同，不是在莫斯科而是在伦敦。卡鲁金的书生动有趣，他对克格勃的许多行动既给了清晰的暗示，也作了天才的联系。所以俄罗斯检察院，在克格勃的保守分子和新共产党人的压力下，试图组织对卡鲁金的起诉，这也是毫不奇怪的。但美国《华盛顿邮报》分析说，卡鲁金揭露抨击克格勃的这本书和俄罗斯有关人士作出的强烈反应，可能是一出双簧戏，是为了误导美国对出卖了几十名情报人员的埃姆斯的调查。

格鲁什科是克格勃对外情报总局的第二个第一副局长，负责对西欧和东欧的工作。由于他经常向克留奇科夫谄媚并投其所好，所以到 1991 年时他成了克格勃中的第二号人物。他是“8. 19 事件”的组织者之一，后遭逮捕并在狱中度过了两年。他在 1995 年出版了一本《我在克格勃的生活》的回忆录。

前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也在 1996 年 5 月完成了一本回忆录，名为《私人案卷》，并于 1996 年 7 月 16 日面世。该书内容很

特别，后面再作介绍。

前俄塔斯社驻美国记者、克格勃派驻华盛顿的间谍尤里·施维茨在1990年9月辞职后，也写一本《华盛顿间谍机关》，专讲克格勃在美国首都的活动。自称该书出版后，反响很大，他过去的一些同事纷纷来信来电祝贺，说书中写出了他们不敢说的东西。更有人形容它像一颗炸弹，击毁了克格勃无所不能的神话。

连克格勃之前的契卡时代的一些更老的特工也违背了只做不说的习惯，也出来著书立传了。1939年被任命为苏联秘密警察特别行动处负责人的巴威尔·苏多普拉托夫，一直到斯大林逝世后的15年中，他领导了苏联在国外的所有秘密行动——“肉体消灭”（有的还是他亲手执行的）。1953年，他在其靠山贝利亚倒台后被捕，但于1968年获释。1994年，苏多普拉托夫出版了回忆录《特别行动处》，自豪地讲述了他作为“共产主义战士”的一生，其中有他如何受命去指挥暗杀托洛茨基的行动过程。

被称为苏联十大间谍之一的奥维德·戈尔恰科夫，他父亲亚力山大在30年代曾被斯大林派到美国去当外交官，以争取美国的援助，后被送到西伯利亚劳改十年。戈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装作美国人或德国人在德国和波兰从事间谍工作。在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期间，他冒充美国人在汉城担任了政府官员，使苏联在搜集情报方面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曾被授予“红星勋章”。他在1994年写了一部共有三卷的自传《被放逐者》，其中说他还给斯大林当过翻译。他之所以没有被“清洗”掉，主要是他那一口无懈可击的英语和杰出的翻译技巧。

舍巴尔申、基尔皮琴科、莱比莫夫和格鲁什科等人撰写的书，都包含了许多细节、事实、观察和怀念。然而，他们都被一个共同的特点联结在一起了：所有的作者都或多或少地保持着对老克格勃的忠诚，不想或不敢披露一些敏感性的话题（这也许是考虑到那些东西现在还被认为是国家机密）。书中反映出的苏联情报部

门领导阶层的相对知识程度和对西方情况的了解贫乏，也是很明显的。基尔皮琴科的知识背景是一位有关埃及、叙利亚和也门方面的专家；舍巴尔申是有关印度和伊朗问题的专家；格鲁什科是挪威问题专家。他们的上司克留奇科夫，虽然当了 15 年的情报头子，也只有一个国家即匈牙利很熟悉。

特别让人困惑的一本书是列昂诺夫的《麻烦的年代》，他在克格勃内是有自己独特风格的突出人物。列昂诺夫是作为古巴卡斯特罗在会见苏联领导人时的翻译和私人朋友而开始自己的事业的，到他快结束在克格勃的工作时，他负责对南北美洲的情报工作。

情报分析和通报内幕

以前人们关于苏联内部对像吸尘器一样从世界各地搜集来的情报是如何处理的情况，一直不太清楚。但列昂诺夫的回忆录《麻烦的年代》提供了这方面的内幕。因为他从 1970 年到 1984 年里，一直是克格勃对外情报总局的情报分析处的头头。应该承认，在他的书中最有趣的是他对该处运作的机构和功能的叙述，以及一些成功例子的叙述。

根据列昂诺夫说法，他的情报分析处是克格勃中效率较高的部门之一，它每天 24 小时工作着，并能立即召集一批分析家来思考一个新冒出来的问题。每天到达该处的问题高达百个，总体上他们都能加以回答。列昂诺夫没有说明该处有多少人在工作，但

他抱怨说，如果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官员和分析人员的比例是 1:1 的话，那么克格勃就只有 10:1（这样可以估计出该处有 500~600 人在工作）。

克格勃受理的主要情报形式是加密电报，它们在列昂诺夫的部门被加以过滤，最有价值的被送到高层。列昂诺夫是完全满意于克格勃所制定的分析工作的程序的，但是他对苏联其他的政府部门的情报机构颇不以为然。苏联当时有四个主要的情报来源：第一个是外交部；第二个是克格勃（主要的材料来自对外情报局）；第三个是国防部（主要是格鲁乌的军事情报）；第四个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有关部门，它们有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和资本主义世界联系的国际部，还有专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事务的部门。

克格勃每天来自外国的大量的给领导人看的信息的总和，一般为 100~400 页。这对坐在克里姆林宫的年迈的党的首脑来说，要阅读所有这些材料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列昂诺夫说，只好让其搁在一边由孤独来“吞噬”它们了。开始时，围绕勃列日涅夫的办公机构只是下令，所有报给政治局的材料要用大号字打印，后来他的助手们又对包括加密电报在内的信息加以阻拦，总是挑选与他们头儿说过的相关或相近的内容。在这个过滤情报的体系的每一级，包括总书记的助手们，主要考虑的是防止干扰性的和粗暴的信息到达首脑手里。呈送上去的信息，都要有一种温和和无牙的形式。

除了加密电报的形式外，苏联对外情报机构也使用所谓的备忘录（一个从沙皇时代继承下来的名称），以保证首脑们了解情况。克格勃经常使用备忘录，这是仅次于密码电报的情报文件的形式。克格勃也为它的备忘录而自豪，它们总是用新颖、完整和简明的方式来提出问题，它们的篇幅只有 3~4 页。列昂诺夫尖刻地写道，中央委员会的有关部门常写出 50 或 60 页的备忘录，来谈论诸如“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对最近党的代表大会的反应”之类的题

目。

有时，当一个格外重要的对外政策问题出现在领导集团面前时，中央委员会会要求组成一个由所有情报机构的熟练专家参加的临时特别小组，这个小组会被送到郊外的像兵营一样的城堡里，并在那里隔离起来，直到他们工作出一个结果来。

列昂诺夫出版的回忆录的缺憾是，关于克格勃分析部门的成功和失败的例子实在太少。其中有一个是，在1975年春，苏联政治局成员们包括安德罗波夫（时任克格勃主席、政治局委员）本人，都担心美国可能会在越南开展一次登陆行动，就像他们于1950年曾在朝鲜干的那样。但克格勃的分析人员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即美国不会再次加大它在越南的军事行动了，而是会面对失败的结局的。

列昂诺夫断言，克格勃在对西方国家的内部局势和议会、总统选举的预测上几乎总是正确的。然而，他没有说明这方面不仅仅是克格勃精明能干的结果，而且也是基于西方社会本身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回忆录中的忧思

前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在其写的回忆录《私人案卷》中，似乎还是以当年主席的身份在思考问题。按照俄《消息报》资深记者拉齐斯所作的书评看，克留奇科夫仍对过去克格勃的情况讳莫如深，他没有讲述在他主管克格勃期间苏联特工具体从事了哪些

谍报活动。拉齐斯说，其实“莫斯科派出的特工成了从中东到加拿大一些政党的创建者，他们有的甚至成为国家的缔造者，比如南斯拉夫的铁托”。而克留奇科夫却讲述他是苏联1979年在阿富汗进行军事行动的领导人之一，“描述苏联飞机大炮如何使阿富汗的一个个村庄化为废墟的情景”。所以人们看了他的书后，对那条看不见的战线依然还是看不见。

但是拉齐斯说，《私人案卷》中关于工业间谍的活动还是最吸引人的。书中反映了苏联工业间谍活动的宏大规模，有些国家的不少人都变成了俄的特工。东德情报机构发现了一些机密材料，后来这些情报成了苏联各工业部门发展的基础。克留奇科夫对苏联企业未能充分利用克格勃的“礼物”而感到不满。

克氏回忆录中有一段很生动的内容是有关他于1974年被任命为克格勃对外情报总局局长、由当时的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把他介绍给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场景。克留奇科夫写道：“坐在桌子后边的那个人（指勃氏）病得很厉害，他吃力地站起来同我打招呼，很长时间缓不过气来，接着便又倒在了椅子上。……勃列日涅夫向我告别时又勉强地站起来与我拥抱，并祝我一切顺利，还掉下了眼泪。……安德罗波夫说，勃列日涅夫身体状况那样糟糕，无法长期治理国家了。然而，他在台上又呆了八年。”

在克留奇科夫的回忆录中，大量的还是他对“8.19事件”后，国家安全机关所遭到的破坏和俄罗斯泄密情况的忧思，数千名克格勃骨干流失在外，国家绝密材料被国内外报刊广为散布等等。他说，这样“不仅使苏联共产党与别国共产党及其他政党之间的内部联系陷入危险境地，而且还暴露了这些联系的内容和情报传递转交的渠道，很多人的生命和安全以及整个组织、运动乃至一些国家都受到了威胁”。克氏在自己回忆录中还举了个例子，1993年有一个外国记者采访他，向他出示了他当时作为对外情报总局局长签署并呈报苏共中央的整整一沓文件的复印件。其中有些是执

行转交资金的报告，上面有具体日期、款项数目、收款人姓名，文件上还盖有“特别需要”的印章，当时这些国家核心机密均是一式二份，一份留克格勃，一份留苏共中央。外国记者告诉他：“是花了相当多的钱弄到的。”

他还特别对前俄罗斯国家总检察长斯捷潘科夫和副总检察长利索夫合著的《克里姆林宫的阴谋》一书感到不安。克留奇科夫在回忆录中写道：“读到《克里姆林宫的阴谋》一书中登出的那几十页属于国家机密和涉及苏联与世界许多国家关系的情报时，不能不令人感到愤怒和为国家担忧。这种公开苏共给予兄弟党财政和其他方面的援助，以及泄露苏共和克格勃把某些党务活动家从苏联转派到其他国家的行动，暴露苏联情报机关从事这种活动的特殊工作方法，在国际上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这么做过……发生上述这一切之后，哪个国家还会就不同程度的机密问题与我国联系而不担心被泄露呢？”

克留奇科夫对于他的继任者巴卡金向美国驻苏大使交出克格勃在使馆大楼内的窃听装置分布图，更是愤愤不平。他说这件事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是多方面的，政治的、经济的、情报业务上的和心理道德上的都有”。他相信：“巴卡金和那些批准这一背叛行径的人终将有一天会受到惩罚！”

一只离巢“乌鸦”的回忆

英国人大卫·刘易斯曾写过一本有关克格勃的书，书名是《色情间谍》，其中第四篇叫“一只‘燕子’的自白”，是一位暂且称呼为维拉的克格勃女色情间谍叛逃到西方后，讲述了她从事这项职业的经过。这里就让一位克格勃的男色情间谍也来回忆一下他的经历。两人有所不同的是，一是这只“乌鸦”并没有叛逃到西方，是一位仍住在莫斯科的退役克格勃上校；二是发表他所讲的从事色情间谍内容的刊物也不是在西方，而是俄罗斯的《家庭》周刊。

这只“乌鸦”名叫弗拉基米尔·茹罗夫，他在1996年接受《家庭》周刊专访时，回忆了往事，主动将自己在公众面前曝光。下面就是他的一些回忆摘录。

在情报系统中，秘密情报人员是专指那些远离祖国、以隐蔽身份在异国他乡生活和工作的情报人员。像我们这样的人的所有文件都是国家的最高机密，由国家高层领导人严格控制，一般人员无权顾问。对秘密情报人员的选拔一般是在高等院校进行。情报机构用一套相当完备的专业检测方法来检测哪些人适合做秘密情报员。遵循这一检测方法，被选定的情报员的外表应该与对象国的普通居民十分相像；应该有十分强健的体魄和敏锐的头脑；至少精通三门以上的外语，其中一门外语的会话水平应与母语一样；

所有候选人的个人档案和家庭背景不能有一丝污点。

秘密情报人员的公开履历都是由专门小组精心杜撰的，完美得无懈可击。一个合格的情报人员，必须能在半夜被人突然叫起时流利地说出上司为他杜撰的出生地及所有教过自己的小学、中学和大学老师的姓名。一个人一旦选择了做秘密情报员，那么他就应该彻底忘记自己真实的过去，牢牢地记住上司为他想像的过去。我个人认为，对于秘密情报人员来说，他所从事的工作与其说是一种职业，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方式。秘密情报人员生活的目的只有一个——最大限度地获取情报。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对家庭生活有很大的影响。

当我接受正式培训时，上级问我是否有未婚妻或中意的女朋友。我回答说，女朋友我有很多，但是我只和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伊琳娜·伊万诺娃经常往来。过了大约半个月，我被上司叫到办公室，他十分郑重地告诉我，秘密情报人员必须带妻子去异国工作，我必须在培训结束前结婚。因此，我和伊琳娜很快结了婚，并开始一起接受培训。伊琳娜与男人们一同进行擒拿格斗训练，她还学会了使用各种不同型号的西方射击武器。我妻子是我最忠实的战友和最亲密的朋友。不幸的是，她40岁时死于车祸。

我妻子的大部分精力用于经营我们在异国的生意，公开场合她是公司经理和公司法人。在国外我们不能没有正常而体面的身份，不然会引起怀疑。而我则主要去完成总部下达的任务。另外，夫妻两人还可以在必要时分头行动。

为了完成任务，我们时常要扮演各种角色，其中包括借助与女人们的亲近关系来获取情报。在一个举目无亲的陌生国家，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打入上层社会获取情报，这决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利用女人往往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记得有一次，我途经布鲁塞尔，偶然结识了北约内部机构的

一位女秘书。她刚刚与心上人分手，正急需异性的安慰。我将她的情况向总部做了汇报，并建议派一位男性色情间谍来，我负责让他与这位北约组织的女秘书认识。情报发出后，便准备去另一个国家执行任务。动身前突然接到总部指示，命令我亲自去接近她并尽快与她建立亲近的关系。我别无选择。这位荷兰女士长得人高马大，比我高出整整一个头。我从未想过要与比我高大的女人亲近，从心理到生理我自始至终都没有一丝快感。但这是命令，在命令面前，我个人的好恶是微不足道的。

我承认，虽然利用女人获取情报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但有时会让人良心不安。我至今还记得，在培训时我就被派去接近一位著名学者的女儿。我与她结识，经常去她家做客。她的父母对我非常热情，把我当做未来的女婿，姑娘对我更是体贴入微。我感到惭愧，因为我非常清楚，两个月以后，我将永远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

我妻子能够正确地对待我与异性的这种交往。在接受培训时，她就接受了这一即将面临的问题。她将这视为工作的一部分。当然，这一切并不像说时那么轻松、容易。比如，我本人在本性上不是一个爱吃醋的男人，但是当我的妻子为完成任务外出与别的男人幽会时，我总觉得不舒服。在这方面，我的妻子更是受了很多的委屈。

本来我和妻子准备至少生三个孩子，但是在这方面我们不走运。在培训期间，我妻子就做了两次人流。当她第三次怀孕时，上司终于同意我们把孩子生下来。从生育的安全角度考虑，伊琳娜决定在莫斯科分娩。后来我在拉丁美洲得知，伊琳娜在莫斯科生了个男孩，我妻子为他起了个与祖父相同的名字：米哈依尔。儿子长到一岁半，我妻子将他托付给祖母照看，只身飞回到我身边。当我们回到莫斯科时，儿子已长大成人，我们还算走运，有一个出色的孩子。这不是我们做父母的功劳，而是多年来精心照看他

的祖母及亲戚们的功劳。

在某种程度上说，我相信命运。如果你经常与极其危险的事情打交道，你就不能不相信成功和失败都有其定数。而干我们这一行的不允许有失败，一次失败也许就意味着一生的失败。运气对情报人员来说是再重要不过了。所以在我们这个圈子里，人们只要拿起酒杯，第一句话就永远是：“为好运气干杯！”这“运气”包括桃花运。

第二十章

怀念逝去的好时光

1994年8月17日，英国路透社有一篇题为《前克格勃成员成立俱乐部》的报道，说当年他们被作为克里姆林宫的剑与盾时，他们严厉镇压持不同政见者，掌握着千百万人的档案，在全世界各地搜集情报。如今，这些前克格勃官员公开表示对他们的过去和高超的职业技能感到骄傲，并且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国家安全委员会老战士俱乐部。确实，他们成立这个俱乐部的目的是既要在资本主义的新俄罗斯有一处可以一起怀念过去好时光的场合，又要在新的环境中为自己开创一个更有利的前途。

俱乐部具体成立的时间是1993年11月，其会长是前克格勃负责警卫的第九局的参谋长、副局长瓦列里·韦利奇科。这个俱乐部是一个跨地区的社会组织，刚成立时有300多人，到1997年9月时，光莫斯科就有1000名成员，在全国各地有40个左右的分支机构。俱乐部搜集和保留着大量的关于俄罗斯政党和运动的档案，但不是用来发表的，仅仅是为了让会员们能够“估价这些政党和运动的力量”。可见，积习难改，克格勃成员也改不了搜集情报的职业习惯。不过俱乐部还是非政治性的，它与如今的俄罗斯

安全局之类的接替克格勃的机构无关。

韦利奇科回忆说：“在1991年的“8.19事件”（反戈尔巴乔夫的军事政变）和1993年的“十月事件”（国家杜马造叶利钦的反）之后，我们就到外面都各干各的，但我们觉得需要寻点别的基础。”他自己曾因支持1991年的政变而于当年的9月被解雇。韦利奇科在俱乐部成立的时候说：“我们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帮助我们的会员在新形势下从心理上接受市场经济。”俱乐部副会长奥布列扎诺夫也说：“任何克格勃成员都能当经理，因为他们过去的工作就是与人打交道。他们可以在旅游、饭店和出版业工作。”这位副会长还补充说，成立俱乐部也是希望能消除现在社会上仍流行的那种看法，即把克格勃看作是搞政治迫害的恶魔。

在克格勃老战士俱乐部的帮助下和自己的努力下，这些前克格勃的官员们当时纷纷拥向能够赚大钱的部门，如木材、食品和石油进出口部门，还有人则转到今天很兴旺的部门，那就是经济安全部门。俱乐部自己也有一支雇佣的队伍，韦利奇科以夸耀的口吻说：“我们可以推荐一些能讲斯瓦希里语和波斯语的人。克格勃在语言知识方面仅次于科学院。”

经过几年的拼搏，这些前克格勃老战士中先富起来的人很多。法国《解放报》在1997年8月12日报道，韦利奇科现在就是一家拥有250人的私人保安公司的老板，但他婉言拒绝说出他挣了多少钱。还有一位45岁的前克格勃上校弗拉基米尔·马鲁什琴科，如今是一家拥有35万名雇员的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的安全部门负责人。他在一间豪华的办公室里领导着1.3万人马：设施和建筑的看守者、调查员、警卫等等。

他们这些人境况都要比以前好得多，正式场合下一般不反对民主和市场经济了，但在俱乐部里他们依然追往忆昔。他们并不怀念旧制度的本身，在旧制度下，他们的物质特权（分房、进特定商店、出国旅游的可能性）同他们目前的所得相比显得微不足

道。他们怀念的是苏联帝国和他们拥有的无限权力。

身为俱乐部会长的韦利奇科一边低调地说：“我们现在尤其不搞政治，这只是一个西方式的俱乐部。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喝喝啤酒，或者举办一些讲座。任何人都不会拒绝我们的邀请。当时的财政部长亚历山大·利夫希茨曾亲自来这里向我们谈论税收政策。”但一边又自豪地吹牛：“在苏联解体之前，我就已经去过美国12次。我们是在深知底细的情况下选择了戈尔巴乔夫。如果没有我们，他就根本坚持不住；克格勃可以在24小时内粉碎任何运动。”

韦利奇科还自吹自己是俄罗斯的反恐怖权威，从1973年起就关注俄罗斯的恐怖活动。他说，在当年，他对一切都能考虑周到：里根总统访问苏联是近东恐怖分子关注的焦点；撒切尔夫人是爱尔兰共和军的目标；锡克教分离主义分子和“泰米尔伊拉姆猛虎组织”也绝不会放过拉·甘地访苏的机会。

韦利奇科下面的说法终于露出了自己的庐山真面目：“我的父亲和母亲都当过军官，我14岁时就在军校得到了我的第一条饰带。整整一生，我都穿着军装为国家服务，要脱掉它是不容易的。但是我很乐观，一旦大俄罗斯重新建立之后，我们这些老战士还会被召集起来。”看来，这个俱乐部的老战士们还真是人老心不老，在怀念过去好时光的同时，还盼望着东山再起呢！怪不得老克格勃特工们都支持俄罗斯那位有“希特勒”之称的政治活动家日里诺夫斯基，因为他整天在鼓吹建立大俄罗斯的美梦，扬言德国不听话就扔原子弹、俄罗斯士兵应该到温暖的印度洋去洗刷自己的战靴云云。

为克格勃树碑立传的博物馆

老黑格尔说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克格勃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特工机构，在世界上存在和活动了几十年，也自有它合理的东西。所以，不仅像一些老克格勃特工对之缅怀不已，其他的人也都充满了好奇心。

为了满足人们对历史特别是对神秘的间谍活动历史的好奇心，当然也为了影响舆论搞好公关，俄罗斯在1991年把建立已七年的克格勃博物馆向国内外人士开放。门票一张15美元，价格不菲，是一个很好的创收项目。

克格勃博物馆是在1982年根据安德罗波夫的命令，开始着手筹建的，并于1984年开始对外开放。当时主要是为了对克格勃自己的成员进行教育，还有就是让有关党政领导了解克格勃的作用。

博物馆的面积有700平方米，展品共有2000件。开头部分的展品是有关沙皇俄国时期的资料，时间可追溯到1380年。苏维埃时期的展品，是由七人巨幅照片打头的，这是1919年成立的第一届肃反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他们是捷尔任斯基、乌拉洛夫、伏洛布耶夫、瓦西里耶夫·尤任、萨文诺夫、克谢诺万多夫和莫罗兹。在这里还展示了当年捷尔任斯基的办公室模型。最引人注目的是内部奖品，最早的奖章是1920年设立的“荣誉肃反人员奖”。苏联解体后设立了“荣誉反间谍人员奖”。

展品反映了从契卡到克格勃的整个历史，其中有两个陈列台

还反映了1991年8月后安全机构改组的情况。这里还有一个特大的像册，收集了各种人物的照片。首先是历任领导人的照片，他们中有契卡的捷尔任斯基、明仁斯基、雅格达、叶若夫、贝利亚、麦尔库洛夫、阿巴库莫夫、伊格纳捷夫等人，还有克格勃的各任主席，一直到现在俄罗斯情报安全机关的各任领导人。博物馆中有无数的照片，但塑像只有两尊，一尊是捷尔任斯基的全身铜像，一尊是安德罗波夫的白色大理石半身像。这是有道理的，前者是情报安全机关的奠基人，后者命令建立了克格勃博物馆，还当上了前苏联的最高领导人。

1995年10月28日，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以“俄罗斯的超现实间谍博物馆”为题，也对这所克格勃博物馆进行了生动的报道。该报道说，抓住铸有镰刀锤子花纹的青铜把手，推开沉重的橡木大门，通过穿土黄色制服的门卫，便进入深邃昏暗的门厅，我们被请进一个像是从艾丽丝的镜子里看到的怪诞的、被扭曲的世界：俄罗斯克格勃博物馆。

这里的讲解员是位上校，名叫阿纳托利。他是个和蔼可亲的人，戴着眼睛，穿细条纹呢制服，喜欢开一些粗俗的玩笑。展厅的展品有从被抓到的美国间谍那里缴来的物品，有些显然是50年代空降到苏联的特务携带的设备。其中有无声手枪、带脚踏发电机的大得吓人的无线电发报机及伪造的身份证件等。

据阿纳托利说，若干年来这些证件之所以能暴露美国间谍的身份，是因为美国的技术太先进了。50年代美国已使用不会生锈的订书钉，而苏联用的订书钉是会生锈的，这就说明真正的苏联证件上的订书钉旁边有黄褐色的锈斑，而美国伪造的证件却干干净净，由此而引起怀疑。

在克格勃博物馆展出的近期缴获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战利品中，有装有卫星传递装置的公文包；有用来作为礼品赠给苏联著名科学家的小型计算机；有其形状像个小手电，但能在五步之内

将人电死的电棒；还有上等的自来水笔，实际上是一支手枪。展品中还可以看到两部与计算机相连的窃听俄国人电话的装置。一部是在鄂霍茨克海海底发现的，另一部是在三年前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的冷战正式结束以后侦查到的。

阿纳托利对美国如此多的间谍活动没有表示出丝毫的愤慨。他坦率地承认：“我们没有在这里展出我们自己间谍活动的设备，因为这些设备还在使用，所以不能让人们知道它们是什么样子。”

博物馆的墙壁上挂着许多著名苏联间谍的照片，如50年代的英国变节者金·菲尔比和出卖原子弹机密的克劳斯·富克斯。当谈到当代间谍事件时，阿纳托利就闪烁其辞了。问他对因给苏联从事间谍活动而被判了终身监禁的原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埃姆斯有何看法时，得到的回答却是：莫斯科对埃姆斯一无所知。

对于克格勃在历史上所起的残酷的镇压作用，阿纳托利也只字未提。相反，该博物馆的宗旨是要为克格勃树碑立传的。阿纳托利说：“现在要让外界看看我们干得多出色。”博物馆的基调可以用布尔什维克秘密警察创始人捷尔任斯基的一句话来概括，这句话在博物馆的一面墙上赫然在目：“如果我再来生活一次，我还将从事同样的工作。”

特工装备商业化

就像在苏联垮台后，俄罗斯的官方和私人都在抛售原苏军的武器弹药来赚钱一样，原克格勃的装备也神秘不断地出现在市场

上，这对买卖双方都有利，一方可以享用先进的特工装备，一方可以有大把的钞票收入。

1991年12月，新加坡的《联合晚报》报道，一个曾被克格勃用于偷拍军事和太空秘密的足金指环间谍照相机，已经以1.2万美元售出。这种指环照相机据说一共只有二只，它们是70年代初苏联克格勃用于偷拍美国和英国的核武器及太空计划秘密的。

这种小型相机的镜头设在中心石中，它的快门安在刻花指环里面。它用的是35毫米的胶卷，由于相机太小整卷装不下，所以必须剪断，它只能拍8张照片。

现在这个间谍照相机还能工作。摄影专家威廉·怀特说，自从政府办公室禁止吸烟以后，苏联间谍就用这种精致的相机了，这意味着像烟盒和打火机式的照相机不再实用了。这只指环式间谍照相机是在英国南肯辛顿著名的克里斯蒂拍卖行拍卖掉的。

到1995年3月，香港的《明报》又报道说，莫斯科的一家专门向新闻界提供各式文具的商店里，最近供货架上增添了一批先进的“新闻求生工具”。

俄罗斯新闻工作者工会副主席鲁加指着一排陈列品说：“对于经常冒险采访的新闻工作者来说，这些工具是非常有用的。”他指的工具有照相机和组合音响。照相机只有“克力架”饼干大小，可以在漆黑的房间内拍照；组合音响外表看起来像大宇汽车的音响组合，实际上却是用来监听六个以上的监听对象的监听装置。

这家名为“新闻工作者”的商店所出售的25种不同的监察和反监察装置，大多数为俄罗斯制造，原本是提供给俄联邦安全局等情报特工机构使用的，最近才开始在市场上流通。一支可监听到200米范围的原子监听笔，价格为77.7万卢布，这还算是比较便宜的。最昂贵的是一套西方制造的窃听装置追踪器，售价500万卢布。

虽然售价高，但光顾者并不少，其中60%的顾客是新闻工作

者。商店也为俄罗斯商人服务，因为比新闻界工作者多的商人是诈骗、街头枪击和汽车炸弹的对象。

有一法必有一弊，合法公民把间谍器材用于工作和防卫，犯罪分子也用间谍器材搞非法勾当。曾有一家俄罗斯公司的总经理对自己公司的仓库管理员打去电话，说一会儿有一个模样如何如何的客户开一辆什么牌汽车来提多少货，叫这位管理员准备发货。结果那位客户开车到仓库时，仓库管理员说，刚刚有一位和你一模一样的人开着同样的车把货提走了。这是犯罪分子窃听了总经理的电话后所作的案。

峰回路不转 前景难乐观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盛衰决定着一个国家特工机构的盛衰，两者基本上是同步的。但也有一些例外，综合国力虽然并不很强，但特工机构在某个方面或某些地区显得很“厉害”，这是由于这些国家面临的生存危险特别大，所以只好不顾其他，倾全力发展特工机构的缘故。

目前的俄罗斯，其综合国力不如前苏联，特工机构自然也无法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虽然一些老克格勃官员在缅怀过去好时光的同时，幻想着大俄罗斯的很快来临，其实只是一厢情愿而已。特工机构要强大，光有老家伙们在俱乐部里高谈阔论是无济于事的，而要有大批优秀青年在特殊学校接受训练才管用。

但原来一些久负盛名的克格勃学校，现在都是处于关门的边缘了。台湾《中央日报》曾报道，俄罗斯对外情报局设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情报学校，过去有 300 名学生，如今只有 50 人，而且有的学生毕业后还另谋高薪工作去了。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刊也报道过，俄联邦安全局在莫斯科科佩谢尔街上有一座不挂牌子的建筑群，这就是它的一所情报学校。该局一共有六所院校，除这所高级情报学校外，还有莫斯科红旗学院，和在下诺夫哥罗德、新西伯利亚、圣彼得堡、叶卡捷林堡的几所高级进修学院。这显然都是克格勃庞大遗产的一部分。

在莫斯科这所情报学校的主管科研工作的副校长伊帕利托夫上校对《论据与事实》周刊记者说，他们学校设有五个系，即反侦察系、侦察系、技术系（密码破译和无线电通讯）、干部进修和培训系及外语系。至于课程，该校现在的国家安全学这一学科目前还处于形成阶段，主要由侦察和反侦察这两个基本内容组成，科学共产主义这门课取消了，马列主义仅作为一种政治学说和其他政治学说合并为一门课，另外还有情报学、分析学和社会学等课。学制是中学毕业生招来学五年，大学毕业生招来学两年。

这位副校长还介绍说，该校的师资力量很强，共有各类教师 900 名，其中二名还是俄罗斯的通讯院士，他们是列文和科兹洛夫。学校的条件很好，愿意报考的人也较多。一到招生的时候，考生先向地方安全机关报名，由地方安全机关进行初步筛选，然后经考试由学校决定是否录取，一般是从四个报名者中录取一名。但是，伊帕利托夫说，学校培养人才是有计划的，招生前由实际部门提出要求，需要何种专业人才，要多少人。由于苏联克格勃的解体和俄罗斯机构的精简，实际需要的干部数量大大减少了。现在学校一方面是招收学生的人数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原因，淘汰率大为提高了，过去为 3~4%，现在增加到 10%。这样看，俄罗斯各方面特工的后备人才似乎将难以为继了。

不过，尽管这样，在俄罗斯高层决策者中想恢复克格勃雄风的想法和举措也还是常常冒了出来。1991年底苏联瓦解后，叶利钦总统曾想成立安全和内务部这一超级部，这是第一次尝试；1993年“十月事件”后，总统安全局局长科尔扎科夫渐渐想把各主要特工机构或其功能掌握到自己一个人手里，这是第二次尝试。

到1997年又在进行第三次尝试。随着北约东扩的临近和实施，俄罗斯政界酝酿恢复克格勃、重振特工机构威风的议论和设想又一浪高过一浪，想以此给美国佬一点颜色瞧瞧。在1997年的上半年，莫斯科政坛上盛传，总统身边的一些谋士正紧锣密鼓地忙着起草一份总统令。这份总统令的内容是要成立一个“情报机关统筹协调中心”，并由该中心来协调、指挥对外情报局、联邦安全局、联邦通讯和信息局的工作及活动。据有关人士称，该中心所辖单位可能还包括保卫国境的联邦边防局。这一消息当时就引起了西方和东欧国家情报机关的高度关注，但后来未见下文。

到了1997年7月，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刊发表了亚历山德罗夫《克格勃会卷土重来吗》的文章，又重提了叶利钦的恢复克格勃的总统令。不过，这次不是什么“情报机关协调中心”了，而是把其他情报特工机构合并到俄联邦安全局去，使它膨胀为一个克格勃式的机构。

该文章说，俄联邦总统1997年5月22日的第515号命令是在绝密状态下起草的，就连联邦安全局局长科瓦廖夫也被蒙在鼓里，以至陷入尴尬境地。5月21日，科瓦廖夫在答电视记者问时还大谈特工部门终于出现的稳定，说目前不想对国家安全体系进行任何改革。而次日，联邦安全局就从总统办公厅的核心部门接到了这份总统令。

叶利钦总统在这份命令的附件中，向联邦安全局局长提出了优化该组织的机构编制方案。指出联邦安全局目前应包括如下机构：反间谍局、反恐怖活动局、分析预测和战略计划局、组织人

事局、活动保障局、研究和取缔犯罪团伙局、侦查局、搜查行动局、技术局、本部安全局、总务局、隔离侦讯所以及科研中心。三个月后将再增加三个局：对外侦查局、边境局、联邦通讯和信息局。如此一来，前苏联克格勃的下属机构，联邦安全局都有了。

尽管这份总统令没有公布，但反对的人已经提出理由说，一旦打破仿效美国、英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建立的特工机关的现有的制约和抗衡机制，俄罗斯将会重新陷入极权统治。支持的人说，合并特工机关，能提高它们的协作能力，还能节省经费。

但是，不管怎么说，俄罗斯现在的国情摆在那儿，要恢复克格勃式的特工机构可能性不大。另外，即使恢复，也像亚历山德罗夫在其文章最后说的：“即使强力部门的改革能够顺利进行，改革的效力也不会骤然出现。”

结 束 语

对华情报 引而不发

本书有关俄罗斯特工对中国的活动提到得比较少，其原因一方面是俄罗斯现在和中国的关系较好，还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何况俄罗斯本身面临着美国的各种压力和北约的东扩问题，所以中国不是俄罗斯特工活动的重点；另一方面，不是重点并不就是没有活动，只是双方都愿克制，一般不愿把这种活动揭露出来，大肆张扬，造成不必要的两国关系紧张，所以这里也只好暂付阙如。

但是应该明白的是，国家之间的情报特工活动，不论关系好坏，是敌是友，总是免不了的，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或明或暗、或张或弛、或政治军事、或经济科技而已。从历史上看，中国曾受到沙俄和苏联特工的很大危害。沙俄的特工人员在白山黑水、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地进行过大量的以分裂中国为目的的活动。为了梦想在满洲建立黄俄罗斯，沙俄特工还收买了好多中国人为他们服务。

苏联和中国在六七十年代关系紧张时，一度“亡我之心不死”，各种对华特工阴谋也很多。《上海科技报》在1997年3月12日曾报道，1966年3月，毛泽东收到胡志明发来的电报，要求中

国求援鲜血 100 万毫升，以及一批医疗器械、药品。毛泽东立即批示：“人命关天，拟援助 200 万毫升。”铁道部把在杭州改造运血车厢的工作命名为“663 工程”，但克格勃得知情况后，也居然命令其特务杜伟丽进行破坏。这位漂亮的寡妇利用性关系勾结电焊工袁海鸣，逼死了负责“663 工程”的老钳工诸志岱，然后就在车厢两侧内壁夹层放进六个放射性物质发生器，企图以此破坏中国援越鲜血，后被我挫败。

还有一个当时就经过广泛报道的案例是，在 1974 年 1 月 15 日晚上 9 时，苏联驻华大使馆的一秘书琴科夫妇、三秘谢苗诺夫夫妇和武官翻译科洛索夫五人开车到北京西坝桥与李洪枢接头时被当场抓获。李洪枢是受苏联格鲁乌之命于 1972 年 6 月潜入中国的派遣特务，他已多次通过苏联大使馆来转交他所获得的情报。在这次接头中，李洪枢将一只藏有密写情报和工具的大口罩给了谢苗诺夫；谢苗诺夫将一只进行特务活动用的手提包给了李洪枢。手提包中有：一部小型电台，一张同苏联谍报机关进行联系的频率时间表及联络方法的指示，两瓶密码显示影药，一份伪造的边境通行证，特务经费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虽然俄罗斯不同于过去的沙皇俄国，也不同于当年的苏联，俄中两国的关系也不断地向密切和友好的方向发展。但是，正如外国有两句谚语说的，间谍是第二古老的职业（相对于娼妓而言），间谍永远不死。

国内局势 乱麻一团

本书相当多的内容涉及到了俄罗斯特工是如何应付国家复杂的安全局势的，因此不要以为这事与己无关，可以高高挂起。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特工机构精干有力，就会对有组织犯罪活动拼命打击，对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使得像三K党、意大利黑手党和亚裔黑社会等有组织犯罪活动受到限制，这个国家的安全局势自然会相对稳定，人身的安全保障系数就大。反之，黑手党黑社会活动就会猖獗，甚至形成大家以黑对黑，举国为黑的局面。这在南美洲个别毒贩集团横行霸道的国家就是这样。现在的俄罗斯由于旧制度“礼崩乐坏”，新体制还在草创，正是犯罪集团混水摸鱼的大好时机，所以安全局势之坏也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俄罗斯又是一个充满巨大发展机会的地方。各国寻求发展不怕冒险的人趋之若鹜。上海的一些报纸曾发表了介绍外国人在俄罗斯发财的翻译文章，其中《险途赚大钱》，讲波罗的海国家人士是如何在那里经营汽车运输业而成为富翁的；《越南人在俄罗斯大发横财》，讲越南人是怎样由过去的苏联劳工成为如今的俄罗斯大款商人。自然，中国到俄罗斯去经商求学的也有不少人，可是由于不了解俄罗斯的安全局势，不少人吃了大亏。

例如，1994年2月的一天，12名俄罗斯黑手党成员突然闯入中国某公司驻莫斯科办事处，用枪威逼当时在场的人员，搜走了价值3万美金的卢布和美元。这是平时生意往来不注意，让人知

道有钱并且钱在什么地方造成的。

还有，1993年东北某学院选派了36名学员赴俄罗斯伏尔加工业学院学习，其中的林某和邢某是恋爱多年的情侣。他们原与其他学员同住学生公寓，1994年8月暑假后却离开了学生公寓，到校外寻租私人住房，不幸选中了当地黑手党骨干分子埃吉科出租的住宅。林某和邢某把伪装得很和善的埃吉科当成了好朋友，埃吉科很快探知了林、邢的家庭较富裕，他们自己在俄罗斯均有大额美元存款。不久，埃吉科以儿子被绑架为名，向林、邢借款6800美元，林、邢慷慨相助。随后，埃吉科为了撕毁借据并进而占有林、邢的全部钱财，在1994年10月13日以答谢为名，与同伙谢尔盖携带香槟酒和饮料到林、邢住室聚餐。他们趁林、邢下厨房备菜之际，将剧毒药物掺入林、邢的杯中。两人喝下不久，即进入昏迷状态。翌日凌晨，埃吉科及其同伙将昏迷中的林某架上汽车，送到离市区200公里处的树林中，将林推入了事先挖好的坑中，并又残忍地对准其后脑开了一枪，然后掩埋。所幸的是，邢某在埃吉科他们返回前爬出了门外，被人救起送到医院，经抢救后脱离了危险。

俄警方侦破此案后，在埃吉科杀害并掩埋林某的树林中又挖出了16具惨遭其残杀的外国人尸体。据埃吉科供称，这些遇害者全都是他的房客。所以，去俄经商、求学的人员一定要多了解俄罗斯国内的安全局势，并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在寻找生意对象、择屋、交友和金钱往来等方面，都应该小心谨慎，在尽可能多地了解了对方背景后才作决定。

重振雄风 尚待时机

本书所讲的俄罗斯特工，主要是集中在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中的这一段时间范围内。这一段时间正好是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独立并谋求发展的社会大变动时期，一切都比较凌乱，俄罗斯特工自然也免不了被打上时代烙印，挫折较多，而且像整个国家一样，一时也难以从根本上重振雄风。但是从长远来看，俄罗斯一旦其政治、经济等体制的大转折完成，各方面就都会焕发出新的强大活力。俄罗斯是具备这种活力的主观和客观条件的。

在客观条件上，俄罗斯虽然与前苏联不可同日而语了，但与现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相比，它还是真正属于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国家。光是天然气的产量，每年就始终保持在 6000 亿立方米左右（相当于 6 亿吨石油）。领先世界的军事科技不减发展速度，仍有 2 万多枚核弹头，叶利钦还在 1993 年放弃了勃列日涅夫在 1982 年所作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1997 年 2 月，俄罗斯武器出口的主导企业还开始实施新的武器出口战略计划，主要目标是要使俄国在近几年内在武器出口方面赶上世界第一大国——美国。所以，俄罗斯学者进行计算后称，俄罗斯人均自然资源和智力资源的总潜力要超过美国 1~1.9 倍，超过德国 4~5 倍，超过日本 17~19 倍。

在主观上，俄罗斯的大国意识浓厚，并由此而成为它重新崛起的内在动力。叶利钦总统就说过：“俄罗斯的天职就是在众人之中

高出一头。”当年沙俄、苏联的扩张，一部分就是靠着这种大国意识的支持，今后俄罗斯也会由这种大国意识推动着前进。俄罗斯也充分认识到了它要重新成为世界大国，存在着一个最薄弱的环节——经济没有活力，所以俄政府提出了 1997~2000 年的经济发展纲要，决心从现在到本世纪末要使俄经济的年增长率不低于 5%。

俄罗斯这种主客观方面的优势条件充分发挥出来以后，必将再次成为一个雄居在欧亚大陆北部的世界强国。那么它的特工活动，自然也会像以前的苏联克格勃和现在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样活跃而强硬有力。对于这一点，世界上特别是俄罗斯周围的国家是应该有清醒的认识的，从而未雨绸缪。

总之，如果读者读完这本书，能在消遣之余，对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有所了解和认识，那么作者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